



目 录

卷首语

搏击长空冲一流

——2016 年新年献词

校党委书记韩进 校长李晓红 / 3

特别报道

武大跻身 QS 排名亚洲大学 50 强 / 9

2016 中国大学排行榜武大蝉联第四

校友捐赠蝉联第三

陈丽霞 / 11

武汉大学 6 项成果获 2015 年度国家科技奖励

王 泉 / 13

10 人入选“万人计划”青年拔尖人才

居全国高校第六位

刘晓慧 谢 茜 / 15

武汉大学 2015 年十大新闻

/ 17

2015 年年度新闻人物：夏军

——有情怀的水利人

/ 21

1986 级校友专刊

两颗种子

——在武汉大学 1986 级校友入校 30 周年返校日
的讲话

喻 杉 / 25



我们的校园,我们的歌	邓 峻 / 29
醉后知酒浓	符霜叶 / 38
我的珞珈山,八十年代的诗歌	黄 斌 / 41
追忆珞珈年华	梅 朵 / 47
珞珈山往事	项勇义 / 51
当时年少春衫薄	袁文清 / 57
不忘初心 不负珞珈	张彩雯 / 60
东湖水,浪打浪	
——忆我那搏击东湖的青春	张 进 / 62
珞珈,我们回来了	
——纪念 1986 级校友入校 30 周年	吴 德 / 65
词两首	
满江红·凤凰醉 八声甘州·羊年即临	吴 德 / 67
重回珞珈	谢春枝 / 69
再别珞珈	谢春枝 / 72
满庭芳·欢聚	张彩雯 / 75
我还是你原来的那个我	
——入校 30 周年之际献给我的武大	张彩雯 / 76
我的 2016 的青春	侯新军 / 78

珞珈人物

六院士谈一流学科建设	陈丽霞 肖 珊 付晓歌 严 航 / 81
一个班走出三院士	付晓歌 肖淙文 / 89
让保险闪耀人性的光辉 让生命的旅程流光溢彩	陈东升 / 95
丁邦清:母校,我从未离开	付晓歌 严 航 / 101
方平传奇	
——追忆总参某部研究员方平	黎 云 吴 旭 陈春晓 / 104
何五元:有校友的地方就有“珞珈山”	严 航 陈晓煜 / 107
一生信仰铸法魂的李亚钦	贾林伟 范 珺 / 111
他何以成为美国杰出年轻教授	



——对斯隆奖得主彭健校友的外围采访	肖 珊 / 118
一朝樱花树下客,同是珞珈一少年	
——访浙江校友会副会长、公牛集团董事长阮立平	钱亦蕉 / 120
一只小鼠“敲出”世界	王新同 / 126
相遇珞珈·许此为家·山水一程·践行三生	
——记校友陶闯	陈 娟 / 132
谁说美女不博学	
——斯隆奖得主王秋印象	陈丽霞 / 134
王兴喜:为人以善 为学以勤 为官以诚	游笑春 / 136
杨震澎:母校就是我们的原点	付晓歌 严 航 / 143
赵华锋:理想主义的践行者	
——用互联网改变教育,让中国人都有好书读	/ 146
“小土豆”能实现“大梦想”	任思言 / 153
朱征夫:精神的归宿	严 航 付晓歌 / 156
矢志土肥研究 伉俪比翼齐飞	
——记 1950 级校友张肇元、周清湘	李烈荣 / 159

珞珈记忆

夏日的一个地方——A Summer Place	陈卫民 / 169
我在武汉大学见到毛主席	陈珠培 / 171
难忘在武大进修的日子	陈震文 / 173
刘双平珞珈忆旧:与东湖为伴的 14 载青葱岁月	
	郭 瑶 胡 华 / 186
“珞珈三女杰”之苏雪林	怀 俊 / 197
一则民间故事造就一位汉学家	
——李格非先生在莫斯科大学讲学逸闻	胡 欣 / 217
我的武大记忆	黄奇志 / 220
摄影社那些事	
——我的武大回忆	李 昕 / 226



青山绿水珞珈校园	李淑芳 / 232
就这样望着你的脸	李少君 / 236
乔木思旧国 珞珈唤归魂	
——缅怀汤子炳(商皓)学长	刘以刚 / 241
请将这张唱片留给我	刘一民 / 247
最美大学与曾经的建筑商	李亚楠 / 257
吾大武大	覃瑞强 / 261
病房里的火热青春	苏者聪 / 265
我的珞珈春秋	史可夫 / 268
回忆关文发先生二三事	孙卫国 / 276
国立武汉大学初创十年(1928—1938)素描	涂上飙 / 280
武大“十区”考	涂上飙 / 283
不思量 自难忘	
——忆千帆老师的几件事	吴志达 / 295
最美大学的最美回忆	王 军 / 305
大清炮队	
——忆我们曾经的校园乐队	吴伟文 / 309
歌声里,有一整个诚恳的时代……	王晓莉 / 311
珞珈的流光	叶 慧 / 314

校友文苑

回珈	陈 勇 / 319
当珞珈把一世的浪漫交付你我	陈 勇 / 320
满江红·井冈山行	邓少君 / 322
同窗聚会	冯从善 / 323
七律·七十述怀	胡德坤 / 324
告别武大	
河南校友会 2010 届社会学专业本科毕业生集体创作	/ 325
一剪梅·鲲鹏广场	怀 俊 / 328
2016 年“校友年度捐赠”附诗二首	孔令仁 / 329



三月的樱花	李福信 / 330
长在春天的珞珈山上	李立屏 / 332
七律·珞珈山	刘鲁颂 / 333
告老还乡有感	刘 征 / 334
九十抒怀	闵朝斌 / 335
贺闵朝斌学长九十大寿	罗肇森 / 336
东湖赋	陶佳珞 / 337
珞樱赋	陶佳珞 / 338
春分	夏 斐 / 339
珞珈缘	于 刚 / 340
八十抒怀	叶国源 / 343
珞珈红	杨光芷 / 344
武大的树	喻 杉 / 345
水调歌头·中秋忆珞珈	杨宜城 / 347
赞美	阎 志 / 348
红叶之歌	
——45 年重聚首	邹昌仁 / 349
蝶恋花·忆念	钟道才 / 352
珞珈赋	张恩东 / 353
七律·酬答原《湖北日报》文艺副刊主编张宿宗惠赠	
书法大作	曾世竹 / 355
东湖赋	邹惟山 / 356
武大同窗久别重逢	张文元 / 359
《武大校友通讯》捐订名录	
(2016 年 1 月 1 日—2016 年 12 月 31 日)	/ 360
征订征稿启事	/ 361
关于进行校友信息登记的通知	/ 362

卷首语





搏击长空冲一流

——2016 年新年献词

校党委书记韩进 校长李晓红

老师们、同学们、校友们、朋友们：

春秋迭易，物换星移，转眼又是新一年。

值此辞旧迎新的喜庆时刻，我们谨向全校师生员工、离退休老同志、海内外校友，以及所有关心、支持武汉大学建设与发展的各级领导、各界朋友，致以新年的祝福！

回首 2015，学校发展的点滴成绩都定格成难忘的历史记忆，它刻画出武大人同心筑梦、振翅飞翔的酷劲流线。

这一年，我们备感自豪，武汉大学在 QS、US News 等世界权威大学排行榜中稳步上升，从去年 300 多名跃升至今年 250 多名；在竞争更加激烈的形势下，保持 12 个学科进入 ESI 全球前 1%，学校综合实力再上新台阶！

这一年，我们顶天立地，学校新晋 1 名中科院院士，新增“长江学者”“千人计划”“杰青”等“国字号”人才 54 人；一批年轻学者在国际学界崭露头角，武大人以第一作者在世界顶尖学术期刊 NSC 发表多篇高水平论文，取得历史性突破；国际法研究所入选首批国家高端智库，是全国依托大学建设的 6 家专业化智库之一，高水平科研平台数量持续增加；6 项成果荣获“国家科技三大奖励”，34 项成果荣获全国高校人文社科研究优秀成果奖，学校核心竞争力稳步提升！

这一年，我们桃李芬芳，“互联网+”创新创业大赛武大学子荣获金奖数全国第一，“挑战杯”全国大学生课外学术科技作品竞赛



获4项一等奖，创历史最好成绩，国际名校赛艇挑战赛勇夺冠军，人才培养质量进一步彰显！武大校友尽展珞珈风流，习近平总书记听取雷军汇报“小米”，世界互联网大会哈萨克斯坦总理马西莫夫全程秀中文惊艳全场，武大同一班级3位校友先后获评院士传为佳话。校友事业有成之后深情回馈母校，学校累计接受社会捐赠协议金额再过亿元，蝉联中国大学校友捐赠排行榜前三位，校友参与学校建设的热情持续高涨！

这一年，我们欢欣鼓舞，学校首次荣获“国家文明单位”，中央和省市政府对学校的支持力度进一步加大，湖北省政府继续划拨专项经费支持学校争创世界一流大学，学校发展环境进一步优化；在省市政府大力支持下，学校启动工学部东湖南路沿线综合整治和东湖水厂环境改造，致力于打造更高品质的珞珈山水美景，全校师生精诚团结的正能量不断增强！

追溯“十二五”，我们一步一个脚印，一年一个台阶。五年之前设定的各项目标已经实现，部分核心指标超额完成。五年砥砺，五年辉煌，武大人用自己的心血和汗水，在学校发展史上谱写了绚丽的篇章！

展望2016，面向“十三五”，我们任重道远。当前，冲击世界一流大学和一流学科的集结号已经吹响，大学之间的竞争好比群鹰振翅、彩鸾齐飞。而我们的梦想，就是要打造中国最具国际影响力的大學，就是要打造世界最美丽的大学，就是要打造世界一流本科教育，培养引领社会进步和文明发展的国家脊梁和领袖人才！

我们要以乘势而上的冲劲，持之以恒地推进内涵发展，不断积蓄冲刺世界一流大学的强大动力。

我们要以雷厉风行的作风，坚定不移地推进综合改革，充分激发冲刺世界一流大学的强大活力。

我们要以卓尔不凡的气度，矢志不渝地打造卓越文化，齐心汇聚冲刺世界一流大学的强大合力。

天蕴浩气，其精为星；地含灵秀，其晶为人。让我们在新的一年里，携手共进、同心戮力，汲天地之精华、沐珞珈之毓秀、提学人之精神、扬武大之雄风！我们坚信，凭借武大人舍我其谁的宏大



气魄和只争朝夕的进取精神，武汉大学这只鲲鹏一定能在世界一流大学建设的万里长空乘风而起、扶摇九天！

祝所有武大人以及关爱武大的人们新年快乐！

愿武大的明天更辉煌！

（原载武汉大学新闻网 2015-12-31）

特别报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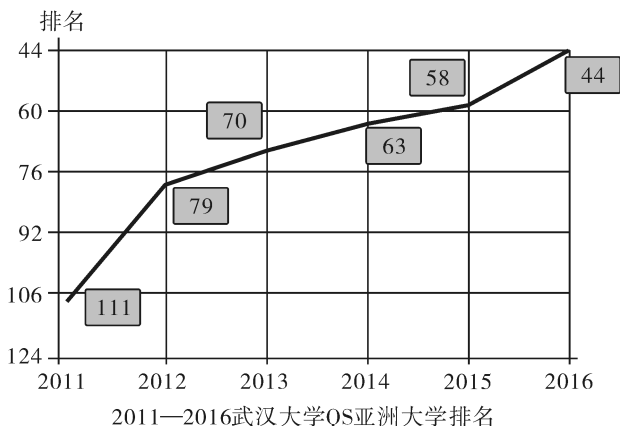




武大跻身 QS 排名亚洲大学 50 强

英国 QS 全球教育集团 14 日发布 2016 年“QS 亚洲大学排名”，26 所中国大陆大学跻身亚洲百强大学行列。武汉大学较去年上升 14 个名次，进入亚洲前 50 名，居第 44 位，大陆高校排名第 9 位。

从 2011 年的第 111 位，到 2012 年进入前 100 名，武大持续发力，排名不断上升，2016 年跻身 50 强。5 年中，武汉大学大陆高校排名从第 17 位上升到第 9 位。



跟随数据来回顾一下武汉大学的排名情况：2011 年第 111 位，大陆高校排名第 17 位；2012 年第 79 位，大陆高校排名第 14 位；2013 年第 70 位，大陆高校排名第 12 位；2014 年第 63 位，大陆高校排名第 12 位；2015 年第 58 位，大陆高校排名第 11 位；2016 年



第 44 位，大陆高校排名第 9 位。

“QS 亚洲大学排名”在去年的基础上增加了 50 所大学，总计有 350 所大学进入榜单。今年中国共有 124 所大学入选，其中，中国大陆 82 所、香港 7 所、台湾 34 所、澳门 1 所。共有 10 所内地高校位列前 50，分别是：清华大学(5)、北京大学(9)、复旦大学(11)、上海交通大学(22)、南京大学(23)、浙江大学(24)、中国科技大学(25)、北京师范大学(40)、武汉大学(44)、中山大学(47)。

据悉，QS 排名主要以学术及雇主声誉、师生比例、教师发表论文引用、国际化程度、学术影响力作为评分指标，今年增加博士教师数量、教学品质作为新的衡量指标。

(原载武汉大学新闻网 2016-6-16)



2016 中国大学排行榜武大蝉联第四 校友捐赠蝉联第三

陈丽霞

2015 年 12 月 30 日，中国校友会网正式发布《2016 中国大学评价研究报告》，武汉大学位列第四，并蝉联校友捐赠排行榜第三。

此次排名前五的高校分别是：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复旦大学、武汉大学、浙江大学。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和武汉大学位列 2016 中国大学校友捐赠排行榜前三。

此外，报告还首次公布中国七星级、六星级、五星级大学名单，武汉大学等七所学校位列六星级。报告称，中国七星级大学是世界知名高水平大学，六星级大学是世界高水平大学、中国顶尖大学。

该排行榜已连续 14 年发布，成为目前中国最具特色，最有公信力、影响力和知名度的大学排行榜公益领导品牌之一。

2015 年，武汉大学综合实力、国际竞争力和影响力不断提升，在国际国内逐渐形成了品牌效应：12 个学科进入 ESI 全球 1%；跻身中国大学世界排名“G9 集团”；US News 排名 251 位，QS 排名 273 位，泰晤士亚洲大学排名第 49 名；中国大学教学质量评价报告排名第四。

这一年，武大校友也十分给力：2015 年，学校接受校友和社会各界捐赠协议金额约 1.1 亿；设珞珈创新天使基金助学子创业；由卓尔公司董事长阎志校友捐资支持建设的体育馆已开工建设；第二届校友珞珈论坛上，陈东升等一批校友大咖回校亲授“互联网+”创新创业秘笈；万林艺术博物馆落成开放；郭水尧回校举办“风景



如画”风光摄影展，展出自己 13 年的摄影成果；“微爱珞珈”汇聚爱心，资助家庭经济困难学生；北京、武汉、青岛、广州、上海、珠海、深圳等地校友建立或正在筹备建立珞珈校友咖啡馆，为校友互助、资源共享提供实体交流空间。

（原载武汉大学新闻网 2015-12-31）



武汉大学 6 项成果获 2015 年度 国家科技奖励

王 泉

2016 年 1 月 8 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在京隆重举行 2015 年度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大会。我校共 6 项成果获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其中主持完成的 2 项成果分别获自然科学二等奖和技术发明二等奖，参与完成的 3 项成果分别获国家科技进步二等奖，与我校合作的外籍教授 Joannes E. Frencken (约翰尼斯·弗兰肯) 获国际科技合作奖。

党和国家领导人习近平、李克强、刘云山、张高丽、刘延东等出席大会并为获奖代表颁奖。

我校获奖成果中，舒红兵院士主持完成的“抗病毒天然免疫信号转导机制”获自然科学二等奖。该项目围绕抗病毒天然免疫识别、信号转导与调节进行了系统和深入的研究，推动了对抗病毒天然免疫信号转导和精细调节机制的了解，为诠释宿主如何抵御病毒感染提供了重要的基础知识，为了解病毒诱导的炎症反应和自身免疫疾病的机制提供了重要线索，同时也为抗病毒药物和疫苗研发、抗炎症和自身免疫疾病药物研发提供了潜在的分子靶标。“这个项目的意义在于，揭示了抗病毒免疫与炎症反应的系列分子机制，让我国在相关领域的国际竞争中占有一席之地。”舒红兵说。

钟波教授代表该团队赴京领奖，他介绍，病毒感染引发的各类疾病对人类的生命安全构成极大威胁，“我们的发现揭示了宿主在第一时间识别病毒并产生免疫应答这一重要生理过程，推动了对病毒免疫学学科的了解，有些研究成果已经写进了教科书。此外，这



些成果也为未来抗病毒药物的开发提供了理论基础。”感受到党和政府对科研创新和科研人才的重视与大力支持，钟波大受鼓舞，“回国三年来，我切实感受到了中组部、武汉大学以及生命科学学院、医学研究院等单位的领导在工作、科研、生活等各个方面对我的关怀与爱护。此次获奖，既是我们过去十年研究的一个里程碑，更是未来我们研究的基石。”

李清泉教授主持完成的“道路路面动态检测关键技术及装备”获技术发明二等奖。该项目围绕路基路面性能影响理论、高速无损快速检测原理和技术，开展了道路路面动态检测方法研究和系列重大装备研制，攻克了道路弯沉快速检测等一系列技术难题，突破了数据自动处理行业瓶颈，实现了道路全指标动态检测，研制了具有完全自主知识产权的系列检测装备，在国家交通事业发展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产生了显著的经济和社会效益。

在参与完成成果方面，测绘遥感信息工程国家重点实验室邵振峰教授等参与完成的“国家数字城市地理空间框架技术体系构建与应用”、水利水电学院陈胜宏教授等参与完成的“水工岩体特性评价与工程利用关键技术”、遥感信息工程学院孟令奎教授等参与完成的“大数据驱动的水文多要素监测预报关键技术与应用”分别获科技进步二等奖。

与我校口腔医学院樊明文教授合作的荷兰奈梅津(Radboud)大学牙学院教授 Joannes E. Frencken 获国际科学技术合作奖。他是世界卫生组织合作中心口腔诊疗计划和未来规划负责人，长期从事口腔预防医学和微创牙科学等领域的研究，一直致力于龋病流行病学、龋病预防及 ART 技术在中国的研究和推广应用。

据悉，本年度国家科学技术奖共授予 295 项成果和 7 位外籍科技专家。授予国家自然科学奖 42 项，其中一等奖 1 项、二等奖 41 项；国家技术发明奖 66 项，其中一等奖 1 项、二等奖 65 项；国家科技进步奖 187 项，其中特等奖 3 项、一等奖 17 项(含创新团队 3 项)、二等奖 167 项；7 位外籍科学家获国际科技合作奖。

(原载武汉大学新闻网 2016-01-08)



10 人人选“万人计划”青年拔尖人才 居全国高校第六位

刘晓慧 谢 茜

中组部近日公布 2014 年“万人计划”青年拔尖人才入选名单，我校 10 人入选，居全国高校第六位。其中哲学社会科学、文化艺术类 4 人，仅次于北京大学，居全国高校第二位。

10 位国家“万人计划”青年拔尖人才入选者中，自然科学类入选者有：物理科学与技术学院廖蕾、化学与分子科学学院袁荃、资源与环境科学学院沈焕锋、遥感信息工程学院乐鹏、药学院王连荣和刘天罡；哲学社会科学、文化艺术类入选者有：法学院罗国强、信息管理学院吴江、公共卫生学院王培刚、中国传统文化研究中心余来明。

我校此次“万人计划”青年拔尖人才入选结果呈现新亮点：

一是学科覆盖面广。入选者涵盖基础学科如物理、化学领域，传统优势学科如测绘遥感、信管、法学领域，新兴学科如药学、公共管理领域，体现了综合性大学的优势和多学科共同发展的态势。

二是人文社科成绩突出。学校实施了基础学科振兴计划、哲学社会科学繁荣计划，高度重视人文社科领域的发展；积极推进人文社科学术研究队伍建设，培植“70 后”学者学术发展计划学术团队；“351”人才计划加大对人文社科领域的支持，有力推动人文社科队伍建设。

三是人才引进和培养体系根基夯实，人才培养成果丰硕。10 位入选学者中，有 7 位是武汉大学“351”人才计划入选者，其余 3 位是我校 2010 年引进人才。学校重视青年后备军队队伍建设，出台



了青年教师队伍建设的专门文件和一揽子建设措施，实行全员聘用，激发活力，提升了青年教师队伍的质量。“武汉大学青年教师占到了全体教师的 60% 以上，他们就是人才金字塔的塔基。”校长李晓红如此诠释。这些充分体现了我校着力贯彻“引进、培养、稳定、提高”的工作方针，用人才支撑发展，在发展中造就人才。

据悉，本次全国共有 354 人入选“万人计划”青年拔尖人才。青年拔尖人才支持计划是“万人计划”的重要组成部分，预计将在十年内遴选出 2 000 名具有较大发展潜力的青年人才。按照“万人计划”相关措施，入选者将获得国家经费、政策和服务等方面的支持。

(原载武汉大学新闻网 2016-01-04)



武汉大学 2015 年十大新闻

12 月 31 日，学校十大新闻评选委员会经过严格认真评审，评出了“武汉大学 2015 年十大新闻”和“武汉大学 2015 年度新闻人物”。分别是：我校首获国家科技进步奖创新团队奖；我校获“全国文明单位”荣誉称号；武大跻身中国大学世界排名“G9 集团”；国际法研究所入选首批国家高端智库；舒红兵获《自然》杰出导师奖；全面深化教学改革，打造一流本科教育；全国创新创业大赛我校学子表现出色；中国大学校友捐赠排行榜我校蝉联前三；比利时国王访问武汉大学；深夜护学，武大“专车”火了。年度新闻人物：夏军。具体内容如下：

一、我校首获国家科技进步奖创新团队奖

1 月 9 日，中共中央、国务院举行 2014 年度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大会，我校 6 项成果获奖，其中由李德仁、刘经南、龚健雅三位院士带领的对地观测与导航技术团队获国家科技进步奖创新团队奖，我校是继清华大学后第二个获得此奖的教育部普通高等学校。该团队长期聚焦学科前沿和国家重大需求，取得了一批国际领先的成果，是国际上本领域最具影响力的团队之一。团队依托的测绘遥感信息工程国家重点实验室，20 年中连续四次被国家科技部评估为“优秀”，并牵头组建了地球空间信息技术 2011 协同创新中心。



二、我校获“全国文明单位”荣誉称号

我校首次获得“全国文明单位”荣誉称号，这是中央文明委授予的国家文明创建工作最高荣誉，是对一个单位各项工作的综合检验与评价，也是我校十余年奋斗的成果，标志着我校文明创建工作迈上新台阶，实现新突破。

三、武大跻身中国大学世界排名“G9 集团”

3 月份公布的中国大学评价结果显示，包括武汉大学在内的 9 所大学，同时进入全球最具影响力和权威性的三大世界大学排行榜——泰晤士报高等教育、QS、US News 的 500 强（武汉大学同时进入 400 强），被称为世界大学排行榜上的中国大学“9 校集团（G9 集团）”。本年度我校在世界大学排行榜的排名大幅跃升，其中 US News 排名 251 位、QS 排名 273 位，学校综合实力、国际竞争力和影响力不断提升。

四、国际法研究所入选首批国家高端智库

武汉大学国际法研究所入选首批 25 家国家高端智库，是法学领域唯一入选的研究机构。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民革中央主席、武汉大学法学院教授万鄂湘为首席专家。建设中国特色新型智库是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提升国家软实力的重要举措，全国首批共有 6 所高校入选。

五、舒红兵获《自然》杰出导师奖

12 月 8 日，2015 年《自然》杰出导师奖名单公布，5 名中国科学家获此殊荣，我校舒红兵院士榜上有名。《自然》杰出导师奖用于嘉奖优秀的科学领域的导师，强调导师启发年轻科学家的重要



性。舒红兵带领团队取得了丰硕的科研成果，他回国以来共培养了39位研究生，全部获得博士学位，其中三人获得了全国百篇优秀博士学位论文奖。

六、全面深化教学改革，打造一流本科教育

2015年，学校深入开展以“提升人才培养质量”为主题的本科教育改革大讨论，11月3日召开了全校本科教育工作会议，推出优化专业设置、压缩招生规模、强化创新创业教育等18个方面63项改革举措，全面深化教学改革，进一步巩固本科教学中心地位，打造一流本科教育。

七、全国创新创业大赛我校学子表现出色

10月19日至21日，首届中国“互联网+”大学生创新创业大赛全国总决赛举行，我校获集体奖，3支参赛队伍均摘得金奖，获金奖数全国第一。我校采取有力措施支持大学生创新创业，学子在多项赛事中表现出色。第14届“挑战杯”全国大学生课外学术科技作品竞赛获4项一等奖，创参赛28年来的最佳成绩；第六届全国大学生数学竞赛决赛获5个一等奖。

八、中国大学校友捐赠排行榜我校蝉联前三

2015年，我校蝉联中国大学校友捐赠排行榜前三名。校友踊跃捐资助学，大力支持母校发展。其中，陈东升校友捐建的万林艺术博物馆5月9日正式开馆；由陶闯校友倡议，学校和武昌区出资以及武汉珞珈校友企业联盟有限公司向武大校友募集资金共1亿元，于11月10日成立了珞珈创新天使基金，优先支持我校师生校友创新创业；阎志校友捐资支持建设的武汉大学卓尔体育馆，12月20日奠基动工。



九、比利时国王访问武汉大学

6月22日，比利时国王菲利普来校访问，被授予武汉大学名誉教授称号。菲利普在校史馆发表英文演讲，并与学生代表座谈，希望通过学术人文交流，搭建两国间沟通的桥梁。我国驻比利时王国大使馆教育处参赞陶洪建校友认为，武汉大学在法语教学中有良好的传统，比利时国王的访问将再次提升武汉大学在比利时的关注度和知名度。

十、深夜护学，武大“专车”火了

7月份，一位学生在BBS上发言，感谢保卫部深夜提供“专车”护送她回寝。“深夜护学”是关爱和服务学生的新举措。为了确保晚归学生尤其是女生的安全，消除单独夜行女生的恐慌心理，保卫部每晚安排5台巡逻车、10名保安巡逻，鼓励学生打电话求助，必要时安排专车护送回寝室。已有200余名学生享受了这项服务。此举在微博、微信等新媒体上受到广泛关注，好评如潮。

(原载武汉大学新闻网 2015-12-31)



2015 年年度新闻人物：夏军

——有情怀的水利人

2015 年 12 月 7 日，水利水电学院夏军教授当选为中国科学院地学部院士。

水，实现了他的梦想，也滋润了他的心灵。



20 世纪 70 年代初，夏军怀揣投身水利建设事业的理想，结缘水文学及水资源研究，在水文时变非线性理论研究与创新方面取得了系统性成果，曾获“国际水资源管理杰出贡献奖”，是首位获国际水文科学领域最高奖“国际水文科学奖-Volker 奖章”的中国学者。



国际水文科学大会评价：“他是一位杰出的科学家，在发展水文科学与实践的知识与战略、在中国乃至全球的水管理与可持续发展及应用方面，做出了创新性贡献，在国际社会产生了重要的影响。”夏军教授在水文水资源教育、水专业人才培养方面，也做出了重要贡献。

（原载武汉大学新闻网 2015-12-31）

1986 级校友专刊





两颗种子

——在武汉大学 1986 级校友入校 30 周年返校日的讲话

喻 杉

尊敬的校领导和老师们，亲爱的师弟师妹们：

你们好！很高兴又来到珞珈山下。其实，我好像从来也没离开过，我是说，我的心。我的心，一直和武汉大学在一起。

你们在 30 年前走进武汉大学校门的时候，我刚刚离开珞珈山两年。

两年前，我和你们的许多师兄学姐们，在这里庆祝了我们的毕业三十周年。因此，我非常理解你们此时此刻的心情。这心情，远远不是“激动”两个字可以概括的，还应当有对青春的追忆，对师长的感激，也许，还有对一段情感的纪念。

百感交集中，我愿意讲一个话题，题目是：

两颗种子

你们和我一样，跨入武汉大学校门时，化身为一颗种子，种植在珞珈山下。

这颗种子，在这里受到了很好的呵护。这里有肥沃的土地，有充沛的雨水，还有充足的阳光，当然，还有技艺高超又尽心尽力的园丁。

种子在这里生根发芽，长成茁壮的树苗。

其间也许有风风雨雨，也许有旱涝虫灾，但是，珞珈山是一块宝地，在这里，有大树的护卫，小苗们也把自己的根系紧紧地缠绕在一起，能够战胜任何的困难而茁壮成长。



当然，人生下来就是一颗种子，但这是作为一个自然人的种子，这颗种子，有父母的呵护，一定是会长大的。上小学时，也是一颗种子，这是求学的种子，小学的老师都是启蒙老师，这颗种子汲取的是最基本的学识的营养。

上大学时，这颗种子大不一样，这是一颗将要成长为栋梁之才的种子。前面的两颗种子此时是和这颗种子并在一起的，有了青春的年华，有了基本的知识，此刻这颗种子播下去，是要成长为栋梁的。

很幸运的是，我，还有你们，都被播撒在武汉大学的校园里，在这里，这颗种子真正成长为栋梁之才。

我知道，你们中的大多数人，都在自己的岗位上成为骨干，独当一面，事业有成。

回到母校，你们是毫无愧色的。正像那句话说的，入学时，你们以母校为荣，现在，母校以你们为荣。我这个学姐，也以你们为荣。

现在我要说第二颗种子。

30年过去了，当年的小树苗已经是参天大树了，在你们这棵大树下，也撒下了不少的种子。人类就是这样一代代传承的，文明也是这样一代代传承和发展的。

这些种子，也许是你们的子女，也许是你们的学生，你们也一定像当年珞珈山的大树呵护你们一样呵护着他们。

今天我要说的不是这些种子，而是你们自己。

30年的时间，你们完成了从种子到大树的转换；现在，你们又应该成为种子，一颗新的、更有能量的种子。

就是说，从现在开始，可以，而且应该开始一个新的学习和成长的过程。

前几天，一个美国人、哈佛大学费正清中心的主任宋怡明到我家，说了这样一个观点，他说，人到了五十岁左右，开始学习一项新技能的时候，反而会更加得心应手，因为有了很多阅历，理解力也强了，所以，很多东西反而会比年轻的时候学得快。

他是在看了我先生画的很多人物画以后发出这番感想的。



其实，这不符合中国人“人过 30 不学艺”的传统观念。当然，宋怡明自己也有切身感受，他现在在学钢琴，也很有心得。

我先生因为“文化大革命”的影响，初一没上完就辍学了，从没学过画画。去年，他突然心血来潮，开始学画画。结果，两个月的时间就画得像模像样了，而且从蜡笔到水粉到油画，不断进步。去年秋天，他的画在日本的一个艺术展览上获了奖，今年又受邀参加更大规模的画展。在下个月的北京国际长城马拉松比赛上，他的画将被作为奖牌的图案，而且还被邮票公司制作成了邮票。今年以来，他还有了经济收益，卖画收入已有几十万元。当然，他的这些收入都将用于我们公益方面的支出。

我以为，他的画比起真正的画家来，技艺差了不少，但他的画有他几十年丰富的人生经历蕴藏其中，构成他画作的特殊意境。

我本人也有这样的体会。我以前并没有学过跳舞，也不会，最近几年，出于锻炼身体为目的开始学习跳舞，很快就上了轨道。现在有不少人问我，以前是不是专业舞蹈演员。

有舞蹈家评价我很有“舞感”，特别是我的即兴舞蹈，具有幸福快乐的感召力。我的轻盈和灵动怎么能与那些年轻的舞蹈演员比？但我相信我对音乐和舞蹈本身理解的深刻与丰富，会让我的舞蹈饱含情感与温度。

现在看来，舞蹈不但能够锻炼身体，还对工作帮助很大。最近几年，我们开展民间外交，很多外国人到我家开会，或者只是做客，在茶余饭后的轻松时刻，我常常会即兴使用舞蹈这门国际通用的语言，它对于消弭、化解拘谨与隔阂，发挥了不少作用。

就是说，这颗 50 岁播下的种子，还可以生长出不一样的、更加多彩的树苗来。

其实我只是一个小小的例子，我们还有很多学长和校友，事业非常成功，但是还在不断学习进取。例如陈东升、雷军、艾路明、毛振华，等等，他们早已是参天大树了，但是，还是把自己当做一颗种子、一颗不断学习的种子。

人生是分为若干个阶段的。传统的观念是这样告诉我们的，什么时候上学，什么时候结婚生子，什么时候努力工作，什么时候该



告老退休。

但是，我们武大的校友应当有新的观念和新的行为。

现在，生活和医疗条件越来越好了，几乎能多给我们 30 年左右的丰富人生；同时，因为有了互联网，学习和沟通的条件也更好了。所以，我们既要打破“人过 30 不学艺”的旧观念，也要打破到了 50 准备退休过悠闲生活的观念。

走进大学校园是一个开始，毕业三十年后，可以看做是另一个开始，是比前一个开始更加精彩的开始。

现在，我站在台上，看到台下，既是一片参天大树组成的森林，又是一颗颗颗粒饱满的种子，再过几十年，又是一片森林。

那时候，两片根深叶茂的森林连在一起，格外壮观，我们每个人都会说，看，武大的种子，武大的森林。

亲爱的 86 级师弟师妹们，感谢你们给了我这个机会，在你们大团圆的日子里，亲眼见证并分享你们的喜悦和幸福，也见证你们的成功。衷心地祝福大家，再次谢谢你们的邀请和信任。

（作者系中文系 1980 级校友）



我们的校园，我们的歌

邓 峻

刘一民毕业，我进校。

1986年秋，我从湖南耒阳某部队驻地军训回到校园，已近10月尾。

顶着在部队剃的小光头，我参加了学校的校园歌手大赛，在小操场一个清凉的夜晚，我登台演唱了《血染的风采》，得了一个鼓励性质的三等奖。当时校艺术团的台柱、中文系1985级的吴伟文清楚地记得物理系1986级的张震拿了第一名。

正是在这次歌手大赛前后，中文系1982级的杨树与刘一民在校期间合作的《请将这张唱片留给我》《别离》《你向我走来》风靡了整个珞珈校园。其中，《请将这张唱片留给我》在歌手大赛上分别被两名歌手演唱，其中之一就是吴伟文，另一名是新闻系1984级的张霞。

曾有那么一周，当黄昏悄悄来临，校园里便响起“茫茫世界，茫茫人海，多少悲欢，多少离合，请将这张唱片留给我，请祝我们都有好生活”的歌声，那旋律在秋色深重的暮霭中，从高高竖立的校广播台喇叭里流淌出来，忧伤而宽广。

时隔30年，这首歌成了我们那个年代珞珈学子聚会时的饮歌（喝酒时一唱百和的歌）。

那一年夏天，刘一民毕业留校在研究生院工作。1986年秋季开学之后，确切地说，在新生湖南军训回校之后，他成了吉他基础班的老师。

歌手大赛结束后，因为仰慕刘一民的大名，我报了吉他基



础班。

便是从那之后，我开始对创作校园歌曲感兴趣，粗通吉他和弦之后，便斗胆开始以先词后曲的方式，在几个基本吉他和弦之中，捕捉搭配歌词的旋律。

我清楚地记得，那年冬天，我写下了我的第一首歌《梦里的树枝》，歌词和旋律已无法记起，但节奏类型是轻松的 2/4 拍。

1987 年春季开学后，我写下第二首歌《判断》，歌词写得“为赋新词强说愁”，旋律现在听来，有点高冷的文艺腔。在 CP 歌会（CP 是英文 campus 的缩写，CP 歌会如何创立的，我又是如何加入 CP 歌会的，我已无从记起）的创作讲习班上，这首歌引起当时在武大做客卿的水利电力学院音乐教研室老师江柏安的注意。江老师现在已经是武汉大学艺术学系的教授。1987 年，他以这首歌为演唱曲目，参加武汉市青年歌手大赛，纯粹玩票性质，却一举打入前十。这段往事，恐怕现今的武大学子无人知晓。

江老师在 CP 歌会的一次创作研习班上，当众提到了《判断》这首歌，因为在这首歌的第一个乐句中，我不自觉地用了“7”这个不稳定的导音，他以此作例，介绍了旋律走势安排当中的一些常用技巧。他大概不知道，他这一提，颇让我受宠若惊，毫无疑问地鼓舞了我。研习班主要由江老师讲授基本乐理和简谱记谱技巧，这令我受益匪浅。

1987 年创作的《一种情绪》的歌词，是吴伟文的同班同学张静发表在校报上的一首诗。我那时在校报做学生记者，校报第四版副刊经常发表学生作品，这首诗刊登在副刊左下角：

流浪是件美好的事
你们也想穿件牛仔裤
像游魂从城市到城市
仿佛你们已将世界丢失……

这是一首画面感绝佳的歌词。那时，《著作权法》还没有出台，我也没有基本的版权概念，在没征得张静学姐的同意下，便擅自把



它谱曲，至今，我甚至连张静的面都没见过。

近 30 年后，我通过吴伟文联络上张静，跟她在微信里提起这事，她回答说：“那个时候啊，诗歌被人喜欢就很开心了。”

《一种情绪》的情绪层次很丰富，给了歌手充分的表达空间，我自己很喜欢这首歌，周围的朋友也很喜欢。30 年后，我用手机编曲软件，唱了一个爵士版的《一种情绪》，与校园时的青春迷离相比，多了一种自在洒脱。

同期的《淡忘季》，是写给小女生的歌，“淡忘季，淡忘季，淡忘季里也不能忘你；淡忘季，淡忘季，淡忘季里更是想你”。在我的想象中，这是一首在樱花雨飘落的日子唱给她听的情歌，只是那时，我其实并不懂爱情。

1987 年秋，学校举办首届金秋艺术节，中文系 1985 级刘晓霞以一曲《一帘幽梦》夺得校园歌手大赛通俗唱法第一名；吴伟文再次以杨树、刘一民合作的原创歌曲《未来曾显得遥远》参赛，拿到二等奖，他在决赛演唱这首歌的时候，刘一民率教工乐队以电子琴、电吉他、架子鼓为主要配置编制了伴奏。继《请将这张唱片留给我》之后，《未来曾显得遥远》再次登上校广播台的《每周一歌》。

我也参加了那一届的校园歌手大赛，但在海选时就被刷了下来，这让我颇为沮丧，此后半年心灰意冷，把精力主要放在了校报学生记者站的工作上。一直到 1988 年暑假结束，这种情绪才缓过来。

或许，年轻就该是这样的，有一点点在乎，有一点点情绪，有一点点任性。

1988 年秋季开学，中文系在桂园食堂二楼开迎新晚会，中文系 1988 级的胡昉与英文系 1988 级的黄海钟现场自弹自唱了胡昉创作的《我们的文字》，歌词幽默调皮，透着个性化的文化追求，曲风清新，尤其现场的和声感觉特别好。胡昉，浙江湖州人，清秀而纤瘦，这身形他一直保持到 28 年后的今天。他们演唱完之后，我找到负责主弹吉他的胡昉——我不擅主动接触人，这是一个意想不到的例外，他的才能确实吸引我。

老实说，我的曲风偏商业化，胡昉的创作则灵气十足，总会有



让人意想不到的旋律抓住我的耳朵。在乐理知识和吉他弹奏方面，胡昉更是在我之上。

从这一天开始直到 1993 年我离开工作地海口赴美，我和胡昉在音乐创作上一直保持着密切合作。1992 年，他从中文系毕业后到海口工作了一段时间，1993 年春天，胡昉、我和另一位朋友在湿热的海口，以胡昉的吉他伴奏录过一个 12 首原创歌曲小样。随后，胡昉赴广州工作，把小样带到广州各大音像出版社“毛遂自荐”。拥有毛宁、杨钰莹、林依轮等大牌歌星的广州新时代影音公司最终挑中了一首我写的《边唱边走》，以 2000 元人民币买断了这首歌的词曲版权，改歌名后收录在殷浩的专辑《从你的房子里面走出来》。当时我人已在美国，和胡昉商量，让他用这笔钱买一台 MIDI 合成器。

1988 年金秋艺术节，本来已不打算再参加校园歌手大赛的我，经不住在法学院学生会工作的同年级同学贾国彪、莫野的死缠烂打，再一次报名参赛。

预赛演唱的是《垄上行》，这是我从中学开始就拿手的曲目。凭此歌我轻松进入决赛。按照大赛要求，决赛现场需要演唱两首歌曲，除了《垄上行》，我决定演唱自己在那年秋季开学之后作词作曲的《不再回首》。

我原本是想请胡昉为《不再回首》作吉他伴奏，但在彩排时，看到同时进入决赛的英文系 1986 级的王敏，动用了从校外请来的电声乐队。我和王敏在 CP 歌会混得很熟，搭着她的关系，顺便也请这支电声乐队利用彩排间隙帮我合了伴奏。

有了乐队，伴奏效果自然丰富很多。在决赛现场，《不再回首》的演唱取得了意想不到的好效果。大赛结果也出乎意料，我凭借这首原创歌曲获得加分，拿到通俗唱法第一名。

此后，1988 年秋到 1989 年 4 月，我的创作经历了一个小高潮，写了四五首新歌，每首歌在歌曲类型上都做了不同的尝试，包括后来获得全国校园歌曲大赛一等奖的《留下阳光》，男女生二重唱《城市角落》（由我和英文系 1986 级的王敏主唱，刘一民帮忙整理了和声部分），带点摇滚意味的《假面》以及利用电影《红孩儿》主题曲



《时刻准备着》的旋律素材创作的《少年中国》。这些歌创作出来之后，我都是第一时间拿给胡昉，征求他的意见。

1988年10月创作的《长大的痛苦》是一首值得特别书写的歌。

当时，好友英文系1986级的符霜叶过生日，我想着要送她一首歌作为生日礼物。那是一个中午，为了不打扰同宿舍室友的午睡，我带着吉他爬到桂园的小山上，写下这首歌。下午，带着我的吉他和这首歌，我从桂园走去她在樱园的宿舍。沿路山坡上，淡紫色的野菊花像星星一样散落，我便采了一把，捧着花敲开了她的宿舍门。

毕业后，我和符霜叶断了联络，直到20多年后的某一年圣诞前夕。那天，我裹着大衣从香港中环置地广场下通往地铁站的过道穿过，被一位气质优雅的女子客气地截停，要求我帮她们全家大小拍张合影。却之不恭，接过她递给我的卡片机，帮她们按下快门，她向我道谢之后，我快步离开。一周后，我收到一封来自落款“Shelley Fu”的电邮，问我是否曾帮一群路人拍过照片，我答是，对方回说：“天哪！我是符霜叶！”

因为那一个在野菊花盛开的季节庆祝过的生日，以及20多年后梦幻般的重逢，《长大的痛苦》对我而言，不单单是一首歌，它还代表着一份穿越时空的真情：从珞珈到香江，我曾以为它断了、没了，只剩下回忆了，却在不经意间又来到面前。

其实，每首歌都是一份真情。

《留下阳光》的创作背景是阳光岛海南建省之初，父母调去海南工作的1989年春节。那年春节，我第一次登上海南岛，在一个午后，阳光洒在窗前，和煦明媚，我感到一种温暖，有如父亲的怀抱，顿时有了创作的冲动，写下了这首赞美父子亲情、充满阳光气息的歌。

回到学校之后，在接受校广播台记者施红涛的访谈中，我与胡昉配合，在校广播台把这首歌录制了下来，记得当时配唱和音的除了胡昉和王敏，还有建筑系1988级的校广播台节目主播冯栢（也是我的小学、中学同学）。此后，校广播台在播出施红涛与我的访谈之余，把《留下阳光》作为“每周一歌”播出。1990年，这首歌在团



中央举办的全国大学生校园文化系列征文歌曲中，成为两个优秀校园歌曲一等奖中的一个。

可惜的是，在校广播台录制的《留下阳光》的音频资料，我头上只残存不到半首了。

1989年春季开学后，在江柏安老师和好友们的鼓励之下，我决定举办一场自己的个人作品演唱会。

在筹办过程中，江老师主动为我联系了中国地质大学的一支电声乐队，我因此也就没有请学校艺术团乐队提供帮助，但我和胡盼需要牺牲周末时间，来回骑一个多小时的自行车，从武大到地大进行排练。

演唱会场地的确定也历经波折。本来江老师联系好了水利电力学院的一处场地，冯栢也义务帮忙手绘制作了演唱会的宣传画（他一共画了三张，我自己保留了一张，毕业后带去海南家里收藏，去美国读书后，家里人搬家弄丢了），宣传画上注明的演唱会场地就是在原水利电力学院。

我的中学同学，当时在校学生会文艺部担任副部长的刘晖认为，武大的校园歌曲还是安排在武大的场地演出为好，提议以樱园的学生俱乐部作为演出场地，这对我而言，当然是求之不得的好事。于是，经过协调，将演出场地改为樱园学生俱乐部。

那时的我们怎么也想不到，多年以后，水院与武大成了一家。

演出当天，不知是否因为紧张的缘故，我突然感到喉咙不适，脑袋发胀，有感冒征兆。开唱时，我的声音发哑，在电声乐队的伴奏中，我根本听不到自己的声音。我站在台上，面对挤满学生俱乐部的人群，已经没有退路，只能咬牙坚持。幸运的是，出了一身汗之后，整个人轻松了很多，到与王敏合唱《城市角落》的时候，声音也渐渐明亮起来。

我的个人作品演唱会，算是武大校园原创歌曲历史上的第一次尝试，尽管简陋，但从策划、制作到宣传，都有意识地借鉴和引入当时流行音乐会的运作手法，其中有些细节，记忆已模糊。最近，我和一位校友同桌吃饭时，他坚持说我们那时还为演唱会搞过一个发布会，可我对此一点印象都没有了。



回忆，就像一本泛黄的杂志，就让它带着岁月磨砺的痕迹吧。

转眼已是1990年春，樱花开了又谢，此时的我一门心思构思为武大1986级写一首挥别母校的歌曲，并且设计这首歌的演唱，以1986年百名歌星联唱《让世界充满爱》的模式，由十几名1986级校园歌手联唱。

在那个特殊的时候，我对珞珈这片天地有着强烈的不舍，对过去四年中度过的每一段日子有着无限的依恋。

歌词的写作非常顺利，几乎是一挥而就。

伸出双手，握住将逝的岁月，
让我们向每段日子告别。
在今天，青春又要启程，
走出这片琉璃深深的目光。

.....

我把这首歌副歌的最后一句“让我们拥抱每一分钟的时光”定为歌名，把歌词给了胡昉，我和他分别谱曲，出品之后，再在两者之间作选择。

胡昉动作快，先于我完成了谱曲。他的曲子，旋律清新质朴，线条流畅，画面感强，副歌朗朗上口。我喜欢胡昉的谱曲，但还是针对主歌部分，写出了自己版本的旋律，副歌则完全延用胡昉版本。但在试唱后，我觉得胡昉的旋律更具抒情性，最后决定主推胡昉版。

为了制作伴奏带，我找父母要了500元，并请江老师联络了一名武汉音乐学院的学生来完成伴奏编曲和MIDI制作。

花了几个通宵之后，我终于拿到了胡昉版《让我们拥抱每一分钟的时光》的伴奏，但在试唱中发现，主歌第一小节有错，不记得是多了半拍还是少了半拍，但重做已经来不及了。不得已之下，我和胡昉商量，歌手从主歌第二段开始起唱，第一段就用朗诵代替。

1990年5月的某天，我约齐了十几名歌手——除我之外还有英文系1986级的王敏、吴传晖，生物系1986级的罗文新、曾迪，



保险系 1986 级的汤革、计科系 1986 级的刘涛、行政管理系一女生及两名来自图书情报学院 1987 级的女生，到化北楼某个空教室录制。所谓的录制，是把借来的一个四喇叭双卡带的录音机置放在讲台上，歌手按照安排其演唱的那句歌词的先后顺序，排成两个纵队，前面的一对歌手对着录音机唱完自己的一句之后，退到队尾，由他们身后的歌手往前一步靠近录音机接着唱下一句。

条件所限，这样的录制方式当然很难保证出品完美，只能因陋就简，尽力而为了。

为了加强效果，我们在现场临时决定把副歌部分分成两个声部：男生唱旋律主线，女生唱第二声部。胡昉和我琢磨了十几分钟，便把女生的声部写在讲台的黑板上，女歌手们试唱三四遍后，正式录制便开始。

录制完成之后的成品颇多瑕疵，某些地方听上去甚至很刺耳，但我认为在那样的条件下，那已经是我和我的小伙伴能力范围之内能够做到的最好结果了。

那样一个场景，那样一种真诚，无可替代，也无法复制。

在我离开校园的前几个星期，每当初夏的黄昏悄悄来临时，校园里便响起：

光阴带着我们的笑容消失，
季节的沙床流淌我们的故事。
让我们感谢这五彩的空间，
让我们拥抱每一分钟的时光。

一如四年前，我们听到的《请将这张唱片留给我》。

我们的校园，我们的歌，远不止我能记述的这一切。

2000 年之后，武大电子工程系 1996 级李楷在十几年的时间跨度里，在自己的本职工作之余，执著于推动武大校园原创歌曲的发掘和传播，以《珞樱》为品牌，连续推出了 3 个系列的校园原创歌曲 CD 专辑，共收录了近 50 首武大校园原创歌曲。

我相信每个年代的学子都有专属他们自己的青春记忆和旋律，



然而，我也分明看见，在这些不同的记忆和旋律里递次浮现的年轻容颜后面，反复叠现的是同一片校园，那里山水相依，四季风华，虽然我们总会在某一天离开，虽然我们的青春也终将逝去。

（作者系法律系 1986 级校友）



醉后知酒浓

符霜叶

好友邓峻(国际法 1986 级)的一首歌《长大的痛苦》和我有关。那是一个久远又熟稔的年代,那个年代里发生的每一件事,每一段美好,总能在最寒冷的季节,绽放一簇一簇的火焰,妥帖、舒适地包裹沧桑冷漠的衰老,温暖急需热量和阳光的心。

那一天,我生日。

秋天的武大一扫夏末梅雨季的潮湿、闷热,秋阳高照,凉爽宜人,是个走路都会撞见诗歌的美好季节,住在以浪漫著称的“樱园”宿舍,紧邻樱花大道,窗外就是连绵起伏、错落有致的水彩画,那天心情小鹿一般乱撞,期待着生日的祝福。

午餐后和舍友躺在被阳光晒得干爽、暖和的樱花大道下坡处的草地上,有一搭没一搭地聊着天,眯眼看着头顶流光溢彩的天空,闻着初秋泥土、青草成熟的味道……不远处成群结队的小树,顶着这个季节特有的红、黄礼帽,随风轻轻摇曳,好像传递悄悄絮语。

下午没课,准备找地方自习,正要去图书馆的时候,阿峻捧着一束鲜花来了。阿峻是我们宿舍的铁杆好友兼歌友,一年前我因为参加武大校刊和许东、邓峻分配到一个采访小组,共同完成一篇与樱花有关的新闻稿,从而“樱缘”际会。邓峻和我们宿舍每个人都很熟络,他常穿一身清爽的白衣蓝裤,背着吉他来到我们宿舍,和与我“称兄道弟”的美女、“卡朋特歌后”王敏一起飙歌,我永远是他们忠实的粉丝。

鲜花是阿峻自己采摘的,充满着泥土芬芳;同样珍贵的生日礼



物，是他为我创作的一首歌曲《长大的痛苦》——那是一个青涩、迷茫的年代，他的歌词很准确地捕捉到了我当时的心情：你的脸在层层笑容中深埋，你的心藏着几分期待，阳光在前，背后有黑夜，今夜所有的关怀不再徘徊。

接下来的某个周末，位于樱园俱乐部的演出，少不了我们热捧的“校园歌手”登台。当主持人说出阿峻的名字时，白夹克蓝长裤的他正淡定地坐在舞台中央，觉得聚光灯下的他全身都在发着光。吉他前奏响起，四周顿时安静下来，他唱的正是这首《长大的痛苦》，我能感觉到他穿透的眼神，定格在舞台下方黑漆漆的人群中，点燃着什么，又燃烧着什么。

那是一个终生难忘的生日，一个回忆起来嘴角带笑的美好夜晚，虽然没有琼瑶小说那样跌宕起伏的故事情节，但这份浓浓的、纯纯的牵绊和情愫，足以回味和珍爱一生。

时光飞梭，二十年后

圣诞节和新年假期，我和老公带着两个孩子在香港度假，香港好友邱生、邱太夫妇热情地陪我们全家在置地广场购物，老公坚持“补送”我一份生日礼物，正在女儿这个“审美顾问”参谋下兴致勃勃地挑选着礼物的我，突发奇想拿出相机，希望找个人帮我们两家人摄影留念。

找好拍照角度，站定各自位置，我在来往穿梭的路人中迅速搜索着，然后就看到了他，一身黑色过膝风衣、表情严肃的同龄人，被我“点差”的他，很礼貌地帮我们调整好位置拍了照。来不及说“谢谢”，他已迅速淹没在香港湿冷的冬季里。眼熟，好像在哪里见过?!——这就是我和阿峻重逢的神奇故事。

我和阿峻的故事，正如他歌曲里的最后一段：长大的痛苦，谁又能明白，就像一个注定，付出的爱，不论成功不论失败，明白都是命运的安排。



附录

日记摘录：1988年10月某天 晴

今天我生日。天气晴朗舒适，武大运动会热闹喧天。

下午邓峻捧着一束沾满水珠的鲜花进来，给我一个意外的惊喜！花束扎得很艺术，几株芭蕉叶的长梗上端，贴着一束粉红娇羞的芙蓉花，其间穿插着楚楚可怜的几把紫色野花，末端芭蕉梗上写着“阿峻”字样。阿峻似乎起了变化，神情也不如从前快活了，他穿着很有个性，看上去非常舒服，我忽然发现：JACKSON 长大了！这是今天第一份生日礼物，而且是如此别致可爱的、来自大自然的馈赠。

下午和兄弟一起大扫除，寝室焕然一新，阿峻精心打扮了一番又来了，深色西装配浅色领带，搭配合身白长裤，好不潇洒！

他为我写了一首歌《长大的痛苦》，曲调略显忧伤，却很贴合我此刻的心情，他带着兄弟和我一起哼唱了很多遍，最后自弹自唱录了下来。阿峻今天少有的寡言，和平日里嬉闹健谈的他判若两人，练习这首歌的时候他感慨了一句：“符霜叶，如果你有一副好歌喉，我会天天为你谱曲的。”可惜我没有啊！不过，阿峻，谢谢你的生日礼物，你真是我的好朋友，永远的哥们！此刻，我感到如此幸运和幸福，拥有那么多来自朋友的爱。

（作者系英文系 1986 级校友）



我的珞珈山，八十年代的诗歌

黄 斌

1986年9月来到珞珈山，在体育馆的老木地板上，蹲着填学生证、报名，算是正式成了武汉大学新闻系的一名学生。不几天，就背上背包，一身军装，和那一届所有的新生去了湖南耒阳军训。耒阳差不多是诗人杜甫人生的终点，那地方有如他行将熄灭的人生蹿出的最后几点光亮；另外，耒阳还是庞统做过县令的地方，让我联想起老家赤壁凤雏庵边的大银杏树，觉得亲切；后又听说耒阳是蔡伦造纸之地，这三点，让我觉得和这个小城分外有缘。回到珞珈山，已经是深秋了，手放在自来水管下有冰凉的感觉，早晚上在宿舍的窗户边，在桂花香中看得到外面桂树的影子。

在桂园一舍207室，大学四年一晃，就像夜晚一样看不见了。

开始上课以后，高年级的同学课余就来拉我们加入各种大学生社团。当时新闻系为珞珈诗社拉人的是1984级的一位师姐，矮矮的、短发，她穿着花上衣，斜纹格的色块，恰好是我现在印象中20世纪80年代的颜色。

本年级同学中，爱好写诗的着实有几个：鬼子、梁敏、狗子、海啸、黄二、老朱、袁勇等；女生中也有几个爱读诗的。最执著的是海啸，产量巨大，几十首诗读来像一首，通篇都是手的意象；现在看来，那手，大约是一个少年有关青春和爱情的象征。梁敏和我先是因谈诗投机而接近，后来无所不谈，就成了酒友，晚饭后，时时相约一起散步，走到水利电力学院（2000年合并到武汉大学）后门的铺子里，买两瓶啤酒，一路拎着喝完，在水院内或茶港的湖汉上逛一圈，回来，顺便把酒瓶还了，赎回押金。



进大学前，看过徐敬亚编的《中国诗歌流派大展》，感觉满眼黑压压的胀人，因为排版方式为连版，很不适应，读完一遍只记住了两个名字，那是一首短诗，在版面的中部，标明为武汉大学某某流派，作者却是两个：一个叫若木，一个叫若华。此前，我知道的武大师兄中写诗的有：高伐林、王家新、马竹、洪烛等。

1987年的春天，第一次感受武大的樱花节，和狗子他们在樱花大道上卖了两箱汽水，就去小操场看樱花诗会。满耳朵都是播音员的朗诵腔，听不出什么。临散场的时候，看到台上有好多小板凳，摆得整整齐齐像一块块白方糖，特诱人，手一痒，就拿了一个，准备带回宿舍，却被抓住了。本来我有一个小板凳的，估计是被高年级的师兄摸走了，每次看电影，都要找人借，很不方便。抓我的人，是当时的珞珈诗社社长刘华。

刘华个子矮小，有一条腿不方便，可能得过小儿麻痹症。他训了我一通，就放过了我。他是法学院的，当时住在桂园，在他考研前，我还到过他的宿舍，和他在一个蚊帐里挤了一夜，听他谈了一晚上人如何先解放自己的双手、再到人的全面解放，很有一些青年马克思的理想主义色彩和人道关怀，很激励人。他考上研究生之后住枫园，我去看过他一次。后来，接替他担任诗社社长的，是法学院1985级的单子杰，诗写得灵巧干净，就像他本人的脸那样。单子杰给我的印象是，总穿着一件休闲西服，文文静静、慢条斯理，很可亲，也特别好说话。

桂园一舍一楼进口的右墙，有一个大黑板，系里轮流给各年级办板报。有一次轮到我们年级，我就和鬼子几个抄了点诗文上去。我的一首诗被1985级的师兄窦文涛看中了，他找到我，夸了我两句，于是，我就请他指教别的诗作。他当时的兴趣在哲学，正潜心读奥古斯丁的书，纠缠于信仰、肉体、罪这些关键词。好在他也喜欢喝酒，有时候，就在六一纪念亭对面的小馆子里，点一个木须肉或糖醋里脊，两个人边吹牛边把一瓶小黄鹤楼喝下去。他当时在校广播台当播音员，头发卷曲着，走路时面无表情，特深沉。不过，他的声音的确不错，1988年华中师范学院举办的“一二·九”诗会，他朗诵了我的一首诗《吾土吾民》，得了朗诵一等奖，我只得了创



作二等奖。

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我的诗歌老师饶庆年，搞了一个湖北青年诗歌学会，地址是现在的楚世家、当时的东湖村里，我自然也成了会员。协会的日常事务都是田禾等文学青年在打理，我去玩过两次。一次不知是什么原因，饶庆年晚上突然来到我的宿舍（应该是在1988年），说没地方住了，就在我的床上睡了一觉，第二天我醒来时，他已经走了。他那时所做的生意，现在可能得叫文化产业——就是收钱，给诗歌爱好者出诗集，出了诗集由作者自己销售。他后来一直做这种生意。

由饶庆年，我认识了《长江文艺》的编辑老师欣秋先生。1987年春节后，为感谢编辑老师，父亲让我带了一条老家的熏鱼送给他。一天晚上，我拎着那条熏鱼，走过湖滨，走过现在是放鹰台、当时是体工二大队训练基地的湖堤，又从湖北医学院一直走到东亭的作协院子，终于把那条鱼送到了。欣秋老师对我这样的晚辈，劝勉有加。他，一直是我心目中的长者。当时的《长江文艺》稿费奇高，发两首30行左右的诗，稿费近70元，足可以喝四餐酒了。

可能是因为一直和诗歌有关，所以，1987年的时候，又认识了1985级的师兄李少君。他当时就住在210室，在我宿舍的斜对面。我记得他当时几乎天天穿着一件亚麻的、斜格子、黄绛相间的休闲西服，除了头发不同，样子还是现在的样子。他当时沉溺于西方的东西，总在图书馆读名著——当然是西方名著，然后在宿舍的过道里徘徊，或者在桂园一舍楼顶的露台上徘徊。这个矮个子的湘乡人，那时候就能让人感觉到一种被压抑的激情。我第一次看到他的字迹非常讶异，他的字怎么会这么写？每一笔画，都能感觉得到钢笔的两片笔锋被撑开、然后又收拢的痕迹。想来他写字，也不是一般的用力了。他当时有一句名诗被大家传为笑谈——勃起的欲望，插入夜的腹部。

接着就有了“珞珈诗派”。这个所谓的诗派，得到了校报副刊编辑张海东老师的支持。记得他在一个黄昏来到了我们桂园一舍，



勉励我们好好创作，为校园文化建设做出贡献。

这个诗派的组成是：中文系3人，洪烛、陈勇、张静；法学院1人，单子杰；新闻系3人，李少君、孔令君和我。张静和洪烛他们一样，也是中文1985级的。我以前几乎没有读过她的诗，后来读到，感觉也不错。我可能对女性诗人有偏见，觉得要么如自白派自我撕扯得厉害，要么风花雪月得肉麻。不过，张静大学期间写的诗，我一直是认同的。孔令君也是新闻1985级的，他的诗，细腻敏感多情，接近纯诗。陈勇的诗机智诙谐，是另一种风格。在张海东老师的鼓励下，“珞珈诗派”不仅经常占据校报副刊的头条和大块版面，也占据了樱园和梅园之间的橱窗。记得有一次，为了宣传“珞珈诗派”，我在樱园的武汉大学学生会，用毛笔抄诗派成员简介。拿了一张白纸，随便在墙角拣了一支秃毛笔，写出的字，竟然有北碑的味道。当时，“珞珈诗派”中每一个人又自封为一派，这是我没想到的，临时，我在自己的名字后面加了一个“本土文化派”。这之后，李少君开始写诗评，他先是写武汉大学校内诗歌的评论，然后进一步写到全国大学生的诗歌去了。他有时候还在晚上开讲座。

李少君介绍我认识了朱明，化学系1984级的，四川人，写口语诗。在1988年的时候，武测的一位老乡找到我，说是四川的大学生诗派要来武大搞讲座，武测管得严，能不能到武大讲。我想，讲讲诗歌，应该不属于精神污染吧，于是就联系团委和教室，迎来了四川的大学生诗人王琪博，他带来了尚仲敏办的两期《大学生诗报》。那天晚上的讲座，是在电教楼的一楼进行的。我在边上，听王琪博在台上一口川语，尽说些不符合常识的话。时隔多年，大约是去年吧，听说他有一首诗卖给某集团公司多少多少万元，我想，这可能就是非诗的证明。诗歌，任何时候都不能和货币等价交换吧。大概是1988年，听洪烛、陈勇他们说第三代诗人中的“非非”来过武大，我后来想起可能是杨黎。一天中午，他站在桂园食堂门口，在进进出出打饭的学生中，用一口川语喊着：最好的诗歌，最低的价钱。我听后一笑，至少，我认为诗歌不应该是这样被言说或



叫卖的。

值得庆幸的是，20世纪80年代的武汉，诗歌是纯粹的和朴素的，有足够生长的力量。直到现在，我仍然坚持认为：诗歌不是政治，要靠不断的青年造反运动去获取话语权；诗歌也不是产品，要纳入到资本推动的产品的生产、流通、消费以及不断地升级换代的秩序之中。我们只是一直行进在通往诗歌的途中而已，永远在路上。另外，好诗就是好诗，好诗是永恒的。

在武大的周边院校，我们有很多朋友：中南财经大学的程道光，华中师范大学的剑男、刘源、黄佳君，中南民族学院的曾光等一批大学生诗人。对于我，收获最大的，是和湖北大学的张良明、沉河等人开始了多年的友谊。

和沉河、张良明的相识，在我个人，可以说是因缘际会。我中学一女同学和沉河是同学，她说，她班上有一个“诗疯子”，这个“疯子”就是沉河。直到现在，我也不清楚为什么和他们相遇后可以没有任何隔阂地直接沟通。我至今还记得，1988年中秋节，张良明、沉河、李少君、余文德、黄虎城、我及几个女生，一起来到沙湖的斜堤上，在中秋的满月之下，喝酒、谈诗、唱歌、吃烤红薯和板栗，一切都是那样无拘无束、那样美好。记得李少君也佯狂了起来，不知把谁的绿书包顶在头上，像一顶绿帽子。那绿帽子上，是沙湖的大堤，是无垠的天空和满月。那满月的清辉，像在守护着我们这群年轻人的永恒——诗、酒、食物、青春和爱情。

我和李少君可能因为这一夜，成为了能共享底色的朋友。我带他去咸宁师专，我高中诗友最多的地方，如龚卫民、肖建华等，我们在师专的食堂里喝酒，吃当时食堂里最好的菜；去蒲圻陆水河，感受河对面的石头城墙；去我的老家新店镇，感受明清湖广府的商埠。

现在看来，当时的我对诗歌也是充满激情的，不然，我不会认识这么多和诗歌有关的人。不过，这都是20多年前的旧事了。珞珈山，永远都只是一座山，它的下面，是湖水。它发生了更多的故事，不仅仅是大学生诗人的故事。



还有若木师兄，他叫王弘涛，是中文系 1984 级的。毕业后，我们在东亭做了多年的邻居。在大学的时候，他为我的一首长诗《夜珠桥》写过评论，发表在张海东老师编的《武汉大学校报》的副刊上。这么多年了，我们比邻而居，却像相忘于江湖。我一直到现在，也没有问过他，若华是谁？

（作者系新闻系 1986 级校友）



追忆珞珈年华

梅 朵

珞珈山，是一座永恒的山，住在我心里，很多时候它在沉睡，和我的青春一起。但是一朵花、一缕月光、群鸟远去的身影，或者突然飘进耳畔的歌，会让它苏醒，让往事从记忆的深处源源不断地流淌出来。那时候常常有蔚蓝的天，巨大的梧桐树温柔地覆盖了校园，银杏像黄金一样灿烂，不时有黑色的鸟从树丛的深处飞出。在连接各个园子的小路上，到处摆着两张凳子一条木板搭成的小书摊，卖的都是当时最新的人文和艺术书籍，像罗素、汤因比、韦伯、马斯洛的著作，像《赫索格》《荒原狼》、欧文·斯通的《梵高传》、林语堂的《苏东坡》等小说和传记，像里尔克、泰戈尔、惠特曼、弗罗斯特的诗集……卖书的大多是高年级的清癯面孔和亮眼睛。我这一辈子最好的书是在那些书摊上买的，最好的时光是在那些书摊前虚度的。那时怀抱着新书，踏着地上的脆叶，钻进樱园的森林，找一个石凳坐下，就在那里透进的斜斜的阳光里，在那些珍珠般的文字里度过逃学的时光，在伟人的一生里消磨整个下午，直到黄昏。

每个夜晚都有各种讲座，关于美学、哲学和自然科学的讲座，邓晓芒、赵林、易中天这些老师的演讲充满了思辨与激情，阶梯教室里常常坐得水泄不通。那时校园的洗澡堂是陈旧的，邮局是窄小的，可是教室和图书馆却灯火辉煌，到处是如饥似渴、专心致志的学生。新闻系的年轻老师周光明在讲台上不拘一格，用新颖的思维和语言颠覆我们，为我们展现思想的自由和美……珞珈山下各个园子的颜色都是那么清晰，樱园是白色和绿色的，桂园是金黄的，梅



园是碧绿和淡黄的，枫园是红色的，湖滨是碧蓝的……星期六晚上我们会拿着小板凳相互挤在梅园操场的黑暗中，数不清的汽水瓶盖儿把地面满满地覆盖了一层，银幕里的光和影把我们的脸映得色彩斑斓；有时还有月光，让你在看电影的缝隙偶尔朝深蓝的天空去看一眼。《欢颜》《橄榄树》《爱情故事》这些电影歌曲余音绕梁，绕着夜晚和光影中的爱情故事让你辗转难眠。除了担当电影院的功能以外，梅操也是武大人聚会众议之地，接待着重要的客人。长江科学考察漂流探险队的队员曾是梅操的座上客，他们为我们讲述惊心动魄的探险历程，讲到长江首漂的英雄尧茂书牺牲的故事时，他们的神色露出异常的深邃和肃穆。那年冬天，在室友们的鼓动下，我准备参加校园歌手大奖赛，宿舍的女孩们全体出动为我伴唱，武汉歌手冯翔从汉口赶来做吉他伴奏。滇敏、红涛、小原、岚毛、璐璐都戴着自己编织的白边彩色毛线帽，鼻子被冷风吹得红红的，每一个人都漂亮极了。我们站在梅操的舞台上，吉他声响起，清亮的歌声带点忧伤：“Away, I'd rather sail away/Like a swan that's here and gone/A man gets tied up to the ground/It gives the world/Its saddest sound/Its saddest sound”。比赛结束后，走在回宿舍的路上，《老鹰之歌》忧郁高亢的旋律还一直在脑中旋转，雪花飘落在我们的睫毛，风从云彩里吹出来，吹散了没有取得名次的遗憾。我第一次觉得珞珈山的天空那么高远，夜那么深，未来显得无边无际。那时，桂园五舍的宿舍走廊上，几个学织毛衣的女孩借了幽暗的灯光（宿舍到点要熄灯），在灯下幸福地钩星织月。热情好像可以传染，越来越多的女同学拿着小板凳接二连三从宿舍里走出来，连 1985 级的师姐们也不甘落后，把走廊坐得满满的。仙女们手里粗粗的棒针织的都是恋人的毛衣，那颜色真比彩虹还要漂亮！沉醉在爱情的甜蜜里的女孩儿为男朋友披上毛衣时的神色，迷人的幸福感至今还历历在目。桂园食堂的“猪油”舞厅地面滑滑的，最适合跳华尔兹舞，星期天晚上音乐响起，男同学彬彬有礼跃跃欲试，女同学或快乐或害羞地站在舞池边等男同学走过来邀下舞池。有的人华尔兹转得又高又飘，一圈又一圈，像风在池塘里吹拂，一会儿就涟漪四起把舞池转了一周（新闻系 1986 级的班长陆涛好像就是这种形象）；有的



人则紧张又笨拙，低着头，生怕踩了对方的脚，偶尔抬起头来，害羞地对望一眼，脸也红去了半边。

东湖见证了很多人的初恋，也包括我的。在湖滨的一间小屋，金银花爬满了书架，桌上的围棋，我执黑，他执白，他用围城的方式占领了我的城池。那个夏天东湖的风浪在突然降下的暴雨中坚决地阻挡着我们的舢板划回岸边，在风雨飘摇的湖中心，我想，死亡并不遥远，和爱情很相似。漫天飞樱的春夜去上晚自习可惜了，桂香濡湿的秋天去上晚自习也可惜了，不如去看梧桐萧索的剪影如何矗立在新四楼的倒影中，不如去吃小贩的铁箱里正烘烤得香喷喷的红薯。我和好友王宁走遍了珞珈山的每一个季节，纷纷飘飞的花瓣、细细的春雨，都落在了那条永远不愿走完的鹅卵石小路上。因为樱花，珞珈山的春天，四个以为青春永恒的春天，四个无尽奔波前的春天，永远地雕刻在了记忆的深处。

还有你们，友好宿舍的男同学，怎能把你们忘记？那个寒夜我出校医院的晚上，你们轮流背我，把我从医院一直背回桂园五舍，个子最小的李利民差点和我一起跌滚在地上。最温暖的是帅哥梁敏的长呢子大衣，他脱下来披在我的身上，顿时电流暖过全身……还有你，刚进校的红玲，你和我自以为已经是斗志满怀的新闻战士，为心中的信念而奔走……还有你，娜佳，当我在寒冬把床上的棉絮送到樱园你单薄的床上，我们就再也不会忘记对方，以后的三十年里，无论是在世界各地，你都带着我的信笺……还有你，诗人黄斌，我们在校园几乎没有说过话，却在寒夜返乡的火车上相遇，你在蒲圻就要下车，留我独自继续往西的旅程。车厢里昏昏暗暗的，列车却在飞奔，一种不真实的感觉让我记住了这个分别的夜晚。二十多年以后当我们再次相遇，诗歌成为我们共同的爱好，那个夜晚不舍的友情得到了那么美好的延续……还有你，邓峻，情歌王子，写歌写得那么好。你写的《长大的痛苦》一直伴我长大，好像成长不会停止，痛苦不会止息。我也像你一样试着写歌，在诗与歌的世界为自己铸造一只木船，在孤独的夜晚划到遥远和未知的海上，慢慢地漂，慢慢地欣赏海上升起的明月……

冬天，梅园，匆匆往前的步伐突然停住，一阵幽香沁人心脾。



转头寻找，看见点缀在褐色腊梅枝上淡黄色的花朵，正在雪中沉睡，白雪像懒散的睫毛轻轻落在它们的眼皮。我俯身久久地嗅着它们，芬芳剧烈而柔软，钻进我的内心，一种安宁与神秘的气氛在寒冷的空气中弥漫开。这仅仅是一种芬芳吗？那天，我感受到的似乎是一种灵魂的存在。园中清幽无人，白雪把平时不引人注目的东西都照得异常明亮。我听到了自己的声音，和梅花的语言，在珞珈山的天空轻轻地飘荡。三十年后，今天，在大西洋岸边的一个角落，在我工作的校园，我又重新遇见了它淡淡的身影，嗅到了它凛冽独立的芬芳。

有了梅花，追忆珞珈山的逝水年华，就有了可以依循的小径。

（作者系新闻系 1986 级校友）



珞珈山往事

项勇义

这些天武汉大学新闻系 1986 级的部分同学聚首珞珈山，活动的照片不断在同学圈中刷新。虽然身在杭州，但大家的相聚触发了我在珞珈山求学时的记忆，往事点点滴滴涌上心头。这种思绪断断续续，连绵绵，飘飘忽忽，却又清晰如昨日。那是初到珞珈山第一次尝到的老酸奶的味道，是武汉特色小吃热干面的味道，是食堂里连鱼鳞都不剥的红烧鱼块的味道，是桂花的清香，是樱花的烂漫……

珞珈山麓的武汉大学校园以美著称，蓝色琉璃瓦顶的古典建筑群名闻天下。在老图书馆的侧旁，在樱园的楼顶凭栏眺望，掠过一个个空旷的操场，但见理学院的穹顶耸立在绿荫之巅，在阳光下熠熠生辉。这大概是每一个珞珈学子都有过的美好体验，这种壮美的景象也定格在了我的记忆深处。

桂园、梅园、樱园和枫园四个学生生活区域，皆以植物命名。春看樱花，秋赏桂花、红枫，冬有梅花傲立枝头。我读书时，住在桂园一舍的二楼，赏桂是近水楼台。每到秋季，在不经意间推开寝室的窗户，那沁人心脾的花香就会随风而入，让你忍不住来几个深呼吸。不过，最让人留恋的还是樱花，樱花树多集中在鲲鹏广场和樱园下方的樱花大道。有一年早春，我与同室的刘君一起在校园中漫步，穿过一片樱花林时，蓦然发现有棵樱花树的枝条无声无息地绽出了花蕾，我们惊喜万分。是的，用不了多久，满园的樱花会团簇锦地开，会如瀑如云地开。这种安静也会很快被打破，游客会接踵而来，校园很快就会人流如织。校园的小卖部里，卖得最俏的



大概是二三十元一卷的富士和柯达彩色胶卷了。多少学子和游人，在樱花丛中做着各种姿态，留下甜美的笑脸。鲲鹏广场以一个呈扶摇欲上姿态的鲲鹏雕塑而得名，雕塑边的樱花开得特别盛，而且触手可及，看樱花的人也一定不会错过这儿。记得游客到武大看樱花是要门票的，收门票的工作则由武大的学生来实施，一个一个院系轮流。新闻系也被安排了，我也曾参与过。在国立武汉大学的牌坊下设有一个卡，收取进校赏花游客的门票。虽然每个游人只需出一毛两毛钱，但一天下来，收入还是挺可观的。每个参与的学生都能获得一份报酬，有十块二十块，其余的钱就作为班级和系里的学生活动经费，这也算是樱花带给我们的小小的福利。武大的樱花节年年复一年，想必年年盛况依旧，不知道这种收取门票补贴学生的做法还有没有延续下来。尽管游人熙熙，但能在清晨、在黄昏从容徜徉在校园之中，谛听花开的声音的，也只有属于武大的师生了。

外面的游人来珞珈山赏花，珞珈山的学子也会走出校园，感受更加广阔的天地。那时，武大的东门之外，一路之隔就是著名的东湖。东湖有一个游泳区域，窄窄的青石板桥从湖边向外延伸，把一角的湖水围成几个方块。因为水质的缘故，下水游泳的人并不多，不过我们喜欢坐在石板上听湖水拍打桥墩子的声音，喜欢在那儿高谈阔论。小到谈论鸡毛蒜皮，大到青春、理想，家事、国事，一逗留就是几个小时，兴味无穷。环湖而行，再往远处，便有磨山景区，选个节假日，一群同学，在那儿野炊，也是其乐融融。新闻采访课还有短期的实习安排，从位于武昌的珞珈山校园到汉口的武汉晚报社实习，要乘轮渡过长江，站在甲板，吹着习习江风，胸中充满少年意气。

印象最深的远行，当属刚入学不久的军训。入学那年，正逢全国重点高校首批军训试点。因为是首批，所以特别隆重，一趟专列，把武汉大学几千新生送到湖南耒阳的军营参加为期40余天的军训。从宿舍的内务整理、叠被子、打背包，到操场上的立正、稍息、正步走的队列训练，再到瞄准、击发、单发、点射的射击训练；从夜半的紧急集合，到几十公里的野营拉练，在夜色里出发，到薄暮时分归营，穿越田间小道和崎岖山路；从夜幕中在黑魑魑却



伟岸的加农榴弹炮边放哨，到唱着军歌、排着队到餐厅用餐，再到篝火晚会；从一次老兵精彩的军事演习揭开帷幕，到在秋雨中在泥泞的操场上以方队接受集团军、军区和学校领导的检阅而画上句号。脚底起泡，手掌磨破皮，汗流浹背，生活艰苦，这是训练中的常态，不过大家斗志昂扬，对未来充满期待。记得那时我还涂鸦了一首名为《绿色的军被》的小诗，刊登在了营部的黑板报上。

我与湖北的刘君、肖君、徐君，湖南的周君，江西的温君共处一室。徐君爱书，特意在寝室置一书架，每一本书都用厚实的白纸做书皮，整整齐齐码满架子。周君也爱书，尤爱小说和散文，台湾作家琼瑶的小说集、三毛的散文集，出版一本周君就买一本，在床铺的内侧排成了长长的一排。他特别喜欢写作，刚报到那天，就携来一个皮箱，里面装的都是他手书的小说稿。温君交友甚广，喜欢吉他弹唱。刘君的字写得龙飞凤舞。寝室里张贴了一张条幅，上书“穷追不舍”，以为陋室铭，相随四年，当出自刘君的手笔。大二那年，我一时兴起，以寝室为题，写成《我们这一圈子人》，投给校报，结果全文在校报上刊出，差不多占了一个版面。校报接着还刊发了几篇其他院系同学参与讨论的文章。这是我第一次在报刊上发表文章，属于那种“少年不识愁滋味，为赋新词强说愁”的文章，带着青涩的记忆。

在武大的校园中，有一个小操场。说是操场，其实是一个露天的会场，更是一个露天的电影院。2015年9月中旬，我到珞珈山匆匆一瞥，暮色渐浓，还下着雨。在小操场正好遇见一大群学生，他们每人一手执伞，一手拎着一个四方小板凳。小操场的舞台上还悬挂有“新生国防电影展”字样的横幅。多么熟悉的场景！30年前，我们入校报到时，每人就发过一个同样的小方凳，是专门用来在小操场看电影的。那时，周六、周日的晚上，都会放映电影。从《红高粱》《一半是海水一半是火焰》这样的流行新片到《魂断蓝桥》《罗马假日》《早春二月》《一江春水向东流》这样的中外经典影片都有。中文系学生喻杉写的小说《女大学生宿舍》也被改编成了电影，曾在校园风靡一时。我是一个电影迷，在大学四年中，小操场的电影很少有落下的。因为爱电影，我还选修了《电影理论和艺术》之类



的课程，因为专业关系还要上《电视剪辑和制作》这样的必修课。课堂上，会播放不少影片，从《战舰波将金号》等早期的无声电影，到《007》等流行的电影系列，于我而言上这些课是一种享受。

新闻系的课程设置体现厚基础的办学理念。新闻系的学生除了学习专业课程之外，还要文史哲兼修，甚至还要学习法学和经济学方面的基础课程。记得初来乍到，周光明老师给我们讲授《中国近代史》，经常引用《剑桥中国晚清史》这样的著作，使得我们这些仅有高考应试用的历史知识的学生脑洞大开，觉得特别新奇，历史原来有那么多种解读。李敬一老师是《唐诗鉴赏辞典》的编写者之一，他给我们上古代文学课，诗词美文信手拈来，充满激情，常见他额头渗满汗珠。记得有次下大雪，他临时调整计划，上了一堂关于“雪”的诗文课，校园里漫天飞雪，课堂上其乐融融。下课了，大家恋恋不舍，半天才回过神来。至于哲学，那时候存在主义哲学大行其道，萨特、尼采、叔本华等的著作，还有弗洛伊德的《梦的解析》在校园里盛行一时，还有大量的专家报告会可供选听。基础英语课是30人以下的小班课，但《英文报刊文选》这样的专业英语课是大班上课，外语系也有不少学生选修。那时的武汉大学被誉为“高校中的深圳”，在刘道玉校长的引领下，教育改革如火如荼。学分制、主辅修制、跨文理跨学科的选修课制度，导师制、插班生、少年班、还有作家班，蔚为壮观。只要你愿意，不管是哪个专业的学生，都可以选修在校内开设的任何专业的任何一门课程。武大的学子没有固定的教室，每个学生都有独一无二的课程表。课堂上老师从不点名，也不计较上课学生的多少。有些课堂，上课的学生有时还不到两位数，老师也最多打趣说，那你们就享受一下研究生待遇吧。喜欢的课就去上，不喜欢的可以不上，只要你能通过考试按要求取得学分即可。晚自修的教室可以按自己的喜好，在全校范围内随意选择。图书馆是自修的好地方，武大的图书馆藏书几百万册，馆内的阅览室、语音室对学生全天开放。新闻系的专业课则很强调实践性，新闻采访和写作课的老师常常抓住机会请到名记者、名编辑来做讲座。《为了周总理的嘱托》一文的作者之一、新华社高级记者陆拂为先生，倡导全息式深度报道的光明日报社记者



樊云芳女士都曾来为我们做过讲座。新闻系倡导学生做专家型、作家型记者，也很重视本科生研究能力的培养。临毕业的那个学期，系里还为毕业生开设了一门《当前新闻理论前沿讲座》课。这门课由许多老师讲授，一位老师少则讲一两节，多则讲一周两周，每位老师把他们研究的领域和成果在课堂上和盘托出。新闻系的元老何微教授也专门为毕业生讲授了马列主义新闻理论方面的研究内容。再就是写毕业论文了，从开题报告，到论文答辩，本科生要花很多时间准备。我的论文题目是《论记者编辑的主观意识》，得到了赵贯东老师和单传芳老师的悉心指导。赵老师还给他的北京大学同学、在杭州电视台工作的孙东来老师写了实习的推荐信，帮我落实了毕业实习的单位。

尽管学习环境和学习条件如此之好，只可惜，那时少不更事，没有很好地抓住学习机会，也缺少人生的规划和清晰的目标，很多学习机会在所谓的迷茫和玩乐中错过了，四年大学生活也就匆匆而过。

从 1986 年 9 月初到珞珈山求学，到现在 30 个年头了。那时候的交通很不方便，往返武汉很不容易。从家乡浙江上虞站乘火车，先要到杭州站转车。杭州到武汉也没有直达列车，列车要先走完整条浙赣线，再转京广线到武昌，全程需要两天两夜。火车又特别拥挤，有时候在车厢内被挤得只能一只脚落地，更不要说有座位了。我在南昌、株洲和长沙都转过车。有一年寒假过后返校，到武昌还是凌晨，又遇到漫天大雪，地面上积雪盈尺，公交中断，我和生物系的同乡同学石君，在凌晨的风雪中深一脚浅一脚，一路跋涉到校园。

1990 年的初夏，一个黄昏，晚霞如练，在汉口码头，轮船缓缓驶离，我站在船舷上，与前来相送的同学挥手道别。几天前，新闻系 1986 级同学在与武大一门之隔的武汉水利电力学院（现已合并为武大的工学部）的食堂里举行了毕业聚餐，老师们也都来了。气氛由开始的欢快激昂，到临结束时的沉郁感伤。武汉一别，原以为只是又一个学期的结束，新的学期同学老师又会重逢，事实上，再一次回到珞珈山却是 2000 年秋天毕业 10 周年的聚会了。同学们风



华正茂，记得参加聚会的导师说过的一句话：“女同学都变漂亮了，男同学都长大了。”第二次相会武大，则是在 2010 年的国庆期间，毕业 20 周年聚会，不少同学成了行业和单位的骨干，岁月的沧桑也开始写在了大家的脸上。导师说的第一句话是“都老了！”。

每一个 10 年，相隔如一瞬间。30 年弹指一挥间。珞珈山是我们的精神家园，每一次走进武大的校园，宛如一次精神的朝圣。每一次走进珞珈山，又仿佛是嵌入人生的一块里程碑，对照一次生命的时刻表。

（作者系新闻系 1986 级校友）



当时年少春衫薄

袁文清

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中国大学的氛围还是很自由的，而武汉大学因为有了刘道玉校长领导的改革，更是意气风发。1986—1990年，我们就这样在珞珈山度过了无拘无束的四年。我学的是档案专业，这个专业当时很冷——当然，现在仍然冷。我们是武大招收的第二届档案专业学生，第一届是1984级。因为“冷”，所以招收的人数很少，而且是隔年招生，我们这一届只有20人，9名男生，11名女生；因为“冷”，我们20个同学，绝大多数来自县城以下的地方，省会城市的只有两个，一个来自青海西宁，一个来自湖南长沙。因为专业太“冷”，因为人少，在武大，我们绝对是最默默无闻的一个班级。很荣幸，我成了这个班的第一任班长。

作为农家子弟，那时候上大学是一件很荣耀的事。记得拿到录取通知书后，外公对我父亲说，这是一件天大的好事，比娶媳妇都重要——只要是儿子都可以娶媳妇，但不是人人都可以上大学的。

上大学之前，我从未出过县城，到了珞珈山这样的地方，自然是兴奋异常。但兴奋劲还没过，我们便被装进了绿皮火车，被拉到了湖南耒阳的山区，一个炮兵师的基地军训，我们是全国第一届军训的大学生。火车慢腾腾地走了一天一夜，到达耒阳已是下午四点多钟，刚将行李放进宿舍，带队的黄泰岩老师便召集大家开会：原则上以专业为单位进行分班，由于我们专业只有九个人，另在我们班加了两个英文系的男生，一曰何纵，另一位只知姓梁，名字忘记了。估计英文系的男生更少，所以很悲催地分散到各个班了。每班有一名部队教官任班长，负责训练，另从学生中选一名副班长，负



责内部管理。我被选为副班长。

原以为晚上可以好好睡一觉了，谁知吃罢晚饭，教官却对我说，你是副班长，今晚就带着他去炮台站岗——他就是智勇同学，一个瘦瘦的戴着眼镜的家伙，教官说智勇熟悉地型，这里离他的家乡不远。智勇一听急了，说：“我家离这还有一百多公里呢。”但没有用，我们只好穿起军装，在班长的带领下沿山路进了大山。到了炮台，教官对我们说：“站岗时，一人站一边，不准说话，下半夜有人来换岗。”炮台有一百多米长，里面摆放了各式各样的大炮，随着夜幕的降临，这荒郊野外还真让人害怕。

军训，训练队列，走正步是必修课。这对我们多数男生来说不是难事，虽然不很标准，但基本也能过得去。但图专的鹏程同学的正步踢得总是让人忍俊不禁，不是同手同脚，就是踢成了弓步。可后来鹏程大学毕业却进了军校，当了一名军官。

我们最喜欢的还是有枪训练。我们的教官有点口吃，也不知是哪里人，他喊“卧姿装子弹”，我们总听成“饿——鸡——装纸袋”，前面两字拖得很长，后面三字很急促。刚开始他一喊口号，全班就忍不住要笑，这时他总是很严肃地说：“严肃点！严肃点！”明儒同学说话方言较重，但喜欢与人争辩，什么都要一较长短，知识很渊博的样子，于是人送外号“大师”，他学教官喊口号最像，华子同学没事的时候就逗他：大师，来一个“饿——鸡——装纸袋”。后来，“大师”考取了武大法学院的硕士、博士，毕业后真的在湘潭大学当了一名法学教授——现在看来知识确实渊博。某次回到学校，我们吃饭时在去桂园食堂的路上还时不时地冲前面的同学喊“饿——鸡——装纸袋”。

当然，我们最乐意做的事是帮厨。每天炊事班都要两名同学帮厨，我们实行轮流制。帮厨有两大好处：一是可以不用站军姿、踢正步，不用晒太阳；二是可以提前吃饭，可以吃到很多的肉，这是一件很美的差事。

部队吃饭是很有讲究的，吃之前，要唱军歌，拉号子。什么“一、二、三、四、五，我们等得好辛苦”，“一、二、三、四、五、六、七，我们等得好着急”，让其他的班唱歌。军歌主要有



《我们的队伍向太阳》《打靶归来》，哪个班声音洪亮，哪个班就先进食堂吃饭，后吃的班往往就没什么菜了。为了先吃饭，大家一个个都扯着嗓子喊，扯着嗓子唱，好不热闹。盛饭也是很有讲究的。开始的时候没有掌握窍门，先使劲地盛满满的一碗，等去盛第二碗时，基本上已没有菜了。有一次，兴辉同学偷偷对我说：先盛半碗，赶紧吃，吃完了再去使劲盛一碗。呵呵，这小子就是聪明，他是我们班年龄最小、当时直接考取硕士的第一人。那时十八九岁，正是狼吞虎咽的年龄，吃得多，但很容易饿，特别是早晨稀饭加馒头，当时吃得很撑，不一会就饿了，于是有人偷偷将馒头塞进军裤口袋，在练卧姿时，趁着教官不注意，往嘴里悄悄塞一口。

由于军训前没有过集体活动，也不知道班上的女生长啥样，大家对女生充满了好奇。一次周末，几个女生到连里来找档案专业的男生，引起了全连男生的轰动和羡慕——原来是我们班的几个女生利用休息时间来“认亲”了，她们对我们也一样充满了好奇。这几个女生是谁，我已记不清了，好像有利群、雪萍俩同学吧，这次历史性的会晤主要由朝晖、立军两个同学接待，其他男生陪同。

军训持续了近两个月，十月底才结束。国庆的时候，全体军训人员，也就是 1986 级全体新生在部队的营地举行篝火晚会，节目自报。我们班男生只有建国同学上去表演了一段拳术，总算没有全军覆没。在这次晚会上，一位个子高挑的女生走到场地中央对大家说：“我唱一首歌，《敢问路在何方》。”她一开口，便将我们全镇住了——专业水准啊！毫无疑问，她是当晚的明星，之后我们发现，她就是我们班的媛媛同学，后来成了武大校园著名歌手。

军训之后，耒阳这个地方我再也没有去过了。偶尔回想往事，那山、那水、那人还不时从心间飘过。

（作者系图书情报学院 1986 级校友）



不忘初心 不负珞珈

张彩雯

离开武大快 30 年了。一直以来，虽然我仍然在武汉市内工作和生活，与武大近在咫尺，却极少回母校。也许是忙于生计，也许是自觉平凡，无颜面对母校和大学同学吧。

当年选择在武大求学，并不知道她有多美、有多牛，只是因为她有当时全国最好的图书馆学系。而我儿时的梦想就是坐拥书城，终身以书为伴。

可进校后却发现理想很丰满，现实很骨感，特别是毕业来到最基层的公共图书馆工作后，正值全民阅读习惯开始改变，传统的区级图书馆逐渐门庭冷落，自己的心情也有些灰暗了。于是我去找当时在县里当检察长的舅舅，想请他找人把我转到政府部门去。舅舅是老华中工学院王牌专业机二系毕业的，他放弃了自己的专业转而从政，虽然仕途坦荡，还评上过全国十佳检察长，但官场的一些不良氛围让刚正不阿的他常常痛苦不堪。面对我的请求，舅舅只说了两句话：如果你不忘初心，就别放弃专业；如果你不从政，生活可能会幸福很多。

有一种状态，叫苟且。我虽然不大认同舅舅的话，但还是不愿地在基层图书馆待了下来。和单位许多人一样，我没有工作上的热情，没有生活上应有的姿态，只是不求有功、但求无过地混着日子。更多的时候，我甚至害怕别人提及我的母校武汉大学，我害怕听到“可惜”这两个字。

同学聚会我也更喜欢与中学同学在一起。一是因为我出生的小城是高中同学聚会的主场，多年来我成了高中同学的轴心；二是因



为高中同学都认为我混得不错，自己的自尊更能得到满足。但是和大学同学一起，感觉却完全不同。每一次看着春风得意的同窗，听着他们说自己如何忙，如何忙到没有自己的生活时，我都会觉得特别特别受打击！武大人的身份于我来说，算什么呢？我平凡的人生、平静的生活、平淡的事业，是一万分地辜负她了！同时我也发现，我离儿时的梦想愈来愈远了，远得我的思维和视线已无法触及！它和母校一道被平庸的我辜负得太久太久了。

随着时间的推移，见过许许多多人事沉浮，再去回首自己的过往，忽然发现我当初的梦想还在。从某种程度上说，它从未离开过，只是我自己未曾觉察到而已。

有一次，跟一个事业上很有成就的朋友聊天，问她理想的生活是什么样子的。她说：拥有一份清闲而有意义的工作，在一个空气新鲜的小地方，和家人在一个带小院的房子里安静地生活！如果这番话撂在几年前被我听到，可能会觉得这是一个成功者在刻意地矫情，但此时的我听了却有一些吃惊：原来她想要的，竟是我早就拥有了的生活啊，而我却一直傻傻地纠结了这么多年！仔细想想，我从小梦想不就是这样的吗？我何尝想过要过高官厚禄的生活呢！为什么一直以来，看着别人的风光和物质上的富有，却一味否定自己拥有的一切？我的梦想之花只不过是开在了贫瘠的土地上，但它却一直失去应有的娇艳啊。

这么多年来，我又何尝辜负过我的珞珈呢？我在最平凡的岗位上努力地捍卫着武大人应有的荣耀。我竭尽所能不断地充实和丰富着自己，并不是为了自己能干出惊天动地的事业来，只是希望无论何时何地，从我身上散发出的永远都是一个武大人应有的魅力，不辱没母校的名声，仅此而已。所以即便无意争春，我也能在有限和合适的领域里，比较轻松地施展着自己所谓的“才华”。虽然并没有建立过惊天动地的业绩，却也在最基层的岗位上实现着自己一点一滴的价值，上千个农村书屋和一沓沓荣誉证书见证着一个珞珈人所有的情怀和执著！

（作者系图书情报学院 1986 级校友）



东湖水，浪打浪

——忆我那搏击东湖的青春

张 进

古人云：仁者乐山，智者乐水。且不论仁智，我最喜山水。登山一眼青黛，不免心悦；遇水一汪清澈，更是心喜。

1986年，是我人生最重要的节点。那年我考入国家电力部直属的武汉水利电力学院，学习电力系统及自动化专业。报到之后，忙碌半天，买了该买的日用品，迎接了一些新同学，便一心释然，慵散地到东湖边散步。

初见东湖，一碧万顷，我难以抑制心中的兴奋和喜悦。湖对面是东湖公园，湖边有小亭，远眺处有磨山，中间是一湖汪洋。有人在水中游泳，有皮划艇悠然游弋。水面上由近及远的几个浮标，很像人飘渺的心。

浮标诱惑着我的心，和波涛一起上下跳动。碧波荡漾，我心荡漾。自自然然，我的心便从湖边武大的游泳池，极快地融入了东湖水。人是水中鱼，湖在我心中。湖边片片梧桐叶，挂满了绿色的惬意。

人的一生，总离不开水。小时候常去外婆家玩，外婆住在沅江边上。江水很清，孩子们喜欢坐在船边，或手捧清水把玩，或在水面划出一朵朵涟漪，听清脆的水声，在指尖柔柔滑过。水清见底，约三五米深处依然能见鱼儿在石缝中穿梭。水面上晃晃荡荡都是手摇的小船，偶尔也有渔民的乌篷船来往，一只只鸬鹚站在船沿紧盯着水下，随时准备捕食。那时候，总想着自己划一叶扁舟，行走于江湖。



或许是年岁太小，不知道冒险为何物。我那时偶尔会有游过沅江到达对岸的梦想，但那只是一刹那的念头，总是电光石火般地燃起，冰水浇头般地熄灭。因为大人能游过去的都不多。

现在东湖就在身边，似乎在静静地等待着我。岸在对面，目标是一个小亭。到对面小亭，走的是对角线，距离绝对不短。我扪心自问，长江都曾有万民横渡，东湖难道就是我生命中一道不可逾越的鸿沟吗？

挑战往往是勇敢者的游戏，“游到对岸去！”这个声音一直在我脑海里回荡。一天晚饭后，我尝试着游到了第一个浮标，感觉对岸东湖小亭就在不远处。回望武大游泳池，人头攒动，但只有两三个人和我一样游到了第一个浮标。水面平静，天近黄昏。我在第一个浮标处徜徉了一会，躺在水面，仰望天边。这时，那个声音再次在脑海响起：“游到对岸去！”“游就游，谁怕谁！”我抖擞起精神离开浮标，游了几米，不过在心里还是告诫自己：要小心，一定要放松，尽量减少抽筋的概率，否则谁也救不了自己。

我控制着速度，缓缓游着，中间变换了几种游泳姿势。时踩水，时仰游，时侧浮，时自由泳。小亭越来越近，终于游过来了。亭子上已经有了几个人，都是游过去的，原来，我不是一个人在战斗啊。稍事休息后，我开始回游。一次“征途”终于如愿完成，这是一次小小的自我实现。

有的自我挑战太危险，甚至会失去生命。我的冒险则是因为实力，这种冒险是对自我的证明，想游过沅江，游过长江，游过黄河，我就必须先游过东湖！

转眼间，进入大四上学期了。在一个初秋的傍晚，我又一次挑战东湖，真正体会到了东湖的力量。秋天的肃杀已经在提醒大家添衣，但偶尔还有人在东湖游泳。夏天热闹的水面，现在只有西风在呼啸。水面已不再平静，正波澜起伏着。站在武大游泳池边，阳光照在身上，感到了一丝丝的温暖；风刮在脸上，感到了一丝丝的凉意。我脱下衣服，跳入水中，虽然打了几个冷颤，但很快便适应过来。

我打量着第一个浮标，琢磨着是否要迎浪游过去。尝试着游了



几下，不知不觉就离岸有些距离了。浪越来越大，前进很难，想回去，但岸已在远方。我本无心与风浪搏击，但风浪已经将我推送到远处。一次无意识的选择，让我进入了危险的境地，但既来之则战之，我必须抛开杂念，奋力搏击。

我艰难地游到了浮标处，抓住浮标，喘了口气。远处其他人都已上岸，一起看着水中孤军奋战的我，这是我一个人的舞台，别人都是看客。浮标起伏着，我的心也跟着在起伏着。此时，风浪越来越大，开始像大山一般阻挡着我前行。我的脑海里思绪万千：是自己游回去还是等待救援？两种声音针锋相对。关键时刻，还是所学知识帮了忙。因为只要不是潮水，在波浪中，人如果静止不动也就是一个振子，理论上都可以在原地上下振动，我完全可以利用此原理转危为安。这时，我的头脑分外冷静，缓缓地往回游着，风浪扑头而碎时，就做一个振子，然后继续回游。前进很艰难，却正在一寸一寸地接近岸边。就这样我终于回到了泳池边，大家都已经穿好衣服在默默地等着我，刚才因为担心都屏住了呼吸。终归，有惊无险。

没有风浪的一生，是意外的人生，也是一种假设的人生。在人的一生中，风浪可能不期而遇，也可能如影随形，当风浪排山倒海而来时，你要么被风浪吞噬，要么劈风破浪化险为夷。

看似平静的东湖，其实蕴藏着非凡的力量。东湖，这个大学四年曾带给我欢乐和深刻烙印的地方，我的青春曾不悔地在此停留：在这里我挑战了自己的极限，并超越了自己，我人生的脚步也从这里走向远方……

东湖水，时有浪打浪。人生路，爱拼才会赢。

（作者系原水利电力学院电力系统及自动化1986级校友）



珞珈，我们回来了

——纪念 1986 级校友入校 30 周年

吴 德

当夜色迷漫
三十年回忆像草在长
那四年点滴
来了又去，扯动我经络
搁浅的海星已无处可逃
仍在等待十月涨起的潮
我们漂在世界每个角落
回望，那最初的起航

沿湖边旧道
曾经扎起膀臂，穿越那碧水 春雨后樱瓣
无语般飘落绿色的军装
梅笔如勾，涂画似水的夜空 桂花香阵轻袭平滑的脸庞
登上山顶那铁塔
俯瞰我的兄弟，我的家乡

珞珈，我们回来了
我们带着身体和灵魂
只要回到你们中间
永远是二九韶光
这是没有血缘的亲人共同老家



挥起来吧，兄弟姐妹，为珞珈歌唱

那一年七月

我要走了，你要走了

天还下着雨

不再幻想武侠里荣光

可再拥有言情小说里的柔肠 流水拂去，裂石温润成一朵雨花

风落风起，随缘而驻

千粒尘埃中闪烁，那一缕初阳

珞珈，我们回来了

我们带着身体和灵魂

只要回到你们中间

永远是二九韶光

这是没有血缘的亲人共同老家

挥起来吧，兄弟姐妹，为珞珈歌唱

注：这是为 1986 级全校同学聚会创作的一首歌的歌词，吴德为词作者，邓峻（法律系 1986 级校友）为演唱者。

（作者系保险系 1986 级校友）



词两首

吴 德

满江红·凤凰醉

漫步狂歌，独行路，山林声汇。吞荡气，纵情三界，为人为鬼。风转急传江湖令，云舒闲进花间会。抛身掷、作一笔春秋，风流岁。

经年又，端午缀。不再做，屈原累。挽山灵湖秀，枫樱梅桂。潇洒有笑哭喜怒，不羁任功过赢亏。生一次、扑火浴涅槃，凤凰醉。

（此词作于1990年毕业季）

八声甘州·羊年即临

记凌波洱海雁门峰，一统入逍遥。

佩金刀北漠，桃花灿灿，襄阳烟销。

驻足断肠崖岸，厌亳县墙高。

惟廿四桥水，红袖招招。

不忍少年子弟，奈何江湖老，且歇舟超。

算经年常事，谋五斗糠糟。

友同僚、一堂和气，



扫庭除、洗锅碗杯瓢。

除夕夜，短信微信，福寄迢迢。

（此词作于 2015 年除夕）

（作者系保险系 1986 级校友）



重回珞珈

谢春枝

轻轻拭去岁月的铅华
在一个初秋的早上 我背起行囊
走进风雨萧瑟的珞珈
空气中漂浮着雨水的清凉
我长久伫立 像久别重逢的朋友
万语千言却不知如何表达

多少次梦里
我重回珞珈
在星月笼罩的樱花道上
追逐那场和春天一起绽放的飞雪
寻找那失落在缤纷落英中的爱的童话

多少次开启尘封的记忆
细品浓浓的桂花酒
和一段
拔剑啸天、跌宕多姿的求学生涯
银杏的故事
早已风化成发黄的书签
湖滨的落霞
也空灵得像一幅永不褪色的山水画



重回珞珈
重回西风残照的梅林
看参天的古树
为我摇曳出一身的葱翠和繁华
每一次轮回
都诉说着沉淀已久的思念
每一次凋落
都飘摇着挥之不去的牵挂

千回百转的枫园路上
秋风乍起
卷起一地的苍凉
流水一样逝去的日子
谁能感觉珞珈山峰峦叠翠的忧伤
那嶙峋的山石
是亘古不变的等待
那火红的枫叶
是滴血殷殷的期望

我终于走进你长长的目光
所有历尽艰难的跋涉
只为抚慰你穿越时空的期盼
所有忍痛割舍的情感
只为放飞千百次喷薄欲出的梦想

在这样一个秋天的早晨
我舒卷多年的相思
和着你玲珑的风雨 谱成一曲天籁
悬挂在我的窗旁



星移斗转 烟雨苍茫
珞珈
我回来了

注：1998 年 9 月，阔别母校 8 年后，再次重返校园攻读硕士学位。记得报到那天，是个细雨霏霏的秋日，在母校的牌坊前，我眼底含笑，心里却是五味杂陈，感慨万千。

（作者系图书情报学院 1986 级校友）



再别珞珈

谢春枝

来不及细数新吐的绿芽
来不及捡拾早春的落花
在这个乍暖还寒的时节
我告别樱飞似雪的珞珈

喧嚣的人群
演绎着尘世的繁华
依稀记得我们初次的相遇
你天然去雕琢的美丽
从此惊艳了每一个春秋冬夏

情人坡上肆意铺陈的银杏
寒夜里暗香浮动的梅花
石径深处飘然流泻的琴音
桂花丛中那一排排热闹而陈旧的砖瓦

旋转楼梯旁缠绵的口哨
油画般定格着遥远的青涩年华
操场上奔跑跳跃的少年
温情的眼眸中读出生生世世的牵挂



水一样的寂寞
在阴翳蔽日的樟树林里悄然沉淀
风一样的渴望
在西风残照的环山路上飒飒回响

每一次驻足
都恍然叠现出物转星移的过往
每一次流连
都蓦然沉醉于日复一日的感伤

难舍你旧时的质朴
也爱你此时的绝代荣光
文科楼群的磅礴 新图的典雅
狮子山上斑驳的石壁啊
万林馆前那轮与落日同辉的月亮

我是鱼
逃不出你目光编织的网
我是鹰
注定要带着你的期许飞翔
每一次离开
其实都为追寻你根植的梦想
每一次回首
你始终守候在这个世界最美的地方

十年一度
三十载寒来暑往
把心事封存进那棵苍老的槐树下
在松针堆积的阶前
在紫藤弥漫的窗旁



看一眼樱顶的琉璃啊
掬一捧鉴湖的霞光
别了 珞珈

(作者系图书情报学院 1986 级校友)



满庭芳·欢聚

张彩雯

岁月如梭，流年似梦，故情难忘心中。
桌前欢饮，杯盏竞频空。
纵是多年未见，怎敌得，数载情浓。
闲斟酒，流觞浅醉，更执笔如弓。
朦胧堪可忆，添香素手，红袖砚墨。
美人暗凝眸，面色微红。
数尽当初往事，且偷笑，且让随风。
期来日，珞珈再聚，余味亦无穷。

（作者系图书情报学院 1986 级校友）



我还是你原来的那个我

——入校 30 周年之际献给我的武大

张彩雯

好像从来就没有离开过
心跳总能和着你的脉搏
数了一路又一路的风雨
我在你目光注视下漂泊

是因为有你和你的嘱托
我把平凡过得陆离斑驳
也是有了你和你的荣耀
我才没有忘记一路拼搏

任我在地球的哪个角落
总能看见我珞珈的磅礴
你用你无限大气的手笔
谱写着青砖璃瓦的传说

在海边捡起了一枚贝壳
泪水滑落似珍珠般婆娑
在山顶我托起一次日落
滚烫的心是不变的承诺

三十年的思念汇成了河



你成了我一生膜拜的佛
当我顶着礼归来的时候
你该怎样再次将我点拨

十月校园杏叶落满山坡
无名湖水也会含情脉脉
再次投入到你温暖怀抱
我还是你原来的那个我

(作者系图书情报学院 1986 级校友)



我的 2016 的青春

侯新军

我的 2016 的青春
我的满是绚烂秋色的青春
是上帝的神来之笔
将这五颜六色泼洒大地
让我这秋天的青春，华丽、丰富
上帝啊，如果您真的爱我
请把我的美意转达给
那个长发飘飘
走进我的 1986 年代的姑娘
请您啊，把醉人的色彩泼洒在她的长裙
让天下的姑娘
都嫉妒她的美丽
最重要的是
让她知道
在 2016 秋天的青春里
我的心里依然有她

(作者系世界经济系 1986 级校友)

珞珈人物





六院士谈一流学科建设

陈丽霞 肖 珊 付晓歌 严 航

武汉大学测绘学科在长期的建设与发展过程中，积淀了独特的学科文化，学科成员形成了具有共同特质的人生观、价值观、世界观，以及特有的精神风貌、知识体系和行为准则，成为学科引领世界一流的强大动力。值此武大测绘学科建立 60 周年之际，李德仁、宁津生、刘经南、张祖勋、龚健雅、李建成六位院士接受武汉大学记者的采访，畅谈测绘学科文化，解读学科发展之道，建言武大“双一流”建设。

李德仁：创新

从事一个专业，要对新事物持有敏锐的觉察力，并注意吸收和运用。我把武汉大学测绘遥感学科出彩的原因归结为：紧跟国家需要和学科发展，持续吸收和充分运用新技术。

传统的测绘科学包括摄影测量学是解决几何问题，武大的几何遥感在世界上是领先的。这些成绩的取得绝非一蹴而就，而是经历了从无到有，从有到强和传承与创新的持续发展。从画地图到研发卫星，是一个不断创新的过程，既要有战略高度，又必须扎扎实实。

从传统的光学测绘遥感，到高光谱和雷达遥感，武汉大学测绘遥感学科体系不断壮大。2000 年合校后，学科交叉与融合有了新突破，开拓了在高光谱、雷达遥感等领域的研究。从不入门到入门，从入门到创新，经历了漫长过程。



20 世纪 90 年代，高光谱遥感逐渐兴起，当时我在加拿大当客座研究员，看到了这一研究领域的广阔前景，回国后带着学生开始钻研。现在由张良培教授领导的高光谱遥感团队，已成为国际上的知名团队。

对于创新，我的思路是不断走出国门，了解世界发展的最新动向。我上学时不知道雷达，1995 年在苏黎世理工大学任客座教授时才初次接触。我用 4 个月把那里所有关于雷达遥感的书都看完了，边看边复印，装了满满 3 箱寄回国。回校后，组织几个老师和博士生建立了雷达遥感兴趣小组，把资料送给他们翻译、阅读和讨论。

我的老师王之卓先生曾说过：“跟着外国人走不叫创新，开拓国家科学发展需要，为实现还没有实现的目标去努力。这才是真正的原始创新。”原始创新的过程相当艰辛，获得其他人的认可是一个漫长的过程。譬如，我在 1994 年加拿大国际会议上首次提出“空间数据挖掘”的理论，并和弟弟李德毅院士一起培养博士，并写出了中文和英文专著，是一个理论创新。现在大数据时代到来了，数据挖掘的重要性已为世人所公认。

孙中山先生有句话：“先知者先觉，后知者后觉，不知者不觉。”搞创新就是先知先觉。一方面，我们要争做先知先觉者；另一方面，国家应当对超前创新给予宽容，允许失败。

宁津生：团结

我一辈子都在这里，60 年没有离开过。1932 年德国人在同济大学办测量专业，当时测量最先进的就是德国，我刚好出生；1956 年原武汉测绘学院成立急需年轻教师，我刚好同济大学毕业；今年武大测绘学科建立 60 周年，我刚好从教 60 年。

60 年来，我深深体会到，测绘学科的内涵，用“严谨、求实、团结、奋进”的原武测校训是可以完美诠释的。

首先是严谨。测绘学科首先就是要获取自然环境或形态的位置、时间的数据。获取数据需要人扛着仪器到野外测量。测量时因



为种种原因会存在一些误差，但在最后利用观测数据计算点的坐标时，必须把误差控制在最小范围。

第二是求实。测绘常常要提供点的坐标或是其他一些边长的数据。这些数据必须实事求是。测量有各种规范，其中一条必须坚守的就是不能造假。记录观测数据的手簿是绝对不允许涂改的。有些测量员就是因为涂改了手簿被处罚甚至被开除公职。

第三是团结。测绘人员在野外作业时，都是以小组为单位来进行的。小组人员分工明确，有人观测仪器，有人记录，有人做辅助性工作。大家必须团结互助，不然观测数据的准确性得不到保障。

最后是奋进。原武测从建校之初一直到改革开放初期，都是在非常艰苦的条件下发展的。从第一届校领导班子起，学校就提出了“团结奋进”的口号。原武测在成立后不久就有了硕士、博士点，1978年被评为全国重点高校，这与学校团结奋进、艰苦奋斗的作风是分不开的。

而今，在新的历史时期，尽管仪器设备都实现了自动化、信息化，测绘人员的工作条件大大改善，但仍要坚持严谨、求实、团结、奋进的精神。我们需要这些精神，才能做到为国家的经济建设提供更好、更专业的服务。

原武测和武汉大学测绘学科带动了全国测绘学科教育的发展。目前，中国测绘学科的水平与国外先进水平势均力敌。中国测绘学科在哪些方面还要创新，领先于世界，武大测绘学科就要在这些方面多下工夫。要创世界一流大学、世界一流学科，就必须在继承传统的基础上，不断创新发展。

刘经南：责任

老武测的校训是“严谨、求实、团结、奋进”，在新的时代条件下，这八个字可以进行新的解读。

“严谨”强调的是责任意识。科学研究和技术发明都允许出差



错，但工程学科是不能出错的，因为关系到无数人的生命。测绘是工程学科，培养对社会的责任感第一重要。

“求实”指唯实唯真、追求真理要唯善唯美，它是科学精神的核心。

关于“团结”，测绘学科要又快又好地解决人类面临的各种实际问题，必须有跨学科跨领域协同合作的团队精神。

“奋进”是一种敢为人先的创新精神。测绘是获取资源与环境信息、实施建设工程的先行者，必须有不畏艰险、敢为人先的职业精神。武大测绘学科之所以能够走在世界前列，正是因为早在 20 世纪 80 年代后期就进行了学科转型和改造升级的探索，从传统的光学测绘遥感到高光谱和雷达遥感，从传统的大地测量到空间大地测量和导航与位置服务，从传统的地图制作到地理信息系统服务。实现了从紧跟世界科技发展潮流，到在一些重要方向开始引领世界潮流的转化。

武汉大学测绘学科在世界上已处于领先地位，未来如何发展，这是大家尤为关心的问题。

泛在测绘与位置服务的发展已经进入了大数据时代。测绘学要结合“互联网+”和物联网感知技术，为建立新一代的适应智能感知与控制需求的网络——信息物理系统(CPS)又称工业互联网，做出自己的原创性贡献，要在国家和全球建立起天空地、室内外一体化的遥感信息、位置信息、环境资源信息系统，打造地球空间信息智能感知网络。

一个学科的发展不可能独立完成，更需要跨学科、跨领域、跨行业间的合作，更需要强大的团队。我们已经实现了测绘学科与计算机、电子信息等学科之间的跨学科融合，也在进一步探索与物理学科的教师共同研发导航芯片等。

测绘学科未来的发展依然需要学校的大力支持，让更多基础学科参与进来，迎接科技革命的新挑战。这不仅能满足测绘学科发展的需要，同时也会为合作学科提供难得的发展机遇，是一个互利共赢的绝好机会。



张祖勋：传承

测绘学科的精神内涵，核心是“传承”。它并不简单指“辈辈弟子当院士”这种直观的传承，而是理念、传统等深层次的延续。

武汉大学测绘学科之所以如此兴旺，就得益于传承的力量。测绘学科经历了几辈学人的发展传承。

1971年，李德仁被分配到石家庄水泥制品厂工作。1978年国家恢复研究生招生，恩师王之卓先生将他召回母校，直接出题破格录取。无独有偶，大学毕业后，刘经南在湖南省煤田物测队任技术员、助工，也是在国家恢复研究生招生的第一年回到母校。

1994年，李德仁和刘先林当选中国工程院信息学部院士，随之，宁津生当选中国工程院土木学部院士，从此开创了测绘人在中国工程院的“传奇”，这里至今已经诞生了12位测绘界的院士。可以说，宁津生为整个测绘学科在中国工程院的兴起做出了巨大的贡献，李德仁极大提升了武大测绘学科在国内外的影响力。

有些人会说，“年纪大的有经验”，这一点在学术上不完全适用。学术需要创新推动，创新需要灵感，年轻人才是创新的主力军。

谈到年轻人的培养，绕不过一位重要人物——我的导师王之卓先生。

大学毕业我留校担任王先生的助教，3年后又报考了王先生的研究生。他对年轻人无微不至的关怀和亲切耐心的指导，令我终生受用。

先生只批评过我一次，至今犹在耳旁。当时，他督促我编一个程序，我因为并不擅长，一直以“忙”为借口拖延。几次之后，他严厉地批评我：“人不怕慢，就怕站。”他说：“慢一点没关系，站一下也没问题，但是不能停下来。有些东西可以放下来，半年甚至一年，但稍微调整后，要重新捡起来，一直搞下去。坚持很重要，认准一个目标就要坚持下来。”

王先生60年孜孜不倦教书育人，一个导师能培养出这么多优



秀的弟子实属不易，这比他自己的学术成果更有价值。2002 年，王先生临终前对我们说：“未来的路要自己慢慢走。”

发现年轻人，还要重用年轻人。创造平台让他们施展特长。王先生的这一点也影响到了我，任系主任、副校长时，我有意提拔年轻人。

龚健雅：融合

相对于计算机等年轻学科，测绘学科既古老又传统，有 100 多年的历史。近二三十年，信息化日益普及，为测绘学科提供了广阔的平台和精尖的技术，并衍生出一个前沿学科——地理信息科学与技术。这是一个交叉多元的学科，和地理专业有关，和计算机专业有关，和测绘专业也有关。如果学测绘的不能跟上形势，不积极主动地拓展研究领域，这个学科就要靠地理、计算机领域的学者来主导。

测绘学科的老一辈科学家积极拓展，在全国最早成立了地理信息系统专业，不断向其他边缘学科发展和渗透，使测绘学科在地理信息系统研究中占据了半壁江山，有着十分重要的地位。

不向其他方向延伸，一个学科的发展将会越来越窄。测绘学科今后的发展同样决定于能否顺势而为、乘势而上，要看学科带头人是否有前瞻的眼界。

新兴的无人驾驶汽车、大数据分析等，看似属于 IT 领域，但结合测绘特色也都是大有可为的。测绘绘制的地形图，在目前的汽车导航与位置服务中起了重要作用，将来的无人驾驶汽车需要更精确的地理信息，测绘人必须参与其中，努力拓展测绘学科的“用武之地”。

一流学科的精髓在于学科间的交叉融合。

随着研究范围的逐渐扩展，跨学科研究的空间也不断加大。现在，IT 产业都有空间信息这一块，BAT(百度、阿里巴巴、腾讯三大互联网公司的首字母缩写)都设有相关的部门。主要内容有两方面：一是导航与位置服务；二是无人驾驶汽车。



除此之外，测绘遥感还广泛应用于农业、林业、水利、城市管理、环境监测等传统行业。测绘遥感技术与其他学科交叉还可以产生新的研究方向，例如，我们最近在与生命科学学院合作共建实验室，通过激光雷达测量和光谱测量进行水稻育种与表型研究。

以前，测绘学科的学生毕业去向 80%~90% 在测绘行业 and 部门，现在我们遥感学院的学生大约只有 20%~30% 留在测绘部门，相当一部分去了像 BAT 这些互联网公司，这说明测绘遥感学科有了更大的发展空间，在更多领域占有了一席之地。

李建成：进取

测绘是观测科学，是一个具有较深数学理论背景的学科。老校训是在当时的历史条件和科学技术背景下提出来的。

“严谨”是学科的前提。过去，我们研究测量时，观测手段比较落后，操作要严格按照规范和流程来，否则任务难以完成，学科目标无法达到。“求实”要求我们观测出的数据成果一定要真实，不能随意改动，这来不得半点虚假。“团结”即和谐，老一辈测绘科学家齐心协力打造出中国的测绘学科，这种团结的精神一代代传承下来。没有团结的氛围，事业就难以发展。“奋进”可以理解为武汉大学校训中的“拓新”——开拓创新。学科如果不创新，不用现代技术改造，就会故步自封停滞不前。

测绘学科在发展过程中形成这 8 个字，放在现在来说，就是“工匠精神”，是一种追求卓越的创造精神，一种精益求精的认真精神，一种用户至上的服务精神。

这 8 个字中，我对“严谨”体会最深。测绘学科本身对数据理论的严密性提出了很高的要求，我们必须严格严格再严格。得到了大量观测数据之后，我们必须在严密的理论条件下，运用精密的数据处理技术来完成。理论如果有缺陷，或者在数据处理技术方面考虑不周，都完成不了学科目标。严谨是我们在任何时候、任何条件下首先应该持有的一种态度，也是应该始终坚持的一种精神。

我认为，测绘学科文化最突出的特质是锐意进取，是不断结合



现代科学技术对传统测绘手段进行改造，形成新的学科体系。在这方面，武大测绘学科表现出色。

原武汉测绘科技大学是举全国之力，集合中国最优秀的测绘人才资源、教学资源办起来的一所学校，逐步发展成为国际公认的“世界测绘教育之都”。现在，由于航天航空技术的发展，学科进入了崭新的阶段，众多方面发生了革命性的变化。过去描绘地球形状的精度是 10 米，现在精度提高到厘米级，将来还要提升到更高的精度。没有锐意进取的精神，我们不可能完成大量的科学研究工作，并不断取得具有世界先进水平的进展。

(原载武汉大学新闻网 2016-10-13)



一个班走出三院士

付晓歌 肖淙文

一个班出了三位院士，而且曾住同一宿舍，师从同一导师。近日，武大和清华的一些校友，津津乐道于这样一则新闻。

王光谦、胡春宏和倪晋仁3人，都生于1962年，同时在武大读本科，后一同考上清华研究生，住同一间宿舍，博士期间师从同一导师。6年内他们相继当选为院士。

三位院士，专业入门都始于珞珈山下。

“他们取得的成果离不开个人的努力奋斗，也与学校重视本科教学质量密不可分。”同样毕业于原武汉水利电力学院的谈广鸣副校长如此分析。

1978年初入大学时，三个人都只有16岁。他们是恢复高考后第一批学生，十分珍惜上大学的机会。“考上大学实在太不容易，从小城市来到大武汉，我们都非常努力。”倪晋仁说。

当时班上一共76个人，分成两个小班，王光谦、胡春宏在1班，倪晋仁在2班。除少数几门课外，大家平时都在一起上课。

三位院士现在都已成为各自领域的带头人，然而上大学时他们对自己的专业并不了解。武汉大学第六届杰出校友王光谦说，入学前自己对治河系学的是什么一无所知。刚踏入校门时，老师对他们说：“中华民族的历史就是一部治河史。”正是这句话，一下子点燃了王光谦对治河专业的热爱。

倪晋仁是作为调剂生进入治河专业的，抱着既来之则安之、任何专业都能出成绩的心态，他马上投入到了对专业的刻苦钻研中。他笑称自己“稀里糊涂上了大学，稀里糊涂踏入了这个专业，稀里



糊涂努力了四年”。其实，所谓“稀里糊涂”只是倪晋仁的自谦，毋宁说这是一种专注，一种对学业的心无旁骛。正是这份埋头苦干，为他此后的学术研究奠定了扎实的基础。

本科阶段的专业学习，让他们第一次对自己要奋斗终生的事业有了清晰的认知。院士们回忆，上学的时候，时任系主任谢鉴衡教授十分注重培养学生对学术研究的兴趣，不仅自己经常做讲座，还积极组织大家参加学校举办的相关学术论坛和学术会议。不少学生听了大师们的报告后，更加喜欢一起揣摩、推导、讨论，渐渐地学习兴趣和学习氛围更加浓厚了。

“记得实习时，老师带我们参观了三门峡水利工程和葛洲坝，实地给我们上了一次专业教育课。对此我记忆非常深刻。”王光谦说，“是武大的读书经历引导我迈出人生事业的第一步。”

谈起校园生活，院士们印象最深刻的就是当时良好的学习氛围。“只要有空就往图书馆跑，抓住一切时间占座位上自习。”倪晋仁形容，当时大家学得很投入，时间抓得紧，甚至“舍不得睡觉”。王光谦说，“到现在我还记得，每天晚上熄灯后，很多学生还在想办法读书。校园的路灯下、宿舍走廊里都能看到埋头苦读的身影。”

与武汉大学周边现在的繁华相比，当年这里可算是“荒郊野外”，娱乐活动十分匮乏。在那个电视、互联网还未普及的时代，他们的生活基本是教室、宿舍、图书馆、食堂，四点一线。学习之余，大家最喜欢的娱乐活动就是周末去看一场学校的露天电影。“五分钱一张电影票，放的都是很好的片子，同学们都乐意去看，到现在还很怀念。”倪晋仁说，学校食堂便宜又美味的饭菜也让他们印象深刻。

1982年本科毕业时，班上有十余人继续攻读硕士学位，王光谦、胡春宏、倪晋仁等人同时考入清华大学，就读于水利水电工程系。巧的是，三人一起住进了2号楼474寝室。爱好写“空心字”（双钩书法）的倪晋仁，一天心血来潮画了三只老虎，贴在寝室门上，题名“三虎居”。读研期间，三人关系十分融洽，交流学术，谈天说地，无话不谈。而后三人又一同入夏震寰教授门下攻读博士



学位。

三人毕业后走上不同的工作岗位，不变的是对泥沙治理工作的一腔热血。凭借累累硕果，2009年，王光谦当选为中国科学院院士；2013年，胡春宏当选为中国工程院院士；2015年，倪晋仁当选为中国科学院院士。

原水利水电学院教学与科技办公室主任吴云芳介绍，自1977级至今，学院本科生毕业后去清华大学和北京大学继续深造（含推免）的有100多人。一届又一届水利水电学科的学子走出校门，走上社会，成绩斐然。业界评价：武大学子动手能力强，业务扎实。

“在武大的学习经历，为我之后的发展打下了扎实的基础。现在的学术环境比起我们当年更加优越，我真心觉得学弟学妹们会比我们更强，会做得更好。”言谈中，倪晋仁表达了对武大学子的认可，也透露出对后辈学人的殷切期望。

>>>人物名片



王光谦，1962年4月生，中国科学院院士，武汉大学杰出校友。



1982年毕业于武汉水利电力学院治河工程专业；1982年至1989年清华大学水电工程系水力学与河流动力学专业硕士生、博士生；1989年至1992年中国科学院力学研究所博士后。

现为清华大学土木水利学院水利水电工程系教授，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工程与材料学部主任。曾任清华大学水沙科学与水利水电工程国家重点实验室主任，2013年7月出任青海大学校长。

主要研究领域为泥沙学科与江河治理，开展了水沙两相流基本理论、流域水沙过程模拟及工程应用等方面的研究。建立了水沙两相流的动力学模型，得出泥沙颗粒浓度分布及速度分布公式，揭示了泥沙颗粒运动与清水湍流的不同特性。研究成果为解决黄河治理及长江三峡工程泥沙问题发挥了作用。承担“复杂条件下坝堤溃决机理与风险调控理论”973项目，研究成果应用于汶川地震堰塞湖除险中。曾获国家科技进步一、二等奖等奖励3项。发表论文240余篇，出版专著5部。



胡春宏，1962年4月生，中国工程院院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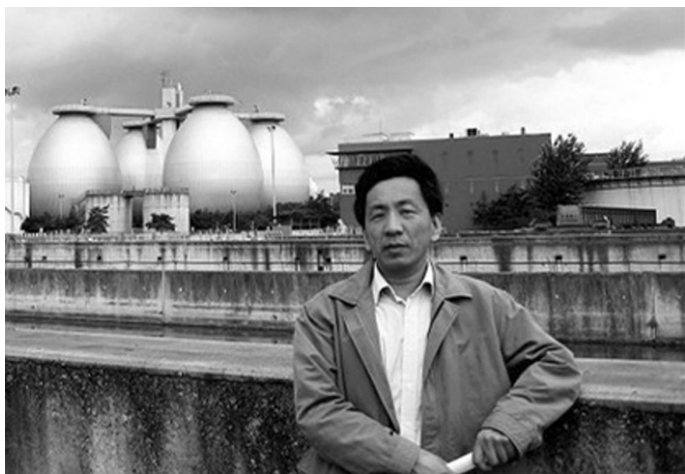
1982年毕业于武汉水利电力学院治河工程系，获学士学位；1982年至1989年在清华大学水电工程系相继获得硕士和博士学位；1989年至今，在中国水利水电科学研究院泥沙研究所工作，现任中国水利水电科学研究院副院长。



曾主持和承担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国家科技攻关项目、国家重点基础研究发展规划(973)项目、国际合作项目、各类省部级科研项目 40 余项,发表学术论文 80 余篇,出版专著 5 本,撰写研究报告 50 余份。

获国家科技进步二等奖一次,水利部科技进步一等奖一次,二等奖三次,三等奖一次,1998 年获中国青年科技奖,1996 年获钱宁泥沙科学奖。

主要从事泥沙运动规律和江河治理方面的科研工作,研究方向为泥沙运动基本理论,河道河口演变与整治、水库泥沙、工程泥沙、泥沙物理模型与数学模型技术等。在长江三峡工程、黄河小浪底工程、三门峡工程、黄河下游河道与河口、渭河下游、官厅水库、塔里木河干流等工程项目中的泥沙治理方面取得了多项国际先进水平的科研成果。



倪晋仁,1962 年 8 月生,中国科学院院士。

1982 年毕业于武汉水利电力学院治河工程系,1985 年和 1989 年在清华大学水利工程系水力学及河流海岸动力学专业分别获硕士和博士学位,1989 年至 1991 年在北京大学做博士后研究工作。

曾在日本北海道大学土木工程系、牛津大学工程力学系作为访



问学者进行学术交流和合作研究。1992 年起在北京大学任教授。1996 年获国家杰出青年基金资助。现任北京大学环境工程研究所所长。

主持国家自然科学基金优秀中青年人才专项基金项目、国家杰出青年基金项目、欧盟科技合作项目、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重大项目等 30 余项科技项目。发表论文 200 余篇，其中在 SCI 收录的国际杂志发表论文 150 余篇，被 SCI 他引 2000 余次、CNKI《中国引文数据库》他引 6000 余次。出版专著 5 部，译著 1 部，获得授权国家发明专利 30 余项。

曾获国际泥沙研究中心钱宁泥沙科学奖、第 41 届日内瓦国际发明展金奖和 FIRI 特别奖、国家科技进步奖二等奖、国家技术发明二等奖，中国地理学会青年地理科技奖、中国水利学会优秀青年科技奖等。指导的博士生获得全国百篇优秀博士论文奖。

(原载武汉大学新闻网 2015-12-11)



让保险闪耀人性的光辉 让生命的旅程流光溢彩

陈东升

校友名片：

1983年毕业于武汉大学政治经济系，1998年获武汉大学经济学博士学位，武汉大学杰出校友、博士生导师、校友企业家联谊会会长及北京校友会会长；中国著名企业家，“92派”企业家代表人物；嘉德拍卖、宅急送、泰康人寿三家企业创始人；现任泰康保险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兼首席执行官，中国精算师协会会长，亚布力中国企业家论坛理事长，全球楚商联合会会长。





此时此刻，我们怀着无比激动的心情，再次相聚在庄严、神圣的人民大会堂，共襄盛举，共庆伟业。

十年前，我们也站在这里，那时的泰康还是一个以个险和法人业务为主的单一人寿保险公司。十年后的今天，我们再次相聚人民大会堂，感慨万千：现实比理想更加灿烂、更加伟大！我们管理资产跨越1万亿；我们以大个险为核心的保费平台跨越了1千亿，成功完成价值转型，踏上了持续、健康、稳定发展的康庄大道。去年我们的税后利润突破百亿，今年新单价值百亿在望，我们迎来了新单价值和税后利润的“双百亿时代”。更重要的是，我们已经脱胎换骨，不仅仅是一家传统的人寿保险公司，我们形成了保险、资管、医养三大核心业务板块，实现了以生命为主体的全产业链布局，正在迈向以大健康为核心的创新型保险金融服务集团！

泰康二十年 大树参天

一个企业的成长，三年决定生死，五年打下基础，八年站稳脚跟，十年小有品牌，二十年才能成长为参天大树。

今天的泰康已然大树参天，根深蒂固、枝繁叶茂。

二十年，我们构建了伟大的销售体系。5家子公司、36家分公司、286家中心支公司和4200多个拥有金融牌照、遍及全国的销售服务机构，全网络覆盖。个险、银保、电销、经代、互联网、法人，全渠道布局，销售队伍超过50万。

二十年，我们铸就了投资的金字招牌，投资回报连续十三年行业领先。我们是京沪高铁、西气东输等国家基础设施建设的重要投资者，是地方经济和社会发展的支持者，更是现代服务业基础设施的投资者和建设者，真正体现了保险是国家现代治理结构的重要组成部分。

二十年，我们抢抓了互联网先机，互联网+保险开启新篇，泰康在线成为第一家大型险企发起设立的互联网保险公司，微互助、飞铁保等产品，创新不断。保险+互联网持续推进，实现了销售、承保、理赔全流程互联网化，云计算、大数据全面武装，“左手抱



右手”初见成效。

二十年，我们积累了庞大的客户群体，我们累计服务的总客户数达到 1.77 亿；我们累计赔付人次达到 1 393 万，累计赔付支出 238 亿人民币，为信赖泰康的客户撑起了一片蓝天！

二十年，我们让每一位员工分享成长的果实。我们用千人计划吸引优秀新人，我们用中青班、世纪组训培训核心骨干！我们用世纪盛典激励销售精英，我们用员工持股打造合伙人制度和精神，我们建设泰康商学院激发创新思想、培养人才！

二十年，我们积极承担企业公民的责任。累计上交税款 265 亿元，特别是去年，我们位列北京市缴纳地税前四名，为国家经济腾飞和社会发展持续贡献力量！我们累计捐赠公益善款超过 3.5 亿元，在祖国和人民的每一个危难时刻，我们都挺身而出，责无旁贷！

回眸二十年，我们坚持“市场化、专业化、规范化、国际化”，“快速发展不失稳健，稳健经营不乏创新”，真正做到了“快速、稳健、创新”三者相平衡；我们“因时而生、因市而兴、因势而变”，抓住每个战略机遇期，实现了超常规、跨越式发展；我们打造了伟大的销售队伍和一流的投资能力，双轮驱动，推动我们的事业向前发展！

我们深深了解这个国家和民族，我们真正融入到经济发展的大潮之中，创造了新兴市场中保险公司发展的成功典范。

我们深深了解人寿保险这个行业，金融企业，对资本和偿付能力有着极高的要求。我们依靠自身资本积累，支撑公司业务快速发展，并始终保持偿付能力充足，为新战略的布局奠定了坚实的资本基础。

我们深深了解企业的本质，只有创新才能永葆活力。泰康三波创新浪潮，与时代背景相契合，与公司战略相匹配。从产品到服务，从理念到商业模式，创新是流淌在泰康血脉中的根本基因。

泰康二十年成长，得益于“时代好、命运好、机会好”。因为时代好，身处飞速发展、创造奇迹的改革开放伟大年代！因为命运好，选择了人寿保险这个充满活力和人文关怀的朝阳产业！因为机会好，共同的信念让我们走在一起，上下同欲、从不折腾，目标纯



正、心无旁骛，共同打造了泰康美好的家园！

尊重生命 关爱生命 礼赞生命

我们这一代人出生在充满激情的岁月，完整经历了改革开放前后两个时期，参与了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型的全过程。我们始终保持着强烈的家国情怀，立志要为人类文明奋斗终生。对世界经济格局的洞察使我们更坚信，强大的国家必须有一批强大的企业，产业报国成为我们人生的奋斗目标和坚定选择。创办人寿保险公司，源于对国家、对民族的责任，更源于以人为本的理念和对生命的敬畏。

自从事保险这个行业开始，我们就一直在思考与生命相关的核心议题。泰康二十年，对保险的理解，实现了从家庭保障功能到一种生活方式，再到尊重生命的思想和认知升华。

2003年，“非典”时期，我们为北京抗击“非典”的医护人员赠送了专项保险，一位医生不幸被 SARS 夺去了生命，我们给他的家人送去了保险理赔金，更送去了一份温暖和对未来的希望。我们说保险是“为爱尽责，让家无忧”！

2008年，汶川地震中，一位很有孝心的女孩不幸遇难，她生前买了我们的“吉祥相伴”产品，因为父母离异，在地震前一个星期，她做了受益人变更，说万一出事，理赔金父母一人一半。当我牵着她父母的手，把理赔款送给他们的一刹那，从我的心底里迸发出一个充满力量的声音：买保险就是尊重生命！

九年前，我们开始筹划把公司的战略延伸到养老实体领域，我带着团队考察了很多国家和各种形态的养老模式。2009年，我们专门把公司的董事会开在了美国，专程考察养老社区，我们看到了这样一幕：95岁的老先生在跑步机上锻炼；一群打扮时尚的老太太在练站姿、跳芭蕾；还有一位开朗的百岁老人，戴着二战时期的护士帽，思维敏捷，开怀大笑……这对我触动很大，我感受到东西方文化的巨大差异：我们中国的老年人大多质朴节俭，往往为了子孙省吃俭用，一切为了下一代。这是一种传统美德，但是在现代社



会，我们一定要改变他们的这种观念，让他们也能自信、快乐、优雅地老去。

于是，我下定决心一定要把这种养老方式带到中国，来改变我们中国老年人对生命的态度和认识。今天，“活力万岁、生命万岁”的一幕幕美好画面，已经出现在了泰康的燕园、申园，未来还会出现在粤园、蜀园……

生命如此美好，我们的事业如此光荣！我们回归生命本源，拓展了保险的边界，丰富了保险的内涵，也升华了对生命的理解：我们就是要尊重生命、关爱生命、礼赞生命，我们就是要让生命的旅程流光溢彩！

展望未来 泰康依然是奔跑的少年

泰康的发展理念，源于二十年前的一份初心，持之以恒，不断升华。我们经常说，节能、环保、人文关怀是本世纪的三大潮流，我们从事的人寿保险是最具人文关怀的事业。中国正在面临深刻的经济转型，从工业化向后工业化转型、从制造业向服务业、从投资出口向内需消费转型。社会经济结构的重点也从衣、食、住、行向娱、教、医、养转变。泰康紧扣时代主题，是最具人文关怀伟大产业的领跑者和这个使命的开拓者！

二十年的泰康不仅是一棵参天大树！二十年的泰康依然是一个奔跑的少年，我们对未来满怀憧憬，我们的新事业才刚刚起步。

未来三年，泰康将全面实现集团化管理，充分发挥子公司的企业家精神，源源不断打造新的业务和利润增长点；未来三年，泰康将致力于成为一家公众公司，打造强大的创新能力、盈利能力；未来三年，泰康将挺进世界 500 强，成为行业内最具影响力的品牌！

未来五年，保险业务要高速发展，跑赢对手，市场领先；未来五年，资管业务要保持竞争优势，成为世界一流的投资品牌；未来五年，医养业务要覆盖核心经济地带。

未来十年，医养业务要完成全国化布局，成为中国医养第一品牌！让“四位一体”创新商业模式落地开花、根深叶茂，真正成为



全球范围内的创新者、示范者和领导者！

为了实现宏伟目标，我们要以创新为动力，全力发展保险、资管、医养三大业务板块，打造全生命周期的垂直化产业链，打造从摇篮到天堂的商业模式。形成全生命周期、“活力养老、高端医疗、卓越理财、终极关怀”四位一体的垂直闭环！长长的坡、宽宽的道、厚厚的雪，滚世界上最大的雪球！

我们的定位是：为日益增长的中产人群及家庭提供全方位健康和财富的管理与服务。

我们的愿景是：坚持专业化，深耕寿险产业链，从摇篮到天堂，让保险更便捷、更实惠，让人们更健康、更长寿、更富足，让泰康成为人们幸福生活的一部分！

我们描绘的不仅仅是一幅美丽的蓝图，我们更是在开启一项伟大的事业：我们把自己融入到追逐“中国梦”的伟大征程中，我们要用市场经济的方式和方法，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我们要用市场经济的方式和方法，实现我们心中的中国梦！

泰康的二十年与我们伟大的国家一样，走过了不平凡的历程。中国崛起的宏大背景诞生了泰康这样一批有理想、有抱负、敢作为、敢担当的行业骨干。我们的事业与人的生命、健康、财富紧密相连，我们要让保险闪耀人性的光辉，我们要让生命的旅程流光溢彩！

（本文摘自陈东升在泰康成立 20 周年庆典上的演讲）



丁邦清：母校，我从未离开

付晓歌 严 航

校友名片：

丁邦清，1990 届武汉大学哲学硕士，中国著名品牌、广告、营销专家，曾获中国广告 30 年突出贡献奖。现任中国本土最大、第一家国内上市的广告公司——广东省广告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副董事长兼总裁，中国广告协会学术委员会副主任，国家广告研究院品牌分院院长。



武汉大学校报(新闻网)记者对其进行了专访。

记者：您是学哲学的，怎么走上了广告传媒的道路呢？

丁邦清：我在武大读研期间，本来的研究方向是毛泽东哲学思想，一次看到毛泽东的一篇文章说：我们靠两手打天下，一手拿着



枪弹，一手拿着传单。这句话吸引了我的注意。我想，枪弹，我们研究不了，那就研究传单吧，研究宣传吧。所以业余时间就去涉及毛泽东的宣传思想与艺术，这样就接触到传播学与广告学，我几乎读完了武大所有这类藏书。以后，在教学之余，一面去梳理与研究广告学理论，一面兼职在广告公司做实践与验证。

记者：您曾说武大自由学习的氛围对您的影响很大，具体体现在哪些方面呢？

丁邦清：母校这种开放创新的氛围对我的影响很大。在省广公司，如果有员工想要创业，我不仅不反对，还会帮他当老板，给予经济上的支持，提供管理方面的经验。我们宽容出错，但是不能不创新。

我在武大学到的另外一点是包容，没有谁是真理的垄断者。记得以前上课时，课堂经常演变成辩论，大家各抒己见，互相质疑、辩驳、讨论。

我认为，凡是封闭的系统都是在走下坡。我们必须有大胸怀、大格局、大容量。如果没有这个传统，我们就不是武大人；如果没有这个传统，就必然走向衰败。

记者：近年来，您与母校有哪些互动呢？

丁邦清：在学术方面，我们经常邀请武大的老师来做报告；我们与武大新闻与传播学院等八个团队合作，推出中国第一本品牌白皮书。我们这里有品牌、有资源，今后，希望通过一些项目，进一步加强与学校的合作，包括联合创业等。

120周年校庆时，我写过一篇文章叫《母校，我从未离开过》。很多人写我离开母校后的回忆，而我却反其道而行之，写自己从未离开过，因为我精神上从未离开。虽然日常工作繁忙，但只要能为学校做一点事情，我都会尽量参与。

记者：这次采访中，感觉到广州校友会的凝聚力很强，能简单介绍下您参与的校友会工作吗？

丁邦清：我自己参加了很多聚会，有两个较为重要的。一个是武大广州校友聚会，除了一年一度的武大新毕业生的迎新活动聚会，我还参加了新闻传播分会和哲学分会。只要有空，我就会参



与，比如前段时间大家一起去看《栀子花开》在武大拍摄的宣传片。第二个，就是珞珈 1893 创业咖啡馆，它成为交流信息、创新创业的平台，大家会常回“珈”看看。

记者：您如何评价武大毕业生？

丁邦清：我所在的广东省广告股份有限公司中武大学生最多，2014 年就招聘了几十个，包括新闻、广告、经济、哲学、历史等专业。在长期的工作中，我发现武大学生素质高，能吃苦，有事业心，专业基础扎实，有激情有梦想。很多武大毕业生不到 30 岁就成为子公司或者事业部的总经理，掌握几亿甚至几十亿的资产。

今后，我们要增加武大优秀毕业生的招聘人数，加强对学生干部、自主创业学生的破格选拔力度，待遇不封顶。省广公司的机制十分灵活，唯才是举，打破了论资排辈等条条框框，最大限度发挥优秀人才的积极性和创造性，欢迎优秀学子来这里发挥才干。

记者：您对在校学子有什么建议？

丁邦清：第一个建议是早一点做职业生涯规划，张爱玲说“出名要趁早”，其实你的事业也要趁早。有的专业大二就可以开始去实习，不断尝试和摸索，找到自己的兴趣和特长。我自己做传播就因为它是我的兴趣所在，新闻传播将科学、艺术、商业有机地结合，比较符合我这个学哲学的文艺青年的标准。

第二个建议就是找到自己的兴趣和特长后坚持下去。有了兴趣，假以时日就能获得成功。

（原载武汉大学新闻网 2015-12-09）



方平传奇

——追记总参某部研究员方平

黎 云 吴 旭 陈春晓

2015年5月25日零时，总参某部研究员方平因连续高负荷工作突发心脏病医治无效，生命停止在41岁。

方平为之付出生命的，是国防和军队建设发展的一块重要阵地。这块阵地，素以超高的技术难度而著称。

有多难？方平的同事、研究员陆兴国介绍说：“就好比攀登珠峰，挑战的是智慧和毅力的极限。”

为了登顶这座强军事事业的“珠峰”，方平以一生只做一件事的决心，执拗前行，不曾游离，从未停步。

1995年，以优异成绩从武汉大学数学系基地班毕业的方平，得知部队来学校招生的消息，飞奔到面试现场，毫不犹豫地签下了协议。

回顾这次重大的人生抉择，方平曾坦言，自己本可以选择待遇优厚得多的地方公司企业，之所以义无反顾穿上军装，就是要挑战这个“高难”。

1996年，方平所在课题组领受了一项“硬骨头”任务——多家单位很长时间都未能取得突破的课题。

面对第一场硬仗，方平没有丝毫退缩和畏惧。他凭借扎实的功底，透过纷繁复杂的课题迷局，抽丝剥茧、化繁为简，将破解课题的关键节点转化为几道数学模型，并开始了艰难的“证明和解答”。

那阵子，他把自己的所有心思都沉浸到了工作中，满脑子都是模型和数据，一次一次推演、验证，一次一次失败，又一次一次从



头再来……陷入僵持时，他干脆直接睡在办公室。时值隆冬，夜里实在是太冷了，他就扯块盖机器的布裹在身上。

两个月过去，方平心中的实验数据日渐丰满，结果一点一点变得清晰……一天半夜，他拨通了科长的电话，兴奋地喊：“成了！”

这是我军某领域科研中的一次历史性突破。捷报传来，前来祝贺慰问的上级领导难掩激动之情，高声评价：“这一战，着实长了中国人的志气！”

这个年轻的军官一战成名。以此为发端，22岁获得全军一等奖，30岁晋升为副研究员，39岁晋升为研究员……方平用不到20年的时间，创造了令战友惊叹的“方平传奇”。

2004年，方平受命担任我军某工作领域转型拓展课题组的组长。在自己创造“传奇”的地方拿起“指挥棒”，方平不敢有丝毫的懈怠。

在他的带领下，课题组7年完成了13项重大专项任务，创设出许多崭新的技战法，在我军某领域开辟出一片全新战场，并两次实现历史性突破，提升了我军在这一领域的核心战斗力。

2015年5月23日深夜，鏖战一天的方平一脸憔悴，他一边揉着肩膀，一边对同事吕辰说：“今天的收获很大，回去我抓紧整理一份调研报告。”

“肩膀还是痛？”吕辰担心地说，“先去医院看看，休息几天再说。”

“还是早点写完心里踏实，时间拖久了，细节容易忘。”方平拍了拍胸脯。

肩膀痛，是心脏“亮起红灯”的前兆——去医院检查的事情，就这样被方平搁在了脑后，他也错过了最后的治疗机会……

2015年5月26日，急救室里，爱人将方平已经冰冷的双脚紧搂在胸前。“你的脚怎么这么凉，让我暖暖。”她喃喃自语，像是在给自己一丝希望。

她不会忘记，16年前的隆冬，在那间简陋的婚房里，因为没有暖气，方平每天正是如此这般温暖她的双脚。

这两口子，是战友眼中“命中注定的伉俪”——同为武汉大学



的高材生，先后分配到同一部队工作，一个是她眼中“久闻大名的才俊”，一个是他心里“志同道合的伴侣”。

他们宛若并蒂芙蓉，在各自的岗位上竞相绽放。2010年，两个人双双担任课题负责人，当方平作为“技术总监”昼夜鏖战时，她则在另一战场带头攻研核心技术。那一年，在部队年终总结表彰会上，他们挽着手一起戴上了大红花……

如果不是一场病，也许日子就会这样美满地过下去。

2011年春，方平的爱人被确诊为鼻咽癌。连续的放疗让她痛不欲生，一度想放弃治疗。一向坚强的方平抱着她放声大哭：“你走了，我怎么办！”爱人又鼓起了生的勇气。

那段时间，方平每天早上5点就起床给爱人熬中药，亲自尝一尝烫不烫后，再一勺一勺地喂着她喝下去。

3年过去，在方平的悉心照料下，爱人的病情渐渐好转，平稳地度过了癌症术后的易复发期。

如今，物是人非。

眼看着她因为过度悲伤而日益瘦弱的身体，家人想让她回老家休养一阵子。听到要自己离开，她的泪水划过苍白的脸庞，环视着眼前这个和方平一起搭建起来的家说：“我要一直留在这里，完成他没能完成的事业。”

（稿件来源：新华网 2015-11-9）



何五元：有校友的地方就有“珞珈山”

严 航 陈晓煜

校友名片：

何五元，1984 级中文系校友，云创数字科技股份有限公司(838730)董事长、广州校友会副秘书长，武汉大学泛珠三角校友企业家联谊会常务副秘书长。他大学期间所写、120 年校庆期间修改的《珞珈赋》，镌刻在校门广场上；《永是珞珈一少年》等多篇美文佳作，在师生、校友中广为传诵。

作为资深的公共关系和移动互联网营销专家，他率领的公关策划团队长期服务于嘉里粮油金龙鱼、中国移动通信、蓝月亮洗衣液、太阳神、华帝集团、万家乐集团等知名品牌。





武汉大学报(新闻网)记者对其进行了专访。

记者：您觉得是什么力量把广州校友凝聚得如此紧密？

何五元：毕业后，无论身在何处，校友们总希望能够重新找到精神世界里的那座珞珈山，大家会自发地凝聚起来。这是广州校友凝聚得如此紧密的原动力。在这个过程中，当然也离不开广州校友会的努力，总有热心又充满激情的校友无私地张罗校友会工作，一代又一代传递着珞珈情怀。

为什么要不断发展校友会？因为我们有责任去达到这样一个目标——有武大校友的地方，就应该有一座珞珈山。无论天涯海角，珞珈的“珈”也是家乡的“家”。校友会就是要营造这样一种“珞珈山”的氛围，打造属于武大人的“珞珈文化”。

记者：校友会对促进校友交流做了哪些工作？

何五元：简单来说，我们就是想为校友和母校(包括在母校的师弟师妹们)做点事。广州校友会很早就建立了自己的微信微博平台，由每个分会轮值负责运营；同时，我们建立了各分会秘书长联席会议和日常沟通群，校友会有什么要求都可以第一时间贯彻到各个分会去。

我们有一群乐于扛大旗的师兄师姐，有一帮无私支持校友活动的校友企业家，有许多义务为校友会工作的会长、理事、秘书长，还有无数的热心校友志愿者，这些都是最好的保证，可以让广州校友会在没有一个专职人员、没有一分钱固定经费的情况下，照样做得风生水起。

校友会是纽带、是平台，是连接、融合和共享，是连接母校和校友之间的桥梁。我们一直在努力搭建一个融合来自不同专业、不同年级校友的平台，一个可以让校友共享资源的大家庭。

记者：校友们通过什么形式的活动聚在一起？

何五元：平常会有很多聚会，比如春茗、年度迎新会、专业论坛、校庆纪念活动等，还有一些常规活动。校友会下属的十几个分会每年还会根据各自特点不定期举办大大小小的主题活动。“珞珈1893 创业咖啡”创立之后，校友们有了新的活动据点，交流共享的频率更高了。



记者：“珞珈星空大讲堂”已开讲三期，反响如何？

何五元：超乎我们想象。三位知名校友中国政法大学校长黄进、知卓资本董事长陶闯和东星集团总裁兰世立，分别带来了题为《涉外民事关系法律适用法实施中的法律问题》《互联网+时代的创业》和《新经济形势下的创业创新》的讲座。每次两个小时左右，主题演讲之外穿插互动和讨论。三场均是爆满，许多校友慕名而来，连过道都站满了人，这对我们是很大的鼓舞。大讲堂计划每月举行两次，邀请业界大咖和明星校友来讲座，把他们的成功经验、成长体会、对未来的洞察等分享给广大校友。同时，我们也在努力把“珞珈星空大讲堂”打造成广州校友会的一张名片。

记者：广州校友会每年有多少新入校友？

何五元：今年有300多人。人数不多，我觉得原因有二：一是学生上学期间信息相对封闭，不了解和各地校友会联系的渠道，这个需要学校相关部门加以宣传；二是师弟师妹找工作的思路不够开阔，其实很多校友企业都十分欢迎武大学生，但是校友企业中新进武大人还是比较少。

记者：您觉得校友会对于刚毕业学生的意义在哪里？

何五元：大学毕业后，我只身来到广州，这里对于我来说是一个全新的世界，面对的首要问题是如何快速适应当地环境。我想师弟师妹也是如此。假如此时正好有人能给予他们一些指引，对他们今后发展应该大有裨益。

记得朱征夫师兄说过一句经典的话：“校友会就是解决和谁在一起的问题。”在校友会，和师兄师姐、师弟师妹在一起，永远能够找到共鸣，永远不会觉得孤单。

而且，武大有一大批优秀校友，如果把他们的人生经验、智慧结晶传给师弟师妹，会帮助年轻人少走很多弯路。像每年“珞珈论坛”这样的活动，我就觉得非常值得学生去听。

记者：听说您经常回母校，大约一年回校几次？有什么样的体验？

何五元：我没有统计过，但比我回老家的次数要多。只要到武汉，我就会回珞珈山走走转转。回到熟悉的母校，我不是一个陌生



人，不是一个新来者，而是这里曾经的主人，自然会轻松自如，心情舒畅。

记者：您觉得是什么原因，使得武大校友工作做得如此出色？

何五元：有人问过我这个问题，我觉得没有一个非常清晰的答案，好像是一种不可思议、不能名状的向心力在牵引着武大人，这中间有一种属于大家的共同回忆、共同文化、共同情感。

当然，这与武大倡导的自由开放的学风有关，在这里拥有一段快乐、开心、自由的回忆，渐渐沉淀为一种深入骨髓的基因。人总是喜欢回忆快乐的东西，离开越久感受越深。

面对母校，我们都是欠债的人，在这里，我们收获了成长，收获了心智的成熟，这是付出再多也不足以偿还的。我相信这是许多武大校友共有的想法。所以，不管母校有什么召唤，大家都会第一时间积极配合。

（原载武汉大学新闻网 2015-12-22）



一生信仰铸法魂的李亚钦

贾林伟 范 珺

在中国梦的语境下，法治成了许多国人的梦想，李亚钦就是其中之一。河南省高级人民法院号召全省法院系统学习李亚钦，并为他追记个人一等功。

李亚钦(法律系1984级校友,1966—2014年),河南省社旗县兴隆镇人,出身贫苦农家。1988年毕业于武汉大学法律系,1992年12月加入中国共产党,从全国法院干部业余法律大学南阳分部(现南阳法官学院)教师做起,历任南阳市中级人民法院助理审判员、审判员、行政庭副庭长、民三庭庭长,2007年3月任邓州市人民法院党组书记、院长。2014年9月25日上午8时30分左右,因劳累过度,李亚钦突发心脏病倒在办公室,经抢救无效不幸牺牲,年仅48岁。经医院确诊,为心源性猝死。

李亚钦为人正直、作风务实、一生清廉,坚守法治信仰、践行法治理想、坚持公平正义,被河南省高级人民法院荣记个人二等功,被省委政法委评为“集中处理涉法涉诉信访问题先进个人”“全省社会矛盾化解工作先进个人”。特别是任职邓州期间,他站位于南水北调丹江口库区移民安置第一大市,带领全院法官积极投身于这个国家行动中,服务南水北调这个世纪伟业,维护库区新老移民的合法权益和正当利益;他认真履行宪法和法律赋予的神圣职责,以“让人民群众在每一个司法案件中都感受到公平和正义”为目标,8年来,带领同志们审执结案件4万多件,审判质效不断提升,向上级和人民群众交出了一份满意答卷。

得知李亚钦牺牲的消息,省委常委、政法委书记刘满仓,省高



级人民法院党组书记、院长张立勇当即作出批示，尽显惋惜之情和崇敬之意；南阳市委、市政府和市中级人民法院领导同志纷纷扼腕叹息；老移民从北京闺女家打来电话悲戚不已，无数乡亲自发前来吊唁，泪如雨下；邓州法院同事白天如常上班，夜晚分班为好院长守灵三个通宵……

一、法之信仰：率先垂范 由己及人

生命有了信仰，人生才不会迷失方向，才能持之以恒地去奋斗。李亚钦的信仰就是法治。1984 年高中毕业时，生性耿直的他选择了武汉大学法律系。

在武汉大学，李亚钦嚼着咸菜和糙米，在知识的海洋里尽情遨游，孜孜不倦汲取着法律的养分。因为纯粹而生的激奋勇气，李亚钦这个农家子弟由此获得了人生最大的支点和立足点；因为崇尚自由和法治的学术熏陶，李亚钦这个青年学子由此获得了人生信仰的最大一粒种子，他向同时代人证明了“人生因为法之信仰而出彩”。

2010 年，邓州市人民法院第一次按照最高人民法院指定，审理湖北省高级人民法院审判监督第二庭副处级审判员罗某某、湖北省高级人民法院刑一庭副庭长邹某某和荆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刑一庭副科级审判员陈某某滥用职权一案。当年 8 月开庭，李亚钦不断接到来自湖北武汉的电话，有同学故旧，也有法律同行，更有被告人亲属穷尽社会关系“不断打点”。李亚钦一边顶住各方面的压力尽力“周旋”，一边抽空听取案情汇报，并嘱咐时任刑一庭庭长刘森，还是那句话：以事实为依据，以法律为准绳，要依法审判。经过几回“肉搏战”，邓州市法院最终依法作出判决——3 名被告人滥用职权罪成立，均被判处有期徒刑。在被告人之后的上诉中，审判得到南阳市中级人民法院的支持，维持原判。这个案件堪称经典，但李亚钦却显得忧心忡忡：知法犯法的根本原因，在于执法者热情的衰退和信仰的丧失。他引用英国第一本法律书的作者布莱克顿的话告诫自己并与全院同志共勉：“法律被称作是一门公正的科学，有人



说我们是它的牧师，因为正义是我们的信仰，我们主持它神圣的仪式。”刘森如今已成为邓州市法院纪检组长，他忆起往事时含泪说，李院长总能在大家困惑时指点迷津，从来没有因为案件有办案人员打招呼而留一手。

李亚钦把法治信仰深植于邓州法官心中。邓州市人民法院常务副院长赵曙君说，斯人长逝，李院长留给他们最大的财富就是对法律的那份信仰，他的方法有两个：一是带头大兴学习之风，二是带头践行法治理想。李亚钦本科毕业于武汉大学，工作中获得了郑州大学法学院研究生学历，担任院长后，被公认为是学者型领导，但他仍始终不忘“充电”，常常挑灯苦读。在他的带动下，全院年轻人抓住每年3个月脱产学习的机会积极参加培训进修，8年来有43人通过了国家司法考试，尤其是2008年，一次通过11人。8年来，在拥有一百多万人口的邓州市，他带领同志们审执结案件4万余件，年均5000多件，发还改判率从2007年的5.8%降至2014年的1.3%，案件数量居全省前列，案件质量逐年上升。李亚钦不止一次说过，法律的命运必须掌握在法律从业者手中，这是司法之官的历史使命！

李亚钦通过邓州法官把法治信仰广泛播种于邓州人民心中。他要求全体法官不仅做到有法可依、执法必严，更要让百姓相信通过司法能够获得正义，当事人之间发生纠纷之后，首先想到的不应是找关系、找后台，而应当是通过法定程序解决纠纷。

作为“学者型”院长，李亚钦曾在工作笔记的扉页上写着法国思想家卢梭的名言：一切法律之中最重要的法律，既不是刻在大理石上，也不是刻在铜表上，而是铭刻在公民的内心里。

二、法之使命：忠诚奉献 大爱为民

服务大局是社会主义法治的重要使命，是司法工作的重大政治责任。随着起于河南省、淅川、经过邓州直达北京的南水北调中线工程上马，作为丹江口库区区域中心城市、全省最大移民安置区，邓州承担着南水北调主干渠、世界最大渡槽——湍河渡槽和通往邓



州城区、新野县城的配套工程等三大工程建设任务，还承担着30 345名丹江口库区移民安置重任。李亚钦所率领的邓州人民法院突出理念引领这个切入点，强化执法办案这个立足点，助推管理创新这个突破点，确保和谐稳定这个关键点，充分发挥审判职能，谱写了一曲“为大局服务、为人民司法”的和谐乐章。

视移民为亲人，服务移民迁安。2011年5月，在第二批大规模移民集中搬迁中，李亚钦任邓州市腰店乡西岭移民新村安置点迁安工作指挥部指挥长。五一期间，他带队进驻淅川县大石桥乡西岭村走访，为移民送上联络卡和服务指南。5月5日，147户693名移民顺利搬迁至西岭移民新村，他带着包户干警逐户嘘寒问暖，提供法律咨询，确保顺利、安全搬迁。2009年以来，他为移民现场解决问题96件，与其他部门联合解决问题57件，为移民提供法律咨询600余次。同时，设立“流动法庭”，受理与移民有关的民事案件48起、刑事案件1起，全部审结。

护航南水北调，保障工程建设。2014年是南水北调中线工程通水年，建设进入倒计时。2月4日，农历正月初五，邓州市张村镇农民赵某开着农用车，经过南水北调主干渠邓州段一个项目部施工通道时不小心翻了车，虽然生命无虞，但肋骨、胸椎、肩胛骨等骨折达17处，胸腔受损严重，双侧胸腔积液，右耳廓阙如。过了正月，赵某家人以道路没有明显警示标志为由要求医疗赔偿。项目部则认为赵某操作不当引起事故，不予赔偿，双方发生了激烈冲突。3月4日，双方把“官司”打到张村法庭，庭长张剑波得知情况后，马上向李亚钦汇报。李亚钦嘱咐张剑波要全力以赴做好调解工作，做好赵某家人安抚工作，确保项目部顺利施工。在李亚钦的协调下，张剑波奔走于医院和南水北调工地之间，讲政策、释法理、说大局，从家长里短说到南水北调意义，最终使双方接受了法庭调解：项目部一次性补偿赵某医疗费等各项损失4万余元。3月7日晚8时，张村法庭法官赶到赵某病床前，将赔偿金交给其家人。3月11日，项目部经理将一面写着“服务企业，共建和谐；勤政为民，两袖清风”的锦旗和感谢信送到李亚钦的手中，感谢法官为他



们创建了和谐安宁的建设环境。

呵护移民乡亲，彰显司法良心。贾新光是 1971 年搬到邓州市构林镇前王村的老移民，因为土地征用赔偿纠纷，他于 1987 年、2010 年两次起诉前王村委，两次向南阳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起上诉，并于 2013 年 9 月 6 日向河南省高级人民法院申请再审。每一次面对兄长一般的贾新光，李亚钦都有难言的痛——1987 年到 2013 年 26 年一瞬间，移民贾新光青丝变白发，随着时间逝去的还有大量人证和物证。怎么办？李亚钦决心解开老人心中的结，协调邓州人大、政协、政法委及相关村镇专门召开了贾新光案听证会，这是移民老人上访 20 多年前所未见的。鉴于贾新光家庭困苦、两个孩子上学费用高等情况，李亚钦多次向邓州市委汇报，为其申请到生活救济金 5 万元，彻底融化了老人心中的坚冰。2014 年 9 月 11 日，在与李亚钦敞开心扉聊了 4 个多小时后，贾新光脸上终于露出了久违的微笑。得知李院长不幸辞世，远在北京打工的贾新光失声痛哭。

三、法之清廉：头雁领先 群雁高飞

李亚钦是农家子弟。他 12 岁那年，父亲去世，母亲默默地撑起这个家，靠着勤劳和坚强把两女四子拉扯大。李亚钦在生活经历中目睹了太多百姓的辛酸和操劳，体会过弱势群体诉求无门、维权无路的隐忍和愤懑，心底烙着对群众的悲悯。正是这份柔软的情愫，使他从没忘记农民儿子的本色，始终保持一颗清廉之心，努力做一个让百姓满意的“好院长”。

李亚钦始终牢牢抓住精神文化这个核心。在邓州市法院，有 50 米廉政文化长廊，《反腐利剑》《廉政楷模》《亲切关怀》《流金岁月》《司法为民》《法官风采》如穿越古今、总揽廉政建设工作的长卷，让人们在驻足流连中体会到了廉洁的力量。汇集数十幅全国法官优秀廉政书法作品的 30 米书法长廊，体现着文化、艺术与法律的同源互通。高高悬挂于每间办公室的个性化座右铭，每一条走廊



边的警句格言，都时刻提醒着人们对廉洁自律的恪守……特别是组织新任法官、新招录人员到花洲书院、编外雷锋团展览馆，举行廉政宣誓仪式，实地感受“忧乐”文化和雷锋精神的深刻内涵。

他在南阳市法院系统率先为干警建立了个人廉政档案，为党组织推荐、任用、评价干部提供客观准确的依据，也使廉政文化建设对每个干警有了长期、有效的约束力，成了名副其实的“硬尺子”。“莲思洁而尊，人因廉而正”，2009年以来，全院共收到锦旗42面、镜匾25块，有6名同志荣立二等功、20名同志荣立三等功，涌现出全省优秀法官史林亚、刘森等一大批先进典型。2012年，邓州市法院被省纪委、省委宣传部、省文化厅评为“河南省廉政文化进机关示范点”，2014年被省委、省政府评为省级“文明单位”。

“李院长是累倒的……”邓州市人民法院常务副院长赵曙君的这句话刚出口，泪水就汹涌而出。让我们来看看李亚钦出事前一天的日程记录：9月24日，星期三。早上7时，他从邓州出发，9时30分抵达南阳市人民检察院汇报案件；11时左右，他赶往唐河协调工作，本答应到南阳忙完工作顺道回家看看，上高速公路时只得给妻子打个电话道声“抱歉，我又回不去了”；14时15分，他从唐河返回邓州法院，15分钟后召开法院党组会议，集体学习贯彻前一天的全国法院思想政治建设工作会议精神；16时50分，他赶赴淅川处理同事祁卫星的车祸事宜；23时20分，他拖着疲惫的身体回到邓州。9月25日早上，心脏不舒服，同事劝他去医院，他还惦记着9点的中层会，他说：“一会儿还要开会，我躺着休息一下就行。”读大三的女儿李婉在纪念文章中泣血呼喊：假如生命可以重来，我是多么希望爸爸再也不要如此拼命工作，再也不要如此顶真较劲……

2014年10月11日，邓州市委专门召开常委会，决定在全市开展向李亚钦同志学习活动，按程序追记个人三等功并授予“人民满意公务员”称号。日前，南阳市中级人民法院党组也决定向南阳市法院系统发出向“李亚钦同志学习”的号召。



2015年元月，河南省高级人民法院下文追记李亚钦个人一等功，要求全省法院系统学习李亚钦同志，学习他尊崇法律、坚守法治的坚定信仰，学习他牢记宗旨、忘我工作的奉献精神，学习他公而忘私、廉洁自律的高贵品质，学习他一身正气、不畏艰险的精神气概。

（原载《南阳日报》2014-10-30）



他何以成为美国杰出年轻教授

——对斯隆奖得主彭健校友的外围采访

肖 珊

2016 年美国斯隆奖颁给了 17 位华人学者。2001 年考入武汉大学，在计算机学院本硕连读的彭健校友榜上有名，是计算与分子生物学领域的唯一获奖者。

斯隆奖又被称为美国的杰出年轻教授奖。自 1995 年设奖以来，获奖者中共产生了 43 位诺贝尔获奖者、16 位菲尔茨奖获奖者，以及众多杰出人才。虽然奖金不多，但含金量很高。

彭健何许人也？他现在是伊利诺伊大学香槟分校计算机科学系的助理教授。话说这个系排名也是妥妥的，全美计算机专业排名第五。这位年轻学者的简历也是十分傲人的——

武大计算机学院取得学士和硕士学位，芝加哥大学丰田科技学院获得计算机博士学位，随后在麻省理工学院数学系做访问学者和博士后研究，漂亮的求学经历一气呵成；

担任国际期刊 PNAS(美国科学院院报)、IEEE/ACM *Transactions on Computational Biology and Bioinformatics* (IEEE 和 ACM 交易计算生物学和生物信息学)的审稿人，是多个重要国际学术会议的程序委员会委员，至少做了 6 个较大的科研项目；

研究成果主要发表在机器学习和计算生物学的顶级会议、会刊上，包括 ICML(国际机器学习大会)、NIPS(神经信息处理系统进展大会)、UAI(人工智能不确定性学会)等，以及学术期刊 *Nature Biotech*(《自然生物技术》)、*Science*(《科学》)、*Cell*(《细胞》)等。

在彭健的硕士生导师毋国庆教授看来，彭健能取得这么好的学



术成绩是有迹可循的：一是他踏实而聪明，计算机理论知识扎实且数学功底好；二是他的研究兴趣集中在计算生物学和机器学习方面，面对庞大的基因数据集以及系统生物学和分子生物学中的数据集，开发高效的算法，对此进行分析处理整合，“这是一个跨学科研究方向，前沿而热门”。

“学神”彭健的大学时代并非自带光环，他与图书馆、实验室里啃书编程的沉默男生没有两样。他曾痴迷于计算机基础理论和数学，读硕士时被导师当头棒喝——“必须动手”，于是安排他进项目组做应用型课题。彭健参与的项目高分通过验收，他收到的反馈也很棒，自此 get 到人生和学术的新技能，为后来成功申请芝加哥大学丰田科技学院奠定了基础。

而彭健履历中另一个看似无心的伏笔，则要追溯到他读大二时。他和同学张文、邹竞宇组了一个叫 Nova 的队，三人各有所长、珠联璧合，代表武大参加国际大学生程序设计竞赛(ACM/ICPC)获银牌，创下了武大参赛历史上的辉煌。从他们起，武大代表队渐成气候，年年参赛年年获奖，已成为老牌赢家。而彭健升入高年级退隐后，继续为武大战队做助理教练和技术顾问。

2015 年 5 月，彭健回到母校做了一场学术报告。报告结束后，有同学对他的研究内容感兴趣，彭健爽快地把源码拷给了他。复杂的源码就像农人苦心培植的瓜果，个中辛劳自不必说。有同学向他请教自然语言处理方面的问题，“我们找个房间聊一聊。”彭健邀请道，于是学弟和学长单独聊了很久。

“师兄给人的最大印象是谦虚。”在彭健的学弟程铭看来，若跟彭健聊家常，他话并不多；但谈到学术问题时，师兄会变得目光灼灼，口若悬河。

“师兄的另一个特点是做事有计划，有规律。”程铭的同学补充道。每天固定时间进实验室、指导学生、陪家人、锻炼……这个严谨的“生物钟”看似很难但他却能日日坚持，这是许多成就卓著的人共同的特点。

(原载武大新闻网 2016-03-04)



一朝樱花树下客，同是珞珈一少年

——访浙江校友会副会长、公牛集团董事长
阮立平

钱亦蕉

夕阳西下，晚霞给滩涂铺上了一层金色的光芒，劳作一天的渔民收网回家，一个小小的身影在海边迎风摇曳，他偷偷跟着大人们来到海边，去堤坝旁捡拾“漏网之鱼”。这是他第一次出来，摸了一手的泥巴和几只小小的虾米。到了家里，奶奶用小酒杯把他捡来的小虾米蒸了，这可是小家伙最初的劳动果实，虽然少，心里却透着快乐和自豪。谁也没有想到，这个在海边农村长大的小男孩，有朝一日会成为一家销售额超过 50 亿的集团公司的领导者。他，真正钓到了大鱼。

小男孩名叫阮立平，现任公牛集团公司的董事长、总经理。





1. 血液里的不安分因子

虽然年近半百，阮立平给人的感觉仍然朝气蓬勃、爽朗不羁。他说，小时候的海边生活给他印象极深，直到现在还经常出现在梦里。

他出生在浙江省慈溪市古窑，离海边只有两三里路。小时候最高兴的事就是踩过滩涂去海里摸鱼摸虾摸螃蟹，玩得最多的就是泥巴——农家孩子玩斗狗尾巴草，他们则玩摔泥巴比大小，大自然就是他们最好的玩具。文首那一幕出现在他六七岁的时候，至今记忆犹新。

在县城上高中时，受电影《火红的年代》的影响，16岁的阮立平的理想是当一名工程师。高考的时候，填报的所有志愿都是机械工程类，最后他进入了远在武汉的武汉水利电力大学。从此，“对技术的执著”成了他毕生的追求。

大学毕业后，阮立平进入水电部杭州机械研究所工作，10年的技术研究生涯养成了他工作认真仔细的风格。虽然进了大城市的研究所是家乡很多人羡慕的，但对阮立平来说这只是梦想开始的地方，那颗不安于现状的心，时时刻刻提醒着他做些“犯规”的事儿。

或许是浙江人经商的天性使然，阮立平一边在研究所工作，一边偷偷做着小生意。他说自己喜欢做生意，曾经看了大量经济方面的书，还想过考经济学的研究生。然而，改革开放初出版的经济类读物让他颇为失望——办企业不讲利润。于是，他直接从理论转入实践。“我卖过猪肝、卖过桃树，慈溪最早的草莓也是我引进的，当时这里的人还不认识草莓。”太太是温州人，很支持他做这样的尝试。“至少家里人从来没有笑话过我，比如说‘你一个大学毕业的工程师去卖猪肝’之类，没有人这样说，没有人阻碍我。”

但是，这些“小打小闹”不能让阮立平满足，而且研究所的工作还牵扯了他大部分精力。1990年代初，随着我国改革开放的进一步深入，下海经商成为很多人实现致富梦的途径，阮立平也凭借一个契机开始了他的“公牛王国”的筹建。



2. 走不一样的路

20 世纪 80 年代末，慈溪涌现了几百家插座家庭作坊，形成全国有名的插座生产基地。阮立平家乡的很多亲戚朋友都跨入了这一行，他们没有钱投资生产，就拿着别家作坊生产的插座样品到全国各地去推销。当时慈溪交通不便，要到其他地方，杭州是必经之地，所以阮立平的职工宿舍成了接待亲友的“中转站”，他自己也帮忙推销。他拿过这些插座、接线板，一眼就看出了问题，这些产品质量实在太差，有的还没卖就已经坏掉了，“30 个产品有 10 个是坏的”，作为技术人才的阮立平又多了一项工作——修理插座。家里二楼的房间成了仓库兼维修站，每次从人家那里拿来货，先检查一遍，把坏的修好了再卖。在这个过程中，他熟悉了插座的结构和原理，积累了不少经验，就萌生了自己做的念头。三年后，他回到慈溪家乡，开始自主创业。最初也是家庭作坊式的——爸爸妈妈弟弟外加几个亲戚朋友，而这个最初成立的公司，至今还在古窑家乡，因为有的老员工不愿离开那里。

农村没有工程师和设计师，模具师傅画个草图就生产了，质量差、外观差、价格低，是当时慈溪作坊式插座生产的特点。阮立平从创业之初，就决定反其道而行之。质量和安全，一直是他坚持的，最初因为没钱，他和弟弟合伙批发别人的零配件来做，尽管对零配件质量有所把关，但还是不行，后来慢慢转换成完全自己生产销售。等到阮立平亲自设计出第一款产品并投入生产后，“公牛”的品牌从此诞生了，“那时喜欢打篮球，1995 年那会儿芝加哥公牛队正是如日中天的时候，‘公牛’的名字就这么来的”。谁说阮立平没有好胜心？只争第一的豪情就在“公牛”的名称中。

说起创业初期的困难，让阮立平印象最深刻的还是“没钱”，制造业是需要预先投入的，但是他最初从农村信用社贷到的款只有区区 2 万元，而当时塑料原料的价格是一万八每吨，捉襟见肘。为了资金快速周转回笼，不管批发还是零售，他们都做，只要是现金。然而即使再困难，他也没有放弃过对高质量的追求，从来没有想过靠降低产品质量去打低价战——“喜欢低价的人不是我们产品



的对象，只有他意识转变了才会成为我们的客户”。

对于“用不坏”的公牛理念，周围一些同行很有些不以为然，质量这么好，都用不坏，那你的产品卖给谁去？但阮立平坚持走高质量、高价格的差异化路线，实践证明他的方向是正确的。公牛产品一问世，就广受欢迎，消费者早已受够了“伪劣产品”的苦，公牛插座虽然价格贵了一倍多，但式样好看，使用安全，质量有保证，大家使用了后愿意再买，“公牛”在消费者中逐渐树立了口碑。

因为走的是差异化竞争路线，公牛在国内市场的推广走得颇为顺利，从推向商场到渠道批发，公牛以质量和诚信赢得了尊敬。阮立平最初的创业梦想已经实现，但是他并没有裹足不前，他想着扩大规模生产，想着做行业的领导者，想着要与别人“不一样”。

为了有效提高销售额，公牛与众不同地引进了快速消费品的销售模式，从粗放式转变为精耕细作式，每个五金店都设销售点，用汽车来配送。“牛奶怎么卖，可口可乐怎么卖，我们就怎么卖。”几千辆汽车在外面跑，销售网点逐渐铺展到40万个。连阮立平自己都惊讶：销售量这么大，这插座都去哪儿了？

3. 小创意 大管理

插座行业入行门槛低，撇开粗制滥造不说，这个行业大多数企业都是家庭作坊式，以最简单的加工制造为主。但公牛却特立独行地开创了研发部门，即使仍带着中国民营企业的家族特色，却率先引进了先进的现代企业管理方式。

说起研发，虽然公牛拥有不少专利，但最让阮立平念念不忘的还是他的第一个发明——按钮开关。“我们的第一批产品是没有开关的，因为市场上买不到可靠的开关，为了质量考虑索性不用开关。”后来阮立平自己设计了开关并投入生产，公牛的插座才有了开关装置。直到现在，国内市场上百分之九十的插座上用的开关还是他最早设计的按钮型，简单实用又可靠，这一小小的发明影响了整个行业，提高了整个行业的品质，这是阮立平的骄傲。

2000年前后，公牛开始关注国外市场，最先想进军美国市场，没想到却摔了个跟斗——连续亏损了几年。“我们出口国外并不是



为了卖产品，因为出口基本上都是 OEM，销售的是别人的品牌，只是赚钱而已。我们的出口定位是跟欧美最好的公司合作，在合作中学习他们的技术和管理。”因此，公牛的出口量不大，却都是与知名品牌合作，比如飞利浦、罗格朗、贝尔金等。

通过与这些一流公司的合作，阮立平学到了不少东西，第三方对质量的监控，外部力量的推动，让公牛不得不做强自己。“出口推动了我们的进步，第一次老外来工厂参观，发现我们没有实验设备。我花 60 万买了一套实验设备，结果发现没有会做实验的人。”买设备、招聘技术人员、开发产品、去国外参展、做认证……一整套下来，投入巨大，前期亏损自然难免，经过一段时间，积累了信誉和客户后，出口之路才一帆风顺起来。

实验室和研发中心都是在与老外的合作中逐步完善起来的，如今 60 多人的研发设计团队已达到国际先进水平。公牛还从外企学到了现代企业管理制度。一是组织架构体系，公牛集团现有 4 个公司，6 个中心——包括研发中心、运营中心、财务中心、人力资源中心、采购中心和品牌中心，从劳动用工到反恐安全，从生产到环境都一一正规化。二是质量管理体系。2003 年，公牛从国外买入最先进的实验设备，斥资 1000 万元建成国际最具权威性的安全实验与鉴定机构——美国 UL 国际专业组织认证的高标准实验室，可以做防雷测试、升温测试等，这在国内同行中都是绝无仅有的。从方案设计到售后服务，公牛集团拥有 190 人的品质管理团队，每个产品都经过超百道的严苛检测程序。

阮立平用“先天不足”来形容自己的企业——带着家庭作坊的基因，如今公牛用制度来保障整个公司的日常运行，使得企业的家族色彩弱化了很多。阮立平是个率性的人，讨厌一本正经的领导作风，不摆架子，但同时他也是整个企业的灵魂和权威，受到员工的尊敬和爱戴。“管理没有最好，只有最合适”，或许，他已经摸索出一套最适合公牛的管理方式——规范却不僵化，推动着公牛快速成长。

2015 年是“十二五”收官之年，在主导产品插线板、墙壁开关国内同行都走下坡路的大背景下，公牛集团创造了带 2 字头的两位数增长，销售额突破 56 亿元，同比增长 22%，继续了逆势高增长



的态势。2010 年以来，企业以两年翻番的速度高速成长，其中 2012 年销售 20 亿元，比 2010 翻番；2014 年销售 40 亿元，比 2012 年再翻番。

4. 专注让梦想更接近

从身无分文、为找第一笔投资到处奔走的有为青年，到销售额 20 亿元的集团总裁，性格执著的阮立平在插座行业坚持了 18 年。

专业专注，是公牛的企业文化——专注于自己最擅长的行业领域、最有竞争力的营销模式、最具核心能力的价值链，从而形成自己的核心竞争优势。其实，也不是没有走过弯路。曾经有一段时间，公牛进军节能灯市场，最初的想法是五金店卖插座同时也卖节能灯，渠道很匹配，没想到真的行动起来，却做亏了。“这其实是决策失误，节能灯行业水太深，产品合格的话利润空间很小”，对于坚持高质量的公牛来说非常困难，很可能会长期亏损，阮立平悬崖勒马，及时收手。“做不成行业的领先者，还不如不做。”现在想起来，他还觉得庆幸，后来 LED 灯逐渐取代节能灯使得行业转移，如果坚持做下去估计血本无归。

18 年做一个行业，阮立平有自己的想法：“民营公司基础比较差，在发展过程中，一直是短缺经济，不断投入再生产，没有富裕过。所以你只能做好一件事，没有资金和精力去关心其他行业了。机会和诱惑也有，比如慈溪是家电制造基地，经常有人让我们做这做那。但是我觉得我们的力量只够做好一件事，实际上从结果来看，我们的选择是对的，我们只做一件事，在这件事上肯定比做两件事的要强。”他说自己原先没有梦想过做行业老大，但是如今“公牛”已毫无疑问地成为了行业的领导者，并参与制定、起草插座行业新国标文件。

乔布斯说：“活着就是为了改变世界！”阮立平说自己或许没有这样的豪情壮志，但他总想着做一些与众不同的事，他希望至少能改变行业，不断创新。

（原载《新民周刊》2013 年第 33 期，浙江校友会马兵修改）



一只小鼠“敲出”世界

王新同

你相信吗？两对小老鼠能卖出 18 万元的天价，还颇受专家们的青睐。这种“基因敲除小鼠”，是海归博士后沈月雷培育的。目前国内科研院所使用的小鼠，70%都出自他手，他的产品还销售到了美国、日本和欧洲的数百家实验室。这个在美国曾因论文没发表而断了“教授梦”的人，是如何实现人生转型，成为时尚老板的？

当不上教授就当老板

条纹衬衫，淡蓝色牛仔裤，戴着一副方框眼镜的沈月雷，给人的第一印象并不像商人，更像一位学者。

沈月雷于 1992 年毕业于武汉大学病毒系，接着到北京读硕士，1997 年又赴美留学。在美国马萨诸塞大学取得博士学位后，他赴纽约大学医学院从事博士后研究。沈月雷最初的职业设想是做一名教授。“大部分中国人在美国的科研梦就是当教授，我读完博士后，一心想发完 Paper(论文)，然后当教授教书育人。”

可是命运却似乎有意和他作对。在整整 5 年多时间里，他费尽心血研究了两个关于“基因敲除小鼠”的课题，在实验室取得成果后，曾经写了两篇科研价值很高的论文，由于种种意外却未能发表。这不仅断了他的“教授梦”，甚至连在美国药企找份好工作都难，沈月雷失望至极。无奈之下，他只得考虑另谋出路。

有趣的是，这位博士后在美国没做成教授，却成就了后来的“育鼠专业户”。“当时，我就想自己做个公司，这样以后就不会有



人向我要简历了。”有了这个有趣的想法后，一直从事小鼠基因敲除研发的沈月雷，决定发挥专业优势借钱创业，主攻“养鼠”。

2008年，沈月雷在美国成立了一家叫 Biocytogen 的生物技术公司并担任 CEO。在一年多的时间里，公司研发出了最初的几种基因敲除小鼠——删除或改变小鼠的特定基因。他把这种小鼠授权给美国和加拿大的几十家大学、研究所和药企使用。“当初选择‘模式小鼠’作为研究方向，主要是觉得很有意思。在医药行业，不论哪种研究，模式动物都一定会被利用到。”

就这样，沈月雷通过出售使用执照收费的方式，将产品销售到近百家实验室，顺利挖掘到了第一桶金。

2009年，Biocytogen 在美国运行了将近两年之后，沈月雷决定将公司迁回国内。“那时候，我的目标是做一个全球有影响力的模式小鼠服务商。当时在美国的公司只有五六个人，投资成本也非常高。考虑到公司长久发展，如果把总部放在中国，而把美国公司作为国外市场销售部门，会更有竞争力。”

这年11月，在中关村生命科学园的一座大楼里，沈月雷的百奥赛图北京公司成立了。没有合适的技术人才，他就自己一点点培养。当时，已完成技术攻坚的沈月雷团队，还面临着科研成果难“落地”，科研服务成果难以规模化生产的窘境。在最初的一年半时间里，公司因为没有盈利，大家工资不高，也没什么福利，除了谈愿景、给员工租宿舍外，沈月雷还每天跟大家一起做饭培养感情。“好多人因此练就了一手好厨艺。”有意思的是，尽管条件非常艰苦，员工们依然工作得非常努力。“2010年国庆和中秋的假期是在一起的，那时，公司还只有七八个专业人才。”

两对小老鼠能卖 18 万

很快，沈月雷发现国内市场很大。他开始把大部分时间放在中国，带领团队开发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小鼠胚胎干细胞，开发出能够用来做基因打靶的 C57BL/6 小鼠细胞系等，达到国际先进水平。

经过两年发展，沈月雷再出奇招：“敲除基因小鼠”还没培育



出来，就开始寻找科研客户，“用‘倒逼’的方式寻找动力和希望”。

从网站上找到中科院动物所、遗传发育所和上海神经所等单位的电子邮箱，沈月雷用邮件“公关”，很快收到不少回应。2011年4月，公司开始对外服务，当年年底就收到了77个课题。

来自国内外的课题委托服务订单，比沈月雷预想的要多得多。所以公司开始扩大规模，从4月初的10人发展到12月份的30多人。“那时候，实验室只有120平方米，里面挤满了实验器材。”另一间20平方米的小屋勉强做办公室兼库房——条件非常简陋，沈月雷将那时的办公环境比作“杂物间”。以致后来连国外专家都不敢相信，小鼠基因敲除技术的研发，竟是在这里完成的。

然而，区区100多平方米的“基地”，承载得下研发人员的汗水，却承载不动纷至沓来的订单和科研范围扩展的压力。“在办公室坐下之后人挤人、脚踢脚，一旦有来访，得先把箱子搬到楼道去才好‘迎客’。”沈月雷回忆说。在如此的办公和科研环境下，企业要想获得更大发展，无异于天方夜谭。

正在沈月雷为办公地点发愁的时候，刚刚落成的北京亦庄生物医药园向他抛来了橄榄枝。作为首批入驻北京亦庄生物医药园的28家企业之一，园区将整整一层楼的办公区交到沈月雷手中，还为他减免了一半的房租。2011年12月，沈月雷的“百奥赛图”迁址到了北京经济技术开发区。

沈月雷的实验室从120平方米变成2000平方米，而且条件大大改善。进入干细胞培养室，要先套上白大褂在密闭风淋设备中吹去灰尘，再进入紫外线灭菌室杀菌消毒……经过4道门3个房间，才能进入洁净度极高的实验室。与创业之初相比，沈月雷自豪不已。

生物医药园提供的不仅是更宽敞的产业发展空间，还为大大小小的生物药企建起公共服务平台。“有些大型仪器设备，虽然并不常用，但研发和制药的科研单位和企业每年都必须用那么几次，不可或缺。现在医药园把大型仪器放在公共服务平台上，企业就可以节省这一部分成本。像大型离心机、流式细胞分析仪，每台成本要几十万甚至几百万呢！”沈月雷感慨地说，在美国，几乎没有生物



医药企业能享受这样的待遇。

“基因敲除小鼠”一对售价 18 万元，还颇受国内外科研机构的青睐，堪称小鼠中的“战斗鼠”。这种颇有点神秘色彩的小精灵究竟是什么？沈月雷解释道，小鼠有很多种，小白鼠只是其中一种，多被药厂用作临床试验；基因敲除的小鼠，则用于更尖端的生物医学研究。

例如，为了研究治疗癌症的药物，要有癌症的小鼠模型；为了研究糖尿病，要有糖尿病的小鼠模型。而把小鼠所有的约 3 万个基因中的一个或几个基因敲除后，培养出的小鼠，就成为适合药物临床实验的动物模型，可以模仿人类患者进行研究治疗。这些动物是生物医药产业链中非常重要的一环。

被敲除不同基因的小鼠，能够在人类遗传疾病和药物筛选等方面进行针对性很强的实验，进而达到预防、控制、治疗人类重大疾病的目的。沈月雷解释说：“传统的转基因小鼠一般是随机的基因插入，小鼠的遗传性状往往不稳定，从而影响到实验结果。我们的团队则通过干细胞重组技术，研发了将基因剔除乃至基因嵌入的小鼠模型，其遗传特征不会在传代过程中改变或丢失。”

客户遍及 50 多个国家

更令人惊讶的是，由于制备过程复杂漫长而且要求极高，这种近似于“定点发射基因”的高端科研技术，在国际上也被称为“基因打靶”，研发时间普遍在 14~18 个月甚至更长。而沈月雷的团队将这一时间压缩了一半，只用 7~9 个月，实现了“世界最快”。“科研企业给我们订单，说清楚需要敲掉哪个基因的小鼠模型，7~9 个月之后，我们就能把一对完成基因敲除的小鼠交付给客户。”沈月雷自豪地说。

这样的超高效率自然受到了全球范围内的关注。沈月雷的团队目前已经完成了大批客户的订单，科研院所客户遍布美国、日本和欧洲等 50 多个国家和地区。包括罗氏、强生、默克、GSK 等世界



著名医药企业，都是其客户。

“2012 年我们接了 220 个基因敲除课题，今年更多。”目前，百奥赛图占据了国内基因小鼠 70% 的市场份额，年营业额达到了 8000 多万元。

没有实现“教授梦”的沈月雷，现在正为数百名教授提供基础服务。“很多在国外做得很好的学者回国，成为我们的客户。”

目前，他仍在投入大量资金用于研发。“现在我们用的大多数技术已不是我原来学的，而是后来不断研发的成果。”沈月雷的团队在小鼠培养时间效率以及敲除基因技术方面都达到了国际顶尖水准。

“现在回头看，自己还是幸运的。一开始想做好的技术，只要公司收入比投入多就行，现在做大了，就希望自己能对我国的产业发展有所帮助，理想也越来越大。单纯考虑赚钱的时间反而越来越少了。”

百奥赛图成立 4 年多以来，已经成长为拥有世界领先技术的基因生物公司。沈月雷告诉笔者：“目前国内生物技术行业的发展程度和国际水平还有不小的差距，器械、试剂产品多数还依赖进口，我们做的基因敲除模式动物，是一个打基础的事，想做一些原创的东西，为其他环节的技术研发提供原材料。”

谈到公司的下一步发展，沈月雷说：“我们正在研发大鼠基因敲除和条件性基因敲除的技术。从小鼠发展到大鼠的基因研究，看似一小步，却是基因敲除技术的一大步，这种技术研发的提升也是生物技术的一次突破！”

沈月雷说：“面对医学现有水平还无法医治的疾病，如果能从与人类基因序列同源性非常高的小鼠、大鼠等动物身上相似的靶基因着手进行试验，利用对引发某种疾病的靶基因做相应的改变（敲进、敲除、突变、人源化等）的模式动物进行前期的药物筛选，由此筛选到的药物再进入临床实验，对人体的伤害也能降到最低。”

近几个月，沈月雷正在准备建一个模式动物中心，帮助国内科研院所及企业提供模式动物相关配套服务。到 2015 年，力争做到



每年完成 500 个课题，年产值达到 2000 万至 2500 万美元。

沈月雷还有一个更大的梦想，那就是将小鼠的 3 万个基因全部“敲完”，并全部拥有我国自主知识产权。再通过国家保种的方式让中国的科研机构和企业能够从中受益，推动生物科研和药制行业的整体发展。

（原载《新阅读》2014 年第 9 期）



相遇珞珈·许此为家·山水一程· 践行三生

——记校友陶闯

陈 娟

第一次近距离接触陶闯师兄，就是在校友会活动中。当时是创业项目的路演，每个项目 10 分钟，陶闯师兄是当时的点评嘉宾。简单的 T 恤、亲切的笑容，与犀利的点评形成巨大反差。近 10 个项目 1 个多小时的路演，陶闯师兄全程专注，简短却深刻地分析着每个项目。最使人暖心的是，每个项目点评结束前，陶闯师兄都会提出可行性建议，甚至约到会后再和创业的校友一起想办法。这位叱咤中国互联网界的大咖，瞬间让我们忘记掉了他的其他，只记住他的一个身份——永远的珞珈人陶闯师兄。

1. 从地理信息专家到互联网专家

创业前，陶闯是国际地图界权威专家。32 岁即成为终身教授，33 岁被授予加拿大国家首席研究教授，拥有多项技术发明。并且





陶闯曾任联合国顾问，担任多个国际协会理事，兼任国内外六所大学的客座教授。创业前的陶闯是一个典型的地理信息学界专家。

转折出现在世纪之交。2001 年陶闯在加拿大创办 GeoTango 网络地图公司，推出 GlobeView 互联网三维地图，比 Google Earth 早三年。2005 年公司被微软收购，成为微软并购史上第一位华人企业家。进入微软版图后，陶闯创建了微软互联网地图部，并负责亚太区移动互联网业务，曾被誉为“微软地图之父”。

后来，陶闯离开微软，再次创业便打造了闻名互联网界的 PPTV。作为 PPTV 聚力传媒集团创始合伙人和掌门人，PPTV 一跃成为互联网领军企业，开启了中国互联网视频时代。而这家拥有 3 亿用户量的公司，还获得了软银孙正义的投资。孙正义在中国当时投资了三家公司，除了闻名全球的阿里巴巴外，就有 PPTV。学而优则商，商而优则投。陶闯创立了知卓资本，旨在打造一家集投资、孵化和创新于一体的移动互联网生态企业，主要专注于空间信息、互联网金融领域企业的投资。于是就有了我们开篇的一幕：专注的投创家与温暖的师兄。

2. 难忘珞珈情怀

近 5 年时间，陶闯逐渐以投创家的身份出现在我们的视野中。而陶闯的转身，也获得了肯定。2014 年陶闯入选中国经济人物，同年获得上海市政府授予的白玉兰大奖。

一系列的殊荣背后，陶闯却最难忘珞珈情。他与几位武大校友一起创办了“珞珈天使基金”，旨在为武大的校友服务，为师弟师妹们助力。还记得蹇宏师兄和陶师兄在校友会上公开表态：师弟师妹们的项目，我们鼎力支持。我们希望无论走到哪里，大家都能感觉到武大的温暖和力量，永远能感觉到来自珞珈的牵挂。

无论走到哪里，我们都是珞珈人，我们都会铭记山水一程的美好，三生有幸的温暖，永是珞珈人的自豪。

（作者系新闻学院 2003 级校友）



谁说美女不博学

——斯隆奖得主王秋印象

陈丽霞

谁说美女不博学？当武大校友王秋获美国斯隆研究奖的消息传来，她超牛的学术经历和超高的颜值，瞬间刷新很多人的“三观”。

1995—1999年，王秋本科就读于我校资源与环境科学学院环境科学专业。2005年在美国埃默里大学取得有机化学博士学位。2005—2011年，先后在美国哈佛大学以及隶属于麻省理工学院和哈佛大学的博德研究所（Broad Institute）从事博士后研究，2011年就职于美国杜克大学，现为化学系助理教授，研究方向为有机合成与化学生物学。同时，她还是美国化学学会成员、美国科学促进会成员。

除了耀眼的学术经历，各种大奖也是拿到“手软”。她曾获勃林格殷格翰公司奖学金、奥斯本 & middot 奎尔奖优秀研究奖、美国化学学会石油研究基金博士新人奖、蒂姆化学期刊奖和美国自然科学基金委杰出青年学者奖。

记者在杜克大学化学系的官方网站看到，王秋获斯隆奖的消息正放在首页的显著位置。配图中，王秋戴着眼镜，披着齐肩短发，身着白衬衣和浅灰色西装，显得知性干练。

当记者辗转联系到王秋想要采访时，却被婉拒：“我实在没有什么可说的，武大比我牛的校友多的是。”

记者在资源与环境科学学院打听到，该院青年教师毛旭辉是王秋当年的同班同学。问起对王秋的印象，毛旭辉笑着说：“王秋同学当时可是我们班的美女学霸，她是‘明明可以靠颜值，偏偏却要



拼才华’的典型啊。”

据毛旭辉和其他同学回忆，王秋很聪明，在学习上一直很努力，每年必拿学校的一等奖学金，在实验室也属于每天走得最晚的几个之一。她写的实验报告字迹清秀、思路清晰，得到老师的赞扬，被当做范本在同学中传阅。

大四时，凭着过硬的成绩，王秋被顺利保研。在杜予民老师门下读研一年后，她去了美国深造。

王秋的人缘也极好，“王秋不光长得漂亮，性格也好，很爱帮助别人哦。”一位同学回忆，有一次生病就是王秋细心照顾了自己好几天，帮忙打饭、提开水、陪同去医院等。

美女学霸绝不仅仅只是埋头读书。除了参加学生会等社团组织，身高 1.7 米、身段姣好的王秋还是系模特队队员，经常参加大学生艺术节等活动。一次，她还和班里的几名女同学一起演小品，得了全校第二名。



本科毕业时王秋赠送同学的照片

（原载武汉大学新闻网 2016-03-07）



王兴喜：为人以善 为学以勤 为官以诚

游笑春

校友名片：

王兴喜，回族，1945年8月出生于山东省泰安县清真寺街。1970年7月武汉大学中文系毕业，分配到贵州省绥阳县旺草区工作，1972年入党。

王兴喜历任贵州省绥阳县旺草区直机关团委书记，福建省屏南县委组织部长、县委常委、副书记，莆田市委组织部长、市委常委，福建省人事厅副厅长，福建行政学院党委书记、研究员，福建省政协第九届委员会委员。先后兼任福建省国际人才交流协会副会长，省继续教育协会会长，省科技与经济发展研究会副理事长，省行政管理学会常务副会长，中国行政管理学会教学研究会副会长，省摄影家协会副主席、顾问，世界闽籍摄影家研究会顾问，省老年大学摄影学会会长，省老年书画艺术协会常务副会长，福建省山东南下干部历史研究会常务副会长。

1952年，年仅7岁的王兴喜跟着母亲踏上了从山东泰安南下福建屏南的火车。颠簸了半个多月，见到了离别六年、在福建屏南县长任武装部科长的父亲。

这是他第一次与福建结缘。从此，他长于斯，学于斯，奋斗于斯，奉献于斯。在福建，留下了他大部分的人生轨迹。

亲历知识分子下乡再造和“文化大革命”等历史时期，王兴喜



的一生饱经沧桑。年轻时艰难困苦、充满磨难的生活环境，没有折损他的心智，反而造就了他坚韧、朴实、敦厚的性格。

这位武汉大学中文系的老学长，信奉“一止四不止”的人生信条：“勤奋学习不止，艰苦奋斗不止，忠诚办事不止，为人行善不止，处事适可而止。”采访中，我们时时能感受到这个人生信条对王兴喜的影响。

接下来，让我们走近这位老学长，一起听听他的故事。

武大让我魂牵梦萦

少年时代的王兴喜，基本在屏南度过。20世纪50年代，生活条件艰苦，艰苦的环境，反而成为王兴喜宝贵的财富。

王兴喜的中学时代正处于国家困难时期，那时每人每个月定量供应24斤口粮，一斤粮票买4斤地瓜米（番薯推条洗出淀粉后晒干成丝）。每个月供应每人二两油票、半斤肉票。肚子里缺油水，更是觉得吃不饱，一天到晚叫饿。他的母亲省吃俭用、瓜菜充饥，竟然得了水肿病。最困难的那年——1960年，从县城到农村，从干部到农民，瓜菜也吃不饱。为了省点柴火钱，王兴喜星期天上山砍柴。一大早起来，吃点东西，穿上草鞋，戴上斗笠，背上柴刀，带上午饭，一个人就上山了。十四五岁的孩子一个人上山，砍完柴回到家里，已是晚饭时分。有时将砍的柴禾卖给学校的食堂，赚的钱缴学费。

生活的困难却促使王兴喜刻苦读书。那时，他的信念是“山瘦栽松柏，家贫苦读书”。每天晚自习下课后，教室的灯都关了，他还到操场的路灯下继续看书。只要天不下雨，都会看到十点钟后才进宿舍睡觉。

刻苦读书终有回报。1965年，王兴喜如愿以偿考上了他渴望的武汉大学。在珞珈山，他度过了五年的大学生活。

在这五年中，他如饥似渴地求学，在图书馆和宿舍看了古今中外上千本书，写了几十万字读书笔记。他在这里收获了同窗之间真



挚的情感，铭记着老师们的谆谆教诲，思考出做人的道理。王兴喜说这段经历对自己成长的影响是巨大的，无论多少年后，母校始终让自己魂牵梦萦。

2011年，他在担任武汉大学福建校友会会长时，写了一首怀念母校的诗——《永远的思念》：

老校长的教导充满哲理，
老师们的教诲孜孜不倦，
同学们的友情如兄弟姐妹一般，
还有赴襄樊泥咀建武大分校，
这一切，
在我心中常常思念。

虽然在母校仅仅五年，
虽然经历了“文革”动乱，
虽然“老九”被发配“夜郎”，
虽然道路坎坷世事艰难，
可是我不后悔不抱怨。
我对母校，
尊敬的老师和亲爱的同学们，
依然深切地思念。

因为母校，
教我做人的道理，
授我奋斗的理念，
给我前进的动力，
让我的理想最终实现。
我爱您——母校，
您使我永远永远地思念。



做官要忠诚办事，与人为善

1970年，大学毕业后的王兴喜被分配到贵州省绥阳县旺草区，在这里劳动锻炼了一年，在区机关工作了两年。当时，贵州被人称“天无三日晴，地无三里平，人无三分银”。虽然条件艰苦，但王兴喜不仅不抱怨，反而想着如何发挥才能，为身边的群众和同事服务。

在贵州晨光大队，王兴喜看见贵州农村的农民还很穷，有的温饱还没有解决，即使温饱解决了，花钱也还拮据，尤其没钱看病，乡亲们说“大人孩子病不起”。怎样帮助解决这个问题呢？王兴喜把自学“中医护病学”的知识重新捡起来、用起来，买了个药箱，配上一些急救药和针灸器具就当起了“赤脚医生”。那时的王兴喜也没想到没有行医证件给人看病是违规的，只想到能给老百姓看好病就行。

1972年12月，王兴喜被调回自己的第二故乡——福建屏南县，从此开始了在福建的从政生涯。

在屏南生活工作了28年的王兴喜，足迹遍布全县400多个自然村。就连屏南特别陡峭的“百树树”官岭村、山顶上住着两户人家没有路的“老鼠窠”、天湖山上的打猎户，王兴喜都去走访过。“我是屏南的活档案。”王兴喜自豪地说。

在从政工作中，王兴喜始终坚持走群众路线，为群众办了不少实事、善事。

尊重爱惜人才，培养教育人才

王兴喜从参加工作到退休历经40年，都在组织、人事部门工作。他尊重、爱惜人才，培养、教育人才，并为此倾注了大量的心血和精力。

1972年，他从贵州调到屏南县革委会组织组，将“文革”中下放到农村改造的几十位中学老师调回学校任教。



20 世纪 80 年代初，在中央“解放思想，改革开放”方针指引下，王兴喜积极推动落实政策，为领导干部平反历史冤假错案。如平反了屏南一批原城工部地下党干部的冤假错案，恢复了他们的党籍、政籍及职级，让他们得到公正的待遇，重新发挥出智慧才干。

“文革”十年，大中专院校停课闹革命输送不出青年人才，一大批年老的干部退休及自然减员，造成整个干部队伍青黄不接，人才严重缺乏。当时屏南县为了补充干部，从中小学抽调了一批教师到机关，这其实是拆东墙补西壁，挖了教育战线的人才，也是不应该的。在这种情况下，1984 年 3 月，王兴喜向省委组织部、省教委、省委党校报告，要求创办干部大专班。县一级办高等学历班，这在过去是从来没有过的，全省也没有。好在当时有改革开放“摸着石头过河”的方针，有关部门表示同意。然后从县一中和教师进修学校选了几位有高等教学能力的老师任教，校牌就挂在县党校，委托党校管理。消息传开，报名的很多，有县乡机关干部、企事业单位干部和上山下乡的知识青年。组织上按照录取条件筛选了六十多位编成两个班，基本上实行脱产学习，学籍为两年。通过培养提高，给干部队伍补充了“四化干部”。同时，又从回乡高中、中专文化程度的优秀青年中选拔一批人才补充到干部队伍，基本解决了干部队伍青黄不接的燃眉之急。

1990 年代初，我国推行国家公务员制度。伴随这一制度建设，建立省一级行政学院提到议事日程上来。时任省人事厅副厅长的王兴喜参加了建立福建行政学院的筹划工作，经过调研，确定行政学院与经济管理干部学院联办。1995 年 11 月 24 日，将“福建行政学院”校牌挂在福建省经济管理干部学院的校门上。王兴喜兼任福建行政学院副院长，1997 年年底任福建行政学院福建经济管理干部学院党委书记。

对待人生，他的信条是艺有度学无涯

“几十年来，我把励志作为工作的志向，把读书、练字和摄影作为生活的乐趣。”王兴喜说。



王兴喜对书法的喜好，从少年时代便已开始。他说，小时候家庭贫困买不起钢笔、墨水，就买石笔、石板写字，用自制的毛笔和烟灰水习楷。有时用树枝在地上写写，用手指头在腿上、肚皮上划划。20世纪60年代读中学时成绩拔尖，写得一手好字，常被老师夸奖。

他经常钻进图书馆看书、做笔记，几十年来坚持练习书法，写得一手好字。他临摹、琢磨王羲之、黄庭坚、米芾等书法家的字，逐渐形成行草为主的书风，字体清秀劲美。他在武大学过古文字学，他写的甲骨文书法古朴淳美。

1990年代，王兴喜任福建省人事厅副厅长时分管引智工作（引进外国专家），时常要接待外国专家、友人，王兴喜常常赠诗并写成书法送给外国专家朋友，他们都如获至宝。就在这一年，福建的引智工作获得国务院授予的“引智工作先进单位”光荣称号。

王兴喜的书法曾获得“全国中老年创新书画大赛”最佳创作奖、中国老年书画研究会“帝度杯”第五届书画展、《中华魂》杯全球华人书画艺术大展”优秀奖等奖项。

除了书法，王兴喜还热爱摄影。他认为对待摄影艺术和对待许多文化艺术一样，不能单纯地为艺术而艺术，应当赋予时代的灵魂，反映时代的气息，感召人们构建和谐社会，建设美好生活。他的摄影作品曾多次获奖，作品《富士山》《昵》《玉华洞》《源头》载入中国摄影家协会编辑的《中国摄影家》（光盘）（上海三联书店出版）；作品《荷趣》入选《丹桂飘香——全国老年（大学）优秀摄影作品选》（浙江摄影出版社出版）；作品《长城》刊登在中国书画收藏家协会编辑的《红色中国》艺术画册（华夏艺术出版社出版），并获金奖。

几十年来，王兴喜发表过一百多篇文章，主编了11册公务员培训教材，有一百多幅书法作品和摄影作品被报刊登载。2004年与2007年，由海潮摄影艺术出版社出版《王兴喜书法摄影选》两辑，收录了王兴喜大部分艺术作品。2014年由海峡出版发行集团出版《史录留连》，则以回忆录的形式，记录了王兴喜一路走来的岁月与感悟。



回顾大半生，王兴喜深有感触地说：“一生就是爱学习，一天不学吃不香；一天不吃可以过，一天没书心沮丧。我觉学习是乐趣，终身学习享安康。”对待学习和工作、对待书法和摄影，他的信条是：艺有度学无涯。

（作者系新闻学院 2003 级校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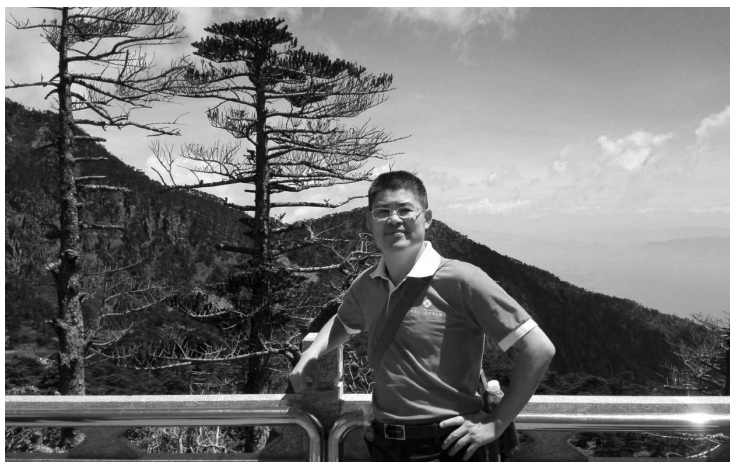


杨震澎：母校就是我们的原点

付晓歌 严 航

校友名片：

杨震澎，原武汉测绘科技大学计算机专业 1987 年毕业，曾是南方测绘集团创办人之一，现任广东南方数码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 & 广州在那儿地理信息公司董事长。中国地理信息产业协会副会长，广东省测绘学会副理事长，武汉大学广州校友会副会长兼测绘分会会长 & 计算机分会副会长，武汉大学职业展望特聘讲师。



武汉大学校报(新闻网)记者对其进行了专访。

记者：听说您每年都回校给师弟师妹上课，能跟我们具体谈



谈吗？

杨震澎：我是“学生就业与创业指导”课的特聘教师，主要为学生做《职场展望》讲座。这门课程全部由知名企业高管联合授课，讲述自身职场经历，已纳入学校公选课体系。

我对每一次授课都很重视，会通过微信、微博征询学生的意见。每次上课都座无虚席，很多同学甚至全程站着听完。讲课结束后，我也会跟学生交流，解答有关职业规划、应聘南方数码等问题。

记者：在校学习时，什么事情让您记忆深刻？

杨震澎：一次偶然的机会，我发现自己有长跑天分。学校举办运动会，我作为班干部带头报名参加，意外地得了第三名。从那以后我就加紧练习，后来终于得了第一名。直到现在，我还保留着大学时的爱好，在公司经常组织体育比赛，自己也会参加足球、长跑等项目。大学时长期的体育锻炼，让我拥有了一个健康的好身体，这对工作帮助很大。

记者：您觉得大学生应该如何提高自己各方面的能力？

杨震澎：大学阶段不仅要学习专业知识，更重要的是锻炼自己的学习能力。因为大家将来所从事的工作未必会和专业对口，知识也在不断更新。我认为大学生应当是多元化的，能够深入学习专业知识当然好，如果不能，起码要找到自己的潜质和特长，有所长才能够在社会上立足。

对我而言，大学生活锻炼了我的综合能力，各方面我都会去尝试，这些经历成了我立足社会的凭借。比如写作，我从没想到写作会成为一个很重要的技能，二十几年来每期杂志我都写刊首语，每周为公司的微信公众号撰写微评，我还为学子们写过《大学生应不应该创业》《如何应聘才更有效》等文章，希望能对他们有所帮助。

记者：您对武大学子有什么寄语？

杨震澎：大学时光非常宝贵，应该好好利用，不能荒废。武大这种人文环境，可以熏陶出有特色的学生。武大的学生是非常有实力的，大家一定要相信自己，好好努力！

记者：您在校友会中做了哪些工作？



杨震澎：合校以前，我就积极参加原武汉测绘科技大学广州校友会的活动，做了副秘书长。合校之后，我又成为新武汉大学的一分子，继续担任副秘书长。在促成四校校友会融合的过程中，我做了一些工作。可以说，在长达 20 年的时间里，我都一心一意地为校友会和校友们付出，这其中既有时间上的付出，也有经济上的付出。

2013 年校庆，我召集了原武汉测绘科技大学 1983 级的全年级聚会，来了 200 多人。这次聚会的理念我觉得比较好，叫“回到原点的聚会”，母校就是我们的原点。我倡导“好汉只提当年勇，同学不秀今天威”，同学聚会非常重要的一点，就是要去掉光环，强调平等。

记者：广州校友会在积极帮助刚到羊城的毕业生方面有什么好的做法？

杨震澎：广州校友会每年都跟学校联系，拿到毕业生名单。在中秋节前后会举办迎新活动，我觉得很不错。这些刚到广州的学生也非常感动，他们来到一个陌生的城市，能和校友会立即取得联系，既得到一些帮助和鼓励，也有一种回家的感觉。

记者：您加入校友企业家联谊会之后，有什么不一样的感受吗？

杨震澎：我觉得加入之后，层次更高、平台更大、资源更丰富了，可以和“大腕们”进行学习交流，也有很多合作机会。

记者：作为校友企业家联谊会的一名理事，您对学校有什么建议？

杨震澎：我认为大学会逐渐回归高等教育的本质，注重对学生的关注、对校友的关注。希望学校进一步开发学生的潜能，创造各种锻炼机会，多元化地培养学生，与校友保持密切的沟通来往。校友珞珈论坛就做得很不错。

（原载武汉大学新闻网 2015-12-14）



赵华锋：理想主义的践行者

——用互联网改变教育，让中国人都有好
书读

校友名片：

赵华锋，武汉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 2001 级校友，获得管理学、法学双学士学位。2006 年白手起家开始创业，在杭州创立杭州铭师堂教育科技有限公司，现为该公司董事长。



记者：赵董您好，能谈谈您的创业初衷吗？

赵华锋：选了这个项目，进入这个行业，可以说是偶然，其实



也是必然。我们知道，做这个项目既有经济价值，又有较强的社会价值。目前，中国的教育培训行业正在蓬勃发展，整个社会包括每一个家庭，由于中国传统文化的影响，对教育都特别重视。另一方面，由于教育资源分配的严重不公，如何做到优质资源共享，如何利用现代手段提升现代教育，都是大家在思考的问题，而互联网是解决这个难题非常好的方式。“十三五”规划中提到教育信息化“服务全局、融合创新、深化应用、完善机制”的原则，鼓励不断加强对互联网教育产品、服务和技术的创新，开拓更为先进的互联网教育模式，为加快推进教育信息化提供更有效的支持与助力。铭师堂就是在践行“十三五”规划，做互联网教育很有意思，也很有意义。

记者：您能谈谈互联网教育的意义吗？

赵华锋：我认为，互联网教育在一定程度上能改变三四线城市孩子的高考命运。举一个例子，正常情况下，一位优秀的教师只能给两个班上课，上三个班的课都是超负荷的，但是如果利用互联网作为手段和工具，北京的教师可以给云南、贵州的孩子上课，杭州的教师也可以给丽水、回山、双彩的孩子上课，这就是互联网时代我们可以做的贡献。如今杭州铭师堂教育的平台上已经能够实现在线教学、微课直播、教务管理、学习评估，以及教师端、学校端、学生端的互融互动。这些功能将有效地解决传统教育各环节中“名师资源不足”“教务效率迟缓”“无法满足学生随时随地个性化诉求”等多个痛点。这正是我正在做的互联网教育平台所能承载的巨大功能。

目前，我国高考处于大变革时期，对学生来说，从“选课”到“选考”，再到“选专业”“选学校”，依据什么来选择？这是高中生面临的人生重要时刻。只有定位准确，选择恰当，才能为自己插上腾飞的翅膀。这对学校教育、教师和学生家长也是一次挑战。杭州铭师堂教育科技有限公司作为一家国内领先的中学生在线教育高科技企业，在新一轮高考改革的大背景下应该紧紧把握时代脉搏，帮助学校、学生和家长解决一些亟待解决的问题，这也是一个企业对社会的责任和使命。

记者：创业之初，你们公司遇到过困难吗？您又是如何解



决的？

赵华锋：既然选择了创业，困难肯定少不了。企业成立之初，我们开发了高考志愿填报辅导软件，希望帮助广大高考学子“圆梦”。但“万事开头难”，当初这个软件开发过程极为艰辛，为防止出现差错影响广大考生填报志愿，我带领员工们三天三夜坚守在电脑前，最终顺利渡过难关。面对困难，我们的理念是“永远坚持理想主义，永远坚持坚守契约，永远坚持有情有义”。

记者：从创业到现在，能说说您是如何推动企业发展的吗？

赵华锋：用产品说话，用效果说话，好的效果自然会产生好的口碑。有了好的口碑，营销和市场就会变得容易许多。比如 2014 年，升学 e 网通服务范围遍及 24 个省市自治区，3 000 多所高中，会员达 150 多万；2015 年 5 月，成立互联网教育研究院，联合武汉大学，面向教育行业和社会公众开展教育创新研究；与此同时，升学 e 网通 app 正式上线，电脑端和手机客户端可同步学习。为让更多学生能够更加充分地享受到互联网带来的丰富而又优质的教育资源，2015 年 7~8 月，铭师堂教育与国内众多重点中学紧密合作，就在线教育与传统教育如何深度融合展开了深入研讨与交流。公司在积极推动互联网教育深度融入传统课堂之路上迈出了重要一步。我们总是在不断追求进步，不断地寻求最高效、最实用的产品，为用户服务。我们的产品好，用户自然会多，我们的市场也就能逐步扩大。

另外，母校武汉大学也提供了不少帮助，遇到困难时，一些校友给我们提供了多方面的支持，也提出了很多宝贵的意见和建议，推动了我们企业的发展进步。作为一名武大人，我感到骄傲、自豪！武大精神，是珞珈山的宝贵财富，我自己也要不断传承并继续将其发扬光大，我坚信自己一定能够做到。

记者：您旗下的“升学 e 网通”给众多学子带来了高效的用户体验，您的企业成立 10 余年来，您是如何不断突破自己，带领企业一步步前行的？

赵华锋：很多人提到企业家精神，我认为所谓企业家精神，就是一种持续的、系统的创新，意味着企业家必须要找到一个永动机



制。企业家是市场的主角，市场在资源配置上起决定性作用，即企业家在资源配置上起决定性作用，企业家履行这一使命的主要方式就是创新，创新和企业家精神是经济世界里永恒的主题。我的梦想是“打造全球最大的在线教育集团，做一家受人尊敬的企业”，为了实现这个梦想，我们需要不断创新，不断超越自我，我们必须找到一个一辈子都无法真正实现的目标。人一旦实现了自己的目标，就会松懈，我们这么辛辛苦苦地创业，这么早起晚归地拼搏图什么？从传统的眼光看，不就图过上一种舒服安稳的生活吗？但另一方面，一旦感觉自己处于舒适、安稳的状态，一旦感觉到满足了，就会缺乏创新的动力了。我给自己树立的目标是：用互联网提升中国教育之效率——这个目标是永无止境的，在我的有生之年永远都无法完全真正地实现。

记者：可以谈一谈你们的企业文化么？

赵华锋：我们企业的核心价值观可以说有四个关键词：奋斗、朴素开放、简单主义、坚守契约。以此为指导，我带领员工们在新价值体系下开展工作。新的价值理论体系包括“新思想”“新思维”“新干法”。所谓“新思想”，指的是以用户为中心，一切都要服从这个中心；“新思维”指的是简单、专注、极致、口碑、快；“新干法”指的是简单、专注、专业。这几个词看起来简单普通，但内涵十分丰富。就拿“简单、专注、专业”来说，“简单”就是建立一种“简单可信赖”的文化和一套“简单可信赖”的制度，让每个人在一个“简单可信赖”的环境中工作，在“简单可信赖”的氛围中相处，让成员之间更加简单，让人与人之间的信任更加强。“专注”即迅速、彻底、全面加强专业化的分工。让每一位成员专注于自己的本职工作，通过“高标准、高要求”来要求自己，高效地完成自己的本职工作，将本职工作做到极致。“专业”即提高整个组织的专业化程度和提高全体成员的专业化水平，用专业化的意识（认知）、专业化的行为，做出专业化的成果和贡献。

2015 学年，铭师堂教育与全国 3 000 多所重点中学展开合作，升学 e 网通帮助广大学生实现了轻松提分、进入理想大学的目标。我们公司始终坚持“一切以用户为中心”的经营理念，走进广大用



户，倾听用户心声，听取用户建议，不断完善和优化升学 e 网通，从而带给用户更优质的学习资源和更完美的学习体验。升学 e 网通之所以能成为我们的主导产品，主要是因为其在不断优化的过程中取得了显著的效果，深受学生、家长和老师的信赖。近期，公司在湖北、广西、江西、安徽、福建、辽宁等省联合各中学相继召开了用户使用交流座谈会，成果丰硕，反响强烈。我们的所有工作都是在这套体系下进行的，我们践行着这些标准，同时这些标准也形成了我们铭师堂的企业文化，它们是相辅相成的。

记者：你们企业还有其他优势吗？

赵华锋：说到优势，我觉得我们企业的一些优良传统应该可以算得上是优势吧。一直以来，我们公司都是一个有着“亲情文化、感恩文化、担当文化、创新文化、极致精神、团队合作”的集体。我觉得“亲情文化”和“感恩文化”是任何行业都应该积极倡导的，尤其是教育行业，教师的职责不仅仅是传授知识，更重要的是教给学生一些做人的基本道理，而学会感恩则是做人的基本道德。不管我们今后能走多远，我们都应该心系亲人，情寄故乡；不管走到哪里，我们都不能忘了自己的根。

对于一个企业来说，团结协作是必不可少的，创新也不是可有可无的，创新是企业健康向上的必备因子。创新不仅能阻止企业走向衰败，更是企业走向繁荣、走向成功、走向辉煌的唯一出路。在民营企业资源比不上国有企业资源丰富的时候，创新就是我们发展的最大动力来源。没有创新，发展的脚步一定是缓慢的。如果整个公司每个人都是一个创新因子，如果整个公司都充满创新精神，这个公司一定会有更大的发展，一定能抓住更多、更好的发展机遇。

记者：据我所知，铭师堂的员工大多是 80 后 90 后，平均年龄只有 25 周岁，你们选择员工的标准是什么，或者请简要谈谈您的人才观？

赵华锋：我认为，人的能力、经验、方法、技巧，是可以后天培养的，甚至可以迅速养成。唯独一个人的基本素养，相当程度上是先天禀赋，我们需要的人是朴素而开放的。所谓朴素，就是朴实，它的反义词就是装腔作势，就是虚张声势；朴素这个词，让我



们想到山里的乡民、海边的渔民。教育关乎广大学子的命运，关乎国运的兴衰，不能有半点虚假，我们必须踏踏实实，一步一个脚印。朴素的内涵其中有真诚、有实在，但是光朴素也不行，同时要开放。何为开放？开放的英文单词是 open，就是你能打开自己的心门，打开你的眼界，打开你的思想，能听进好的、顺耳的声音，也能听见反对的、难听的声音，能看到别人的优点，也能看到自己的不足，并且能不断完善自我，学习具有新生力量的事物。只有开放，我们的人才能不断进步，我们这个组织才能成为一台不断进化的机器。企业是树，人才是根，根有多深，树有多茂。人是最宝贵的资源，拥有怎样的人才资源，决定了一个企业的未来。因此，我一贯推崇“英雄不问出处，不拘一格降人才”的用人之道。

记者：您跟您的员工相处得非常好，工作环境也轻松愉快，您的员工好像称您为“老大”？

赵华锋：我们一般在公司内部都叫化名，比如说，名字里有个江字，我们就叫他“大江”，或者前面加一个“小”字、“阿”字。“老大”这个名字是因创业开始时就这样叫的，也就叫习惯了，外面听起来可能会有点江湖味道，但听起来还是蛮亲切的。我的员工就像我的弟弟妹妹，他们称呼我为“老大”，在工作中是一种敬畏，在生活中却早已融入了浓浓的亲情。

记者：您是如何与员工相处得如此融洽的呢？

赵华锋：我们公司经常会组织一些集体活动，大家参与其中，既得到了放松，相互之间的感情也增进了。我还经常跟（市场部）总监级别以上的员工开玩笑说，只要你们在地球上，我都会来参加你们的婚礼！因为在多年的创业过程中，大家一起战斗、风雨同舟，不仅仅有革命战友之情，还有兄弟之情——甚至于亲人般的感情。所以我的亲人结婚，能不去吗？另外，我还常常建议员工们读读韦伯的著作，我希望能通过阅读经典，把勤奋、忠诚、敬业——最重要的是自律精神，潜移默化地注入到员工们的内心。

记者：您与员工之间这种无形的精神互动正是企业发展的强大动力，您可以谈一下对未来发展的想法么？

赵华锋：从客户的角度来说，我们希望能够持续地创造优质、



平价、具有优质服务的产品；从员工的角度，我们希望员工能够得到物质与精神的双重幸福；从社会的角度出发，我们希望不仅仅为社会解决就业问题、国家税收问题，同时也希望向社会输送一种价值观，比如我们公司一直在提倡践行的“坚守契约、有情有义、奋斗文化”等，希望能够影响到更多的人。世界 500 强为什么能够征服世界？他们征服世界的武器就是强大的使命感。这种使命感我们可以表达为：用互联网改变教育，让中国人都有好书读！随着互联网教育行业的快速发展，铭师堂教育将不断加强对产品、服务和技术的创新，开创更为先进的互联网教育模式，践行“用互联网改变教育，让中国人都有好书读”的使命，为中国教育改革、促进教育公平、让更多的学生享受优质的教育资源做出贡献，为铭师堂教育科技有限公司成为一家受人尊敬的伟大企业而不懈奋斗！

（本文由校友总会根据浙江校友会提供的相关资料整理）



“小土豆”能实现“大梦想”

任思言

“人如果没有梦想，那和土豆有什么区别？”可是“土豆”也有自己的梦想。近几年，在央视和各大卫视热播的一部名为《土豆侠》的动画片，让全国的小朋友为之疯狂。在动画片中，一个名为“阿逗”的普通土豆有着一个“大侠梦”，它在自己的江湖路上发生了很多有趣的故事，它教会了孩子们，就算是一个土豆，如果坚持自己的梦想，也会成为人们心中的“大侠”。

《土豆侠》的出品人是张义滨，他是武汉大学 1989 届哲学系校友，目前是福建天之谷动漫的负责人。

敢拼，世界就是你的

和动画片里的“阿逗”一样，张义滨也有着一个“大侠梦”。大学毕业时恰遇敏感时期，他被分配到福州化肥厂工作。“最开始我是做一线工人，一直都在读书的我，气力不如那些工人，时常会被大家嘲笑。”说起那段经历，张义滨表示记忆深刻，也学到了很多人生经验。没多久，他就被提拔为化肥厂的中层。“可是工作了一段时间之后，我觉得这种生活不是我想要的，我就毅然提出了辞职。”在别人眼里，张义滨年轻有为，却在这个时候提出辞职，不够成熟。而张义滨却坦言，如果一直都在化肥厂工作，可能就距离自己的梦想越来越远了。

20 世纪 90 年代，张义滨开了一家小广告公司，做起了广告。“那时候我还很害羞，不会做生意，也不会和人谈判，刚开始的时



候，经常很久都接不到订单。”至今，他仍记得接了第一单广告牌的业务后，和工人一起制作和安装广告牌的情形。张义滨为人诚恳，很快事业就上了轨道，公司也越做越大。

2010年，张义滨创建了天之谷网络科技有限公司。“其实那时候我另一家公司经营得还不错，可是我总觉得想要做一些自己喜欢的事情。”天之谷的定位是开发动画片和动画电影的原创动漫企业。彼时，中国的国产原创动漫还处于起步阶段，而“语言粗俗、制作粗糙”的国产动漫深受国人诟病。“我的理想是做出优秀的国产动漫，做到和迪士尼动画一样家喻户晓。”张义滨说。

“小土豆”实现大梦想

2012年5月，天之谷网络科技有限公司出品的《土豆侠》网络样片首度通过优酷网测试播出前期宣传片，一时好评如潮，网络点播量达1亿多次。同年，3D动画短片《土豆侠贺岁之龙腾福跃》获得第八届中国国际动漫节最高奖项“金猴奖”。这部动漫讲述了一个有点滑稽、缺点多于优点的草根阿逗，因不愿意重复父亲的人生，执著于追寻自己的梦想，在江湖寻梦的过程中，历经种种感动、背叛、迷惘、抉择之后，终于大彻大悟，从一个普通土豆逆袭成了大侠的故事，传达了“追求梦想”“寻找自我”以及“勇敢、坚持”的主题。其对“跟随内心，每个人都能成为自己的大侠”的“侠义精神”解读，在当下弥漫着颓废、伪娘的动画风气里，显得格外振奋人心。

《土豆侠》先后斩获金猴奖“中国动画短片优胜奖”、第五届全球华人非常短片创意大赛“最佳微动漫奖”、福建省第七届百花文艺奖荣誉奖等各大奖项，其播放权更是成为央视和各大卫视争相购买的对象。在网络上，《土豆侠》系列动画的点击量已达到6亿，单集点击量超过了《熊出没》。这让张义滨觉得距离自己的梦想越来越近。他告诉笔者，《土豆侠》的成功不是偶然的，而是基于动画片“低幼划分”的大数据基础上，将目标受众定在6~11岁这个儿童市场，而在这一年龄段，男孩比女孩更爱看动画片，忠诚度也更



高，同时也是动画衍生品尤其是游戏、玩具的消费主力军，而土豆侠的热播也证明了天之谷走在了正确的市场道路上。“我们公司刚开始的定位就是将动漫做到精品化、市场化、网络化和多元化，不局限于国内动画的圈子。我们希望能让自己的定位再高一点，走国际化路线。”

《土豆侠》第三季于 2016 年 8 月 19 日上线。《土豆侠》的大电影也正在紧张筹备中，预计可在 2018 年上映。“从短片到系列短片再到电影，再到土豆侠的游戏和周边，我希望能实现与实业界的对接，挖掘出《土豆侠》的全部潜能。”张义滨介绍，近期土豆侠的薯片将会上市，相关的手游也在研发中。

（作者系新闻学院 2002 级校友）



朱征夫：精神的归宿

严 航 付晓歌

校友名片：

朱征夫，武汉大学法学院 1980 级校友，先后在武汉大学获得法学学士、法学硕士和法学博士学位。律师，现任全国政协委员，中华全国律师协会副会长，东方昆仑律师事务所主任、执行合伙人。武汉大学校友企业家联谊会泛珠三角分会会长。



武汉大学校报(新闻网)记者对其进行了专访。

记者：作为广州校友会的骨干力量之一，能否谈谈广州校友会



工作为何能做得如此有声有色？

朱征夫：校友工作，依靠的是人。我们有一个强大的秘书处，是校友会的中枢机构，他们非常团结，有很强的参与感和责任感，能把大家都发动起来，校友工作因此不同凡响。

记者：校友沟通，平台很重要。“珞珈 1893 创业咖啡”是一个很好的交流平台，大家相互借力，资源共享。你们是如何做到的？

朱征夫：以前，校友们都是埋头在自己岗位上工作，互相交流比较少。现在通过校友平台，增进了彼此间的交流，还可以互相帮助。

我们在筹备校友咖啡初期，很多人并不看好，但是为了能够让这个平台顺利建立起来，我们几个校友商量自掏腰包，补给校友咖啡的开支。从目前来看，情况不错，很多在周边上班的校友知道后都前来订餐，有的把朋友聚会定在这里，已经基本实现了盈亏平衡，也初步有了“校友之家”的感觉。

记者：近年来，校友回馈母校的方式越来越多样化，不仅仅局限于捐款捐物。您认为回馈母校最好的方式是什么？

朱征夫：很多校友愿意为武大捐钱，我相信他们是发自内心的感恩。因为他们中的大多数已经有很高的知名度了，并不需要以此做宣传。

除了捐钱，我觉得更好的回馈母校的方式就是创造条件，尽可能多地和师弟师妹在一起，跟他们分享自己的人生经历及对世界的看法，让他们更深刻地理解社会发展的规律、创业的规律、行业的规律，帮助他们少走弯路。

更重要的是，引导他们积极地面对人生。对于成功的界定有很多种，我认为你只要有让自己快乐的能力，就是成功的。当然，这也包括让父母生活开心，让孩子有钱上学，在这样的条件下，你就是成功的。

记者：您对学校的校友工作有什么建议？

朱征夫：一个就是希望母校能给各校友分会一个牌子，例如，广州校友会能够作为“武汉大学校友总会广州分会”。因为武汉大学校友总会是通过民政部门批准的组织，这样称呼后，各分会就更



加规范化了。

另一方面，例如珞珈校友论坛、珞珈法律论坛这样全校性的盛会，武大还有很多专业具备举办条件。学校可以参考这些，再多设几个其他专业的论坛，把某一领域的优秀校友凝聚在一起。校友也可以回学校做兼职教授，比如我是律师，长期游走于法学界，可以在法律教育、课程安排等方面对学生提出一些建议和引导。

记者：当前，越来越多的学生选择毕业后创业，对此，您有什么指导性意见？

朱征夫：我的意见是先积累经验。若想在某个领域创业，可以先去实习打工，积累一些实践经验和经济基础。对于法学专业学生来说，在律师事务所工作一段时间，有了一定的经验和客户群之后，再出去创业可能会更好。

记者：现在很多法学专业的学生毕业后并没有从事法律工作，您怎么看？

朱征夫：我认为这也是可以的，从事其他工作，依然可以学习待人接物的方法，但是同时不能忘记自己的专业优势。

另外，创新精神要一直有，不管学什么专业的学生，都不能满足现状。不断改变自我、挑战自我，这也是武大一直以来着力引导学生去做的。社会管理需要创新，不管是经济还是科技，要立于不败之地，唯一的出路就是创新。

记者：随着个人发展不断完善，身份地位不断提高，校友们是不是更加重视自己的校友身份？

朱征夫：人最终要面对精神归属的问题。我不信教，宗教对我来说比较遥远，我把珞珈山当做自己的心灵家园。精神上受到挫折，会想到回武大走走，排解一下心中的郁闷；取得了什么成功，想与同窗和老师分享，这就是我的精神归宿。

（原载武汉大学新闻网 2015-12-4）



矢志土肥研究 伉俪比翼齐飞

——记 1950 级校友张肇元、周清湘

李烈荣



张肇元和周清湘 1955 年 10 月结婚照



张肇元和周清湘 2005 年 10 月金婚照



认识周清湘学长是一种缘分。

2014年7月的一天，我随手翻开当月广西《老年知音》杂志，看到其中一篇文章《知音伴侣忆往事 耄耋夫妻话情长》。细看之下，才发现作者周清湘和文中的男主人公张肇元原来都是武大1950级校友。他俩是在武汉大学农学院农业化学系学习的同班同学，是我们的老学长，1954年毕业后经统一分配来到广西工作。三十多年来，我一直关心和收集武大广西校友名录，但都未见有农学专业毕业的校友。因为自1952年我国进行高等学校院系调整，根据中南区高等学校院系调整方案，武大农学院与湖北省农学院合并成立华中农学院，同时调入华中农学院的有原武大农学院的农艺系、园艺系、农化系、森林系和农业调查专修科、粮食专修科、茶业专修科和林业专修科的同学们（见武汉大学出版社1993年出版《武汉大学校史1893—1993》）。此后，武大便再也没有农学院毕业的校友。得知周清湘学长是武大校友，我十分高兴。在《老年知音》编辑部的帮助下，我联系上了她，以武大校友的名义向她表示亲切问候。去年底，我专程登门拜访她，得以当面向她了解他们在母校学习和来到广西工作、生活数十年的一些故事。

1950年秋，张肇元和周清湘考入武汉大学农学院农业化学系，他俩分别来自江西九江和湖南长沙。当时，周清湘是化学课代表，经常去男同学宿舍收集意见，协助解决疑难问题。共同的专业学习经历，让他俩都有了爱恋对方的情意。她记得，1952年的一天，他邀她去山顶法学院大楼左侧的石阶上坐坐，第一次腼腆地向她表示爱意，她因出乎意外有点不知所措，只是细声地说“让我想想”。后来珞珈山上的羊肠小道、东湖宿舍楼旁的月夜花前都留下了他们初恋的美好回忆。1954年毕业后他俩统一分配到广西，张肇元分配到距南宁150公里开外的广西贵县（今贵港市）西江农场，周清湘则分配到了位于南宁市郊西乡塘的南宁农业试验站，两地相距甚远。

张肇元先是在贵县西江农场任技术员，参与农场农业生产管理和指导。一年后，调广西农业厅荒地勘测局（后改为土地利用局）任土壤调查队副总队长、土地利用处技术员。数年后又调到广西农



业科学院土壤肥料研究室(后改为土壤肥料研究所),历任技师、副研究员、研究员、副主任、副所长、所长,1993年经国务院批准享受政府特殊津贴。张肇元在几十年工作中都是从事土壤肥料研究,重点研究绿肥引种、栽培、利用及化肥使用技术,参与紫云英良种选育和黄花草木樨引种及稻田套种田菁的试验推广。(见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2009年出版《广西大百科全书》当代人物·张肇元条目内容。)完成的主要工作有:在1950—1970年,他和基层技术人员完成桂西南及桂中地区荒地资源的土壤普查工作,全面深入调查了解广西农业自然条件及农业生产情况。参与并主持“摩洛哥磷矿粉对冬季绿肥肥效研究”“紫云英早花退化原因和防治措施研究”“草木栖品种比较试验”“合理使用碳酸氢铵”“腐植酸铵对水稻肥效试验调查”等项目的研究工作,初步提出广西农村肥源状况及合理利用技术问题;1976—1980年连续4年,他被国家派往非洲卢旺达农业援外,任土地规划专家,在沼泽荒野艰苦地勘测设计施工,新辟稻田300公顷,从气候相似的云南引进水稻种试种成功,得到受援国政府及我国农业部的好评;1980—1982年,主持“中国绿肥区划”广西地区的研究工作,开展绿肥引种、选育、栽培及示范推广工作,并参与《中国绿肥区划》的编写工作,该成果获农牧渔业部技术改进二等奖;主持“水稻氮磷钾化肥配合施用研究”“水稻氮磷钾化肥用量与配比定位试验”“我国氮磷钾化肥肥效演变和提高增产效益和途径”“稻田肥料效应和土壤肥力演变定位监测研究”“广西化肥区划”等项目的研究工作,并筹建了“广西化肥合理施用试验网”课题组,在广西逐步开展主要作物的营养特性研究,探索出实用的研究技术手段。其中“水稻氮磷钾化肥配合施用研究”于1985年获广西自治区科技进步奖三等奖;“广西化肥区划”于1986年获广西农牧渔业厅科技成果三等奖;“我国氮磷钾化肥肥效演变和提高增产效益和途径”于1987年获国家科技进步二等奖;主持“南方七省提高钾肥效的研究”“经济作物营养特点与施用技术研究”“甘蔗营养特点与氮磷钾配合施用研究”“中加钾肥效益合作研究”(广西与加拿大钾肥公司合作,张肇元主持)、“玉米营养特性与高产栽培技术研究”等多个项目的研究工作,全面开展广西主



要农作物的营养特性及化肥合理配施的研究，取得了丰硕的研究结果，为广西平衡施肥技术体系的构建奠定了基础理论依据。张肇元参与编撰《广西土壤肥料史》《中国南方农业中的钾》《中国肥料》《中国南方土壤肥力与栽培植物施肥》等专著的编写工作。主编《广西土壤钾素状况与平衡施肥研究》专著，发表学术论文 20 多篇。“甘蔗营养特点与氮磷钾配合施用研究”“稻田肥料效应和土壤肥力演变定位监测研究”“玉米营养特性与高产栽培技术研究”三项研究成果分别获得 1990 年、1992 年广西科技进步三等奖；“南方七省提高钾肥效的研究”于 1991 年获农业部科技进步三等奖。张肇元作为农学技术专家，为广西化肥的合理施用技术做了许多开拓性的研究和普及性的示范推广工作，是广西化肥使用技术及示范推广的带头人。他还开展关于广西主要作物营养特性的研究工作，并形成了广西主要作物平衡施肥理论体系，特别是对钾肥的合理施用技术有较系统深入的研究。这些研究成果，对广西农业生产水稻、玉米、甘蔗、黄红麻、花生、大豆、苧麻、烟草、香蕉、菠萝等主要农作物的产量和品质有很大的帮助与提高，取得了显著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以上根据中国科学技术协会编印出版的《中国科学技术专家传略·农学编·土壤卷 3》“张肇元”条目内容摘录。）

周清湘主要从事土壤肥料研究和土壤调查工作，她先后在南宁农业试验站、广西农科所、广西农科院任技术员、土肥系副主任。20 世纪 70 年代在自治区农林局、农业厅任办公室秘书、粮食处科长、技师（农艺师），后又回到广西土壤肥料工作站任科长、督导员、高级农艺师。1983 年获广西自治区先进工作者称号，1992 年经国务院批准享受政府特殊津贴，1994 年被评为农业部先进工作者。

1958 年，周清湘曾被国家选派留苏，去北京学习俄语，1959 年如期通过出国考试，等候出行。但因后来中苏关系破裂，留苏计划落空。20 世纪 60 年代，正值越南抗美战争时期，周清湘两次去越南援外支教；1964 年去河内参与中国援建中等专业技术学校培训专业师资；1968 年去越南援建高平、谅山二省建立农化分析室，负责全套仪器设备安装及操作人员培训。由于她工作认真、耐心勤



勉，处处体谅对方的战时困难，表现出同志加兄弟的情谊，受到好评，工作结束时获越南民主共和国三级劳动勋章一枚。

20 世纪 70 年代，周清湘在自治区农业厅参与发动群众，抓面上生产，重点做好增辟肥源、科学施肥等技术的示范推广。20 世纪 80 年代初，国务院下达文件部署全国开展第二次土壤普查工作。广西农业区划委员会及农业厅责成自治区土壤肥料工作站具体承担组织和进行技术指导。周清湘主持广西全区大比例尺土壤普查《广西土壤资源调查》。这项工作量大面广，专业性强，从培训组建专业技术把关队伍，到深入山坡田垌，观察记载剖面、取样，勾绘图斑，从生产大队做起，乡、县、地区（地级市）逐级汇总验收，历时 12 年。这项基础调查研究，摸清了广西土壤分布及资源概况，建立了各级图、文、表系统档案，对广西发展农业，调整农业产业结构，保护自然生态，起到重要作用。1990 年 10 月，在有国内知名专家共 20 多人参与的验收会议上，该项成果被评价认为“工作基础扎实，手段先进，路线正确，各项资料调查系列成果反映了广西土壤科学的新成就和现阶段发展的最新水平”，获得广西自治区科技进步一等奖。（以上根据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出版的《广西大百科全书》“当代人物·周清湘”条目内容摘录。）这项工作从 1978 年冬开始至 1990 年 10 月验收，时间长达 12 年；参加这次土壤普查工作的人员多达 26 000 人次，其中专业技术干部 2 000 多人次，是历次广西土壤普查工作人数最多的一次。面对这项量大面广、专业技术性强、要求又高的基础工作，周清湘和她的同事们建立起以专业队伍为骨干，有领导干部和群众参加的三结合队伍。方法上是先以横县一个县作试点，约一年时间按全国技术要点要求，培训技术骨干，制定切合实际的技术方案和规程，同时抓好土壤普查成果的应用，总结出“因土施肥、因土种植、因土改良”的经验，促进了该县的农业生产。然后再在专区试点，由各专区（等于今天的地级市）铺开所属各县的土壤普查工作。继续认真抓好地区和自治区级资料汇总，并组织逐个验收和成果评奖。周清湘作为年过半百的女同志，承担这项艰巨又艰苦的工作，实属难能可贵，她付出了大量的心血，做出了无私的奉献。1989 年，她已到了退休年龄，但



为了把这次土壤普查工作资料完整地汇总和顺利通过国家验收，硬是把退休时间推迟了两年多。1990年10月，广西第二次土壤普查通过国家验收，获得好评。由这次土壤普查工作形成了《广西土壤》《广西土种志》、广西土壤系列图件及编制说明书、土壤普查数据集等；建立了土壤标本室、土壤档案室及广西土壤普查数据库。可以说，这次土壤普查所取得的成果，对广西农业工作领域有巨大的影响，具有无可替代的作用。

20世纪80年代中期，在广西自治区党委、自治区人民政府的领导下，广西组织部分农业专家、学者和农村工作者编纂《广西农业(史)丛书》，其中的《广西土壤肥料史》分册指定交由张肇元和周清湘编著。《广西土壤肥料史》分上、下两编：上编为土壤史，由周清湘执笔；下编为肥料史，由张肇元执笔。因他们长期一线工作实践和较全面的专业知识，用时三年，经过艰苦的资料搜集工作，该书终于得以完成。

从1950年考上武大，1954年大学毕业来到广西工作，一转眼60多年过去了。周清湘回忆往事，好像只是昨天发生的故事：在欢迎新生大会上，校领导热情洋溢地鼓励同学们积极向上、努力学习、奋发有为的讲话情景还深深印在脑海中。她十分感激在母校专业学习中老师们给予的亲切教诲，让自己学到了专业知识，为今后从事农业科学研究打下了基础。她说：当年初到南宁农业实验站时工作地点是在市郊区的一个土坡上，只有一个不大的、约有十几平方米的晒坪和一些泥砖做的房子，刚从大城市毕业来到这里，还真有点不习惯。两位学长就是在这样的艰难环境条件下，在农业实验站、土肥站开始他们从事了一辈子的土肥研究事业。那时候，张肇元从贵县西江农场需要多次搭乘车船才能到达南宁市，还要再搭乘人力自行车、爬山越岭奔波几十里才能到郊区农业试验站，看望未婚妻周清湘。结婚后，因工作需要经常两地分居，聚少离多，孩子幼小，母亲衰老，工资微薄，经济拮据，白天上班要应对繁重的工作任务，下班回家要关心照顾孩子及老人。张肇元那时候因工作需要长期出差在外，据他的女儿们回忆：小时候每当远远见到出差归来的爸爸时，就高兴得大喊“妈妈，爸爸回来了”。即便在那样艰



难的日子，两位学长也是勇于克服各种困难，坚持土肥科研工作不停步。

在 20 世纪 50~70 年代，我国科研人员从事科学研究的环境条件还比较差。在政治活动频繁，政治压倒一切、政治挂帅的氛围下，科学研究工作不容易得到重视，知识分子也得不到应有的尊重，甚至动辄被批斗，被污辱为反动学术权威“臭老九”。缺少科研经费、缺少科研资料，因国门封闭无法与国外同行交流和学习、借鉴他们的先进经验，这样的困难很多很多。像张肇元和周清湘这样的科研人员要搞科研，只能靠自己结合工作实际选择或上级指定最急需研究的课题，靠自己从各种途径收集研究资料，反复琢磨思考、实验对比，才能逐步找到科学研究的依据，形成最后的科研成果。通过长期艰辛的科研探索，两位学长都取得了突出的工作科研成绩，受到政府表彰奖励，得到了人们的认可和尊重。一个江西老表一个湘妹子，张肇元和周清湘由大学同学成为恋人、伉俪，后来又成为同事，一起共同为土肥研究事业奋斗。他们趣味相投，专业相近，在事业上能相互切磋，互相理解、支持，无论在外面工作多么辛苦，只要回到充满爱的家，所有的辛苦和不快都会随风而逝，婚姻美满是他们一生最大的幸福和满足。2005 年，在金婚的日子里，他们共同写下了感人的诗句：

珞珈山上遇知音，相思湖畔结缘姻。
志同互勉奔事业，执著追求情智增。
援外非洲与越南，八桂查土十三春。
中外合作钾肥用，勤书心得论著丰。
家风俭朴严律己，晚辈关爱重亲情。
相濡以沫半世纪，畅叙温馨庆金婚。
但愿天长人地久，还盼牵手步来生。

这是张肇元和周清湘学长对他们大半辈子学习、工作过程的回顾和总结，是他们对自己人生最美好愿望的憧憬，他们获得了爱情和事业的双丰收。（2012 年 10 月，张肇元学长因病逝世，我们永



远怀念他!)

张肇元和周清湘学长数十年如一日矢志不渝地坚持土肥研究，用他们的聪明才智和辛勤劳动，在土肥研究领域开拓创新，取得了许多科研成果。这些科研成果的推广应用，产生了良好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他们为社会做出了贡献，作为武大学子的他们，也为母校争了光。“自强、弘毅、求是、拓新”是武大校训，我们每一个校友都应向张肇元和周清湘老学长学习，更好地弘扬武大校训精神，为社会做出更大贡献！

(作者系历史系 1978 级校友)

珞珈记忆





夏日的一个地方——A Summer Place

陈卫民

20 世纪 80 年代初在武大读书时，学校广播台有段时间每天结束播音时播放的一支乐曲让我始终难以忘怀。

当时的情景是这样的：晚饭后，同学们背起书包，沿着校园的林中小路走向“理学院”或南一楼，热闹了一天的校园渐渐隐入湖山之间的暮色里。就在此时，那支不知名的乐曲从四面八方如潮水般涌来，旋律是那样悠扬抒情，在树林里欢快地跳跃、飘荡，最后渐行渐弱、渐行渐远，直至完全消失在空旷寂寥的校园里。这支曲子每次都在我心中激起一股莫名的惆怅：不知道它写的是什么，却强烈地引起了我这乐盲的共鸣；特别是它的结尾，每次听到都好像有什么东西在向远方飘去——时光？机会？梦想？说不清道不明。我知道自己今后再也不会忘记大学期间听到的这支曲子了。奇怪的是，当时并没有想到要去打听清楚这是一支什么样的曲子，我以为今后肯定会在某一天、某一个地方和它不期而遇。

遗憾的是，自 1985 年毕业后，无论在国内还是国外，我竟再也无缘听到那支曲子，仿佛一切都已随着那段学生时光消失殆尽了。它叫什么名字？创作者是谁？来自哪个国家？对于我都是一个难解的谜。很多次当我走进各种各样的图书馆的音乐部时，都想把曲子哼给工作人员听，请他们帮忙查找，终因不好意思或不抱希望而止步。直到 2003 年的某一天，我才鼓起勇气做了这件事。那是在加拿大阿尔伯塔省的卡尔加里市图书馆（Calgary, Alberta），当我哼起这支曲子时，热心的市图书馆工作人员也被我逗乐了：“啊，是有点耳熟。”她在计算机里查找了一会，又赶紧打电话向朋友询



问，不出所料，没有找到。“请留下 E-mail，应该能找到的”，对方非常热情地说。我却怅然若失地走出了图书馆。

没想到第二天上班，打开 E-mail，一眼就看到了市图书馆发来的邮件，那位图书馆理员真的帮我找到了：原来是一部 1959 年的美国电影 *A Summer Place* (《夏日的一个地方》) 的同名主题歌，由 Percy Faith 演奏。再看歌词，竟是一首情意绵绵的大情歌：在夏日的一个地方，不管刮风还是下雨，我都会感到安全温暖。因为在夏日的那个地方，你向我张开双臂，我心中再无忧虑。因为我知道，情人眼里不会有阴沉的天气。夏日的地方在哪里，告诉你它的小秘密：只要我俩怀着一样的希望，一样的梦想，一样的爱情，夏日的地方就在那里。在夏日的一个地方，可能会刮风下雨，但我都会感到安全温暖，在你的怀抱里，在你的怀抱里……

这样的“靡靡之音”居然能在 1980 年代初的大学校园里天天播放，简直匪夷所思。不知当年广播台的同学是从哪里得到这支曲子的，真该感谢播放这首优美乐曲的他们！

只可惜，在毕业近二十年后的万里之外，我才总算弄清楚了这首曲子的来龙去脉。听着这久违了的乐曲，我仿佛又回到了美丽的校园，回到了那一个个平常而又难忘的黄昏，情不自禁地想起了老师和同学们。这首曲子，让我又充满了二十岁时的青春、活力和梦想。

感念珞珈山上的四年青春！感念在那里度过的最美时光！

(作者系物理系 1981 级校友)



我在武汉大学见到毛主席

陈珠培

春夏之交，百花争艳，气候宜人，湖南省社会科学院离退休办公室组织离退休人员，赴武汉红色景点和著名景区考察学习。景点包括毛泽东主办的中央农民运动讲习所旧址，武昌起义辛亥革命纪念馆，黄鹤楼—武汉长江大桥，东湖风景区等。

我们考察学习的第一站是著名的东湖风景区，这于我是故地重游，对比当年，感慨良多。

在已走过的 80 年的人生旅途中，武汉可以说是我一生中最重要的成长之地。20 世纪 50 年代中期——1955 年秋，我参加了全国高校统一招生考试，幸运地考取了著名学府武汉大学，在那里学习生活了四年。

武汉大学位于东湖边的珞珈山上，与东湖是名副其实的“山水相连”，每逢节假日，我们经常约上三五同学好友，到东湖游玩或游泳。那时，东湖景区只有一个听涛景点，规模比现在小很多，磨山等景点尚未开发；从学校渡湖到听涛景点，乘坐的是人力操作的小木船，一次只能坐 4~6 人，没有现在的豪华游船、游艇，也没有供游客租用的其他船只；景点上只能步行，没有现在的游览车、观光车；供游客观赏玩耍的设施也比现在少许多……

游览东湖景区时，我脑海里涌现得最多的是当年在武汉大学求学时的点点滴滴，其中最难忘的，是 1958 年 9 月 12 日在学校的大操场见到了毛泽东主席！

当时的武汉大学已是全国著名高等学府，时任校长李达又是中国共产党的创始人之一，中共一大代表，全国著名哲学家，与毛泽



东主席有着深厚的友谊。1958 年秋，毛主席来到武汉后，于 9 月 12 日视察了武汉大学，重点参观了武大教育革命成果展览，并接见了武大及附近多所高校的万余名师生。

我清楚地记得，那天是星期五，天高气爽，同学们吃过早饭，照常去教室上课。但此时大家已感觉到了学校气氛的不同寻常——到处有警察、警车巡逻。大家纷纷猜测“一定有要人来访了”；“听说是毛主席，因为最近毛主席一直在武汉各地视察”。果然，下午时，同学们就接到了通知：大家做好准备，等待毛主席接见。于是，我们提前吃好晚饭，整理好着装，排列好队伍，怀着无比敬仰和兴奋的心情，排列有序地进入到学校的大操场。不久，附近的武汉水利电力学院、武汉测绘学院、中南民族学院、华中师范学院、中南体育学院的部分师生，也纷纷列队进场。全场一共 13 000 余人，人山人海，气氛热烈；大家情绪高昂、激动，都在盼望着毛主席的接见。

傍晚七点多钟，毛主席在时任中共湖北省委第一书记王任重和武汉大学党委书记刘仰峤等的陪同下，缓步来到了大操场的主席台上。这时，全场立即响起了暴风骤雨般的掌声和“毛主席万岁”的欢呼声！

毛主席已 68 岁高龄，但身体健康，精神饱满，他在主席台来回走动，不停地向师生们招手、微笑、鼓掌。各校负责人一一向前，向毛主席致意、握手、问候，台下是一片欢乐的海洋。

晚上八时左右，毛主席离开主席台，缓步走上校行政大楼的台阶，再一次向全体师生挥手致意，全场师生员工不约而同地、有节奏地鼓着掌，并唱起了《东方红》，用雄壮嘹亮的掌声和歌声，欢送着毛主席！

一时间，掌声和歌声响彻了武汉大学，响彻了珞珈山！

注：此后学校这一处操场被叫做“九·一二”操场。

（作者系历史系 1955 级校友）



难忘在武大进修的日子

陈震文

—

我于1954年从沈阳师范学院毕业后留校工作。1955年7月上旬，正在北大旁听苏联专家毕达可夫讲学的我接到母校信函，通知我一俟课程结束，马上返校接受新的任务。此前就听说学院正在为我联系到外校进修中国现代文学史的事，当时有两个选择：青岛的山东大学和湖北的武汉大学。我当即选择了后者。武大校风朴实、严谨，那里还有我所熟知和仰慕的一位著名现代文学史专家刘绶松教授。师院领导尊重我的选择，同意我去武大中文系进修，为期三年。我怀着青春梦想，恨不得一下子飞到珞珈山。

1955年9月29日，我终于来到了朝思暮想的珞珈山。走进大门，一眼就可望见如圣殿般矗立在狮子山顶的图书馆，它是武汉大学的一个地标性建筑，气势宏伟，直逼蓝天。秋天的珞珈山，依然美丽动人。行走校园里，目之所及，林木苍翠，鸟语花香，堪比一座浑然天成的大公园。珞珈山让我一见钟情。我来不及欣赏风景，怀着一颗忐忑的心，想早点见见这里的人。中文系办公室一位中年女同志接待了我，对我的到来表示欢迎，这很快解除了我初来乍到的紧张和拘谨。她告诉我：和我学习同一专业并由刘绶松先生指导的，有4名研究生和1名助教。研究生是杜毅伯、赵君圭、黄冠星和辛建领，助教名陆耀东，他们大部分是南方人。听了介绍，我很高兴。本想早点去拜访他们，没想到他们却一起先来看我了。



为我做介绍的是一位高个子、戴眼镜、操湖北口音普通话的大男生，他是武大中文系毕业的，对学校的方方面面都比较熟悉。

我刚到武大时住在学生宿舍，和研究生们的待遇一样，只不过我是住单间。武大的学生宿舍建在珞珈山的山坡上，像梯田一样，由低向高共4排楼，每排4个单元，共16个单元。每个单元的名称不是按数字排列，而是称“斋”。采用的是“千字文”中的前16个字：天、地、玄、黄、宇、宙、洪、荒、日、月、盈、昃、辰、宿、列、张。即“天字斋”“地字斋”等名称。我住在女生宿舍的列字斋，那4名研究生住在洪字斋。从宿舍的命名就不难看出，具有悠久历史的武汉大学，处处彰显着丰厚的文化底蕴和对传统文化的认可与尊重。

二

到武大一切安排就绪后，我就开始了紧张而愉快的学习生活。在这里，我接触最多的是研究生，特别是现代文学的4名研究生，因为导师给我安排的专业学习内容和进度与那4名研究生完全一致。不同的是共同课（现在的公共课）我不参加考试，共同课有中国革命史、哲学和俄文等课程。我主修的现代文学则是由导师列出书目，读作品，写读书报告，导师定期检查指导。进入学习状态之后，每天都是很紧张的，共同课的每门课程，我都按时到讲堂听。当然，更多时间是放在主修课上：读不完的作品，写不完的读书报告，还有导师安排的就社会上发生的某一种文艺现象或某一部作品进行的讨论。大约是1956年的1月，导师为我们指定一本当时社会上已点名批评的书《鲁迅思想的逻辑发展》进行讨论，并让我根据讨论写出第一稿。我鼓足勇气，用两三天时间把文章写出来了。后来刘先生让“高个子男生”在再次讨论后又执笔写了一遍。最后经过三次讨论、修改后作为定稿的，是“高个子男生”执笔的那篇。文章虽然没有被采用，但这对我来说却是一个难得的锻炼机会，这是我的导师在有目的地锻炼我，通过实战演习，让我不断提高。在学生时代，我一直被认为是好学生，学习成绩优秀，但我毕竟只读



到专科，而且又是跳着读的。我很感谢刘先生对我的精心指导和良苦用心。武大中文系是我人生的一个重要加油站，能来到武大我感到自己十分幸运，这里有那么好的读书环境，那么多优秀的“伴读”，还有尽心尽力指导我的刘先生。我由衷地热爱武大，感恩武大。

在武大的日子里，除紧张而愉快的学习外，文娱活动、社会实践活动也是丰富多彩的。娱乐活动最多的当属看露天电影，诸如《列宁在十月》《脖子上的安娜》等，不下几十部。武大当时没有大礼堂，只有一个体育馆，看演出、开大会、舞会、球赛等文体活动，都在体育馆进行，看电影则都在一个小操场。为了能坐着看电影，考进武大的每个新生都会领到一个小板凳。到武大后我第一次看电影是站着看的，“高个子男生”发现后主动送给我一个小板凳。我正疑惑他以后看电影怎么办时，他说他有两个，一个是在武大读大学本科时发的，另一个则是读研究生时发的。他送给我的那个小板凳是崭新的，是他被录取为研究生之后发的。以后每次看电影，我都拿着那个崭新的小板凳。

武大中文系当时共有 10 名研究生，另外 6 名分别是研究古代文学和古代汉语的。我和他们很快也熟识了，彼此之间关系十分融洽。冬季武汉室内特别冷，没有取暖设备，学校照顾我这个来自东北的进修生，特给我配备了一个烧炭取暖的火盆。我充分利用这一“特殊条件”，经常把研究生们请来，用火盆给他们做点好吃的，比如用铝饭盒在火盆上油煎糍粑，把糖块化开加入花生米制作花生糖，等等。

和研究生们在一起，除学习、听报告外，还参加了许多有意义的劳动和社会活动。如和研究生们一道参加美化珞珈山的义务劳动；到汉口第一纺织厂参观；到长江大桥工地参观大桥的建设工程等。给我印象最深的是一次下乡帮助合作社社员劳动的社会实践活动：那是 1956 年的 2 月 5 日，我们一行 10 人乘坐校车经过一个多小时的车程到达了目的地——灯塔第一农业生产合作社。领队苏者聪和合作社的负责人接洽好之后，我们就分成两组开始劳动了。我们的任务是帮社员种菜，共劳动了 5 天。2 月 10 日返校时，社



员们热情地和我们话别，并赠送给我们每人一份糍粑作为礼物。这是我到武汉后才吃到的一种南方美食，类似北方的年糕。

1956年4月，我从“列字斋”搬到了东湖之滨的武大教职工宿舍，研究生同学们都为我高兴。

我喜欢东湖。它是中国最大的城中湖，不仅在武汉的雨水调蓄、生态平衡、淡水养殖等诸多方面发挥着重要功能，更以它勃勃的生机给历史悠久的武汉大学注入了青春活力。从我居住的湖滨宿舍步行出发不到10分钟，就可见到那十分开阔、碧波荡漾的湖面，湖水清澈，水天一色，令人心旷神怡。

搬到湖滨宿舍后，研究生们到我这来得就比较频繁了，特别是晚饭后，他们常来邀我一起到湖边散步。来得最频繁的两位研究生当属陈竹梅和那个“高个子男生”。陈竹梅是我介绍入党的新党员，她常常在周末跑到东湖来找我，有时还捧着一束在上山路上采的野花送我；我则留她在湖滨食堂，吃她最爱的粉蒸肉。武大的食堂，不论是学生食堂还是教工食堂，在我吃过的多个学校食堂里是最好的，物美价廉，鱼类等鲜活水产品多，新鲜蔬菜多，菜品种类也多。在食堂挂着的食谱上，总是琳琅满目一大串。只是我一贯坚持节约的原则，在食堂买饭时，总是只看菜单的最后一款。我在武大食堂吃的次数最多的一道荤菜是鱼杂豆腐，6分钱。粉蒸肉之类，只是在招待陈竹梅或母校来南方出差到武大看我的同事们时才享用。

住湖滨宿舍期间，频繁来宿舍的另一位，就是那位“高个子男生”，有时是邀我到湖边散步，有时是教我游泳，有时则是到我的宿舍看书，我这里相对安静、凉快。我的书架、书桌、抽屉摆放的不够整齐甚至零乱，他爱整洁，看书间歇也帮我整理图书、物品。时间久了，我就有点神经过敏了，这是待字闺中的女孩惯有的思维方式。我不希望他常来，特别是一个人来，而他的特点正是特立独行。我开始逃避了。当发现他从山下向我的宿舍走来时，就跑到和我住同一楼层的好友的房间躲起来，我希望他和其他研究生一样，和我保持单纯的同学关系，我在进修期间不谈个人问题。这以后，“高个子男生”就再没来过我在湖滨的宿舍了。我发现他也是个很



敏感且自尊心极强的人，以后的友好相处表明他并没有怪我，我很感激他。

后来我发现，“高个子男生”乃是刘先生在他的4名研究生中最看好的一个，他很勤奋、用功，基础知识比较扎实，文章也写得好。刘先生家住在有名的教授住宅“十八栋”，离我们宿舍较远，有什么事要通知我们，总是先找“高个子男生”，然后由他转告我们。我在珞珈山上生活学习近一年的时间里，得到过“高个子男生”的许多帮助，事无巨细，但我却从未邀请他出去玩过，也未邀他到教工食堂吃过饭或表达过谢意，想起不免有些愧疚。

“共产党员”成了我在中文系的一张亮丽名片。1950年代，党在群众中的威信达到了至高点。追求进步的青年学子们，把加入党组织当成了自己的理想和奋斗目标。到武大不久，中文系的领导、教师、研究生们，就把我看成是武大的一员了，我也不再把自己当外人，彼此之间关系特别亲密和融洽。党组织尤其关心我，分配了我一些工作，特别是党建工作。武大作为历史悠久的名校，很重视学术研究和人才的培养，造就了许多卓有成就的尖端人才；同时政治气氛也十分浓厚，对此我有很深的感触。中文系的党员不多，研究生中竟没有一个党员，但要求进步、要求入党的却大有人在。支部经常开会研究入党积极分子的状况，要求入党的人也经常找党员谈话，所以我也成了大忙人，一年内，我做了两名同志的入党介绍人，他们是我的导师刘绶松先生和陈竹梅。

中文系不仅年轻同志政治热情饱满，靠近组织，要求入党，就是一些老先生也积极，要求进步。1956年3月间，中文系党支部召开了一次发展新党员的大会，除了年轻的积极分子外，也邀请了刘博老（刘赧）、程千帆等一部分老先生参加。这些老先生都很高兴，认为这是党对他们的关怀和帮助。他们都在会上做了积极、中肯的发言，表达了自己对党的热爱，希望不断得到党的帮助。我听了很受感动，和老先生们的距离一下子拉近了。

在武大进修期间，我的另一重身份是进修教师，所以中文系教师的一些会议和活动都邀请我参加。我特别喜欢参加中文系教师的座谈会，那是我长见识、开眼界的好机会。每次开会，我所仰慕的



老先生们如刘博老、袁昌英、程千帆、刘绶松等都悉数到场。这些专家学者平易、谦和、幽默、风趣，特别有亲和力。给我留下印象最深的当属程千帆先生，他是一位风度翩翩的儒雅学者。在座谈会上，他滔滔不绝、口若悬河的发言最受欢迎，会场的气氛特别活跃、热烈。有一次，我正聚精会神地听他发言时，他却在高潮处戛然而止，我正望着他等候他继续讲下去时，先生却端起自带的小茶壶喝起了茶，并配以蛋糕。我在心中暗笑，觉得率性而为、不拘小节的程先生太有意思了。他的一位博士生在回忆往事时曾评价说：“程先生不是一位埋头于故纸堆中两耳不闻窗外事的学究，他对家事、国事、天下事都很关心，热爱新社会，追求进步。”对这一点我也深有感受。我在中文系参加支部发展党员的某些会议时，就发现有程先生参加。当时能够被邀请参会的老先生，都是靠近党、追求进步的党的朋友。程先生每次到会都很高兴并积极发言，表现出自己对党、对新社会的由衷之爱。万万没料到的是，在一年后的那场针对知识分子的“反右派”斗争中，生性耿直的他竟中了引蛇出洞的“阳谋”之计，一夜之间成了武汉大学的“右派司令”。此后，程先生便被剥夺了教书和搞科研的权利。8年后的1975年，程先生总算被摘掉“右派”帽子，出乎意料的是他却被“自愿退休，安度晚年”，变成了每月拿49元退休金的街道居民。所幸的是，粉碎“四人帮”后，他被推荐到了南京大学，并被重视人才的匡亚明校长所重用，迎来了自己生命和教学、科研的第二春，攀上了学术事业的巅峰。

三

到武大不久，就听说中文系教授中有“五老”，这个“老”字不仅是因为年龄大，还由于他们学养深厚，受人尊敬。而这“五老”中，就有两位（刘博平、刘永济）是国家一级教授，这让我很神往，却一直无缘见面。到武大三个月后，机会终于来了。那是1956年1月18日下午，中文系召开全系教师大会，欢送刘博老去北京参加全国政协会议并祝贺刘绶松先生被评为武汉市劳模。我也应邀



出席，这是难得的和大学者见面讨教的好机会，我聚精会神地等待着。不一会儿，一位身着一袭长袍的老先生在一年轻教师的搀扶下走了进来，早到的先生们赶忙起立让座，有人告诉我那就是刘博老。我拉紧的神经开始松弛下来：原来这就是“高个子男生”曾向我介绍过的，他所崇敬的著述宏富的，长期在高校讲授文字学、声韵、训诂、毛诗、周易等多门课程，又善于书法和篆刻的全国知名的老教授。据说他的全部著作都由自己用毛笔写成，笔触苍劲，自成一家，被郭沫若称之为“珍品”，崇敬之情油然而生。

再一次近距离地接触刘博老是 1956 年春节，研究生们相约去他家拜年。博老家的陈设一如他的衣着一样，简朴、整洁，给人亲切温馨之感。博老很健谈，兴致勃勃地跟我们谈起他在北京参加政协会议的见闻，言语中充溢着对新社会、对共产党的热爱和感激之情。

谈话间，刘博老特别关心地问到我这个来自东北的姑娘的一些情况，如对武汉这个新环境是否适应等。研究生们七嘴八舌地为我做介绍。刘博老对我春节、寒假都留在学校，显得特别感动，说了许多勉励的话。临别时，还特别对我说欢迎我有时间常到他家去。我被博老慈父般的关爱之情所深深打动，为有机会结识这样的学界鸿儒感到幸运，不久我竟鼓起勇气，在“高个子男生”的陪伴下，再一次到博老家造访。这次不是一般的做客，而是有求而来——即不揣冒昧地请他给我早已准备好的一方玉石刻一枚印章。当时的印章用处很多，人人必备。我已有了木质圆形的印章一枚，领工资、到邮局取款、写材料和题写留言，等等，除了签名外，还要盖上印章。我深知时间对于博老来说是何等宝贵，可当我忐忑不安地提出这一要求后，刘博老当即慨然应允。几天后，我便得到了一方镌刻精美的玉石印章，真是大喜过望。这枚带着刘博老手温的印章，成了我的手心之宝和少有的珍藏品，它蕴藏着无限的温馨和感动，陪伴我走过了整整 60 载的漫漫人生路，直到今天。



四

我的导师刘绶松先生，是新中国成立后武大首次招收研究生的导师之一。与刘先生初次见面，就给我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先生为人热情爽朗，正直乐观，工作兢兢业业，认真负责，指导我们学习非常尽职。他对我这个进修生，和他所指导的研究生同等对待，开列出我们必读的书目，引领我们制定学习计划，让我们定期写读书报告，并汇报学习计划完成情况。

1955年11月21日，我第一次到先生家汇报学习情况。先生仔细听完以后，有针对性地提出了几点意见：1、读书要精，要认真读懂，忌讳走马观花、一知半解式的学习；2、要学会搜集资料，要做读书笔记和记卡片，以备使用时查阅方便。为了尽快提高我的阅读和写作能力，刘先生经常让我参加4名研究生的学习汇报会和讨论会，使我受益匪浅。在指导我们学习的时间上，先生常常向我倾斜，指导我的次数和时间更多一些，因为我的基础、自学能力和写作水平，与研究生们有不小的差距。刘先生不仅极为耐心地指导我的学习，也十分关心我的生活。为了改善我的伙食，差不多每次到他家汇报学习情况后都要留我吃饭，由师母亲自主厨烹饪美食。考虑到北方人喜欢吃饺子，师母还不止一次专为我做水饺。有时晚饭后天色晚了，刘先生则和师母一起走很长的山路，把我送到湖滨教工宿舍，使我感受到亲人般的关怀和温暖。我在武大吃到的美食，都是在导师家师母给做的。这种真诚的关爱之情，大大消解了我这个远方游子的乡愁，每一想起心中便涌起对先生和师母的无限感念。

1956年教育部决定抽调一批著名的专家、学者到北京统编全国高校的文科教材。刘先生将带他的4名研究生和1名助教前往。至于我去北京与否，要由沈阳师范学院来决定。5月29日我接到学院的来信告之我不能去北京，须立即返校。得之这一“不幸”的消息，我心急如焚，不知如何是好。先生安慰我不要着急，让我马上给学校写信，提出自己的正当要求。我立即给院、系的几位领导



同志写了求助信，恳请学校同意我跟导师一起去北京，把3年的进修任务按预定计划完成。很快就收到了汪迟书记的回信，告诉我学校已同意我跟随导师去北京继续学习，并勉励我学成之后回母校工作，为母校做贡献。一块压在心头的石头落地了。我感谢沈师院领导对我的关心和栽培，也感谢导师刘先生对我的鼎力支持。

1956年的金秋时节，我如愿以偿地和4名研究生及1名助教随同刘先生来到北京，住在中国科学院（今属中国社科院）文学研究所。这时我的学习内容有了很大的变化，共同课全部结束，专攻现代文学，学习内容更集中了。刘先生对我的指导一如既往，让我做出学习计划，按照他开列的作家作品读书，写读书报告，经他认真审阅后，提出指导意见。

到京后，刘先生的活动范围扩大了，有时被请去做学术报告，还不时与文艺界的故交、特别是北大等高校关系密切的同窗、朋友小聚。刘先生也常带着我，把我介绍给他们，这不仅让我见了世面，同时也提供了我向专家、学者学习的好机会。

刘先生是我在武汉和北京接触到的专家教授中最迫切要求进步、也是政治热情最高的一位。1955年他被评为武汉市劳动模范，1956年4月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从此，刘先生更是以共产党员的标准严格要求自己，他是组织观念极强的一位新党员。1956年，他的60万字的著作《中国新文学史初稿》由作家出版社出版。得到稿酬后，他当即从中拿出2000元交了党费。我当时的月工资为56元，刘先生一次交的党费，差不多是我三年的工资。通过这件事，也可看出刘先生的慷慨大气和很强的组织观念。

刘先生对我的关心和爱护是全方位的，甚至在我的婚姻大事上，也给予了极大关心，起到了很大的促进作用。在北京时，他曾特别叮嘱那个“高个子男生”不要与我“失之交臂”。1957年春天，在黑龙江省农业厅任职的哥哥到北京参观苏联展览馆，顺便到中关村的文学研究所看我。刘先生听说后十分高兴，要求和我哥哥见面。两人一见如故，交谈十分投机。刘先生尽地主之谊，请我哥哥吃了一顿饭，还留他在文研所研究生寝室住了一宿。刘先生的安排用心良苦，哥哥对我的个人大事很上心，他仔细观察了“高个子男



生”的言谈举止，竟喜欢上了他。接下来哥哥和我做了一次长谈，转达了刘先生对“高个子男生”的极好评价：根底扎实，学习勤奋，人也老实厚道，是他4名研究生中最优秀的，在读本科时就是排在前几名的好学生。哥哥反问我：“这么好的条件，你还挑什么呢？”我一时语塞。哥哥又换一种问法：“你对他不够满意的地方是什么？”我简单地回答了一句：“他只是个团员，不是党员！”哥哥笑了，说：“你当年不也是先入团后入党的吗？年轻人只要努力，这不是问题。我看这是一桩好亲事。”哥哥在我心目中的地位至高无上，既然他首肯了，我也就不再犹豫了。就这样，在导师的极力关照和促进下，经由哥哥拍板，那个在我身边转悠了很久的“高个子男生”杜毅伯就属于我了。这也是我在武大进修的重要收获之一。

我无论如何也没有想到的是，在10年之后的“文化大革命”的黑色风暴中，我们所热爱和尊敬的导师刘先生竟在经历了残酷的斗争和迫害之后，和师母同时双双自缢身亡，给我们留下了不尽的痛苦和永恒的思念！

五

我与被称为“武大三才女”的苏者聪1955年在珞珈山相识，成为挚友。我们的情谊从未中断过，而且似多年陈酿，历久弥香。她是我所熟悉的女性友人中出类拔萃的一位。

者聪天资聪颖，勤奋好学，1956年从武大中文系毕业后留校执教，在这所具有百年历史和浓厚学术氛围的名校中，她的才能得到充分施展，除担任繁重的古典文学教学任务外，在中国古代女性文学、特别是唐宋女性文学的研究上也卓有成就，硕果累累，显示了她非凡的学识，成为这一研究领域的领军人物。她出版的著作有《中国历代妇女作品选》《宋代女性文学》等多种，发表论文100余篇，诗词300余首。1991年出版的《闺帏的探视——唐代女诗人》在学界获得了很高的评价，港台媒体也纷纷报道，称此书是海内外第一部研究唐代女诗人的专著，填补了中国文学史研究上的一个空白。1993年6月，者聪应耶鲁大学东亚系系主任孙康宜教授的邀



请飞赴美国，参加中国明清妇女文学研讨会，并在大会上做了精彩的演讲，获得与会者的一致好评。研讨会一结束，者聪就迅速离开会场直奔机场回国。我听到这一消息不禁目瞪口呆，不知说什么好，从中国的武汉飞到美国的位于纽约和波士顿之间的纽黑文市的耶鲁大学，旅途劳顿未消就走进会场，加上会议紧凑的日程安排，对精神与体力的消耗是很大的，而者聪当时已年过花甲，就这么来去匆匆，竟未稍事休息或顺便游览就踏上归途，这就是专心、忘我而又低调的学者苏者聪。

我已记不太清和者聪是怎样相识的。1955年9月我到武大进修报到时，她还是大四的一名学生。在我的记忆中保留得最早、最清晰的印象，是应邀参加她和何国瑞的婚礼。时间是1956年7月14日，正值武汉的盛夏，当时我俩其实已经是很熟悉的朋友了。为祝贺她的新婚，我还送了她一份薄礼：一对当时很流行的针织缕花枕套。我还记得她的另一位要好的乔姓女友，送她的礼品是一床白绸子被面。而这两样礼物，当天就出现在她的婚床上，可见者聪对友情的珍惜。我对者聪的婚礼记忆深刻：婚礼虽十分简朴，但气氛极为热烈、欢快。让我惊奇和意外的是，主婚人竟是我的导师、也是两位新人的老师刘绶松先生。

1956年者聪毕业后留校执教期间，担任过党支部书记，她曾带中文系研究生和我下乡参加社会实践，任队长。在劳动中，她很能吃苦，事事带头，又很会照顾大家，给我们留下了很好的印象。随着时间的推移，我们之间的接触和了解增多，友谊也日益深厚。她对远离家乡的我关怀备至，假期回老家长沙，也不忘给我带一瓶苏妈妈腌渍的美味可口的辣萝卜。者聪虽然只比我大1岁，但她的成熟稳重和干练却是我所不及的。她在公众眼里最突出的特点是淡泊名利，刚直不阿，抵制歪风，弘扬正气。这也正是作为一名老党员的她的高尚品格。

和者聪真正相处只有短短几个月的时间，我就随导师刘先生离开武大，去了北京。在北京期间，我们仍保持着联系，常常互通信息，交流情况，彼此关注。1958年秋天，我又回到武大，等待毅伯研究生毕业分配的消息。一天，我去探望者聪，刚走到她家楼梯



口，巧遇苏妈妈，她立即惊喜地朝楼上大喊：“者聪，你的好朋友来了！”离别两年，老人家不仅记得我，而且反应还那么迅捷，让我欣喜异常，十分温暖，我至今仍怀念这位善良、热情、有爱心的老人。

者聪的成功，不仅表现在事业上，还表现在她拥有一桩幸福美满的婚姻。她和夫君何国瑞志同道合，共同追求进步，同一天入党，大学毕业即喜结连理。婚后尽管生活清苦，但两人相依相守，艰苦奋斗，在各自的专业领域均取得了骄人的成绩，退休后过着幸福宁静的晚年生活。过去的几十年间，我和者聪除书信来往外，她还给我书赠过情深意切的诗词，因我不谙此道，从未敢贸然唱和，深感歉疚。

六

1955年的除夕之夜，我参加了中文系的一个小型茶话会。在座的年轻人都是各个专业的研究生，他们边品茗边畅谈自己的理想，气氛热烈。1956年元旦，全校教职工举行盛大的团拜会，在鞭炮声中，李达校长为新建的俱乐部剪彩。之后，中文系的教职员又举行了新年茶话会。会上不少教授即兴发言，其间还穿插表演了文艺节目，给我留下了深刻印象的是语言教研室的李格非教授清唱的京剧选段，声音高亢、洪亮，得到了大家的热烈喝彩。会后，我和4名研究生应邀到导师家吃饺子，这肯定是刘先生和师母为了照顾我这个北方人过年吃饺子的习俗。

2月12日是大年初一，上午中文系举行春节联欢会。首先由工会主席李健章教授致祝词；之后，由从北京出席政协会议归来的刘博老报告会议的见闻；接着，刘绶松教授谈了他以市劳动模范身份参加武汉市慰问团的见闻和观感；我也在支部书记许文庆的推荐下，谈了下乡与社员一起参加劳动的几点体会。

午后，研究生们又齐集在“列字斋”我的单人宿舍，吃喝玩乐了一下午才散去。我是一个随和并喜欢让别人快乐的人，我自己虽然很节俭，但招待朋友，总是倾其所有。年轻人聚在一起，快乐无



比。我的单身宿舍，成了大家的活动中心，我在他们的快乐中也得到了快乐。我虽然远离家乡，但 1956 年的新年和春节，过得仍然充实、欢快。

1955 年的金秋季节，我怀着兴奋、好奇而又有些胆怯的心情，来到名校武汉大学。在珞珈山优美的自然环境和浓厚的学术氛围中，愉快而紧张地学习，增加了知识，开阔了眼界，结交了许多好友。三月的樱花，夏日的荷花，九月的桂花和冬季的腊梅花芳香，永远散发在我的心里，流淌在我的血液。珞珈山上留下了我青春的足迹，留下了我欢乐的笑声，也留下了我不尽的思念。我十分怀念在珞珈山上度过的这一段美好时光。我多么希望在有生之年还能有机会重返珞珈，再次与它亲近，重温旧梦！

（作者系中文系 1955 级进修生）



刘双平珞珈忆旧：与东湖为伴的 14 载青葱岁月

郭 瑶 胡 华

“珞珈山上的香樟树，凌波门外的东湖水，宋卿体育馆的琉璃瓦，老斋舍的青藤叶，樱花大道飘散的花瓣……”刘双平说，每每回到武大的时候，他对这里的空气都是那么熟悉。

刘双平，这位从武汉大学哲学系走出去的国内知名文化产业专家、幽默研究专家，现任本山传媒集团艺术总监，曾在珞珈山下与东湖为伴，度过了 14 载难忘的青葱岁月，结下了深深的武大情结。

学生时代获“李达哲学奖”

1982 年 9 月，刘双平和来自全国各地的 45 名同学，汇聚武昌珞珈山麓、东湖之滨的武汉大学，进入哲学系学习，自此与哲学结下不解之缘。

据刘双平回忆，当时的辅导员孙志军老师，是哲学系 1978 级高材生，他说，哲学是给人智慧、让人聪明的学问。他还介绍，武大哲学系是由李达老校长亲手创办起来的，李达老校长是党的“一大”代表，是新中国哲学界的泰斗。

辅导员老师的话，让原本对哲学普遍缺乏了解的刘双平和同学们，个个热血沸腾，都觉得能考上武大哲学系，实在是太幸运了。

在刘双平看来，20 世纪 80 年代是一个充满理想主义的年代，每天的太阳都是新的，有诗歌无市侩，有担当不犬儒。大学三年级，刘双平在选修了周运清教授讲授的社会学课程之后，对社会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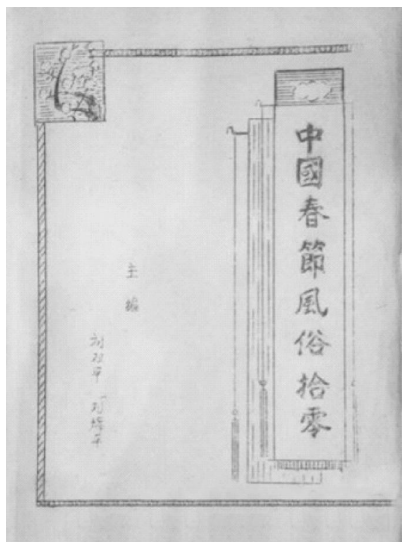
1989年7月，刘双平在武大校园

产生了浓厚兴趣。在周老师指导下，他和同班同学刘辉平积极响应刘道玉校长“鼓励创新、鼓励学生开展业余科研”的号召，专题研究中国婚姻风俗，并于1985年暑期到少数民族集中的云南实地调研。

“我俩从武汉坐绿皮火车到昆明，两天两夜，车上人满为患，只能站在异常拥挤的过道上。深夜我俩实在太困，钻到座席下面铺上报纸就睡，尽管四围全是臭脚丫子，但很快就睡着了。”刘双平回忆起那趟云南之旅至今难忘。他觉得那时的大学生活，清贫却至纯，简单却激情洋溢！

他俩回校后，很快便将考察调研成果进行了整理，编撰了《中国春节风俗拾零》《中国婚姻风俗》，并因此荣获哲学系学生最高奖——“李达哲学奖”。

勤思敏学，敢于创新。大学时代的刘双平就开始紧跟时代，关注社会，开展独立思考。1988年，针对学术著作出版困难的现状，刘双平参加了《光明日报》举办的征文比赛活动，他的作品《设立国家出版基金，资助学术专著出版》荣获优秀征文奖，他的建议也在



刘双平、刘辉平共同编撰的《中国春节风俗拾零》

一定程度上受到有关部门的重视。国家出版基金于 2007 年设立，专门用来资助出版具有文化传承与积淀价值的图书。

刚毕业的大学生成了年轻的校长秘书

1986 年 7 月，刘双平从武大哲学系顺利毕业了。那时的大学是“天之骄子”，毕业生的工作分配基本上由国家“包办”，每到毕业季，来校要人的单位十几倍甚至几十倍超过生源数。

按实力排名，刘双平属班上前几名。作为全班为数不多的几名党员之一，加之荣获过“李达哲学奖”，刘双平对自己的分配情况比较乐观。

某天下午，系里管分配的领导熊建生老师找刘双平谈话。他说，刘道玉校长要找一位秘书，校办主任说哲学系学生素质高，要系里推荐，他想推荐刘双平去，想听听他自己的意见。一听说要留校到刘校长身边工作，刘双平二话没说就满口答应了。



在 20 世纪 80 年代的中国高等教育界，刘道玉校长可谓大名鼎鼎，在刘双平这些武大学子的心中，“刘道玉”三个字是英雄的代名词。

刘双平正式到校长办公室上班的第一项工作，是管理“红头文件”。这项在别人看来枯燥乏味的工作，他却干得津津有味。通过“红头文件”，他不仅能及时了解国家的大政方针和学校各项工作进展，还明白了行政系统的运作模式。并且，通过学习刘道玉校长及其他校领导对文件的批示和对公文稿的修改，他的政策水平及文字功底大大提高。

那时的武大被誉为“高校里的深圳”，不管是教师、学生还是机关干部，思想都极为活跃，以追求“创新”为时尚。学校里常有各种各样的名人讲座，听讲座的学生很多，常常见到挤爆教室的场景。

在这样的环境里，不甘平庸、有梦想、有精神抱负的刘双平如鱼得水。

1986 年 9 月，刘双平获悉围棋“国手”聂卫平坐船从重庆到武汉，马上有了请他来武大做一次讲座的想法。

那时的聂卫平如日中天，在中日围棋擂台赛中屡获奇胜，为国争光，已成为国人特别是年轻人心中的传奇英雄。如果能够把“聂棋圣”请来给全校学生做一次讲座，一定会大受欢迎。

但要邀请到他，必须以刘校长的名义才有可能。刘双平忐忑不安地把这个想法向刘校长汇报，还没听完，刘校长就说“赶快以我的名义去找省体委”。刘双平据此找湖北省体委出面协调，很快就落实了这事。这是他参加工作后操办的第一件有成就感的事。那天聂卫平在陈祖德九段的陪同下来武大做了一次精彩的演讲，能容纳两万人的小操场人山人海，场面之火爆至今仍让刘双平难以忘怀。

“回忆这些激动人心的场景，真让人热血沸腾。”刘双平对武大的讲座“情结”很深。1990 年代末他又陪同外交部发言人沈国放归母校做过国际形势报告，同样是小操场，同样是人山人海，让人难忘。



破格任鄂西支教讲师分团团长

到了1987年夏天，刘双平留校工作即将满一年。当时正值中央和地方省(市、区)为经济欠发达地区派支教讲师团。湖北省指派由武大牵头，6家省直单位和高校抽调青年骨干组建鄂西分团，到鄂西支教一年，分团团长由武大委派。用人不拘一格的刘道玉校长把这个机会给了还未转正的刘双平。

有一天，校办牛太臣主任突然找他谈话：“刘校长决定派你去担任讲师团团长，到湖北的鄂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后改名恩施土家族苗族自治州)锻炼一年。”刘双平毫无思想准备，一脸的迷惑，牛主任便将他带到刘校长的办公室。

刘校长对此事很重视，他让两人坐下来谈。他说：“对于身边的人才，不同的领导有不同的做法。有的领导总是把自己喜欢的人留在身边，舍不得放出去；有的领导则爱把自己喜欢的人放出去锻炼后再抽回。我属后者，准备把你派出去锻炼。”

刘双平记不清自己当时说了什么，只记得牛主任说：“小刘工作未满一年还没转正啊！”刘校长皱着眉头说：“马上转正啊！”牛主任又说：“省里要求团长是副科级以上干部。”刘校长立刻说：“马上给小刘提一个副科长啊！”就这样，刘双平成了校办的一名副科长，又转身成了“湖北省87届支教讲师团鄂西分团团长”。

讲师团团长这一特殊岗位让刘双平脱胎换骨地“早熟”了。20多人组成的年轻队伍，分成5个支队，分布在恩施、来凤、咸丰、宣恩、建始5个市县支教，大事小事都得团长去张罗。他经常坐长途大巴颠簸在险峻狭窄的盘山路上，奔波五地检查指导工作，每天神经都绷得紧紧的。

恩施地处武陵山腹地，当时条件十分艰苦，没有互联网，也没有手机，工作外的生活非常单调。到恩施后不久，经武大同事介绍，《湖北日报》驻鄂西记者站的记者赵洪松成为他在恩施的第一个朋友。赵洪松比他早一年大学毕业，毕业后下派到恩施锻炼。他俩属恩施为数不多的年轻“下派干部”，两人共同语言多，常见面



1988年6月，鄂西自治州领导与刘双平（前排左五）及讲师团全体成员合影

聊天。

没过几天，赵洪松就带刘双平认识了好友——《鄂西报》记者向东。向东是土生土长的鄂西人，跟单纯的赵洪松相比，向东可算少年老成。尽管赵洪松比向东年长一岁，但有时赵更像一个小弟。

刘双平说，当时最大的享受，就是约上赵洪松去向东在《鄂西报》的单身宿舍聚会。三人聚在一起，棋艺水平差不多，总爱大摆三方围棋“擂台赛”，三人轮番上台对弈。车轮大战杀得天昏地暗之后，他们总会大啖一顿绿色美味的火腿炖土豆，喝几杯鄂西产的“遍山大曲”（因由漫山遍野的苞谷酿成而得名），谈古论今，畅谈人生和理想。

刘双平回忆说，阳光、率真的赵洪松既没酒量也没酒瘾，但就是架不住他和向东的劝酒。每当他和向东觉得酒足饭饱谈兴已尽时，就花三五分钟劝赵洪松喝几杯酒。两杯“遍山大曲”下肚，赵洪松很快就醉倒了。这时，他和向东总有几分自责，都觉得下次不能再“整”赵洪松了。但只要一聚会，酒酣耳热中他和向东眼神一



对，就会不自觉地一唱一和地开始劝酒，赵洪松一定又会毫不设防地端起酒杯。“洪松醉酒”常常成为他们三人聚会的“收官”环节。

时间飞逝，一年的讲师团生活一晃就结束了，刘双平于1988年夏天依依不舍地告别山城恩施后回到了武汉大学。两位好兄弟后来也因他与武大结缘，向东考上了武大的插班生，赵洪松考上了武大的研究生。

筹办在京召开李达校长诞辰100周年座谈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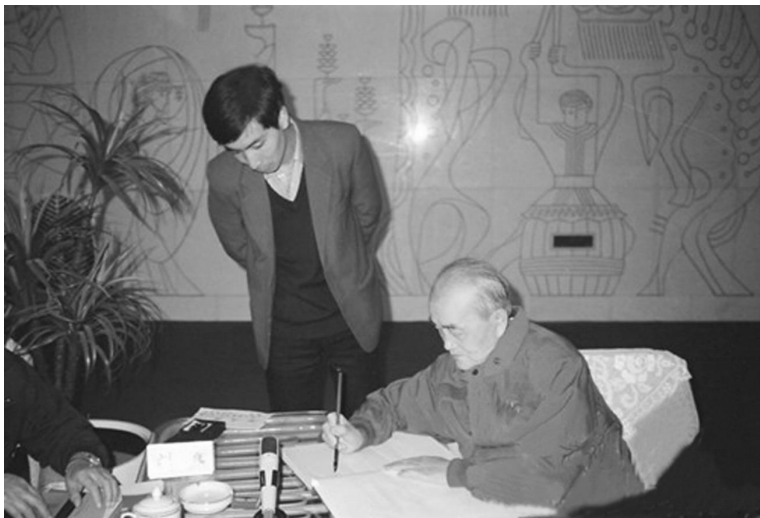
1988年武大校领导班子换届，著名哲学家、刘双平大学期间的哲学系主任陶德麟教授担任了常务副校长。刘双平开始跟随陶校长工作多年。

1990年是武大老校长李达诞辰100周年。武大积极策划，希望能举办一次纪念李达诞辰100周年的座谈会。

座谈会在北京还是武大召开？当然是在北京召开合适，但却碰到不少障碍。负责前期筹备工作的刘双平及校办两位同事按陶校长的安排，多次跑北京协调，并有幸向时任中央党史工作领导小组组长的邓力群同志汇报，邓力群同志当面批示同意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办纪念座谈会。

在确定了会议召开的地点后，陶校长又亲自向时任中国社会科学院院长、中央党史研究室主任胡绳同志汇报，得到了胡绳同志的大力支持。于是，“纪念李达同志诞辰100周年座谈会”由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央党史研究室、北京师范大学、湖南大学、武汉大学共同发起，由武汉大学承办，于1990年12月27日在人民大会堂成功举行。胡乔木、胡绳、张友渔、任继愈、汝信等重量级人物济济一堂，时任中央党史工作领导小组组长的胡乔木同志作了重要讲话。

胡乔木在讲话中对李达作出了高度评价：“李达同志是我们党杰出的马克思主义宣传家、教育家、理论家、著作家，他是多方面的学者。李达同志是中国共产党的发起人之一，也是我们党早期的领导人之一。李达同志从他接受马克思主义思想开始，为宣传马克



1990年10月，刘双平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参加纪念李达诞辰100周年座谈会时与胡乔木合影

思主义的真理奋斗到最后一息。我想，在我们党近70年的历史上，还很少有像李达同志这样勤奋，这样有丰富卓越的成就，这样在任何困难危险的环境下生命不息、战斗不止的马克思主义宣传家、教育家，这样坚定勇敢而不断追求进步、力求达到当代最高水平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战士。我国马克思主义理论界完全为有李达同志这样一位自十月革命和五四运动以来，投入全部身心为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而奋斗，数十年如一日的先驱和榜样而自豪！”

刘双平立刻意识到了这一讲话的重要性，回校后便根据录音整理出了记录稿，收入到他后来编著的《漫话武大》中。胡乔木同志的这篇讲话后来成为理论界公认的对李达同志最准确的评价。

多了个“武大校史专家”头衔

早在1983年武大校庆时，海内外校友就提出建议，要组织专家对校史源头进行再研究和再考证，认为武汉大学源头应该是



1893 年湖广总督张之洞创办的自强学堂。

1993 年武大校庆时，经过专家充分论证，确定为百年校庆。刘双平配合陶校长参与了这一重要论证工作的全部过程。

1993 年校庆前，在当时国家教委直接指导下，就武大校史溯源问题进行了审慎考证。学校首先邀请湖北省从事高等教育研究的 15 位专家进行了论证，得到一致认可。

接着，学校又邀请在全国高教界很有影响的专家（国家教委指定的 5 位、学校特别延请了 3 位）进行了更深入的论证。除一位专家在基本认同的前提下提出希望学校继续查找第一手资料，使论证工作更为严谨外，其余专家都完全同意前期的论证意见，认为“武汉大学的校史应从 1893 年湖北自强学堂开办之时算起”的结论是成立的。

多年后，提起这件事，刘双平说，陶校长对武大校史的考评和定性发挥了关键性的作用。

随后，筹备“百年大庆”成了学校的一项重点工作。除了参加“百年大庆”的筹备工作外，刘双平还准备送母校一份校庆礼物，那就是配合校庆活动编写一本通俗版的校史——《漫话武大》。



1993 年 10 月，刘双平编著的《漫话武大》



陶德麟教授当时已经担任武大校长，这一想法得到了陶校长的支持。于是，刘双平白天上班，晚上下班后就埋头撰写《漫话武大》。在半年多的时间内，几乎每晚挑灯夜战到半夜，顺利完成了二十多万字的书稿。书稿完成后，曾任中顾委常委的武大杰出校友伍修权将军应邀作序。

《漫话武大》把武大百年历史上大家感兴趣的很多轶闻趣事作了系统的整理，后来被广泛引用。该书在武大百年校庆前由武汉大学出版社出版，受到了师生和校友的广泛欢迎。

刘双平也因这两件事又多了一个“武大校史专家”的头衔。

完成了可载入武大史册的两件大事

热闹的百年校庆活动结束后，学校又恢复了往日的安静。刘双平不太习惯学校周期性极强的相对安静的生活，总想琢磨点更有意义的事。

时任校长陶德麟教授评价说，刘双平既聪明又实在，既会读书又会写作，既有长远眼光又会办实事。他不仅能出色完成领导交给的任务，还能主动办好领导没有想到而学校很需要办的事。

刘双平回忆说：“太大的事驾驭不了，太小的事又难引起激情，我琢磨良久，终于找到了一件适合做的事，那就是收回东湖边被部队占用了几十年的武大三亩多土地。”

这块土地位于武大东湖游泳池边，当年用作毛主席下榻武汉东湖宾馆时的警戒岗用地。警卫任务结束后，因各种特殊原因部队却驻扎下来了。

为协调此事，刘双平多次往返北京向相关部门汇报，商量解决办法。在校友伍修权将军等的帮助和部队的积极配合下，1995年5月，学校成功地收回了这三亩多宝地。为此，武大专门发文通报嘉奖刘双平。后来，武大又陆续收回了100余亩土地，成为宝贵的教学发展用地。

同样是这一年，刘双平借鉴去清华大学考察学习的经验，成功运作成立了武汉大学校友基金会（现更名为武汉大学教育发展基金



会)。20 多年来，该基金会接受来自校友、海内外公益机构、社会爱心企业和个人的各类捐赠资金十余亿元，在支持学校的人才培养、教学科研、基础设施建设等方面的作用越来越明显，影响也越来越大。



2010 年 10 月，刘双平与陶德麟夫妇在武大合影

2010 年 10 月，回母校参加陶德麟教授 80 华诞学术研讨会的刘双平，会同几位哲学系校友捐款设立武汉大学陶德麟哲学基金，致力于推动武大哲学教学与研究。

这两件大事，都在武大的改革和发展过程中发挥着重要作用。

后记：1996 年，是刘双平毕业留校工作的整整第 10 个年头，当年哲学系初出茅庐的校长秘书，已变成了能谋大事、严谨内敛、乐观向上的校长办公室负责人。而这年夏天，刘双平选择了赴北京工作。不知道刘双平今后的路上会遇到怎样的风景，然而武大留给他的，无疑是最珍贵的精神财富。武汉大学哲学学院党委副书记龚文德博士评价好友刘双平时说：“他是一位智者、仁者、勇者，总是在快乐的工作和生活中不断地超越自我！”

（稿件来源：荆楚网 2016-08-30）



“珞珈三女杰”之苏雪林

怀 俊

苏雪林，“五四”新文学时期女作家，武汉大学文学院教授，20 世纪二三十年代与冰心齐誉为“冰雪聪明”。她有半个世纪教龄，80 年创作生涯，出版著作 50 余部，洋洋洒洒十余万言，是集作家、学者于一身的伟大女性。在国立武汉大学任教期间，和袁昌英、凌叔华并称“珞珈三女杰”。

一、黄山才女

苏雪林(1896 年 4 月 10 日—1999 年 4 月 21 日)，原名苏梅，字雪林。原籍安徽省黄山市太平湖(永丰乡)岭下苏家村。光绪廿二(丙申)年二月廿四日(1896 年 4 月 10 日)出生于浙江省瑞安县，旧时江南一带多以“奴”名女儿身，她乳名“瑞奴”便缘于此。家中长辈唤她“小妹”，稍大称“小梅”，上学时取为学名。考取北京女子高师时，称“苏梅”。1925 年留法归国后，以字为名，“苏雪林”沿用至今。17 岁开始写作，以后陆续发表文章，所用笔名有绿漪、杜若、杜芳、灵芬、天婴、野隼、老梅等，其中“绿漪”因处女作《绿天》成名。



民国二十二年在武汉大学

苏雪林天生男性性，调皮淘气，爱与



男孩儿一起玩耍，与叔叔、哥哥们一同骑“马”挂刀，神气十足，乐而无忧。当小叔叔、哥哥们要上学读书时，她也吵闹着要上学，直到家里大人答应让她到祖父县署所设私塾里读书为止。苏“小妹”特别珍惜这来之不易的学习机会，用心跟着先生朗读、背诵蒙学经典书籍，从《三字经》《千字文》《女四书》与《幼学琼林》始，书里所说内容大多不懂，只有《幼学琼林》里的典故引起她的兴趣，她从中除认识一些汉字外，还获得不少国学知识。

“教不言，师之惰”

十一二岁时，祖父便叫雪林和堂妹爱兰跟随本家一位老学究学习古诗。这老先生论辈份是雪林族祖，虽说也进过学，学问却很有限，遇有疑难字也不翻字典，随便猜定一个读音，或仅读半边，把虫豸(zhì)的“豸”读成“兽”，寒风凛冽的“凛”读成“稟”。雪林后来回忆说，因为这，“自己也装了一肚皮别字，直到当了国文教师才逐渐矫正”。^①老先生教她们《唐诗三百首》时，从“五言绝句”读背起，再继以“七言绝句”；然后转来读“五言乐府”“七言古风”。先生说律诗结构谨严，留待以后再读，后来却一首也未曾读到。然而苏雪林却从此喜欢上了古诗词，竟大着胆子请先生讲解所读诗意，但屡次都遭严厉拒绝。一天，小雪林受强烈求知欲驱使，忍不住大声说道：“先生，教书是应该言的，你不知道‘教不言’是‘师之惰’吗？”惹得先生拍案大怒，把她痛骂一顿。那时师道尊严不可侵犯，先生忍无可忍，不久便以老病辞幕返里。

据黄山市岭下《苏门族谱》记载，苏雪林的先祖乃是北宋文学

① 苏雪林回忆在国立武汉大学任特约讲师时，文学史课中有学生反映她“别字、讹音”。武大乃古典文学大本营，中文系老先生皆国学界名流，期末“教师学力评审会”行将多投反对票，唯独王雪艇校长起立发言：“苏讲师的文章我在《现代评论》及《武大季刊》上读过，她并不是一个没有学问的人。况读书与智慧是两件事……至于偶尔写别字、读讹音，凡自学成功的学者都不免此病，慢慢地她自己矫正过来。……我们为一二小小蠹孔，便抛弃一根栋梁之材，是为不智。我主张下学期仍予她以续聘，想大家都赞成吧。”此事雪林铭记终生，称雪艇校长对她有“知遇之感”。



世家“三苏”一脉，其嫡祖乃是北宋时代苏洵（1009—1066，号老泉，苏轼、苏辙之父），而她正是苏辙第38代嫡孙女，九百年后的苏雪林（绿漪），在“五四”新文学运动中，成为民国早期青年女作家，当时芳华正茂的冰心与之齐名，被誉“冰雪聪明”，她们同为20世纪中国两位著作等身、享誉海内外的“百岁文星”双子座！苏雪林后来成为当之无愧的苏门骄傲。

豆蔻女童《种花》诗

雪林说“四叔是我家天才，诗画均甚出色”。一天，四叔说：“听说你欢喜诗，也懂诗，现在我出题考你一考，要你做首七绝，若做得还像样，便收你做诗弟子，好吗？”雪林想试试，便请题首，四叔出了“种花”二字。她略一沉吟，便提起笔来一气呵成：

满地残红绿满枝，宵来风雨太凄其。
荷锄且种海棠去，蝴蝶随人过小池。

这是她的第一首诗，却出手不凡！四叔称赞她“小小年纪，初次作诗竟有如此风致，实为可造之材”。家中大人异口同声对她赞赏有加，此后四叔果然教小雪林做诗。雪林初入诗门，常有新作却不肯轻易示人，她说，只是做出诗来，“句子总是平庸，意境总是浅薄”。然而其诗才已崭露头角。如：

《秋泛》：烟波轻泛木兰舟，江水苍茫芦荻秋，遥看
远峰云锁处，帆樯点点似浮鸥。

《初夏》：云阑干外望斜阳，燕子双飞水一塘，日夕
凉风亭畔起，薄衫时著柳棉香。

后来，哥哥和小叔叔们都到省城去上“新学了”，家中老人受“女子无才便是德”的封建道德影响，不再让女孩子读书了，雪林无奈只好利用已认得的千八百字看闲书，在哥哥书房找来《西游记》《水浒传》饶有兴趣地读起来。凭其聪颖悟性竟无师自通，逐渐



读一些半文言书和古文书了。“兴趣是最好的老师”，她索性从叔兄书箱里取来《古文观止》《聊斋志异》和纪晓岚的《阅微草堂笔记》等大部头啃了起来。一本本读来，她的古汉语日益精进，文化程度也大大提高。

踏上写作第一步

看到大哥从上海带回来几本林纾用文言文翻译的新小说，《茶花女遗事》《迦茵小传》《京华碧血录》等，她如获珍宝，竟然手不释卷，甚至废寝忘食，觉得于中国旧小说之外又发见了一片“新天地”。她试着模仿林纾笔调写了一本“文言”日记，内容多是家庭琐细，却记录了少女观察事物的感触，透露出天真烂漫的童心，是不乏活泼清新的小品散文。正如她自己所说：“可算是开笔，也可算是我踏上写作生涯的第一步。”并由此引发了她的创作热情，17岁时便以家乡童养媳的坎坷生活为题材，写出一篇辛酸泣泪的文言体“小说”，念给家里人听时，竟感动得奶奶、婶婶们流下了无数眼泪。19岁时，她又写了长约三四百字的“五言古诗”，之后又将其写成文言体短篇小说《姑恶行》。后来升学北京女高师，此文投校刊得以刊出^①。

1913年苏雪林进入省城安庆一所教会女子中学读书，学名苏小梅，她极其珍惜这次上学机会，益发勤奋向学，次年考取了安徽省立第一女子师范学校。因她爱好文学诗画，基础扎实，且常有创意，在校学习四年中，竟有七学期荣获第一名，学校壁报上常常留有她的书画笔迹。当时民国初年省内新兴教育初设，女界人才极少，像苏雪林同学这样“既能咏旧诗，又能画山水”之出类拔萃者，自然受到校长至科任教师的注目，同学更说她是“天生才子，前途远大无涯！”1918年毕业后即留校在一女师附小教书。当时舒畹荪

^① 小说在她到北京求学时，刊登在《北京女子高师范学校》年刊（1919）上，受到同班好友冯沅君（1900—1974，闺名淑兰）的赞赏，并寄给她在美国读书的哥哥冯友兰（1895—1990），令兄复信大加赞赏，说作者“富有文学天才，将来定有成为作家的希望”。



女士为安庆实验小学校长，苏雪林受邀去兼课。有一天舒校长介绍一个叫黄英的体操教员与雪林相见，说是她在北京女师的同学，这就是后来著名女作家（黄）庐隐，她身材短小，脸孔瘦黄，时有抑郁之色，谈话似乎有些拘束。因钟点不同，雪林、庐隐虽同校，却相见不多，只是相识，并不熟悉。

1919年秋，苏雪林与黄庐隐不约而同地考入北京女子高等师范学校国文系，并同时被录取为旁听生。雪林与庐隐结伴同行，离开安庆，到北京女高师报到，经过一学期的努力，期末考试成绩合格，得到系主任陈钟凡批准，雪林与庐隐又同时从旁听生转为正班生。这年正值“五四”运动爆发，新文化运动带来一股科学与民主的新鲜空气，她们有幸受教于胡适、陈独秀、李大钊、周作人、陈衡哲等知名学者、专家。当时风云际会，新文化运动、白话文运动，各种新思想、新学说“百花齐放”，层出不穷，她们经常聆听名师、学者演讲，条件得天独厚。国文系主任陈钟凡教授为满足学生求知欲，特地订阅了多种报刊杂志，还邀请多位新文化运动大师，如胡适之先生、李大钊先生、陈衡哲女士等来讲学。雪林说：“胡先生给我们的印象当然最为深刻，当他来教他自编的中国哲学史时，别系同学都来旁听，即使年在四五十以上的学监、舍监及校中各部门职员，也自己端个凳子坐在我们后面，黑压压地水泄不通地拼满一堂人，鸦雀无声，聚精会神，聆受这位大师的宏论。”“李大钊先生讲书极有条理，上课时滔滔千言，如瓶泻水，但你永远莫愁他的笔记难记，因为他说话只直说下去，不着一句废话，也没半点游姿余韵，所以一点钟的话记述下来，自然成为实实在在的一章讲义。他朴实诚恳的面貌和性格也同他的讲授一般，很引起我的敬爱。”

满园春色关不住

北京女高师荟萃全国英华，苏雪林同学中就有黄庐隐、冯沅君、石评梅等才女，雪林在良师益友的影响下，思想发生巨大变化。她后来回忆说：“我便全盘接受了这个新文化，而变成一个新人了。”就在这时激起她对写作的强烈愿望，开始用白话文写作，



在《时事新报》副刊《学灯》、《国风日报》副刊《学汇》及《晨报·副镌》等园地陆续发表文章，也参加了对社会政论性问题的论争，开始其“五四”新文学的创作生涯。苏雪林与庐隐在女师大两年，成了要好的朋友。苏雪林细心观察同学，课余时间来了灵感，常常诗兴大发，随笔即兴“长歌”一曲《戏赠本级诸同学》，将同班同学的“中国文学”成绩较优者尽数写入。她这时创作热情之旺盛，真个是“春色满园关不住”了。

二、留学生涯

1921年初秋，苏雪林带着“去大千世界闯一闯”的抱负，考取了赴法留学预备学校——中法学院。她瞒着家庭，直到临行当天才告知亲爱的妈妈。与她同舟远航留欧的有一位叫潘玉良的女性，还有一位湘妹子杨润余，她哥哥是经济学家杨端六，嫂嫂则是后来与苏雪林同为“珞珈三女杰”的袁昌英。杨润余是湖南长沙新民学会会员，是由正在上海参加中共第一次代表大会的毛泽东亲自送上这艘海轮的。这批女留学生搭乘的是一艘叫做波尔多士(Porthrs)号法国远洋邮轮，从上海港出发，直达目的地——法国里昂。这艘冒着浓浓黑烟的大舰艇，载着数百名满怀希望的热血青年，自上海黄浦码头向茫茫无际的太平洋、印度洋进发，其中有一位年逾半百的老先生吴稚晖(1865—1953，江苏武进人)，他是我国著名教育家。这年秋天，吴稚晖与李石曾等在法国里昂创立了中法学院，在国内招考一批留学生，由吴先生亲自带领前往法国。这批留法学生家庭经济状况一般要比留英、留美的差一些，当时正值欧战结束后的恢复时期，法郎贬值，但从中国赴法的旅费也相当可观，不得不节约着用。吴先生特地与法国船长交涉，在四等舱里特辟一片“园地”，所有男女生都睡进统舱，与其他乘客铺位略为隔离，男生片是用绳索，女生片则用木板在统舱里另辟一间“客房”，因为女生人数不多方蒙此优待。吴先生和男生睡在一起，铺位正当女生“客房”门外，同船的留学生们朝夕进出都可以看到吴先生。

苏雪林是中国首批留法生，吴稚晖先生是中法学院的首任校



长，他圆脸微呈紫褐色，眼睛炯炯有光，个头不高，身材胖硕，是一位平易近人的长者。中法学院第一期学生共 150 余人，其中女生 13 人。女生宿舍安排在学院大门内一座小楼里，到教室、图书室和食堂都不远。杨润余与潘玉良一室，苏雪林住隔壁单间小房，往来十分方便，三人宛如同室，彼此相处情谊甚好。她们中除杨润余外，都是二十多岁的女孩子，大多天真无邪、不谙世事。唯独潘玉良曾经饱受社会雨雪冰霜，于人情世俗甚为娴熟。玉良中等身材，体格硕壮，脸形稍长，肤色微褐，容貌并不怎么美，性格则刚毅强傲。据她自己说结过婚，丈夫叫潘赞化，大家就叫她“马丹潘”，“马丹”是法文 madame(夫人)音译。由于苏雪林与潘玉良都学美术，自然接触更多，从而结下长达数十年的友谊。

苏雪林来到法国后，好像变了个人似的，全新的生活使她精神十分愉快，不觉便把思念母亲的心情淡了下来，而专心学业了。她来里昂，原预想七年完成学业归国。谁料来法不久，就接到母亲的家书，说女儿不该瞒着她自行决定出国，给母亲留下无限思念；说女儿心太高，只顾求学，母亲寂寞残年，谁来陪伴安慰！苏雪林不禁对母亲牵肠挂肚起来。苏雪林虽是五四运动中成长起来的新女性，在婚姻问题上却深受传统思想约束。在法期间曾和“未婚夫”通过几次信，发觉“性情不合”，便写信给父亲要求解除婚约，但父亲在回信中对她大加申斥，母亲在病榻上也托人写信劝说，甚至哀求女儿，为了父母双亲，她只好勉为其难地“认了这门亲”。

“春二三月莺飞草长”

在中法学院紧张的学习生活中，读背单词、相互听说法语练习，成了一幅绚丽的校园风景画。四月的欧洲一如中国“春二三月莺飞草长”，校园生机盎然，鸟语花香。身处异国的学子正当青春年少、意气风发，学院集聚华夏英才淑女，在这浪漫国度，自由恋爱自然而然！苏雪林也不例外，自是不乏才俊“君子好逑”趋之爱之，她都以“已由家庭订了婚”为由拒之。但生活在自由浪漫的环境里，即使对母亲百依百顺的乖乖女，也架不住爱的魔力的吸引！有一位“颇有才华”的“尖头曼”(gentleman)，因失恋心灰意冷，陷



人痛苦不能自拔，甚至“见了女子便恨”，唯独对雪林“文笔钦慕不已”，“愿意和她谈谈”。雪林便与他见了面，此后他经常主动邀约，把他曾和一位美丽姑娘相恋的故事和盘托出：“我全身心爱她，她家里反对，我们订下‘石烂海枯两心不负’誓约。但赴约时，她已于十天前与他人结婚了。”他伤心至极，陷入半疯狂状态。雪林那晚临睡时，想起他那凄怆失恋故事心情久久不能平静，从此与他交了朋友。他深信“遇到知音”，便大胆表白：“竭诚想和你做朋友。……互相勉励，致力艺术研究，让艺术曙光照彻中华。”雪林也曾为之倾心，然而，她却深记父母嘱咐——她已有了“未婚夫”，将来要与他结婚。因此思前想后、千斟万酌之后，只得“忍心割爱”，痛苦舍弃这段美好而珍贵的感情，并拒绝一切“爱”与“不爱”的求婚者。她把这段爱的洗礼称之为“光荣的胜仗”，写成文章作为永久的纪念（收进她的散文集《棘心》）。这是父母包办婚姻对恋爱自由的“光荣胜利”，她身上保留着中国封建传统女性的道德素养，不逾雷池半步。

苏雪林在中法学院学习一段法语后，即转入里昂国立艺术学院主修美术，对中西方绘画艺术颇有造诣，还广泛涉猎文学而有丰饶感悟。她却自谦道，赴法后“三分时间，一分虚耗于患病，一分枉费于恋爱问题的烦扰，思亲情绪的萦缠，我的书之读不好也是当然的”。留学期间脑海里大量活生生原始素材的“集腋成裘”，为她造就“日落千言稿，下笔如有神”的文学才华作了铺陈。这位受国内五四新文学运动哺育成长起来的“闺秀派”女作家，不时以白话文撰文陆续寄回国内发表。据不完全统计，苏雪林20世纪20年代初期所发表的散文、短文、评论有：《新生活里的妇女问题》《沉沦中的妇女》《人口问题研究》《再论人口问题研究》《生育制限运动声中的感想》《男盗女娼的世界》《相对性原理和哲学史的问题》《时髦男子择妻之条件》《相对性易解》《世界语者之宣言》《家庭》《民众艺术论》《对于“五一”的两大希望》《自由文爱论》《说内外》《说美恶》等五六十篇，还有大量政论杂文、政论，刊载于《民铎》《民国日报·觉悟》《时事新报·学灯》《国民日报·学汇》等报刊上。



三、报效祖国

苏雪林留法第四年，由于水土不服经常生病，加之不断收到家中来信，母亲特别关心她“女大当婚”的终身大事，“恋爱自由与婚姻不自主”的尖锐矛盾时常困扰着她。加上父亲病故的噩耗，母亲又病重“非常想念女儿”的消息，让她只好决定中断学业，于1925年提前归国，回到母亲身边，不久便奉母命与未婚夫张宝龄（江西南昌人，上海圣约翰大学肄业赴美，入麻省理工学院学工）完婚。不久母亲转入病危，在看到爱女“终身大事”完成后与世长辞。苏雪林料理完母亲丧事后，丈夫接到苏州东吴大学理科主任聘书，学校赁给屋子一所，遂去苏州安居。同时雪林由母校北京女高师中文系主任陈钟凡推荐担任苏州基督会景海女子师范学校国文系主任。同时，陈又要雪林代替他（在东大作短期讲学，将回南京金陵女子大学）的课程，这样雪林便在东吴大学兼每周六学时的《诗词》课，没有规定教材，忽而几首唐诗，忽而几首宋词。然而教学之余却引发她诸多联想，特别从李商隐那“镂金错采、瑰丽绝伦”的《圣女祠》《重过圣女祠》和《碧城三首》中悟出了对作者恋情考察的研究课题。好个苏门女才子，连梁启超^①都认为“解不出”的课题她也敢立！“世上无难事，只怕有心人”，雪林正是这样的有心人！她认准的课题就锲而不舍，就“原诗所用典探寻其本事”，不到两年就有专著《李商隐恋爱事迹考》出版。

1927年苏雪林随夫返回上海，翌年在沪江大学担任教席，这期间通过她的留欧同学杨润余女士介绍认识其哥嫂杨端六、袁昌英（兰子）夫妇，雪林和兰子（当时在《中国公学》讲授莎士比亚和法文）由于竞相在《现代评论》《现代文艺》《独立评论》《文艺月刊》等报刊杂志上发表文章，结成密友。当时中国文坛上涌现出崭新的女

^① 梁启超（1893—1929，字任公，清华国学院四大导师之一）曾言：“李商隐的碧城和圣女祠诸诗，讲的是什么，我理会不著，拆开一句一句叫我解释，我连文义也解不出来，但我觉得他美……”



作家群落，有陈衡哲、袁昌英、绿漪(雪林)、庐隐、沅君、冰心、凌淑华、石评梅、丁玲、林徽因等，这年上海《真善美》月刊要出女作家专号，主笔曾虚白先生专程采访了绿漪(雪林)女士，并向她约稿，从此结下长达半世纪的“笔缘”。

苏雪林结婚不到三年便分手了，婚姻以“悲剧”结束。她在《绿天》里描述得浪漫微妙：“小小银翅蝴蝶和蜜蜂结婚以后，开始一段岁月，过得也还相当美满，但蜜酒里常搀有苦汁，柔美的旋律也往往漏出不和谐的音韵，蝴蝶又渐渐感觉这种家庭生活与她不甚协调了。这不是说‘结婚是恋爱的坟墓’果然是一条颠扑不破的定理，不过是因为蝴蝶现在身到庐山，认识了蜜蜂……”

1930年苏雪林收到安徽大学杨士亮校长来信，聘请她担任中文系教授。那时安大聘请了一批知名人士如陆侃如、冯沅君、朱湘、饶孟侃、刘英士等任教，教务长兼文学院院长程憬(字仰之，清华国学研究院肄业)兼有文化史课。雪林到校时，程教务长便将文化史课给了她。雪林擅文学创作，这门课她本不在行，便婉言辞之，仰之却将他编好的大纲给她看，再介绍一本西洋文化史供参考，鼓励她说：“总可勉强对付下去的。”苏雪林无奈，只好答应下来，如此在安徽大学教了一年“文化史”。谁知自此伊始，竟导致她到武大长期担任起“文学史”的课程来。

当时，国立武汉大学校长王世杰大量延聘海内外专家和有真才实学的学者加盟武汉大学，共建“国内一流高等学府”。苏雪林收到武汉大学来信邀她加盟武大，但却约定职称是“特聘讲师”。她当然明白武大对师资要求极严，未聘“教授”是因她虽留学却无博士文凭，她当时考虑到武大是“国立”，校规严肃，誉满东南，此时珞珈山新校舍即将建成，湖光山色，“在那个世外桃源生活几时，也是值得，我当然舍安大而就武大了”。1931年秋，苏雪林来到武汉大学，任教《中国文学史》，每周三学时；一年级《基本国文》每周五学时；教《文学史》，还须编讲义；第二年又加授《新文学研究》每周二学时。文学院院长陈源(西滢)对她说，沈从文曾在武大教这门课，编了十几章讲义，每章介绍一个作家，说着取出沈氏讲义给她。可她觉得“并不精彩，比他的创作差远了”。接了《新文



学研究》课，果然“苦”字临头，她编新文学讲义与沈从文以作家为主者不同，以作品性质来分为“新诗”“散文”“小说”“戏剧”“文评”五个部门，作家专长某一类文学，即隶属于某部门下。如此《中国文学史》与《新文学研究》讲义编纂同时进行。后者所费劳动在前者一倍以上。《新文学讲义》陆续编写好几年，才将五个部门写完。抗战发生后武大迁川，这门课便停了。她在原来教的《中国文学史》外，又加了一班《基本国文》。

苏雪林在珞珈山校园的湖光山色和幽雅恬静的自然环境中平静自由地独居生活，使得她赏心悦目、神清气爽。她一向刻苦勤奋，教学创作相辅相成。刚来武大不久，就有长达数万字的研究论文《清代男女两大词人恋史之谜》等发表在武汉大学《文哲季刊》上。三年前她已出版《李商隐恋爱事迹考》（上海北新书局，1928）。同时苏雪林与袁昌英、凌淑华等在《现代评论》上发表文章，有《九歌中人神恋爱的问题》《论梅特灵的青鸟》等。雪林因担任《现代文学史》课程的缘故，经常关注同时代作家的创作，陆续写了《论闻一多的诗》《论李金发的诗》《论朱湘的诗》《沈从文论》《郁达夫论》《王鲁彦与许钦文》《多角恋爱小说家张资平》《林琴南先生》《周作人先生研究》《〈阿Q正传〉及鲁迅创作的艺术》《俞平伯和他几个朋友的散文》《关于庐隐的回忆》《记袁昌英先生》《其人其文凌淑华》《胡适的诗》《我论鲁迅》《我所认识的女诗人冰心》等，几乎对“五四”时期活跃在文坛的众多作家及其作品一一进行了评介。其文思之敏、精力之旺、笔锋之锐，可窥一斑。1938年苏雪林出版《青鸟集》（长沙商务印书馆），其中收集她关于剧评、文评、诗评和画评等方面的大量文章，书名取自第一篇《梅脱灵克青鸟的眼睛》。“教学相长”是苏雪林几十年教书生涯中的独到体会，且运用自如，她有许多学术性文章都是课堂教学中提炼、积累的成果。勤勉的她常在教学之后进一步整理讲稿——进行再创作，研究推敲撰写成书稿并付梓出版。如《辽金元文学》（1933年，上海商务印书馆；1939年再版）、《唐诗概论》（上海商务印书馆，1933年），都是她来珞珈山后两年内完成的。桃李不言，下自成蹊，苏雪林之后被破格晋升教授。苏教授以课余从事研究为极大乐趣，她在《谈写作的乐趣》中



说：“这一类心灵探险时沿途所拾摄的奇珍异宝，令人精神鼓舞，勇气倍增，觉得为这个研究牺牲一切都是值得的。”

四、乐山武大

1938年初，武汉大学决定西迁四川嘉定（乐山），苏雪林、袁昌英、凌淑华跟随武大师生西迁。当时民国“五大学府”中央大学（直迁重庆）、武汉大学（直迁乐山）“一步到位”；北大、清华、浙大皆辗转数度，最后分别到达云南昆明、贵州湄潭。武大师生经宜昌，兵荒马乱中踏上“难于上青天”的蜀道。

五十两黄金献国家

此一时期，苏雪林对国土沦陷、民族危难深表忧虑和担心！她同每个中华民族儿女一样，愿将“自己的血肉筑成新的长城”，去抵御侵略者的炮火。抗战伊始，她便将自己多年积蓄的薪金、版税和稿费全部取出，买了五十两黄金，献给危难中的国家和为国流血牺牲的将士！此事轰动珞珈山校园，武大师生无人不晓。

她还不断拿起笔来记述侵略者的血腥罪行，1939年“八·一九”乐山大空难后，她奋笔疾书，写有《乐山敌机轰炸记》《敌人暴行故事》等檄文，激发全国同胞敌忾同仇。抗战后方生活极其艰苦，物价扶摇直上，几乎一天一变，苏雪林教授等概不能外，每天粗茶淡饭，维持温饱，“三月不知肉味”；穿棉布旧衣；住潮湿的老式民房，每晚都有老鼠、跳蚤做伴；行十几里“安步以当车”。艰苦生活中，她还因地制宜，利用屋边两亩左右空闲土地种菜、栽瓜，买了锄头、镰刀、扁担、箩框等日常用具，自己动手挖地、松土，播种、施肥、锄草。她不时向当地农民请教，不辞辛劳，在干中学，终于开垦出了一片菜园。所种蔬菜种类繁多，有白菜、苋菜、萝卜、莴苣、蕃茄以及小葱、蒜苗等，冬天还种有菠菜、胡萝卜、韭菜等应时菜蔬。苏雪林在《〈屠龙集〉自序》（1940）中写道：抗战以来，文坛真寂寞得可以：多产的变成了少产，少产的变成了绝笔。我到四川乐山，整整过了两年半，只写了一二篇文字。“我



的文章原来要催才有。”今年春季，恰有某刊物来征稿，写了一篇《青春》，自觉文思尚不蹇涩；第二篇写的是《炼狱》，把两年以来我们这些教书匠所受的琐琐碎碎的生活痛苦，发泄了一个干净，心里果然就伏帖了许多。暑假三个月，除了休息个把月以外，差不多天天钉在那张小书桌写文章，长短共写了十余篇……十年以来，写作兴趣，以这一季为最浓，“朋友们都说我的作风改变了，一派幽默风味洋溢笔端，可以继承林(纾)大师的衣钵”。

苏雪林在乐山武大的生活不得不随“抗日烽火”时局变化，室内典型教书匠，室外一派田园风光。她在《灌园生活的回忆》中写道：我本是一个用脑的人，忽然改而用手；又是一个一向安坐书斋的人，忽然跑到土地里去，生活完全改变，觉得别有一番从未尝过的新鲜滋味，于是兴趣大为浓厚。苏雪林享受着丰收果实的甜蜜时，没有忘记给密友袁昌英家送去新鲜蔬菜瓜果，分享“劳动果实”。田园生活对雪林来说，固可聊以自慰，事后却又十分“悔恨”。她回忆说：“我那时脑力在一生中为最强，若专心研究学问，也许可以获得几种专门知识；若全力来写作，两年内也许可以写出二三十万字的文章，但因为我的愚妄无知，太受兴趣的支配，把大好的光阴精力都白费了。”然而在八年抗战时期，乐山武大学者所发表学术和创作成果原本就不多，苏雪林女士却一直在写文章、出文集，已属难能可贵了。

“最频繁”借书者苏雪林

武汉市收藏家黄明忠收藏《武汉大学抗战西迁乐山时的借阅登记本》，记载八年抗战时期武大西迁乐山、校园群星闪耀之际，包括周鲠生、朱光潜、苏雪林等80余位名教授的借书记录。其中显示“珞珈三女杰”之一苏雪林借书甚为“频繁”——借阅登记表达19页之多。其中有一次就借阅了《词话丛编》16册、《词源疏证》1册、《宋名家词》5册，共计22册。左图所示“苏雪林借书登记卡”一瞥。



P.19.

國立武漢大學圖書館

姓名 蘇雪林 院別 _____ 學號 51
 現在住址 _____ 學系 () () () () () 年級 _____
 永久通信處 _____

書	日期	書	號	登記	號	還書	日期
24.12.26	詞話八編	Y1-16	416	35824			
"	詞話八編	Y1-16	416	35824			
"	宋名臣集	Y1-221	45	35122			
35.1.22	299.31/S47714	13478					
"	299.219/S47714	12477					
1.23	5001/10606	23407					
2/13	851.15/DSy	V.1 11079					
"	851.15/PE	28230					
"	851.15/PP	V.2 6817					
"	851.15/PP	V.1 6816					
"	851.15/DM	12418					
"	851.15/PP	V.5 6820					
"	851.15/DM	12412					
"	851.15/DM	12411					
"	415.14/1020	V.1 100201					
3.8	4607/510	92128					
3/11	851.15/PP	V.3 6818					
"	851.15/PP	V.4 6819					
3/9	843.08/Y17	32419					

苏雪林的借书记录

五、故土难离

情至深时木亦怜

1949年苏雪林离开工作18年的武汉大学，实出无奈。她说，“我因过去反共反鲁太激烈，早被左派文人围剿得体的无完肤”，自觉“新文坛”已无地容身，留下来的前途之险不问可知！遂毅然决定离开武汉。她即将告别珞珈山时，感到阵阵凄楚苍凉，恋恋不舍。一天下午这位小脚女教授独自一人从二区走出，漫步珞珈山腰小道，轻踏翠绿芳草地，享受芬芳温馨气、静听松竹窸窣声。山景如此了然于胸，东湖那样清彻，山林依旧葱笼，蓝天仍然空灵，曾



几何时与她结下不解之缘，如今竟要绝情离去。她貌似闲庭信步，不觉来到一区十八栋好友兰子家门口，她轻轻叩门而入，“什么时候走？”昌英带着一丝忧愁。“不久了。”雪林嗫嚅着。“跟我们一块儿坐坐吧！”昌英说，身旁坐着几位中文系的学生。“我还有些挂心的事要做，改天再来吧！”雪林笑了笑，转身向兰子借把锯子，便走向后山，蹚入松树林，径直向几棵被巨藤缠绕的松树走去。那些树因树干被绕得过紧而枯瘦起来，雪林好“心痛”，她摆好姿势，擎稳钢锯，使劲锯起树藤来。这位年逾半百的女学者吃力地拉着钢锯，自语“松林中被巨藤缠死的树已经不少了，学校的管理人员也不管管，它们是珞珈山的生灵，我着实不忍心看着这些坚强的生灵走至灭亡啊！”苏雪林直盯着树藤，感叹“物竞天择，岁寒后凋”。忙碌好一阵子后，终于将那顽固的巨藤尽数锯断，她长长舒了口气，沉默了。十八年前，初到珞珈山，便被这山的美丽吸引。局势发展，她不得不离开她深爱的珞珈山，此刻不由得泪眼模糊。她抚摩着树干，陷入沉思：“春至寒处树犹绿，情至深时木亦怜。”生机勃勃的松树林，碧翠玲珑的珞珈山，曾留下她温情的足迹，记下她眷恋的目光，更能读懂她深情的思绪。

恰在这时，苏雪林接到香港真理学会的聘书，于是她便收拾行装，在汉口搭乘邮轮，经上海转航海轮到香港，在香港真理学会担任编辑工作。然而作为教授、作家的苏雪林却与众不同，她说过：“个人忝为文人，其实兴趣偏于学术，所以我写作的第一本书是学术性的。”此书指《李商隐恋爱事迹考》。她在香港工作一年，大有“身在曹营心在汉”之感！总想赴海外寻觅“解决《屈赋》的资料”，借以实现她对《屈赋》系统研究的愿望。她攒足了盘缠，于翌年动身前往法国从事她心驰神往的“神话”研究。她一方面在巴黎大学旁听著名汉学家戴密微(Demieville)教授“英德法汉学家研究屈赋”课，另一方面在法兰西学院旁听 E. D. Horne 教授的亚述巴比伦神话课。课余闲散散步时遍逛巴黎书肆，搜罗世界神话书籍，遇着了便买下。不曾想，她所带去的那点私蓄刚维持一年就要告罄，这才开始着急了！不由得想起老校长王世杰，雪林无奈之中提笔写信给老校长，请他给海外学人一点救济金。遂得美金 500 元，使她



得以多留巴黎一年。本来巴黎生活花费并不高，但雪林太爱买书了，这样又要囊底朝天了。她寻思旅法两年，屈赋问题解决“初露端倪”，求人接济非长久计，回台湾吧，旅费又无出处，她再次把目前处境告诉了雪艇先生。雪艇又商请文艺协会张道藩会长和文化界罗家伦主任，得两位先生筹措合汇美金 500 元，方使苏雪林女士得以离开巴黎。1952 年苏雪林回到台湾，即受聘台湾师范学院国文系教授。走马上任后，在完成教学工作同时，仍念念不忘她的学术研究计划。正好胡适担任“中央研究院院长”，设立“长期发展科学计划”，便申请了一项《屈赋研究》科研经费。她当年论文是《〈屈赋〉问题研究》，她确信已将《九歌》歌主的性质搞清楚了，只是论文尚未全部写出，仅以其中几篇呈胡适先生指正。谁知胡竟在论文几处批语：“胡说”“这条路走不通”！这让苏雪林十分沮丧。她回信辩解：“我的屈赋研究，立论虽过于新奇，自信却极其正确。……所以就正于先生者，因先生是当代硕学，又曾是我的老师，想眼光必高人一等，对我必有相当的了解，而赐加指导。谁知先生并不肯细读拙文，便轻轻地一笔抹煞，这怎能叫我不对先生失望呢？”雪林信寄出后，方始大悔，心想这下糟了，胡先生读后必大生其气，我的研究经费一定泡汤了。遂又去信雪公，雪艇十分重视，即驱车见胡适，胡适笑道，我做学问原主张“大胆的假设，小心的求证”，不过苏的立论太奇诡，未免太大胆了些。此后苏雪林每年呈交屈赋论文，胡适总叫徐芸书、杨希枚二位研究员审阅，他知二君是雪林屈赋研究的同志。

苏雪林于 1956 年调台南担任刚成立的成功大学中国文学系教授、系主任，一直住成功大学教授宿舍，与姐姐一起生活，终生不嫁。1964 年应聘赴新加坡南洋大学讲学一年，期满回成大，直至 1973 年退休。她感念胡适先生“长科会”计划助她完成所挚爱的《屈赋论丛》专题系列著作，同时感念王雪艇先生的玉成之德。胡适逝世后，王雪艇继任“中央研究院院长”，苏雪林科研经费每年蝉联更不成问题，有了经费资助，她的《屈赋》项目得以写成，著作四卷，共一百八十万字。成书后，幸得王云五于中山文化学术基金会拨款数万元作为出版费，出版了《屈原与九歌》第一册；两年后《天



问正简》出版。数年后，苏雪林另两部书《楚辞新估》和《屈赋论丛》版权卖给“国立编译馆”，得以面世。

1991年4月，成功大学中文系为苏雪林教授九五华诞在台南市召开盛大学术研讨会，为之庆寿，台北市武汉大学校友会共襄盛举。莅临研讨会的中外嘉宾百余人，其中大多曾是苏师的学生和曾聆听过她演讲或阅读过这位世纪文星论著者，研讨会的召开成了宝岛文坛一大盛事。在她九五寿庆，陈立夫先生题诗志庆：

博学多才，蜚声寰宇。等身述作，淹贯今古。

寿人寿世，胸无城府。桃李争荣，辉增宝婺。

雪林教授九五华诞

陈立夫敬祝(签章)，八零·四·八。

其实早在一年前的1990年，就有报刊编辑部邀请，请苏雪林写点自传回忆，她总是推诿：我有一部《棘心》小说形式的传记，又有一部《我的生活》从摇篮写到成长，还不够了么？更何况一个具有历史价值的伟大人物，才有资格写自传，像我这种普普通通的人也来灾梨祸枣，岂不笑煞人？由于学界和学生的关切和期盼，她不得不执笔忆叙自身经历《浮生九四》，历时八个月在她九五诞辰前完成，从十三岁开始做诗至今八十余年创作生涯，这本身便是一桩罕世奇迹！

六、叶落归根

“九七嵩寿”出画集——《苏雪林山水》

其实苏雪林女士颇有绘画艺术功底，却深藏不露，早在乐山武大时，袁昌英女儿杨静远说：干妈凌淑华常躲在家里作画，苏雪林阿姨的画却总是秘不示人。苏雪林曾有多篇“评画”的论文发表：《凌淑华女士的画》《孙多慈女士的画》《我与国画》和在珞珈山写的一篇《山窗读画记》等。苏雪林以97岁高龄在台北出版了她的唯一



画集《苏雪林山水》(1993)，收入了她历年所作、鲜为人知的 75 幅美术作品。这些“山水”大多描述黄山风景和她故乡苏家村，令人惊异的是，她只凭着半个世纪前的记忆作画——那记忆竟如此刻骨铭心，终生难忘！这哪里是画，明明就是一位天真烂漫的女儿对故乡真情的流露、对祖国挚爱的写照！犹如封存地窖半个世纪的陈年老酒那样芬芳浓郁，沁人心脾。

尽管雪林老人一生大部分时间远离家乡，但其浓厚的乡土情却丝毫不减。数十年来创作大量散文随笔，以清新笔触写父亲、母亲、姐姐，儿时印象，山村过年轶事，篇篇精美文字渗透着她心底的骨肉亲情。几年前，与她一起生活的姐姐与世长辞，她万分悲痛、伤心不已，把姐姐安葬在台南陵园公墓，并在姐姐墓旁购置一块墓地，准备百年后与姐姐“相伴相随”。

百零二岁写传奇

1998 年 3 月 24 日，苏雪林在台湾的台南市度过她 102 岁生日。她内心深处难以割舍的故乡情结——强烈的返乡愿望，想在有生之年实现。为达成老人心愿，经弟子联络，得到家乡当地政府的支持，1998 年初夏，苏雪林由成功大学国学女导师唐亦男陪同，坐轮椅自台南跨越海峡(经香港中转)回到阔别 73 年的故乡安徽省黄山市太平县岭下苏家村。她看到了祖屋，见到母亲曾住过的卧室，来到儿时私塾海宁学舍，“坐”到了自己当年的婚床，她的一切愿望满足了。一往情深地说：“这是我自己的家，到家了，我不想回去了。”她每天随笔记下这无比珍贵的故乡观感！返回台南后便结集出版了她的《日记》15 卷，这是我国一位女学者 102 岁亲笔撰写的又一人间传奇，是雪林女士为“等身著作”划上的完满句号。

“绿天永存”黄山麓

1999 年 4 月 21 日，苏雪林在台南辞世，终年 103 岁。皖南才女苏雪林灵柩从宝岛台湾“驾鹤西归”回到家乡，安息在故土黄山岭下苏家村的风形山，她的骨灰盒埋葬在母亲坟墓的下方，孝女苏小梅永远陪伴母亲于天国。人们走进白色大理石雕护栏，一座青石



墓碑镌刻“苏雪林教授之墓”，背面刻“棘心不死 绿天永存”。黄山岭下苏家村是苏雪林成长的起点，也是她人生的终点。民国才女、百岁文星苏雪林女士“落叶归根”，谱写了一曲感人至深的世纪绝唱。

回归故里的苏雪林并没有被人遗忘，反而更加得到海内外学界和社会的关注。1999年8月，正当苏雪林魂归故里之际，“海峡两岸苏雪林作品学术讨论会”在黄山召开，盛况空前。这是中华学界对这位世纪女文星的最佳纪念。2000年4月，苏雪林逝世一周年之际，黄山区文化局和博物馆举办了苏雪林作品展，400多件展品通过互联网向海内外传播。尽管苏雪林先生文坛业绩有待专家学者研究，然而苏雪林永远是故乡的骄傲。黄山市当地区政府筹资300余万元修缮了苏雪林儿时就读的私塾学堂^①“海宁学舍”、苏氏宗祠等建筑。陈列馆展出了苏雪林童年和少年时期读过的部分书籍和她的大量著作（一部分），包括：《绿天》（北新书局出版，1929）；《棘心》（北新书局出版，1928）；《青鸟集》（商务印书馆，1938）；《屠龙集》（商务印书馆，1941）；《归鸿集》（流畅出版社，1955）；《苏绿漪创作选》（上海新兴书店发行，1936）；《欧游揽胜》（光启出版社，1958）；《闲话战争》（台湾传记文学出版社，1967）；《我的生活》（同上，1967）；《文坛旧话》（同上，1967）；《我论鲁迅》（文星出版社，1967）；《眼泪的海》（同上，1967）；小说集《蝉蜕集》；传记作品《南明忠烈传》；《雪林自选集》（台湾神州书局，1956）；《苏雪林自选集》（黎明文化事业公司，1975），等等。

归根一叶动苍穹

“苏雪林回归故里”恰如一股强劲旋风，唤起大陆众多年长读者尘封已久的记忆。雪林毕生精力，全在孜孜不倦治学，包括四十几种文艺创作和文学评论，更以30年心血从事屈原作品研究，出

^① 苏雪林祖父当年兴建的私塾海宁学舍，唐亦男陪老师返乡时，她做主用苏雪林的一笔稿费从他人手里将这间老宅买回，捐给当地文化局。如今这座老建筑已辟为“苏雪林纪念馆”。



版了《屈赋新探》四卷 180 余万字。苏雪林集作家、学者于一身，从事教学 56 年，创作生涯 80 余载，出版著作 50 部，洋洋洒洒近 2 000 万言。2000 年 11 月，《海峡两岸苏雪林教授学术研讨会论文集》(上、下两册)出版。其中收录 52 篇论文(大陆 32 篇，台湾 20 篇)，以雪林女士早年创作(小说、诗歌、散文)及晚年学术研究(诗经、楚辞、唐诗等)为主题，多层次多角度评赞苏雪林教授百年人生中，以豪迈民族激情、赤诚爱国信仰、一枝生花妙笔挥洒大半个世纪。两岸学人共同景仰苏雪林女士的文采智慧，见证苏雪林教授学术成就与影响。

情长篇限，万语千言难以表达雪林先贤世纪业绩于万一，谨以拙诗结束本文：

七律·珞珈女杰苏雪林

——纪念校友先哲苏雪林女士 120 冥诞

黄山才女冰雪聪，五四京师崭笔锋。执教勤殷多半纪，笔耕恳切八十冬。

文学论著五十种，词赋精研颌万工。佳话三杰珞珈女，归根一叶动苍穹。

(作者系数学系 1952 级校友)



一则民间故事造就一位汉学家

——李格非先生在莫斯科大学讲学逸闻

胡 欣

人生中，有些事是巧合也是机缘。记忆中最难忘、最有趣的是我的老师——中文系教授李格非先生讲述的他在莫斯科大学讲学时发生的一段逸闻。

1961年春，中文系全体师生在南一楼（现教一楼）三楼大教室听李格非先生在莫斯科大学和列宁格勒（圣彼得堡）大学讲学四年归来的首场报告，教室座无虚席。我当时是大二下学期，坐在教室前面。李先生是武汉人，新中国成立前毕业于武汉大学中文系并留校任教。他身高一米八左右，白皙的皮肤，头戴青色鸭舌帽，身穿青色中长呢绒的西式外套，颇具学者风范。

开讲时，他洪亮而抑扬顿挫的语调，一下就扣住了大家的心弦。他娓娓道来的内容，使我们领略了苏联名牌大学的风貌，并使我们感悟到了苏联人民对中国人民的深厚友谊。报告中李先生讲的一段逸闻给了我深刻印象，之后只要有机会，我就会津津乐道地转述给后来的学弟学妹们听。

李先生在莫斯科大学讲学时，指导莫斯科大学东方语言学院一位主攻汉学的学生写毕业论文，学生叫 LuByKb（俄文，中文译音是“尼弗格”），这个名字的发音与李先生的“李”谐音，他就取了中文名字“李福清”。论文写的是中国古代流传甚广的民间故事“孟姜女哭长城”，论文的题目是《论孟姜女哭断长城》，以此透视中国古代政治、文化及社会历史。

此时，李先生高扬声调对我们说，这位学者选取中国古代一则



家喻户晓的民间故事写毕业论文，居然获得了副博士学位。此话一出，引得满堂唏嘘。（这里说明一下，苏联的副博士学位相当于中国的博士学位。他们的博士学位则是更高一级的学位，要求此学位获得者在相关领域有非同寻常的贡献。）

李先生跟我们讲这个故事倒不是为了说笑话，而是为了启发我们，做学问要善于从司空见惯的平常事物中挖掘出非同寻常的意蕴。

这事一晃过去了24年，凑巧的是1985年元旦过后，我遇见了当年逸闻的主角——那位中文名叫李福清的俄罗斯人。当时新闻系领导让我到西安去接何徽老先生。何老年届7旬，是新闻学界巨擘之一，正准备从陕西省社会科学院院长职位上退下来。武大闻讯后立即打报告给湖北省委请调何徽先生来刚成立不久的新闻系任教，助推新闻系的发展。报告很快批下来，何徽老先生整装待发，而帮助何老搬家到武汉的任务落到了我身上。到西安的第二天，何老安排我同一位苏联汉学家和陕西省社科院一位专家乘小轿车参观仰韶文化半坡遗址、临潼骊山华清池、秦始皇陵兵马俑坑、武则天陵墓等多处遗址。途中，这位汉学家问我在哪里供职，我说在武汉大学新闻系，是中文毕业的。这位汉学家激动地问：“你认识李格非教授吗？”我回答：“他是我的老师。”他扭头诚恳地对我说，“请你回去代我问李先生好。说我是他在莫斯科大学任教时，受他的引导走上研究中国文学之路的俄罗斯学生，中文名叫李福清。”我即刻拍手道：“你就是那位借《孟姜女哭断长城》获得副博士学位的高材生！李先生回武大给我们中文系师生做报告时讲的‘一则民间故事造就一位汉学家’原来就是你啊！”我仔细端详着这位苏联汉学家：大高个，50岁左右，举止文雅，讲一口流利的普通话。他对中国古典小说四大名著了如指掌，尤其对《三国演义》的分析十分透彻；同时，他对中国现当代著名作家如数家珍，全然不像个“老外”。坐在旁边的陕西省社科院专家介绍说：“他是苏联社科院高尔基文学研究所所长。”我一听十分惊讶，高尔基文学研究所相当于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是苏联文学界最高的学术机构，只有对文学研究造诣很深的人才能担当此职务，可见李格非先生的这位外国



学生十分热爱中国文学，并且学有所成。

观光了一整天之后，夜幕降临，华灯初上，是告别的时候了。我说，“欢迎您到武汉大学来做客”。他说很想到武汉拜访李先生，只是太忙，一直不能如愿，以后一定找机会。接着又叮嘱我回武大一定要代问李先生好。

后来，听说这位汉学家再次来中国时专程到武汉拜访了李先生。

2003年3月27日，李先生以88岁高龄辞世，他获悉后专门发来唁电，缅怀恩师教诲之情。可见外国人也崇尚中国的传统美德——“一日为师，终生为父”。

（作者系中文系1959级校友）



我的武大记忆

黄奇志

2013年，武大120岁。如此算来，1964年我成为武大学子时，母校武大已经71岁了，而我，时年17岁。

1964年17岁的我，身体甚至尚未完全发育，由于长身体时恰逢三年困难时期，我们这一茬人是在半饥饿状态下完成中学学业的。考入武大时，我的身高只有158厘米，体重才39公斤。成为武大学子后，享用学生食堂美味的油饼、油条、馒头、肉包、稀饭早餐（我的中学时代没有早餐，一天只午、晚两餐，只有寡油少盐的青菜，绝对没有肉），午餐晚餐不时变换的鱼肉蛋（油炸鱼块、红烧肉、粉蒸肉、鸡蛋炒番茄、煨藕汤、洪山菜薹炒腊肉……），用每月13.5元甲等助学金即可支付的丰盛伙食，使我在18岁真正完成了从少年到青年的转变，身高达到169厘米，体重达到55公斤。可以说，我是到了武大之后才真正长大成人的。

光阴荏苒，在纪念母校武大校庆120周年的时候，我已是一位66岁的老人。回首往事，我在武大度过的日日夜夜仍是那么清晰，那么亲切。武大的校园、武大的师长、武大的同学，是那么值得怀念。

一、校园记忆

武大是我的高考录取第一志愿。高考前中学宣传栏张贴的全国各高校的招生简章，武大图书馆老斋舍的美丽独特一下子就抓住了我的心。那孔雀绿的琉璃瓦，那翘然欲飞的檐角，那高耸雄开的拱



门，是多么神圣的大学殿堂！当我如愿以偿成为一名真正的武大学生之后，心里真有说不出的幸福感。

那时老斋舍是外文系、数学系、生物系男生和全校女生的宿舍。我们中文系以及哲学系、图书馆学系、化学系的男生被安排在四区的八、九、十、十一栋宿舍，中文系住八栋。四区的这4栋学生宿舍建筑质量不太好，听说是1958年后新建的，但在外观上依然承袭了武大老建筑大屋顶的建筑风格。八栋在1965年成为越南留学生宿舍时作了内部装修，但外观不变。中文系1963级、1964级则于1965年迁入十一栋，直至离校。

尽管在校没有住上心驰神往的老斋舍，我仍然为武大美轮美奂的建筑感到自豪。与老图书馆、老斋舍遥遥相对的是行政大楼，其下前方是宽阔的大操场，浓荫掩映的是小操场。我们的入学典礼在小操场举行，每周一次的露天电影也是在小操场放映的。1965年的元旦迎新晚会，我在小操场欣赏了本系师哥师姐们演出的歌舞《花儿与少年》，美妙的音乐、灵动的舞姿，让我如醉如痴，至今不忘！大操场则洋溢着武大学子们旺盛的青春，每天下午4时以后，这里跃动着学子们矫健的身影，踢球的、跑步的……青春的欢乐在这里定格。如果不能选一个角度表现武大校园美的话，我认为就是在行政大楼上取老图书馆、老斋舍的景，也就是我当年在武大招生简章上看到的那一张。

上大学后，与中学最大的不同是上课没有固定的班级教室。当年我们是轮着在东教室、南教室、西教室三栋教学楼上课。东教室在行政大楼左下方，距离四区宿舍最远，步行约10分钟。南教室在老斋舍右下方的半坡上。西教室就在四区八栋的旁边，离宿舍最近，我们大部分的课都在西教室。教室窗外的风景，以东教室为最好，绿树碧瓦，尽入眼中。南教室则在桂花飘香时最佳，可以闻着花香听课。西教室外是四区大操场，没什么风景，只能安心听课了。说来奇怪，我在大学里学得最好的两门课也是终身受用的两门课——《现代汉语》《形式逻辑》，基本上都是在西教室听的。

武大的澡堂和游泳池也给我留下了难以磨灭的记忆。我们两广的同学，天气转凉后，仍坚持用铁桶盛水在宿舍洗漱间冲凉。但武



汉的冬天可不是好受的，在同学的鼓动下，我终于鼓起勇气到学校大澡堂去洗澡了。第一次进去，脱光了衣服，竟看见了教我们写作的老师，老师也脱得赤条条的，而且还笑盈盈地主动打起了招呼：同学，你也来了？师生如此“赤诚”相见，在我还是平生第一次。之后，也就习惯成自然了。湖滨游泳池则是夏季消暑的好去处，即使不游，只静静地泡在水里，任凭湖水有节奏地拍打着身子也是非常舒适的。头上是纯净的蓝天白云，默念着毛主席的名句“极目楚天舒”，惬意极了。

武大校园的美在于其有山有水，建筑融汇中西风格，植物蓊郁，种类繁多，一年四季景色分明。夏天，高大挺拔的法国梧桐枝浓叶茂，大大消减了武汉逼人的暑气；秋天，金桂飘香，沁人心肺；冬天，腊梅怒放，青松傲雪，令人神清气爽；春天，樱花虽说只有短短 10 多天的花期，但是以它的热烈灿烂，绝对是武汉三镇春景的主角。人生而有幸求学于武大，得享此“物外桃源”（郭沫若《洪波曲》赞武大语）之美景，此生足矣！

二、师长记忆

按当年的学制，中文系要读五年，一、二年级为基础课，到三年级才分专业。我 1964 年入学，1966 年卷入“文革”无休止的动乱之中，严格讲只上过近两年的课。1968 年“复课闹革命”，又断断续续上过一些课。工宣队、军宣队进校后，老师学生进行军事化编队，取消系别班级，中文系被编为四大队十六连，开赴襄阳分校隆中广德寺参加三线建设，66、67、68 三届于 1968 年离校，69、70 两届 1970 年分配离校。一、二年级时多是在课堂上接触老师，而在襄阳隆中，则是与老师们同吃同住同劳动了。

“文革”前中文系老师有“五老八中”之说。“五老八中”是我们心中崇敬、仰慕的师长。“五老八中”之中，我们这一年级有幸听过其中“一中”刘绶松教授的一堂课，他是讲现代文学史的，在我印象中，他讲课平平，也许是专业性太强，那堂课没给我留下什么印象。工宣队进校后，“清理阶级队伍”，听说从他老家洪湖来了



几个贫下中农，要揭发他“地主家庭”的罪恶。那是一个星期六下午，我们在十一栋周围扫地，在那棵樟树下，我作为学生，见到了也在扫地的他，我礼貌地朝他笑笑表示问候，他也朝我以及我旁边的同学笑笑以示回礼，看不出有什么异常。扫完地，他可以回家过周末了。谁知第二天上午传来消息，刘教授和他爱人（外文系老师）前一晚在家里把大床竖起来，双双上吊在床两边了！时隔多年，不知十一栋宿舍旁的那棵樟树还在不在？樟树下刘教授对我们的那一笑，又该如何解读？

“五老”中有“一老”，人称“鲁老”的席鲁思（古典文学研究专家），个头瘦小，总是一身长袍马褂。“文革”初期大家都贴大字报表示“拥护”，鲁老贴的是两个巴掌大的小字报，用毛笔从右到左竖行书写，这是我在系办公室亲眼所见。及后，被当成封建遗老遗少打成“牛鬼蛇神”，他说“士可杀，不可辱”，绝食而死。

“八中”之中的周大璞教授（著名语言学家），是我入学时的系主任，河南人，慈眉善目，见人脸上总是带着微笑。入学分班，让我担任其中一个班的班长，当时全班 32 位同学，我个子最小，年纪也最小，甚至还不是共青团员，担心当不好。在他召集的学生干部会上，他亲切地鼓励我：大家会支持你的，好好干！那目光，就像父亲鼓励自己的儿子一样。

当年给我们授课的大多是年轻的讲师。教《现代汉语》的陈恩泉老师，广东潮汕人，普通话咬字却很标准，对学生的不标准发音，总是很耐心地指出纠正，我的普通话说得还可以，完全得益于陈恩泉老师的指教。蔡守湘老师，湖南口音极重，正因为学生听得不明白，到重点处，他也就不厌其烦地重复，所以他讲授的《诗经》我们印象就特别深刻。孙家富老师，教写作课的，有一张姚晨式的大嘴巴，似乎还有酒窝，讲课妙语连珠，以至于下课铃响后大家还舍不得离去。工宣队进校前有一段时间我们班编一本《毛主席诗词解说》（后由校印刷厂印刷），我有幸和孙家富老师共同钻研了一段时间，得到孙老师指点良多，由此培养了我钻研毛诗词的兴趣。孙老师真良师也。

韩愈说：“师者，所以传道授业解惑也。”在武大，最值得终身



敬仰的师长当属老校长李达。当年考入武大，最自豪的是老校长李达是中共一大12位代表之一。李达老校长的名言是“当择天下英才以教之”。我辈不算英才，但能当上老校长教导下的学生也是很幸福的。我只见过李达老校长一面，是在四区礼堂的一次大会上，他老人家坐在主席台上。“文革”爆发，老校长被当作“武大三家村”揪斗，“三反”罪名第一条是他对《羊城晚报》社论“论毛泽东思想的顶峰”的评语：“顶峰，那还要不要发展？”老校长是哲学家，因坚持哲学而遭罪。尽管当年我并没有参与“揪斗”行动，但“打倒”的口号是跟着喊了的。老校长是因为坚持真理而死的，身为武大学子，老校长所传之道乃大道，值得我们终生领悟体行。

三、同学记忆

“恰同学少年，风华正茂，书生意气，挥斥方遒”，以毛主席之伟大，同学情谊尚且常萦心头，何况我等普通之人，能不记同窗之谊？

我认识的第一位武大同学，却不是同班同窗的，而是比我高一届的本系学长，名叫朱开扬，中等个儿，胖圆脸，身板敦实，系学生会的体育部长，入学迎新接待站是他接的我。他把我从接待站带到宿舍，一路上帮着我拿行李，告诉我等下要拿碗到食堂打饭，我说还没买饭碗呢，他说，先拿我的去打吧。说着就快步回到他的宿舍拿了一只宽口平底搪瓷碗过来给我，碗里还有刚用水洗净的痕迹。时间已经过去了近半个世纪，朱开扬学长的搪瓷碗依然清晰地留在我的脑海里。朱开扬学长，你现在可好？

我们中文系1964级共招收63名学生。有一位姓雷的湖北天门籍同学因身体不适，报到后就回乡不再回校了。共分为两个班，62名同学中女同学只有4名。开始女同学全在甲班，我所在的乙班都是男同学，因此得了个“和尚班”的雅号，我这个小班长因此也得了个“小和尚”的绰号。第二学期，系里采纳我们的建议，从甲班调整了两名女同学到乙班来，从乙班调1名男同学到甲班去，“和尚班”成为历史，“小和尚”却从此成为同学们对我的别称。



武汉的冬天室内没有暖气，很冷。学校想得很周到，给我们这些南方来的同学都配发了棉衣棉裤。但我这个广西来的学生，以前睡觉从未垫过毯子、被褥，到武汉还真的受不了。来自河南滑县的同学袁振明，拿出他的一床褥子给我垫，这是我生平头一次睡觉垫上褥子。以后，袁振明又成了我的入团介绍人，让我在 1965 年成为了一名共青团员。

谢佚芳，广东怀集人，入学时他已是共产党员，是调干生。他是我们班上的老大哥，参加劳动时，重活脏活抢着干。他还是班上的义务理发员，在武大六年，都是他给我理的发。以后我俩一起分配到广东南方日报社，他又成了我的入党介绍人之一，还一直给我理发，直到我调回广西。

熊礼汇，湖北公安人，长得高大帅气，我们叫他“大老熊”，有诗人气质，是我们班唯一留校任教的同学。记得当年在隆中劳动时赛诗，描写人所遭受的痛苦，他有一句“钉板上打滚苦难言”，至今仍烙印于心。分配离校的那年，朝夕相处的同学们一个个都走了，大老熊对着空荡荡的宿舍空无一物的架床，禁不住放声大哭！之后，数次同学聚会，都少不了他热心操办。

我的武大同学们，你们的音容笑貌，你们对“小和尚”的关照，我永难忘怀！今生我们有缘相识相聚，全因为有我们的母校——武汉大学。母校不老！我们心中永远的武大！

（作者系中文系 1964 级校友）



摄影社那些事

——我的武大回忆

李 昕

要说武大中文系摄影社，还得从校学生会摄影社说起。

大约是 1980 年下半年，那时我在中文系读大三。一天，校学生会美工队队长刘涛来找我，说校学生会要成立一个摄影社，也就是照相馆，给同学们照照相，然后印出照片留作纪念，同学们有这种需要。我们的摄影社也可以适当收费，但价格一定要便宜，因为珞珈山照相馆收费太贵，很多同学照不起。刘涛知道我会摄影，也懂得暗房技术，所以问我有兴趣。我说这事好办，只要有人有设备有暗房，肯定做得成。他说没问题，与学生会协调，他来解决。

很快，校学生会是老斋舍楼顶平台上大屋顶的角楼里面，给我们腾出一间屋子，摄影社就准备在这里开张了。刘涛本人是摄影高手，且精通书法，但是他不喜欢张罗具体事情，找到我以后，他就大撒把了。他兼任摄影社社长，让我当副社长，然后就把一切都交给我来办。首先是组建班子，刘涛只给我介绍了历史系 1977 级的同学夏潮和计算机系的柴潇勇，其他由我来找。我就近在中文系 1978 级同学中，发展了骆苗、徐江和隋圻，又找了物理系的徐世斌，还有经济系的一位陈姓同学（名字已忘记了）。后来摄影社开张，因为和外系的同学不住在一起，那时又没有手机，联系不方便，所以摄影社一共八九个人，其实主力就是中文系的四位。

那时的摄影，用的是传统胶卷相机，拍的是黑白照片。我们要做的，就是先拍照，然后冲洗底片，再用底片放大黑白照片。这在



当时也算是高技术含量的活了。首先得有放大机，校学生会出资100元，让我们去买机器。我和刘涛跑到汉口，按照预算，抱回来一台80多元的，当天晚上架上一试，发现洗出来的照片都是虚的，对焦不准；再一看，原来是放大机的铁支架太软，时有轻微晃动，影响对焦。于是第二天又马不停蹄地跑回去换货，按理说已经拆封启用的机器，是不退不换的，我们好说歹说，照相器材店的女服务员看见我们是苦兮兮的穷学生，就同意给换了一台“海鸥”牌的，这一架就贵多了，共花了130多元。

其他设备就是相机了。校学生会无此预算，只能用我自己的相机。我的相机其貌不扬，就是一个接近正方体的小铁盒子，上面露出一个镜头，看上去笨头笨脑的。它是20世纪40年代东德的产品，品牌是“维拉”，几乎无人知晓。50mm的定焦，焦距是1:2.9。懂行的人一看便知这是一个非标准化产品，因为一般相机的焦距，有1:2、1:2.8、1:3.5等，从没听说过有1:2.9的。但在那个年代，老百姓中拥有相机的家庭恐怕十不及一，一个大学生能把这样一架老旧的相机带到学校，已经是一种奢侈了。这架相机成像极好，用过的人都说它特别“出片子”。我在农村插队时，曾经带着它走遍公社的村村落落，用它给老乡们拍过几千张照片。我发现它不论室内室外，无论光线好坏，拍出的照片清晰度都很高。记得我当时为讨好大队党支部书记，特地给他拍了一张近照，然后用10X12的相纸放大出来送给他，希望他镶在镜框里挂起来，谁知因为照片拍得太清晰，把老书记脸上的七沟八梁、疙疙瘩瘩都表现无遗，就像罗中立画的《父亲》似的。老书记见状说，“我有这么丑吗”，竟然当场将照片撕成两半。由此你就可以知道这相机的“写真”能力了。

设备有了，还得做广告呀。我和徐江、隋圻等同学平时在一起拍过一些照片，可以贴出去作为样品，但这时同学陶家凯说，你们几个秃小子的形象，能吸引顾客吗？打广告得有美女呀，可到哪去找美女呢？本年级里有6位女生，个个都是“读书的种子”，问都不用问，肯定是不肯做广告招摇过市的。于是找刘涛帮忙，他给我介绍了历史系的两位美女，一位是1977级的朱雯，另一位是1979



级的虞织文。这两女孩是闺蜜，出双入对，形影不离，平时在校园里就是引人注目的一对，总惹得男生给她们起外号。我在一个星期天约她们到校园里转了一圈，在图书馆、体育馆、湖边，她们尽情地摆出 pose；我拍了一组照片，然后把照片放大出来，贴到了校学生会的布告栏里面。

既然是收费服务，就要有定价标准，我和徐江就到珞珈山照相馆去“取经”。怎么取？就是去抄他们印制和放大照片价目表。那价目表上，从 1 寸、2 寸一直到 12 寸、24 寸都详列价格。我们抄回来以后，就一律除以 2，按半价计算。比如 6 寸照片照相馆收费 7 角 2 分，我们就收 3 角 6 分；4 寸照片照相馆收费 3 角 6 分，我们就收 1 角 8 分。拍摄一张照片，照相馆收费要 1 元多，而且没有外拍服务，我们只收 4 角钱一张，常年在外面设点。这样比起照相馆，我们的竞争力就很明显了。

摄影社就此办了起来，我们几个人轮班，两人一组，每周两次，下午课后在老斋舍平台图书馆前，定点为同学们拍照，晚上在暗室冲洗照片。我们洗出的照片，和珞珈山照相馆相比，质量一点也不差，很受同学们好评。于是一传十、十传百，各系的学生都跑来请我们照相，摄影点经常要排长队。许多同学、特别是刚入学的新生，要给家里寄照片，要在武大的校园美景留个影，我们的服务满足了他们的要求。

大约一个学期以后，摄影社盈利了。扣除设备和其他生产成本（胶卷、相纸、洗相药品）和摄影社人员的出勤补贴（每人每次 4 角钱）以外，上交给校学生会 150 多元。这在当时绝不是一个小数字，大致相当于一个大学毕业生三个月的工资。中文系主管学生工作的老师林豪生闻知此事，便来找我说：你们干嘛要给学校赚钱呀？咱们自己系里的人，应该给系里干。这话很有点肥水不流外人田的意思。我问：给中文系干以什么名义才好？他说：就叫系学生会摄影社。我在学生会成立一个勤工俭学部，你就做部长，兼摄影社社长。后来我才知道，所谓勤工俭学部，是不需要做其他任何事情的，摄影、洗照片，可以和勤工俭学画等号。

在这之后我和刘涛商量，中文系的四个人要撤出校学生会摄影



社了。刘涛此时也到了毕业前夕，无心恋战，看到主力统统离开，便和校学生会打招呼，他自己也要退出。正巧，此时老斋舍楼顶平台上的摄影社暗房被盗，洗放设备不翼而飞，校摄影社不仅无人经营，而且成了无米之炊，只能宣布解散。我们几人撤回到系里，重新购买了放大机，林豪生老师协调，在老八舍三楼的女生宿舍中腾出一间屋，作为我们洗相的暗房。重建中文系摄影社，我做社长，徐江是副社长，原有的四人不够，我们又在同年级的同学中拉进来几位摄影爱好者，记得有寇勤、刘道清、李建平、陶家凯等。由于男生都住在老八舍一楼，宿舍的窗子临着一条小路，我们选定了骆苗和徐江等同学的宿舍，就在那里开窗营业，接待顾客。窗台就是柜台，来登记照相和取相的学生不用进屋，就在窗外排队。由于我们大作宣传，把海报贴得满校园都是，食堂、小操场门口都有，特别是贴到了珞珈山照相馆门前，很有一点摆擂台、争客户的味道。这样一来，一时间非常热闹，顾客增加了很多，生意比校学生会摄影社时期火了不少。我们很注意照片质量，每天洗出的照片，装袋以前都要质检，发现不合格的，立即返工。有时在景点拍照，取景不理想，比如人脸黑了，或阴阳脸了，或人像不突出与景物不成比例了，就主动联系顾客重拍，重洗照片。我印象中，摄影社营业期间我们从来没有因为质量问题受到顾客投诉，更没有与顾客发生过纠纷。

说到纠纷，倒是有一次发生在我们和珞珈山照相馆之间。这家照相馆是武大校园内唯一的国营照相馆，位于12路公交车终点站旁，紧临一间热干面馆，其位置，离老八舍不过两三百米。因为我们的生意火爆，珞珈山照相馆变得门庭冷落，眼看要被我们挤垮了。一天下午，他们忽然派出两名员工，到我们老八舍一楼的营业部门前探头探脑，见到我们的营业广告牌上手就撕，用脚踹，弄得稀巴烂。他们大概觉得我们是非法经营，且对他们构成了不公平竞争。严格地说，我们的确没有履行工商登记，属无照营业，但我们以勤工俭学为名，又有校方支持，也自恃理直气壮。当时我不在宿舍里，后来听说，几乎是打了一场群架。最先发现有人搞破坏的是同班的杨铁原，此人是湖南汉子，人称“潇湘酒徒”，一向侠肝义



胆，好打抱不平。记得不久前我们开门办学，在农场里发现一个小偷儿，大家义愤填膺喊抓，也是杨铁原一马当先，提着此人脖领送到派出所的。这天杨铁原从宿舍里冲出，大喊一声“住手”，随即挽起袖子，扑将过去，与那两个照相馆员工扭作一团。因是在宿舍门前，同学们纷纷涌出，将那两人团团围住，形成群殴之势。那两人犹如过街老鼠，见状不妙，夺路而出，狼狈而逃。从此，再没有人敢来摄影社门前滋事了。

另一个小插曲是，我那架老旧的东德相机有一天突然坏了，快门无论如何按不下去。预约摄影的单子已开出了一大批，相机出故障，急死活人，这可是我们唯一的摄影工具呀！我们想找汉口的照相器材店维修，但是考虑到这架已经是文物级别的外国相机，估计维修人员都没有见过，怕是修不了。这时，当兵出身的同学万凤琪凑过来看看，摆弄了两下，说：“我来试试吧。”我们知道这家伙心灵手巧，平时就喜欢鼓捣些半导体收音机之类的小玩意，但并不相信他能修相机，只能死马当活马医了。谁知万凤琪把相机拿去，几下就把它大卸八块，一两个米粒大的小弹簧、螺丝钉拆出一大堆。拆开一看，发现机身内部，已经积下一层尘土。原来它像钟表一样，是需要“擦油泥”了。于是万凤琪把每个部件用汽油清洁一番，又原样安装回去，这机器立刻完好如初，快门咔咔作响，分外悦耳。

中文系摄影社又红红火火地开办了一个学期，后来学生宿舍搬离老八舍，我们的营业窗口没有了，摄影社就不再对外营业，但是作为本年级同学的内部社团，仍然为大家提供自娱自乐的服务。毕业前同学们颇为活跃，组织过学生毕业论文演讲答辩比赛，请校长刘道玉和众多教授亲临现场；又组织过中文系优秀毕业生写作讲习班，面向社会招收了1000多名学生，盛况空前。这些活动都被摄影社完整记录，有些照片还被发表在报刊上，作为新闻报道的插图。毕业前夕，全班同学一同到磨山游览，摄影社的记者一路捕捉精彩镜头，记下了大家当年的风采。我想那时武大的学生，大概没有哪个系哪个专业的同学，可以像我们中文系1978级同学这样，在大学期间留下那么多珍贵的照片吧。



说到摄影社的功劳，还有一条需要记上一笔。我们号称“勤工俭学”部摄影社，为系里赚了一点学生活动经费，那是不值一提的事，但是对摄影社内部的成员来说，还真是有一点“勤工俭学”的意义。摄影社里有几位同学，家庭生活蛮困难，我们规定每个成员每值班一次，给4角钱津贴，这对他们来说是不小的外快。比如后来做了嘉德国际拍卖有限公司常务副总裁的寇勤，现在是高薪名车别墅都有了，但当时却是依靠每月领取甲等助学金买书、穿衣、吃饭的，手头的拮据可想而知。那时学生食堂改善经营，提供夜宵，晚上8点以后，供应馄饨、油条、荷包蛋等，生活富裕的同学每晚加餐，而另一些同学只能往肚子里咽口水。我想，像寇勤等摄影社的同学，拿到出勤津贴以后，恐怕是狠狠地享受了几次荷包蛋吧？

最后再啰嗦几句，说说我那架东德相机。毕业前夕，我交了女朋友，作为礼物，女友送给我一架崭新的国产海鸥牌相机。这时万凤琪对我说：“你的旧相机反正也用不上了，不如转让给我。”我想，这架古董相机，说不定哪天又要修理，大概也只有万凤琪可以摆弄它，于是便同意了。不知后来，这相机陪伴了万凤琪多久？如果一直留到今天，或许能送到寇勤的嘉德公司去拍卖，卖出一个文物价呢。

（作者系中文系1978级校友）



青山绿水珞珈校园

李淑芳

我所知道的最浪漫的事，就是四十岁的人能有机会重新过一回二十岁的学生生活，感受来自生命深处的蓬勃朝气，酣畅淋漓地享受如夏花般灿烂的青春年华，由此更深地去体会生命的美丽。

20年后，重新走进这所中国最美丽的大学，心底不禁涌起一种恍若隔世的感觉，感慨岁月悠悠，年华飞逝。改变的是人的容颜，是不同时代走过这美丽校园的少男少女，是那青山依旧，绿水长流；不变的是那一颗颗永远年轻的心。

漫步樱花大道，看着迎面而来的一个个活力四射的身影，一张张飞扬着青春的笑脸，不禁为他们的年轻所感染，这些生于20世纪80年代的孩子们在尽情享受属于他们的美好时光。20世纪80年代，那是一个充满激情和理想的年代，以至于今天的我仍然能感觉到那种火热生活的余温。我重新走在这些当年经常经过的道路上，漫漫地回忆着那些属于我的金子般的岁月，品味着属于自己的那份年轻，内心感到前所未有的悸动和满足，或许这就是我重新读书的真正意义所在。

我深情款款地走在桂园的小路上，两旁的树木遮天蔽日，林子里一片清幽宁静。一些不知名的小鸟在林间穿梭鸣啾，互相追逐嬉闹，有一只居然在我脚下昂首阔步，全然不理睬我的存在。这是桂花悄然开放的季节，暗香浮动，一阵阵浓郁的花香随风而至，满溢



在空气里，让人忍不住深深地呼吸，神清气爽。当年班上只有5位女同学，爱花的天性使我们能克服一切恐惧，常常在半夜的时候倾巢出动去“偷花”。学校里花团锦簇，我们寝室也是四季飘香。桃花、樱花、桂花、梅花一应俱全。记得何姓女生最喜欢把梔子花戴在发间，引得当年多少英雄竞折腰！我那时年少无知，不解风情，只知道用桂花腌糖很好吃。虽然没有戴花的浪漫，但是那份甜蜜却也牢牢地印在了记忆深处。

教三楼风采依旧，虽然外表已不如当年那么崭新。下课的时间到了，学生们从楼里蜂拥而出，广播台开始播放刀郎的歌曲。还记得当年在学校广播台主持节目时的风光，也记得入学不久在那间教室做演讲时的情形。桂园食堂大厅见证了我主持晚会从稚嫩到成熟，所有以前不曾想象的事情都敢于去尝试，一切只因为那时很年轻。

站在当年的宿舍楼下，仰望3楼那个多少回出现在梦里的窗口，还是那样的熟悉亲切。窗下的小松树已经长大，那时我经常站在三楼的窗口俯视它，现在它已经长成了一个挺拔健壮的小伙子，浑身昂扬着旺盛的生命力，身姿越过我的窗口，直冲楼顶。

站在311寝室的门口，门虚掩着。我停了片刻，轻轻地敲门。一个很有磁性的男声底气十足地回答：“请进。”我看到一个20多岁英俊帅气、稚气未脱、朝气蓬勃的男生就坐在我当年的铺位上。床还是那张床，依然光鲜如初，仿佛时间不曾走过。他把眼光从书上抬起来，很诧异地望着不期而至的陌生的我。

20年世事轮回。我深深地注视着面前的大男孩儿，详细地告诉他20年前曾经发生在这个房间的一个女孩儿的故事，给他讲那些远去的日子，他惊奇不已。

他是法学院研三的学生，正在复习考博，准备报考北大法学院。我衷心地祝愿他梦想成真。

其实，那又何尝不是我的梦想呢？！

二

我以为武大之美，在于她的自然与人工的浑然天成。天人合一



是中国哲学追求的最高境界，而这恰恰是武大建校之初的指导思想。站在依山而建、气势磅礴犹如布达拉宫的老斋舍前，感受武大老建筑群的苍劲和雄浑，你会惊诧于 20 世纪 20 年代一个美国建筑师对中国传统文化的深刻理解。理学院、工学院（现在的行政楼）无不彰显着人与自然的和谐统一。徜徉于古树丛林之间，你能深刻地体会到武大厚重的历史积淀和浓郁的人文气息。

煌煌武大，烨烨其华。

行政楼背靠珞珈山，俯瞰东湖，远眺磨山，尽显珞珈之翠，东湖之瀚，占尽湖光山色的秀美，被国内建筑学家称为“最美丽的大学中最美丽的建筑”。站在行政楼的台阶上，回想起 1983 年刚入学时，我们新生被安排去给电影《女大学生宿舍》当群众演员的情景。当时拍的是下课的场景，我们一遍遍地走来走去，感觉只有累和乏味，巴不得快点结束。后来电影在小操场首映的时候，导演黄蜀君专门致辞表示感谢，我们则一心一意地想在画面上找到自己的身影。那天晚上电影散场后，大家还一直热烈议论着周围突然出现的许多“电影明星”，互相打趣。

多年以后，这部电影仍然是我大学时光的一段难忘的回忆。

到武大，不能不到情人坡去走走，尤其是天晴的时候。白岩松来武大时曾说过：“武大的环境这么优美，大学四年不谈一次恋爱是很遗憾的。”情人坡就是樱花大道下面那片美轮美奂的林子，和繁华的樱花大道相映成趣的是这里的曲径通幽。浪漫的樱花、凄美的梧桐落叶，营造出一种宁静祥和、超凡脱俗的气氛。傍晚时分，一对对恋人在这里许下心愿，牵手未来。当然，这里也不仅仅属于情人们，坐在参天大树下的小石凳子上或读书或聊天，也是不错的享受；甚至只是坐着发呆，也不失为一种陶醉。一个人静静地坐在这里，什么都可以想，什么都可以不想，便觉得是一种幸福。

最爱梅园的那片樟树林，那份清幽、静美、高雅，宛如人间仙境。尤其是在炎炎夏日，听着蝉鸣，享受着清凉，嗅着扑面而来的花香，坐在石桌边，随便翻开一本书，或者干脆合上书本，戴上耳机去听上一首《春江花月夜》，会忘记自己所置身的这个世界。

武大，你的美无法言传。我所能做的只有在你的怀里尽情地享



受上天的恩赐，感受你的博大和灵性，努力地去体会一种生命的永恒。

是这般柔情的你给我一个梦想，徜徉在起伏的波浪中盈盈地荡漾，在你的臂弯；

是这般深情的你摇晃我的梦想，缠绵像海里每一朵无名的浪花，在你的身上。

亲爱的母校，我回来了！

（作者系历史系 1987 级校友）



就这样望着你的脸

李少君

每次到武汉，不管多忙，我都一定要回珞珈山看看，其实也没什么事，就是在校园里随便走走。比如，在樱花大道散散步，去东湖边吹吹风，在桂园宿舍寻寻旧，或者到樱顶喝杯咖啡，到梅园操场回味一下当年拿着小板凳看电影的感觉……总之，这种情感如此深入骨髓，就像过一段时间必须回一趟家似的；这种惦念如此顽强固执，随着年龄增长，回珞珈山的频率越来越快。有一次去武汉，实在没时间专门回珞珈山了，就提前出发，让送我的车从武大绕一下，然后，伸出头来看一看珞珈山。

看着珞珈山，我就想起了三十年前那首曾经耳熟能详的歌：

我们曾经坐在广场前
将那忧郁的歌儿唱遍
那时候未来还显得遥远
我们期待着一个改变
——一个奇异的瞬间

那个瞬间总也没出现
可是分明一切已改变
回望时道路已伸出很远
我们已经习惯独自走在
——陌生的人海中间



就这样望着你的脸
像那时我们望着蓝天
就这样望着你的脸
隔着多少岁月多少年

.....

确实，就这样望着你，珞珈山，好像时间还未远去，我还是那个初来乍到的 17 岁的懵懂少年，充满热情又茫然无知；又好像一切都过去了，但我仍然对珞珈山怀有强烈的、非同寻常的深厚感情。

我一直在反思这是一种什么样的感情，仅仅是青春的回忆吗？人们都说青春是最难忘怀的；还是那些共同成长的经历？一代人无法磨灭的艰苦岁月和痕迹烙印；抑或，一种类似理想加青春加激情的共同体情感？因为，我们都是 80 年代的儿子，是思想解放运动的产物，是自由开放的时代风气的受益者，是激情燃烧的热血青年，是理想主义和浪漫主义的急先锋。

在珞珈山这样的地方，很容易培养出一种带有个人主义色彩的生活方式，而其精髓就是：自由。在武大读书期间，我们就常拿武大和北大比较，说北大追求民主，武大则追求自由。这样的比较略显简单，但里面也透露出一些信息，即在珞珈山这样满眼青山绿水的地方，很容易唤起诗情画意，文艺细胞空前活跃。珞珈山是文艺青年和伪文艺青年的大本营和根据地，谁都会在情人坡上文绉绉地来几句诗，或在樱花树下摆几个很文艺范很有派头的姿势，更酷一些的，则是抱把吉他登上珞珈山，在山上放声歌唱。

我是学新闻的，当年一到学校就惊讶地发现几乎所有同学都写诗。而长期迷恋于此的青年，很容易加入或发起一些文艺小团体，所以武大文学、诗歌社团很多，最久的浪淘石文学社已成立三十六七年。如果有更多的追求，这些文学、诗歌社团最终会发展成为诗意小团体，乃至文学共同体。2014 年 4 月，当我在北京农展馆南里中国作家出版大楼的楼下与邱华栋、洪烛不期而遇时，这种感受特别强烈。



20 世纪 80 年代，我们在珞珈山上一起办珞珈诗社、樱花诗赛，组织各种诗歌采风朗诵会，从未想到过 30 年后我们又走到了一起，而且是在一栋楼里工作。但这 30 年间，我们一直有联系，我在海南，他们在北京，我们各自奋斗。“独自走在陌生的人海中间”，但我们常有信件或电话，约写诗歌或文章，讨论交流，互赠新出的诗集文集，一直保持着某种相当密切的关系，从未中断。这样一种隐秘的相互关注和精神交流，我理解为就是一种诗意共同体和精神共同体。

最令我难忘的一次，是我在楼下马路上见到好长时间没消息的陈勇。我们曾经一起发起过“珞珈诗派”，我和他及洪烛、黄斌、单子杰、孔令军、张静等七个人，长期占据《武汉大学校报》的第四版副刊，在校园里宛如一道诗意风景线。我看着陈勇，久久说不出话来，就如那首歌所说的：就这样望着你的脸。我强烈而又恍惚地感受到：近 30 年的时间流水般消失，但又觉得，时间从未远去，我们几个人居然又在一起了，而且在同一个地方，只是地点从珞珈山换到了团结湖。洪烛一直在中国文联出版公司，邱华栋从《青年文学》调到了《人民文学》，我也来到了《诗刊》，陈勇则在旁边一家影视公司。世界居然就真的只有那么大，30 年来，我们并没走多远，还是在同一个地方，小到就在同一栋楼里，这不就是一首歌里唱的：世界从未改变。

当然，还是有些东西改变了。10 年前，我在香港铜锣湾遇到邓峻时，曾有过这样的感慨。邓峻，法学院才子，从小就出生在珞珈山，家世好，品位一流，很有涵养，人帅到不自知，但常有寂寞伤感的表情。大学期间热衷音乐，抱着一把吉他迷倒众生，他身边总是美女如云。我因为为校报做一个校园文化深度报道，在他的热心介绍下，接触了武大的一帮校园歌手。

1984 年，中文系学生刘一民、杨树、李峰、谢际真等率先组织“黑眼睛吉他协会”，他们创作的《请将那张唱片留给我》《送别》《故乡的江边》等歌曲风靡整个武汉高校校园。刘一民更是成为明星般的人物，在 1985 年武汉高校歌咏比赛中囊括校园歌曲创作全部五个奖项。随后，长江文艺出版社为他们出版了校园歌曲作品集



《珞珈歌曲》。毕业之后，刘一民又写出了《未来曾显得遥远》，至今仍被认为是武大校园歌曲的经典。邓峻深受刘一民师兄等的影响，随后与全威、叶汉平、王敏、胡昉等先后加入 CAMPUS 歌会。武大广播“每周一歌”曾多次播出他创作的歌曲，邓峻还成为首个在武大成功举办个人演唱会的校园歌手，当时在全国也属首次。与此同时，中文系 1985 级的吴伟文、刘晓霞、蔡青则成为在校园里广受追捧的校园歌手，吴伟文、刘晓霞还成为当年演绎杨树、刘一民原创歌曲的第一批歌者。珞珈山上，一时诗如云歌如海，每天都仿佛过着狂欢节。

邓峻毕业后，在海南短暂地工作了一段时间，随后去了美国留学打工，我对他后来的生活一无所知。然后，又听说他到了香港当律师。那一次，在香港街头久别重逢，我们找了一家茶餐厅，坐了一个多小时，坐在陌生的地方，望着邓峻的脸，我突然觉得这个早年的朋友有些陌生，有些心不在焉，话题好像也有些东拉西扯，说过一些什么现在都记不得了。

当时觉得彼此生活已经相隔遥远，甚至觉得见一面算一面。谁知世事难料，10 年后的一天，邓峻突然来到北京，说要找我。我正在外地，他说要等我回来。回来后见面，我们还是找了一个餐厅坐下，慢慢开聊。他说他这些年来想通了，觉得钱是永远挣不完的，还是想做些自己喜欢的事情，于是辞职了，准备主要从事与艺术相关的工作。而当下最主要的一件事，就是把武大 30 年来涌现的校园原创歌曲收集、整理出来，并准备在珞珈山组织一场“校园歌曲三十年”的大型演唱会。邓峻介绍说，武大的校园歌曲历史从未中断，后来又涌现过一大批优秀歌手和作者，1996 级电子工程专业的李楷，出版发行原创音乐专辑《珞樱》，已出到第三辑；段伯昌，出过原创专辑《凝时》，举办过演唱会；尹晨，现今校园歌手中的佼佼者，参加了今年的《超级女声》，创作的英文歌曲 *It's Over Now* 极受瞩目；王圣夫，第一届现代艾克斯原创歌曲大赛亚军……其中的一些作品，如 1995 级生物系学生彭挺在 1999 年创作的《樱花树下的家》等影响很大。他们几代校园歌手，现在拧成一股绳，准备大干一场，要再创武大校园歌曲新的辉煌。



再次望着邓峻的脸，我又觉得其实他没变多少，他还是那个满怀激情的校园歌手，虽然已经沧桑，但情怀依旧。时间并未能将他改变太多。

我把邓峻他们的大举动发布在微信圈。有武大学子欢呼“珞珈山的文艺复兴要来了”，因为就在不久前，“珞珈诗派”也在武汉举办了30年后的首场朗诵会，武汉大学校长李晓红院士专门到场祝贺。而且还有众多迹象表明，武汉大学万林艺术博物馆也将举办系列重要活动。对此，我觉得倒不如理解为我们这一代人理想仍存，激情还有，正好又迎来了一个新的诗性时代，这一次，或许真会产生一些什么：新的美学思想和观念？精神价值？乃至一种更符合人性的生活方式？一种我们真正想过的生活？我不知道。我脑子里反复萦绕的，还是那句歌词：“就这样望着你的脸。”

就这样望着你的脸
像那时我们望着蓝天
就这样望着你的脸
隔着多少岁月多少年

.....

是的，就这样望着你的脸，隔着多少岁月多少年，我还在望着你的脸……一切既熟悉又陌生，我们常常分散各地，人过中年，各有家室事业，但也难以真的永远割舍分离。我们其实都是同一种人，身处俗世又想超越俗世；在同一个世界，我们面对相同的困惑和处境，也常有相同的痛苦和喜悦；我们还同属一个情感共同体和精神共同体，珞珈山是我们永远的家园。

（作者系新闻系1985级校友）



乔木思旧国 珞珈唤归魂

——缅怀汤子炳(商皓)学长

刘以刚

我与汤子炳学长相识是在 1985 年。这一年的 5 月 25 日，旅居美国的汤子炳学长回到阔别 51 年的母校访问，当时，我任高教研究所校史研究室主任，有幸忝列参加接待工作。能够亲眼再看看母校的一山一水、一草一木是汤先生的夙愿，过去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始终未能成行。改革开放后的 1985 年，当汤先生重新踏上这片与他有着不解之缘的校园故土时，他的心情是何等的激动和兴奋啊！

当时陪同汤先生前来的有他的同班同学、原华中理工大学教授张培刚，我校经济系教授黄永弼，汤先生在湖南工作的儿子汤原华，外甥许廉发等人。学校相关同志热情地接待了他们，并向他们介绍母校现在的情况。汤先生对解放后母校的巨大发展变化表示惊讶和赞叹，不住地称赞道：“这可比得上世界一流的大学！”当有关部门同志送给他一套武大彩色图片时，汤先生一脸惊喜，连声说：“这是母校送给我的最好礼物啊！”汤先生在台湾生活过很长时间，他回忆起一段往事：1961 年，不知是哪位校友得到一本从祖国大陆带过去的武大画册，在台校友如获至宝，纷纷翻印，聊慰对故园的热爱、对母校的思念之情。

我们陪同汤先生游览了校园，在老图书馆阅览大厅里，他环视四周，抚摸着桌椅，追忆已逝的岁月。当他和张培刚、黄永弼两位同学并排挨坐在一起，沉浸在当年负笈求学的青年时代的回忆中时，有人为这三位年逾古稀的老人拍了一张照片。汤先生参观了老



斋舍、教学楼和正在开饭的学生食堂，又兴致勃勃地找到他曾经住过的列字斋寝室，和现在住在这儿的计算机系的三位同学亲切交谈，合影留念，勉励小学弟们为国家用功学习。

在参观过程中，我私下向张培刚教授提出，想请汤先生谈谈武大校园内樱花树的来历。于是，张教授有意识地大声说道：“我们当年读书的时候，这里还没有樱花树吧？”言外之意是婉请汤先生作答。但是，汤先生没有应声，可能是一两句话说不清楚的缘故吧。我又对他儿子汤原华提出，是否能请他父亲写写当年留守珞珈山护校和有关樱花树的故事，以便弄清楚当年武大的这段史实，他答应了。第二天送汤先生到南湖机场，临登机前，我又对汤原华提及此事，得到应允。这里还有一个小插曲，参观完毕，在半山庐旁的教工小食堂二楼（此处现在已改建成武汉大学校友工作办公室、教育发展基金会和董事会办公的地方），设宴款待汤子炳先生一行，我也作陪。厨师刘师傅烧了一桌丰盛的美味佳肴，张培刚教授连声赞道：“味道不错，不错！”并问道，“厨师是谁？”当刘师傅出来和客人们见面时，张教授惊呆了：“是你啊，刘师傅，当年你结婚时我还是你的证婚人哩！”说罢，汤子炳等人哈哈大笑，并给刘师傅敬酒。（张教授原是我校经济系主任，总务长。1952年华中工学院建校后，调往华工参加创建工作。）

数月后，汤先生从美国给我寄来一文：《1985年回国重游珞珈母校武大忆往感怀记》，文中详叙了1938年他受王星拱校长和杨端六教授之托，留守珞珈护校的往事及樱花树栽种的历史，对今日母校的发展变化表达了欣喜和敬佩之情。1988年我主编《武大校友通讯》，写了一篇《白云游子意 落日故人情》的文章，详细介绍了汤子炳先生这次母校之行，并附上汤先生的《1985年回国重游珞珈母校武大忆往感怀记》一文。于是，武大樱花树种植的时间，武大人留守护校的壮举，以及当年武大校园的情景等被第一次公诸于世，弥补了武汉大学在抗战时期缺失的这段校史。

汤子炳学长1912年出生于湖南省大庸县（现张家界市），1934年毕业于武汉大学经济系；后东渡日本留学，专习国际贸易与国际金融；1937年“七·七”事变不久，回到母校执教。1938年4月，



武汉大学西迁四川乐山。行将迁校前，王星拱校长和经济系主任杨端六教授考虑汤子炳谙熟日语，其夫人铃木光子又系日本女子，于是指令他留守武汉，保护学校。同时留下的还有总务处3人，秘书组1人。1938年10月底，武汉沦陷，武汉大学被日军侵占。当时校园内驻扎一个日军联队，联队部设在文学院，联队长是荒原大佐。过了不久，汤子炳冒着风险，嘱托夫人铃木光子前往“武汉治安维持会”，联系前往珞珈山巡视校园事宜。获准后，他们从汉口由学校预先租定的一间民房出发，过江上岸，沿途遭日军数次盘查。一路上，只见兵车辚辚，路断人稀，一幅战时景象。一行6人，无不暗中垂泪。在文学院原王星拱校长办公室，见到了荒原大佐。汤子炳在与他谈话时，要求他将驻扎在校园内的千余名日军调往城外，迁让出若干校舍，以便保留学校原貌。荒原大佐最终答应将住在天地玄黄至辰宿列张15栋学生宿舍的大部分官兵调往城内。但是，文、理、工学院已被日“华中派遣军”文职人员使用，18栋教授宿舍也由日军高级军官居住。学生饭厅楼上楼下为日军野战医院，拒不迁出。汤子炳一行乘车从学校大操场转到湖边女生宿舍，又转到东湖边的自来水厂，然后回到理学院，绕往山后的教授宿舍巡视，只见各处门前都是日军出入。武大附中，军车云集，已经成为车辆调度场；邮局附近，已经成为一片马厩；学生饭厅下面的体育馆，已成为日军军官俱乐部。大好湖山校舍，不久前还是传道授业的地方，现在忽然变成日军活动居住的场所，汤子炳一行无不悲痛万分。

1939年春，汤子炳一行又来到珞珈山巡视校园。此次接待的是日军一文职武官高桥少将，此时校内驻军减少，校园已成为日军办理后勤的地方。高桥表面和善地对汤子炳说：“惟值此春光明媚，尚欠花木点缀，可自日本运来樱花栽植于此，以增情调。”随即引一行人到文学院前，遥指将要栽植樱花的地方。汤子炳回答：“可同时栽种梅花，因为中国人甚爱梅也（他的意思是，樱花是日本国花，梅花是当时中国国花）！”高桥婉拒，并说：“樱苗易得，梅种难求。”要他们明年今日来此赏樱。汤子炳栽种梅花的设想没能实现，但维护民族尊严的精神却溢于言表。



1939年冬，学校留下的守校经费即将用完，汇兑又不通。于是汤子炳派两人设法入川返校复命请示，一人回到黄陂原籍家中，另一人和他一起继续留汉护校。由铃木光子向日侨批发部购买日用品出售，维持生计。每过数月，则去珞珈山巡视一次。1942年冬，铃木光子病逝，两个儿子无人照料。1943年夏，汤子炳与现在的夫人刘崇贤女士结婚，一家四口生计维艰。夫妻商量后，决定将二子寄养岳父家中，两人借故先乘船到上海，再转香港赴湘入川。而另一名留守护校的涂君，因年已老迈，也先回到原籍汉川去了。临行前，汤子炳最后一次回到珞珈山护校巡视。见到尚未光复的校园，他徘徊良久，暗自落泪，久久不忍离去。1943年冬，他在上海由朋友介绍，在一家银行工作，等待返校时机。

1945年8月，抗战胜利了。汤子炳与学校取得联系，周鲠生校长嘱咐他返校。正准备成行时，台湾光复，新建立的台湾省行政长官公署急需留日学生前往协助接收，于是汤子炳应邀前往台湾工作。

诚如汤子炳所言：“予毕业武大，返校任教，受命于危难之际，留汉护校，三年苦守，校舍无恙，幸未辱命。夫以当时数百万国防军，犹不克阻顽寇，而纷纷损兵失土。而予与数同仁，皆手无寸铁之文弱书生，尚克冒险犯难，与寇酋数度周旋，完成此一艰巨任务，未负学校当局之苦心！”

所以，当汤子炳学长在阔别数十年后，重游珞珈旧地，抚今追昔，怎能不感慨万分呢？他说：“所幸予曾守护之校舍益见壮丽，珞珈东湖愈觉明艳，尤以弦歌大振。昔日全校师生约只千人，今则学院及科系增加甚多，学生已达一万五千余。遍地厅舍林立，人潮澎湃，非复昔日之疏落气象（予昔宿列字斋，独居一室，今则上下铺3人）。新中国前途全赖此济济多士之后辈同学矣！”表达了饱经忧患的老一辈学长的喜悦心情和对新一代武大学子的殷切希望。

汤子炳学长自1985年回母校访问后，又曾4次回国观光讲学（最后一次是1996年冬），受到武汉、长沙、张家界等地领导的欢迎和赞扬。他热爱祖国，在自己的名片上用中文楷体印着“原籍中国湖南省张家界市”，以此表明自己作为一个中国人的骄傲和自



豪。他留在大陆的两个儿子虽历经坎坷，但均刻苦追求，也都事业有成。长子汤原华，曾是湖南张家界市政协委员、张家界市人大代表、张家界市归国华侨联合会副主席。次子汤少皓，曾任新疆兵团侨务经济工作联络员、石河子市侨联委员、石河子诗词学会会员。汤子炳经常写信鼓励在大陆的儿子服务祖国、建设祖国。1995年4月5日，他在给二儿子汤少皓的信中写道：“报载（指美侨报）新疆加强文物保护工作，此点至关重要。国内物质与精神文明建设能如此齐头并进是大可喜的。祖国由此日益富强，吾辈华侨在海外可益受外人敬重。出国愈远愈久，愈知祖国富强之可贵！”1996年7月10日，他在给汤少皓的信中赋诗一首，表示切盼香港回归的心情：“百年割地今归还，旧耻回忆泪不干。惊叹虽觉头已白，故国亲人笑震天。”拳拳赤子之心，令人感佩！

最能表现汤子炳爱国情怀的还有一件事情。1997年3月23日，中国海军舰艇编队访问美国，到达美国海军基地圣地亚哥，数以万计的旅美华侨纷纷前往参观。居住在洛杉矶的汤子炳虽已80多岁高龄，仍抱病同夫人驱车数小时赶往圣地亚哥参观中国海军军舰。汤先生一踏上军舰，就激动地对中国水兵说：“我们虽然来到了美国，但还是中国人！”汤夫人也说：“中国军舰很气派，中国人能在美国看到自己这么好的军舰还是第一次，真感到自豪和扬眉吐气！”两位老人还和哈尔滨号军舰政委夏克伟合影留念，并给我寄来这张照片。

1997年11月2日，汤子炳学长因患肺癌与世长辞，享年86岁。汤子炳学长生前给我来过几封信，对当年的接待表示感激，并极为关注《武大校友通讯》。他在一封信中说：“每读寄来的母校通讯，如重返故国，其间珞珈山光，东湖水色，辄萦怀五内。”他是在美去世的胡国材学长写来纪念文章：《追忆诗词权威胡国材学长》，刊登在《武大校友通讯》上。汤子炳学长辞世后，其家人给我寄来一本怀念他的纪念册，二子汤少皓还与我有过一段文字联系。汤子炳学长在台时，先在政界任职，20世纪60年代后告别政界转教杏坛，先后任中兴大学、淡江大学教授；主要著有《国际贸易与国际金融》《国际贸易实务新论》《中国经济史》《台湾史纲》等；



1997年3月，中国海军编队访问美国，汤子炳学长驱车前往参观中国军舰。
图为汤子炳学长与军舰首长合影

1982年应在美子女之邀移居美国。他热爱公益事业，曾任加州湖南同乡会监事主席、加州华人参政促进会会员、美西武汉大学同学会理事等职。汤子炳去世后，时任武汉大学南加州校友会会长的赵保轩学长及武大在美的一些校友前往悼念。

在汤子炳学长逝世近二十周年之际，我重新整理了这篇文章，以表达对这位老学长的敬重、缅怀与哀思之情！

（作者退休前在校友总会工作）



请将这张唱片留给我

刘一民

我虽未以音乐谋生，但它却与我相伴了几十年。我把它当成自己心中一方有花有草的小小园地，无论是四处奔波还是百无聊赖，都愿意常常回到那里去——那里让人轻松愉快，让人自然纯粹。

—

我出生在遥远美丽、歌舞遍地的新疆。

20 世纪二三十年代，我的祖父毕业于黄埔军校，后随军戍守新疆，新中国成立前夕他已是率部起义的国民党军队将领，但在“文化大革命”中，他毫无例外地受到冲击，甚至我的父母也受到牵连，并被遣送到吐鲁番艾丁湖农场改造。之后长达十余年时间，我一直生活在祖母身边。

祖母是湖南长沙人，受过良好教育，是我最信赖的老师。正是她，给了我音乐的启蒙，唱歌、识谱、吹口琴乃至从京剧样板戏中辨识乐器、声部，等等，都是跟她学的。在那段艰难的岁月中，我和祖母相依为命，她用母爱育我成长，我利用童心给她宽慰。1980 年上高中时，我就已能用简谱和五线谱听歌记谱了。那时家里只有收音机，只要我听过的、喜欢的歌，都会记下曲谱和歌词，身边同学颇为羡慕。

“文革”后，祖父的历史问题得到彻底解决，父母的莫名冤案也得以彻底平反。为了让我受到良好教育，祖父在征求我的意见之后，毅然决定带我回到他的故乡湖北武穴就读。1982 年，我考入



武汉大学中文系，毕业后留校在研究生院工作至 1992 年。两位老人一生辉煌而坎坷，他们对我无私的付出和关爱，在我眼中堪称伟大。

二

进入武大后，我利用中国吉他教学的开山鼻祖程志编著的《古典吉他教程》，较为系统地自学了古典吉他的弹奏。与此同时，我还阅读了大量关于乐理方面的书籍。这些知识积累和训练，为我日后编配吉他伴奏、谱写歌曲声部以及尝试音乐创作打下了较好的基础。

记忆中最初的音乐创作，始于 1983 年新年来临之际。我尝试着写了一首适合小提琴与吉他合奏的小乐曲，旋律舒缓、结构简单。系里举办文艺活动时，胡怡同学用小提琴演奏，深受大家好评。因为这段旋律很有歌唱性，隔壁寝室的杨树就填上了一段非常优美的歌词，取名《那明亮的眼睛》。后来，我又尝试着与杨树合作写了一首具有西洋曲调风格的艺术歌曲《在那个地方》。从此，我便信心满满地开始与善写诗歌的同学们联手创作属于自己的歌曲。这段记忆现在看来，是那么珍贵，那么美好！

大学一二年级，我还尝试改编了一些外国歌曲，填词的人除了杨树之外，还有班上的李峰、谢际争等。当时名扬校内外的浪淘石文学社凝聚了一大批像李峰、杨树这样的诗歌天才，他们在中国最早的校园歌曲创作中，起到了开先河的作用，那些精美的歌词达到的艺术成就，历经 30 年至今仍然能够深深地感染听众。从这个意义上说，我谱的曲只是依附了他们歌词的精髓而已。

记得进校后的第一个冬天，李峰写下了这样一首感人至深的歌词——《乡愁》：

层层乡思多么悠悠，层层乡思熬白了头，
奈何岁月无情向前流，故乡容颜依然如旧。
眷眷痴心多么悠悠，眷眷痴心熬白了头，



忧郁的脸庞更加清瘦，月亮也失去了媚秀。
每每的目光多么悠悠，每每目光熬白了头，
老牛车吱吱往哪里走，路过我的故乡没有？
深深的怀恋多么悠悠，深深怀恋熬白了头，
如织的游丝何处收留，故乡故乡故乡的愁。

这首歌我借用一首美国黑人灵歌的音乐素材编曲，把大调改成小调，使之更符合中国人的音乐习惯。此曲后来得到大学生艺术团周康明老师的推荐，曾安排一位男低音歌手在湖北省高校歌曲大赛上演唱，获得大奖。当时在场观众有不少人受歌曲感染而落泪。后来我才知道，台湾乐坛也把类似旋律改编成名为《祈祷》的歌曲，还有一说是从日本民谣翻唱的。

那时杨树和我经常一起弹唱英文流行歌曲，特别是民谣风格的。他曾有感而发，把奥斯卡影片《毕业生》主题曲 *Scarborough Fair* 填上非常动听贴切的中文歌词：

啊长江，让我离开你，
让我回到我北方去。
当北方飘起漫天大雪，
我却走进温暖回忆……

这些歌，在刚刚开放的 20 世纪 80 年代，像沙漠中的甘泉，配上我们班诗人们直击心灵深处的词句，加上醇美和声的演绎，一直陪伴我们度过大学最美好的青春时光。有些至今仍然令人回味，以至于抱起吉他，就会自然而然地弹唱起来。

当时，武大有北京图书馆来的图书馆系在职北京班，还有来自新疆石化的中文系新疆班。有一年冬天学期结束，北京班们乘火车回京，几乎坐满半个车皮。列车从武昌启程，穿过长江大桥，他们情之所至，在车上齐声唱起了这首离开长江“北上”的歌曲，他们反复吟唱，感染了众多乘客和乘务员，很多人脸上挂满泪水……

当听说此事后，我意识到校园里的歌声，其实不只是象牙塔里



的自我陶醉，校园氛围中那种纯净的、诉诸本心的情感表达，在大众中也会产生共鸣。而且，随着以罗大佑、侯德健等为主创的台湾校园歌曲传入内地，其中相当一部分作品的精神气质，与我们当时想做的和正在做的音乐，颇为类似。我和我身边这些优秀的同窗好友，都深深地觉得我们应该可以、也完全可以创作出属于我们自己的校园歌曲精品，我们正在亲身经历一场中国校园歌曲即将蓬勃发展的时代的到来。

随着编曲、谱曲、填词、作词等音乐创作经验的积累，我和杨树的合作日趋默契，便开始有意识地以通俗和民谣曲风来完成我们的校园歌曲创作。

三

武大校园歌曲的创作和传播主要得益于两个平台：一是学生们自发创办的“黑眼睛吉他协会”，二是学校官方组建的“大学生艺术团”。

1984年，正值刘道玉校长倡导开放办学，各类学生社团风起云涌，还有作家班、摄影班的开办，一时间珞珈山成了社会各界人士和莘莘学子心生向往的“圣地”。整个武大呈现出一派多元化办学的生机勃勃的景象。

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以我们几个初创校园歌曲的人为骨干，吸引校内外一批热爱吉他、热爱音乐的人，自发组成了“黑眼睛吉他协会”。

协会成立伊始，就广泛招收吉他爱好者。那时会弹吉他的同学并不多，女生更是稀缺。有一次招募现场还真来了几个女生，其中一位娃娃脸庞、身材娇小、十指纤细，抱着一把大大的吉他，对着一帮高年级男生，弹奏《爱的罗曼史》，给大家留下深刻印象。她就是刚进校的新闻系1984级学生张霞。后来，她与中文系1985级的吴伟文成了《请将这张唱片留给我》的首唱者，成为“黑眼睛”的骨干成员。

随着吉他协会在校内外影响的扩大，希望加入的人越来越多，



甚至有个根本不会弹吉他、也不会唱歌的同学，也要报名加入。他给出的理由是可以在演出和排练时，专门负责组接音箱和调试麦克风等音响工程，因为他是空间物理系的。这位姓吴的同学就这样成为“黑眼睛”的第一任专属音响工程师。

协会运作需要经费，我们就组织“中外影视欣赏”等系列活动，用租场地、租设备的方式，为学生放映中外优秀影视作品，卖门票赚钱。另外，我们还租借食堂场地，自组乐队办舞会，也收取门票。同时，在各种人流密集的活动中大力推销我们用蜡纸钢板刻印的歌曲小册子和吉他谱，收费大多是几角钱起，虽然低廉，但在同学们慷慨解囊大力支持下，协会有了较为充足的经费来源，办得有声有色，影响力也日益扩大。

“黑眼睛吉他协会”的成立，不仅为我们的创作提供了推动力，同时也为我们的创作提供了更为广阔的传播界面。它吸引了一大批渴望听到中国大学生原创校园音乐的人，也给我们提供了更广泛的与校内外大学生互动的机会。附近几所高校如武汉体育学院、湖北大学等，都邀请或与我们合作举办演唱会、舞会等活动，“黑眼睛”走出校门，走向社会。

1985年，校团委、艺术教研室广泛组织吸收各院系文艺人才，在各学生社团的纷纷响应下，成立了“武汉大学学生艺术团”。在学校官方的大力推动下，一大批发端于民间的艺术表演作品以崭新的面貌、专业的姿态逐步登上大雅之堂。

当年，在“洪山区高校歌咏比赛暨文艺汇演”上，武大学生艺术团演唱了中文系1982级谢际争作词、我作曲的《故乡的江边》。台上歌声响起，台下众人齐声应唱。此前，这首歌已经在校内外流传了一段时间，会唱的人很多。

同年樱花节，湖北电视台、电台播出了“黑眼睛吉他协会”的演出实况。我和我的词曲合作者们则在武汉高校歌咏比赛中，囊括了校园歌曲创作的全部五项奖。

也是在同年，长江文艺出版社为武大校园歌曲汇编了一本《珞珈歌曲》并公开发行。

1986年临近毕业，我决定以《诗歌与音乐》作为我的毕业论文



选题。动笔之后，我才发现其难度超出我的预想。于是，我花了大量时间奔波于武大图书馆和武汉音乐学院图书馆之间，借阅各类文献资料，积累各种写作素材，最终在导师的指导下，顺利完成毕业论文。

四

《请将这张唱片留给我》这首歌，在创作的所有歌曲中，是我心目中最喜欢、最满意的一首。不仅仅是因为它有着较高的传唱度，更是因为它的歌词是如此优美、如此打动人心：

……

我不问你为什么，
为什么带去这么多，
请披好你的风雨衣，
请藏好你未来的生活。

我不问你为什么，
为什么带去这么多，
请随手关上我的门，
请将这张唱片留给我……

杨树的文字所表达的意象，不迂腐，不空泛，新颖且精辟，有一种举重若轻、信手拈来的神采。他对歌词本身的音乐性和适唱性，有着近乎执著的追求，哪几个音符配哪几个字他都要反反复复地推敲。

这首歌有着比较鲜明的、不断重复的结构特点，句式简单清晰，旋律易于吟唱。全曲弥漫着一种梦牵魂绕、挥之不去的游吟诗人气质。这首歌关于青春流逝、关于曾经拥有，深情而豁达；有一份留恋，有一份期盼，更有一份祝福！

此曲整个谱写过程，基本上是一气呵成的。让我十分享受，也



让我十分感动，恰如畅饮之后的随性放歌。

这样一种感觉，让我回味了 30 年。

1986 年春节后，这首歌迅速在“黑眼睛吉他协会”中传唱。在那年秋天的歌手大赛上，中文系 1985 级吴伟文和新闻系 1984 级张霞分别演唱了这首歌，并获大奖。随后，这首歌登上校广播台《每周一歌》，在校园内外流传甚广。

同期创作的男女声二重唱《你向我走来》，也由吴伟文与他同班同学刘晓霞带到了这次歌手大赛上，这首歌依然由杨树作词，旋律改编自一首英文歌曲，我为它全新谱写了男女声互相交织的和声声部。演唱者吴伟文和刘晓霞都有相当不俗的声线和乐感，两人对这首歌做了非常出色的演绎。

毕业前夕，杨树与我合作写下了《小鸽子飞去》的毕业歌。1986 年夏，我们离开大学校园，就像已经可以展翅高飞的小鸽子，奔向各自的远方和未来。2002 年，我们中文系 1982 级大部分同学再一次齐聚珞珈山。这次“相逢二十年”的纪念重逢活动，由在电视台工作的同学全程录制剪辑了一张 VCD 影像光碟，背景音乐配的就是这首《小鸽子飞去》。

《就这样望着你的脸》原名《未来曾显得遥远》。写这首歌的时候，我已毕业留校在研究生院工作，而杨树当时在《湖南日报》工作，我们俩在音乐上的合作并没有因为毕业后各奔东西而中断。

那时没有互联网，没有 E-mail、QQ 和微信。杨树写好歌词，就会装进信封邮寄给我。那段时间他有很多作品诞生，可我却并没有全部完成，心中颇有愧疚。

就这样望着你的脸，
像那时我们望着蓝天。
就这样望着你的脸，
隔着多少岁月多少年……

这首歌似乎更能感染那些已经离开了武大的人，容易唤起人们对大学时代美好时光的怀想和回忆。



其实，这首歌最初的一些创作设想，一直未曾真正实现过。最早的构想是，让童声合唱(或女声合唱)与男声独唱相呼应，不同质感的音色、不同层次的音域相互对比和映衬，效果应该比男声独唱更为丰满、更具感染力。可惜因为条件所限，一直以来这个愿望未能实现。

1987年武大首届金秋艺术节上，吴伟文在教工乐队的伴奏下，首唱了《未来曾显得遥远》，获得二等奖。这首歌也成为校广播台《每周一歌》金曲。

其实，在武大学习和工作的那些年，我们创作的歌曲还有很多，许多作品只是没有机会拿出来传播而已。但如果没有这些音乐的积累，也就不会有上述那些承蒙同学们厚爱的所谓“精品”。

五

1988年底，在武大管理学院任教的王璞，对我们的创作产生了浓厚的兴趣。他提出一个策划方案，由他来做我和杨树的经纪人，出版发行一盘武大校园民谣录音磁带专辑。而且他还真的利用各种资源，筹集到了2万元资金(这在当时真正是一笔巨款)。而当时恰好谢际争就分配在中国唱片社工作，于是他也积极地参与进来。在他的联络下，最终选定编曲和录音制作由中央歌舞团作曲家侯牧人担任，同时还请来了当时国内知名歌手田震、胡月、朱哲琴、朱桦、胡寅寅和王迪等来主唱专辑中的部分歌曲。至此，我们带着单纯的校园歌曲梦想，懵懵懂懂地踏进商业化流行音乐圈的边缘。说实话，在这个圈子里，我们几个“书生”并没有多少话语权，但为了把我们自己的校园作品推向市场，我们对制作方的诸多安排，作了很大的让步和妥协。特别是部分歌曲配器编曲的风格，以及歌手对词曲内容的理解和演绎，与我们创作的初衷有不小的差距。

1989年，因为种种原因，这个满载着我们期望、也带着些许遗憾的专辑，虽然母带合成已制作完毕，但却无法进入发行渠道，最终还是被束之高阁。



1992 年末，我离开武大，到海南岛工作，历经商海浮沉 10 余年，最后还是回归教育领域，创办了一所中等职业学校，直到现在。

到海南之后，我在工作之余仍然坚持玩我的音乐，并和另外两个朋友组建了“守望者组合”三重唱。我们改编翻唱国内外名歌名曲，同时我个人继续创作自己的音乐。我们参加过海南电视台“音乐流行风”100 期特别节目；也曾受邀到“海口经典音乐沙龙”做专场音乐会；更是在全中国 HASH（风靡世界各地的户外跑步活动）大会上作为特邀嘉宾演绎中外民谣三重唱，等等。

2006 年，一位身居海外的佛教学者，通过武大海外留学生介绍，几经周折到海南找到我，让我为她的一首歌词谱曲。之前请的几位专业作曲都不能令她满意，这次我这个业余作者却让她满载而归。我把她的一篇名为《誓言颂》的短小颂诗谱写成了一首长达 7 分多钟的佛教风格乐曲，并完全由我一个人完成 MIDI 配器、伴唱以及后期录音合成，乐曲主要用于她组织的各种佛会场合。同一年，海口 HASH 拍摄 DV 电影《天涯无贼》，我个人承担了全部的影片剪辑合成、后期录音以及配乐音效等工作，片头曲就是“守望者组合”三重唱的专属歌曲南非民歌《萨里玛莱》，而这首歌恰恰是当年“黑眼睛吉他协会”校外会员带到武大的曲目。“守望者组合”三重唱在海南民间音乐界也算是有一定影响力的。

六

关于校园歌曲，我自己作为亲历者，也总在思考这样一个问题：到底什么是校园歌曲？武大的校园歌曲已经跨越 30 年的历程，我们是不是应该把这个问题想明白呢？

我个人认为，校园歌曲应该是青春时代内心世界的一种自然而然的流露和表达，其创作动机应该是没有丝毫功利性的。在音乐形式上校园歌曲可以借鉴、模仿各种类型的流行音乐，但一定不能沦为出于商业目的而类型化的“校园民谣”。

此外，从音乐本身的角度，我们的校园歌曲还需要对艺术性、



对歌曲内涵有更高的追求，只有朝着艺术的方向不懈努力，才能创作出真正的、优秀的校园歌曲。

而我自己，则会继续守护心中的那片小小园地，无论是四处奔波还是百无聊赖，都愿意回到那里去。就在此刻，仿佛那里又有音乐响起，一位歌手正在轻唱：请随手关上我的门，请将这张唱片留给我……

（作者系中文系 1982 级校友）



最美大学与曾经的建筑商

李亚楠

沈祝三！这是每一个武大学子都应该知晓的名字。

沈祝三？他是谁？绝大部分武大学子恐怕都会有此一问。

武大学子或多或少都听闻过李四光、王世杰、李达，甚至农学家叶雅各的名字：李四光和叶雅各为武大选择了珞珈山这块风水宝地；王世杰作为首任校长，顶住压力，历经迁坟风波，奠定了武大基业；李达则是新中国成立后武大首任校长，也是迄今任期最长的校长，为武大发展倾注了无数心血，乃至生命。

“武汉大学是全中国最美的大学之一”，当初，正是因为招生简章上这句话，我高考后填报志愿的纠结烟消云散。

在校园里生活四年之后，尤其是经历过每年樱花开放的时节，我早已将“之一”两字移除。

武大的美，在山、在树、在花、在湖，尤在掩映其中的民国建筑群——沈祝三，正是这些建筑精华的营造者。

然而，无论校史，还是导游词，都很少提及这位曾为武汉大学做出了卓越贡献的盲眼建筑商。

近日，宁波市和武汉大学合作探寻沈祝三与武汉大学百年传奇的新闻在武大校友间传播，我才初次听闻沈祝三其人其事。作为一名历史系毕业生，对母校过往知道如此之少，深感有愧。

—

沈祝三是宁波人，20世纪二三十年代，他创办的汉协盛是武



汉地区最著名的营造商。令人痛心的是，由于患青光眼，1918年他就已经双目失明。

1930年3月，由汉协盛为主承建的武汉大学新校舍动工。1932年1月，新校舍一期工程竣工。新校舍整体上既有中国传统建筑风格，又引入西方的罗马式、拜占庭式建筑式样，把对称式的传统格局和现代风格巧妙融合在一起。中西合璧的宫殿式建筑群气势恢宏，布局精巧，是20世纪30年代中国唯一完整规划且一气呵成的大学校园建筑，堪称近现代中国大学校园建筑的佳作与典范。

1934年5月26日，武汉大学举行了隆重的新校舍落成典礼，蔡元培先生在典礼上赞誉珞珈山新校舍工程设计新颖，是国内最漂亮的大学建筑。时任校长王世杰在演讲中特别提到：“无论如何我们要感谢一个人，他就是浙江鄞县的沈祝三先生，他每天自早至晚，都坐在他小办公室的桌边接电话，指挥珞珈山及其他部分的工人从事工作。感谢他肯以比较低廉的标价，承包这个巨大而且困难的工程。”

赞誉背后是无尽的艰辛。武汉大学建在山上，沈祝三承包时漏估开山筑路费用，为了顺利建成学校，他不但没要求修改合同，而且在竣工后信守承诺奉送水塔、水池两项工程。1931年，武汉遭遇水灾，又逢经济危机造成原材料大幅上涨。

在极其恶劣的条件下，沈祝三依然坚持“三不原则”：一不主动向业主提高造价，二不拖欠供应商货款，三不拖欠建筑工人工资。

整个工程完成后，汉协盛亏损达四十万元以上，经济状况每况愈下，在沈祝三最困难的时候，他不得不将自己的房屋和砖瓦厂抵押给银行，贷款连本带利滚成100余万元。这笔债他还了许多年，直到武汉沦陷时，方才还清。1941年1月，战乱中的沈祝三在汉口因病去世，时年64岁。

二

沈祝三以失明之眼赋予今人眸中最美大学建筑。70多年过去



了，这批校园建筑不仅风采依旧，而且还被国务院定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成为武汉大学乃至整个武汉市的一张靓丽名片。

或许，在很多人看来，这样“毁家兴学”实在不值，但对于农民出身、靠着下雨时在私塾外面“读雨书”长大的沈祝三来说，却是完成了他的一个梦。

“我给洋人盖了一辈子房子，但是今天，我要给国家盖一所最好的学校。”沈祝三在修建武汉大学时曾这样说。

沈祝三很小的时候，父亲就因病去世。他跟着舅舅到上海的营造厂做工，做事勤快干练，抓住一切机会刻苦自学，学会了看工程图纸和各类施工技术，还从看门的印度人那里学会了英语，可以直接和洋人交流。

1905年，沈祝三受上海协盛营造厂委派主持汉口平和打包厂大楼的施工，这幢大楼的成功，使他在武汉地区营造业中名声大震。1908年沈祝三在汉口正式开办了自己的营造厂——汉协盛。

因信守承包合同，采取先进施工方法，注重工程质量，汉协盛很快赢得社会信任，先后建造了德商捷臣洋行、圣玛利亚学校、汇丰银行等一批优秀建筑。汉口总商会、景明洋行大楼等优秀建筑更是在他眼睛完全失明后建成的。

在他的苦心经营下，汉协盛营造厂成为20世纪二三十年代武汉最著名、规模最大的建筑企业，汉口最著名的老建筑几乎全都凝聚着沈祝三的心血。

三

旧时建筑，今日镜鉴。

网友们热衷于拿过去的建筑和如今的“楼脆脆”“桥塌塌”相比，赵州桥、南京长江大桥等，都曾作为理想中的建筑典范，反衬当下建筑行业的种种不堪。

沈祝三建造武汉大学民国建筑群的事迹，一旦为更多人所知，无疑也会成为批判当下的热门案例之一。

鲁迅曾说，做事的总不如作文的有名。这样默默做成大事、造



福众生之人，在历史中沉寂这么多年，是作文者的失职。

今日，重温沈祝三的事迹，为纪念，更为学习。

虽然很少有人将沈祝三看做教育家，但他却以自己毕生实践写就了最宏大的人生教材，教材的精华矗立在珞珈山巅。

教材的核心思想只有两个字——诚信。这是沈祝三骨子里流淌的血液，也是我们这个时代最为稀缺的品质之一。

所以，为人、为商、为政，皆当如沈祝三。

（作者系历史系 2000 级校友，原载《武汉大学新闻网》2015-12-04）



吾大武大

覃瑞强

我与武汉大学的结缘纯属意外。20 世纪 80 年代初，上大学还是千人过独木桥，竞争异常激烈。对于我们这些农村孩子来说，上了大学就意味着命运的改变：有一份体面的工作，吃上“皇粮”，不用像祖祖辈辈一样面朝黄土背朝天了……因此，我在高考前给自己定的目标并不高，能上本科当然好，不行的话上个大专亦或中专也能接受。尤其是有了前一年高考上了本科线、却由于志愿填报不当而名落孙山的痛苦经历，更不敢对名校有丁点的奢望了。所以考完后虽然自觉考得还不错，但在填报志愿时我在“第一志愿”栏中只小心翼翼地报了广西的一所高校。成绩公布的时候，我所在中学的校长发现我的分数超过了全国重点线不少，觉得我就这样上区内的普通学校太可惜了，便“自作主张”地跑到南宁，通过关系把我的第一志愿改成了武汉大学！

收到录取通知书是在一个闷热的下午，当时我和母亲正在地里给黄豆苗除草，那天三堂兄去赶圩，经过大队队部（现在的村公所）时大队长让他帮忙带回的。我接过通知书一看，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武汉大学”四个苍劲飘逸的大字仿佛是在梦中向我飘来！要知道，在这之前，我对校长帮我更改志愿的事毫无所知（是后来去武汉前到母校向老师道别时才从班主任那里得知的）！接着而来的，当然就是兴奋和激动了。感谢我的中学校长和老师，他们冒着很大风险为我更改志愿，才让我这辈子得以与美丽的珞珈山结下了不解之缘！

我考上武汉大学的事，在老家迅速被传到七里八乡。尽管父老



乡亲们对武大并没有多少了解，但仍然引起了很大的轰动，以至于后来无论是办理户口还是粮食关系迁移手续，都一路绿灯，还被素不相识的工作人员大赞了一番。这让一向不够自信的我在踏进武大校门之前平添了几分自豪感。

第一次前往武汉，我是和同时考上华中工学院的同学结伴而行的。先是坐三四个小时的汽车到南宁，然后坐三十多个小时的火车到武汉。我俩都是第一次出远门的懵懂少年，就这样带着几分欣喜、几分羞怯闯进了梦想的怀抱。

当迎接新生的大货车载着我们从武珞路拐进街道口时，一块掩映在高大的法国梧桐树下的“国立武汉大学”牌匾映入眼中，顿时引得满车从全国各地来的新生们发出了一阵欢呼声。武大，我们来了！

办完入学手续，几个负责接新生的师兄把我领到了桂园六舍的518室，这就是我即将度过四年大学生活的新家了。这不过十几平方米的家一共要住8个人，估计当时整个武大也没有几个宿舍像我们室友构成这么多样的了：8个同学，分别来自湖北、湖南、河南、安徽、江西、广西六个省（区），有汉、回、壮三个民族。虽然大家都说普通话，但基本都带着浓重的地方口音，刚开始的时候沟通多少有些障碍，甚至闹出了不少的笑话和误会。不过毕竟都是学中文的，这小小的障碍当然难不倒我们，很快，我们就快乐地融为一个和谐的集体了。

其实当初填报志愿时，中文专业并非我的第一选择，最终能读武大中文系，仍是中学校长的“功劳”，因为他看到我高考时语文成绩最好，报中文最有把握，就帮我改了。懵懵懂懂地进了武大，又懵懵懂懂地“被”选择中文，等到开始上课，我才发现自己对学中文并没有完全准备好。那时正是新时期文学勃兴的时代，因此开学的第一节课，老师便让我们对几首朦胧诗进行讨论，不少同学讨论得热火朝天，而我几乎都没读懂，自然只有看热闹的份了。从那个时候起，我就暗暗发誓，要关注文坛动态，尽快补上这一课。

那是一个全民为文学而疯狂的年代，武大的文学创作非常活跃，王家新、高伐林等在校时已经成为全国闻名的校园诗人。而喻



杉的短篇小说《女大学生宿舍》获得全国优秀短篇小说奖并被改编成电影，更激起了大家的热情。我们也开始跃跃欲试。我们班几个爱好诗歌的，便自发地成立了一个诗社，并刻印出版诗刊《乌合》。

起步阶段当然是艰难的，我便从别人的作品中汲取养分。课堂上、阅览室里、床上、散步的路上，都成了我练习写作的场所。每天晚饭后，只要天气许可，我们宿舍的三四个“诗人”便在校园里或到东湖边散步，我们称之为“寻找灵感”。一路天南地北地聊，一路风花雪月地采，珞珈山上的花花草草、天空中的晚霞、东湖的波涛或者倒影等，都曾被我们吟唱。我们创作的高峰期多数是在晚上，严格地说是在床上。晚上熄灯后，我们并没有马上入睡，除了吹牛聊天，就是构思诗作，我们因此而自封为“床上诗人”。我们四个诗友曾经合作写过一首长达两百多行的长诗，就是在各自的床上你一句我一句地吟出来的。虽然现在看来那首诗非常稚嫩，但这样的创作经历非常独特，它无限地调动了我们创作的积极性，对我们来说是极其珍贵的，让我今生难忘。

天道酬勤，我们的创作有了收获，从大二开始，不少同学陆续在各种报刊上发表了文学作品，我的处女诗作更是得以在中国作协主办的《民族文学》上刊出，让我很是兴奋了一阵子。当时学校在通往梅园的小莲塘边建有一个宣传窗，宣传学校的各项成果，我的这首诗也曾光荣上榜，这对我是个极大的鼓励。那时的武大，环境宽松，思想活跃，非常注重对学生创新能力的培养，给了我们很自由的成长空间。较之于现在一切为了就业，一切为了实用的办学理念，那时的武大令人怀念！

上大学之前，我的父亲就已经去世了，家里只有母亲一个劳动力，家境可想而知。好在那时读大学都是免费的，国家还有每月二十二块五毛钱的伙食补贴，吃饭问题基本不用愁了。其他开支靠母亲的省吃俭用和亲戚的接济，也可以维持。但大一大二阶段，日子还是过得紧巴巴的，我的一日三餐，基本都是在食堂里吃的。到了大三，由于接手了系里的相片冲晒设备，加上偶尔的稿费和奖学金等，我的生活得到了很大的改善。喝啤酒、抽香烟，就是在那个时候开始的。我们最常去的是学校公交站旁的一个小店，小店很简



陋，店主是一个六七十岁的老太太，经营的是小炒、臭豆腐和云吞等。我们往往就点上一碟小炒、一碟臭豆腐、一碟炒花生、一箱啤酒，一坐半个晚上，直到珞珈山上的花草们都睡着了才回宿舍。

虽然当时的伙食还算不错，但毕竟是处于青春年少时消耗大，每到晚上，肚子还是会感觉饿。不去臭豆腐店改善生活的晚上，我们都要买一些小吃来填肚子，多数时候，买的是几个小商贩到宿舍里叫卖的茶叶蛋、糯米鸡和“欢喜坨”。直至今日，小商贩们用武汉话吆喝的“欢喜坨呀糯米鸡”的叫卖声仍萦绕在耳边。

都说学中文的最浪漫，但说来惭愧，这种浪漫于我而言只是存在于文字之中，整个大学四年，我没有读过一场恋爱。这一方面是因为我由于家境等原因不够自信，另一方面是因为当时学校明令禁止谈恋爱。当然也有不甘寂寞又胆大的同学秘密或公开地谈着，我只有羡慕和佩服他们的念头了。大学期间，我唯一一次单独和一个女孩子在一起的时间就是放暑假时和一个师妹一起坐火车回家，这段算不上浪漫的旅程是我大学期间最值得“夸耀”的浪漫经历了。

转眼之间，离开武大快三十年了，这三十年间，我梦中出现最多的地方就是美丽的珞珈山。那山，那水，那人，是我今生今世永远的最爱！

(作者系中文系 1982 级校友)



病房里的火热青春

苏者聪

1951年8月，我考入武汉大学中文系，9月到汉川参加土改工作，翌年3月1日回校。学校对全校学生进行了一次体检，发现肺结核病患者六七十人，我是其中之一。肺病当时被视为绝症，我自然地想起了林黛玉的悲剧，又不禁想起1951年与我同时考入大学的两位同学，一个考取哈工大，因病退回长沙；一个考取湖南艺术学院，也因肺病退回老家农村，急得吐血。联想到自己的学业、前途、命运，我不免有些伤感。

就在我苦闷之时，学校给了我们极大的关爱，采取了果断措施，专门辟出两个宿舍给学生养病，30多个女生就住在辰字斋，半天上课，半天卧床静养。学校每天为病号学生增加营养，开设小灶，每餐两荤一素，还另外增加两个鸡蛋、半磅牛奶；饭菜、开水全送到寝室；重病号还有专人洗衣服。学校爱生如子，那无微不至的关爱与呵护，如同一股和煦的春风吹进病房，也吹进了我们的心房。这些豆蔻年华的姑娘们，从此在党温暖的怀抱里无忧无虑地生活、健康快乐地成长。

我们那时对党、对新社会十分热爱，对解放带来的所有新鲜事物非常感兴趣且乐于接受。我们追求真理，要求进步，积极争取入党入团，对革命书籍如饥似渴，尤其爱读苏联卫国战争时期的一些书籍，我记得《共产党宣言》《卓娅和舒拉的故事》《无脚飞将军》《钢铁是怎样炼成的》，就是在辰字斋养病时阅读的。

我们时常背诵保尔·柯察金的经典名句：“当你回首往事时，不因虚度年华而悔恨，也不因碌碌无为而羞耻……”我们学习保尔



与病魔作斗争的精神，思想上严格要求自己，牢记党的教导：把革命利益放在个人利益之上。我当时是一个特困生，没有一点经济来源，团支部给我评上了乙等生活补助费（每月2元零花钱），我执意不要，想着为国家节约一分钱也是好的。辰字斋每年都有同学申请入党、入团，我和席学媛（外文系）就是1952年7月在养病时入党的，从此确定了为共产主义事业奋斗终生的目标。我在养病期间做过团支部书记，还发展了几位团员。

当时我们不但喜欢看革命书籍，还喜欢唱革命歌曲，宿舍里经常传出《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五星红旗迎风飘扬》《莫斯科郊外的晚上》《再见吧，妈妈！》《喀秋莎》的歌声……有个女同学模仿男高音独唱，还挥手打拍子，气势豪迈雄壮，激发我们向上的革命热情，鼓舞我们的革命斗志。星期六的晚上，有时我们会到宋卿体育馆跳交谊舞，参加化妆晚会。我记得去过两次，都是穿着打补丁的布鞋，没有人笑话，更没有人瞧不起，那是一个纯朴的年代！

人们只知道终日紧锁着铁门的辰字斋，是得肺病女生的疗养之地，门前清冷，使人望而却步，他们哪会知道铁门里的姑娘们青春似火、热血沸腾！

1954年武汉遭遇百年未有的特大洪灾，全校师生走上了抗洪第一线，我们留守后方，但也不甘落后，每日赶制棉签，送给前方伤病员。当时，我还有个隐私，我的身为共产党员的男朋友，奋战在抢险突击队，几十天日夜轮班在大堤上，有时通宵站在齐胸深的江水中护堤，得了急性痢疾也不吭声，丝毫不顾个人安危。我支持他的义举，在病中给他一针一线密密麻麻地缝制了一个垫肩，寄托了我的深情与期盼，给他在艰难困苦的时刻以鼓舞。抗洪结束，他被评为武汉市防汛二等功臣。至今，60年过去了，这个垫肩还被好好地保存着。我即兴填了一首词《如梦令·垫肩》：

六十年前信物，心痛抗洪艰苦。密密病中缝，少女火般情愫。何速、何速，倏老两情弥笃。

我在辰字斋养病三年半，病友之间亲如姊妹，就像是一个革命



大家庭，遇到困难，互相帮助。记得我读大三时，衣服破了，经济系孙宏琛同学送给我一件浅绿色花布衣，还有七八成新；农化系乔维珍同学从汉口家中拿来一块4尺长的蓝布，替我裁剪，我自己缝制了一条西装短裤。这套衣服我一直穿到大学毕业，这些都是难以忘怀的革命友谊的见证。

还有一件事铭刻于心，学校曾组织辰字斋全体同学去看戏，当同学得知我无钱买票留守宿舍时，纷纷慷慨解囊，替我买戏票、买车票，让我高高兴兴和她们一道看戏，欢欢喜喜回宿舍。在养病的几年里，我感到格外温馨与幸福。

在党的雨露阳光滋润下，青年学子一批批康复，走上工作岗位。当他们离别母校时，依依不舍；千万遍感恩母校，热泪盈眶。母校武大，您是我们的母亲，您对我的恩情尤重，给了我两次新生：第一次是给我政治生命，我在武大入党，从蒙昧茫然，到知道怎样活着，怎样做人；第二次是给我健康之身，使我从怏怏病体中走出了人生低谷，变得乐观开朗，经受住了风吹雨打的考验。没有您的爱护，就没有今天的安康幸福。

母爱无私，母爱伟大，情深似海，恩重如山。俗话说：滴水之恩，当涌泉相报。我今天以长江黄河之水，也难报您三春之光辉。

（作者系中文系1956级校友，原载武汉大学新闻网2016-4-20）



我的珞珈春秋

史可夫

1963年，我从湘西北的慈利一中毕业，考上了武汉大学中文系。在美丽的珞珈山度过了五年半的时光。前三年平静的书斋生活与后面两年多的“文革”风暴形成了鲜明的对照。这种经历，我的前辈学长没有，20世纪70年代以后的大学生更不会有。写作本文的初衷，就是希望真实地再现当时的大学生活，从个人的视角观照那个时代。

最美的大学

提到武汉大学，人们的第一反应大概就会想起它的樱花。每年春天的樱花节，数十万人涌进武大校园赏樱，这在全国的大学中恐怕是独一无二的。其实，樱花全国各地也有不少，甚至有的地方樱花面积比武大还要大得多，为什么国内其他地方的樱花没有武大的有名？我想，重要原因恐怕就是武大的樱花开在充满书卷气的高等学府，与巍峨壮观的宫殿式建筑互相映衬，有着烘云托月、相得益彰的效果。游人到此的感受，自与别处不同。

武大的美，当然不只是一条樱花大道。人们谈起中国最美的大学，往往会提到武汉大学和厦门大学。我去过厦大，确实是一座很美的大学，它位于海边，有浪漫的海滩和热带植被。而武大位于东湖之滨的珞珈山麓，高低错落，宫殿式建筑与周围的山水形成一个完美的整体。武大与厦大之美，大概是春兰秋菊，各有所长吧。



1928年，南京国民政府决定组建国立武汉大学，并任命著名的地质学家李四光为学校建筑设备委员会主任。为了给武大选址，据说李四光骑着毛驴跑了不少地方，最后选中了罗家山。后来，根据闻一多先生的建议，将罗家山改名为珞珈山。这一改名妙就妙在读音没有多大变化，意思却大不一样，文野雅俗之别，有如天上人间。

武大的早期建筑群建设始于1929年。校长王世杰、地质学家李四光、林学家叶雅各等几位主要负责人进行总体规划，同时聘请美国建筑设计师凯尔斯、结构设计师莱文斯比尔主持设计，工学院缪恩钊教授负责建造。凯尔斯巧妙利用地形地貌，尊重自然，依山就势。他注重运用中国园林殿堂建设惯用的布局方式，精心设计布置建筑群。整体上遵循“轴线对称，主从有序，中央殿堂，四隅崇楼”的中国传统原则，又引入西方古典样式和现代建筑理念，融合中西建筑之长。整体上气势恢宏，布局精巧，中西合璧，美轮美奂，堪称中国近现代大学校园建筑的佳作和典范。这个系列建筑群至今给人的感觉依然庄重典雅，气势非凡，有15处26栋于2001年被国务院批准为第五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除了李四光的选址，凯尔斯的设计，武大今日之美也得益于林学家叶雅各。他是当时武大筹建委员会的委员兼秘书，作为李四光的助手，他除了协助李四光选址，还负责设计和组织武大校园及珞珈山地区的造林绿化。自1929年起，他按照建委会的规划，在校园、林场、植物园及一切可绿化的道路网和荒山隙地，亲自进行造林设计。还采取了自采种、自育苗、自栽植、自保护的勤俭建校办法，几乎每一棵耸立在校园的大树，都是当年叶雅各先生筹划甚至亲自参加种植的。

50多年前，当我第一次走进武大校园时，确实感受到了视觉上的冲击和震撼。那巍峨的宫殿式建筑，飞檐碧瓦掩映在绿树丛中，让我这个农家孩子恍如进入了仙境。当时并不知道李四光、凯尔斯、叶雅各等人是美丽武大的营造者。后来才知道，是他们留下了这份美丽的遗产，我心中对他们产生了崇高的敬意。



苦乐年华

我进武大的时候，中文系的师资力量很强，处于全国一流水平。当时有一大批知名教授，号称“五老八中”。“五老”包括古典文学专家刘永济，文字声韵专家刘博平，小学与诗学专家黄焯，经史典籍专家席鲁思，唐宋小说专家陈登恪；“八中”有现代文学专家刘绶松、古典文学专家胡国瑞、语言学家周大璞、先秦文学专家李建章、语言文字学家李格非、古典文学专家缪琨，还有享有“当代李清照”美誉的女词人沈祖棻等。而“八中”中最牛的程千帆教授已于1957年被打成“右派”，贬在系资料室做一个小小的图书管理员。此公在夫人沈祖棻遭遇车祸去世后，于1978年离开伤心之地到南京大学任教，晚年大放异彩，成了著名的国学大师。除了名师荟萃，当时在武大求学，还有一个得天独厚的条件，就是图书馆的藏书过百万册，在全国大学中名列前茅。那时武大一共十个系，其中就有一个图书馆学系，这在当时全国高校中也是罕见的。

有这样好的学习环境，自然是学生之福。我和同窗每天都沉浸在古今中外的文学作品中，遨游在知识的海洋，如饥似渴地学习着，眼界逐渐开阔。那时候真有一种天之骄子的感觉，心中是满满的幸福和快乐。其实，就生活条件而言，当时是非常艰苦的。我们中文系的男生住在新四区，那是1958年大跃进时建的学生宿舍，条件极其简陋，每层楼一个公共卫生间兼浴室，但浴室只有冷水。一间宿舍住六个人，上下铺，夏天酷热难耐，冬天冷似冰窖。刚入大学时，每人每月十元五角的伙食标准，生活很苦。1964年上半年提高到每月十三元五角，生活有了明显改善，可以经常吃到肉和鱼。

我们班的同学大部分来自农村，家庭条件普遍贫困。当时全班33人中只有两名女生有手表，她们还不敢戴，怕别人说有资产阶级思想。我在班上属于最贫困的学生之一：家里根本无力负担我的任何费用。有一年，家里只给了我一块钱，全靠国家助学金生活。不知道当时助学金是由哪些人评定的，第一学期给我每月十元五



角，仅够吃饭。冬天穿一条裤子，腿脚都生冻疮了。后来给我增加到每月十四元五角（最高的每月十五元五角）。其中十三元五角为伙食费，还有一元零花钱。一个月一块钱怎么花呢？钢笔墨水是必须的，但一瓶要两毛钱，我就买两分钱一包的墨水粉，用凉开水融化后装瓶使用。买不起牙膏，我便买食盐来刷牙。每周周末学校小操场的电影是必看的，每张电影票四分钱。有时实在没有钱看电影，就把餐票退掉，只吃饭，不吃菜。在外面理发至少得一毛钱，当时学雷锋，班上成立了理发小组和钉鞋小组，理发这笔开支也就省了。去学校澡堂洗澡，一次也得五分钱。而我从1962年秋天开始冷水浴，在武大的五年半，我一直坚持洗冷水澡，冬天还常常到东湖去游泳，这样也节省了一笔开支。直到大学毕业前夕，才花了五分钱去学校澡堂洗了个澡，算是留作纪念吧。除此之外，偶尔上街去远处，还要搭乘公共汽车，一次也得几分钱。夏天看到卖冰棒、西瓜和酸梅汤的，哪怕口渴难耐，也从未买过，更不用说下馆子了。有一次，在学校参加植树劳动，就是在从街道口老校门到珞珈山的道路两旁挖坑栽法国梧桐。我干了四天，拿到四块钱，用这些钱买了一套北大王力教授编的《古代汉语》，这套书现在还保留着。半个世纪过去了，那些法国梧桐如今已长成参天大树。

在上大一的时候，我看了俄国作家车尔尼雪夫斯基的《怎么办》，其中的主人公拉赫美托夫对我影响颇大。他是一位俄国革命民主主义者，为接近民众，跑遍了整个俄罗斯，干过樵夫、锯工、石匠、纤夫，最后成为职业革命家。为了锻炼意志，他过着苦行僧一般的生活，还经常睡在一条扎满小钉的毯子上。我从他身上汲取了力量，不再是被迫过穷苦的生活，而是为锻炼身体和磨练意志自找苦吃。一年四季睡在仅仅铺了一床草席的木板床上，从来没有垫过棉絮。每天清晨，打着赤脚在珞珈山校园跑一大圈，哪怕是冰天雪地也是如此。坚持冷水浴和冬泳，直到大学毕业。

处于青春期的学子，自然也会渴望爱情。但那时校规极严，学生不准谈恋爱，更不要说结婚了。至于暗恋和各种各样的地下活动，那是无法禁止的，谁能禁止春天樱花的开放呢？每当莺飞草长、樱花盛开之时，春情也会在心中涌动；夏日在荷塘边读宋词的



时候，会有一种无名的惆怅；盛夏去东湖游泳的路上，遇到数不清的俊男靓女，心中会生出“遍地佳人谁属我”的感慨；深秋季节，看到珞珈山的红叶，偶尔会想起红叶题诗的浪漫。然而，美好的爱情在哪里呢？只能把这种渴望深深压在心底。当时对于师生恋，也是严格禁止的。一位教写作课的老师在一位女生的作文本中夹了一张表达爱慕之意的纸条，被发现后，再也无法在武大立足，调到四川教中学去了。

当时除了读书，学校还组织了一些社会实践活动。1963年冬，我们全年级同学去红安县参加农村社会主义教育，吃住在农民家，在乡下呆了一个多月。1965年春夏之交，由学校安排去黄陂驻军部队下连当兵月余。1966年3月，中文系几个年级到襄阳隆中前面的广德寺办武大分校。在那里边劳动边上课，直到6月中旬才返回武大，参加轰轰烈烈的“文化大革命”。

疯狂岁月

“文化大革命”一开始，目标对准北京的吴晗、邓拓、廖沫沙的所谓“三家村”。紧接着，在武大也揪出一个“三家村”，就是当时的校长李达、党委书记朱劭天和副校长何定华。我们回到武大时，整个珞珈山大字报铺天盖地，批斗会接连不断，这里再也不是适合青年学子读书的宁静校园了。

我在武大求学期间，李达已是七十多岁的老人，身体不好，我们很少见到他。他是中共“一大”代表，是中共的创始人之一，于1927年脱党，从事教育和著述，1949年经董必武介绍、刘少奇批准重新入党。当时揭露他的主要罪状有几条：其一，他说“一大”会议通知是他发的，当时毛泽东还不是共产党员，只是共青团员，是他错发了通知，毛来了上海，就只好让他参加；其二，他说《矛盾论》《实践论》主要是根据他提供的资料写成的；其三，李达将自己写的《社会学大纲》送给毛主席看，毛做了许多修改。李达拿回来后，把毛改的许多地方又改回去了。他还狂妄地说：俄国是普列汉诺夫培养了列宁，中国是我培养了毛泽东。这些在当时自然是滔



天大罪。李达曾写信给毛主席，希望主席能救他一命。但信件被扣押，李达在被批斗两个多月后于8月24日含恨去世。

“文革”运动还在发展，八月以后，全国各地纷纷成立红卫兵组织。红卫兵运动最初是破除“四旧”（旧思想、旧文化、旧风俗、旧习惯），随后发展为抄家，打人，砸物。无数优秀的文化典籍被付之一炬，大量国家文物遭受洗劫，许多知识分子、民主人士和干部遭到批斗。中文系的一些老师，包括老教授刘永济等都被打成“黑帮”或反动学术权威，接受批斗和监督劳动改造，在烈日下被迫在地里干活，有的甚至被迫害致死。

当时武大成立的是“9.12”红卫兵。因为毛主席曾于1958年9月12日到武汉大学视察，“文革”中就把9月12日定为武大的校庆日。我也参加了“9.12”红卫兵。1966年9月下旬，我和同学们一道上了北京，于国庆节接受毛主席的检阅。回武大后不久，全国性的“大串联”开始。所谓“大串联”，就是要发动群众，“踢开党委闹革命”，矛头指向以刘少奇、邓小平为代表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那时，各地都有红卫兵接待站，提供免费吃住，有些地方要打借条，那也不过是个形式，没有人会还账的。我和班上另外两位同学一起乘火车到桂林，然后又乘车到杭州。车上十分拥挤，我们站了十来个小时才到。然后从杭州到上海。在上海见到红卫兵给路人剪掉长发，还见到红卫兵将行人的喇叭裤和旗袍剪烂，这些在当时都被认为是“破四旧”的革命行为。而所谓“大串联”，对于大多数大中学生而言，其实就是免费游山玩水。

“串联”的第一个阶段，是免费乘车到全国各地，后来又兴起步行串联。我也参加过步行串联。1967年元月，我和另外七个在武汉上大学的老乡一起，从武汉步行到慈利，途经沔阳、潜江、荆州、公安、津市、澧县、石门等地，耗时半个月。这是我一生中连续步行最长的经历。

进入1967年以后，各地派性斗争升级，许多地方演变成武斗。武汉的武斗在全国也是有名的，武大物理系就有两名学生在武斗中被打死。当时在校园中为他们立了纪念碑，后来拆掉了。武大内部主要分为“龙派”和“虎派”。我属于“虎派”，开始参加一些活动，



后来慢慢厌倦了，成了逍遥派。1967年武汉“7.20”事件后，武汉的武斗基本停止。8月1日，武汉组织五万人横渡长江，我和班上几个同学也参加了。那一次组织指挥失灵，竟有200多人被淹死，其中有不少是大学生。当时我也很危险，差一点葬身长江，想起来感到后怕。

1968年年初，中央号召“复课闹革命”，但是，课还是上不起来。除了这年春天组织去麻城县“支农”，其余时间，同学们大多凭兴趣干自己想干的事。有的雕刻印章或练书法，我当时也曾学习刻印章，还花时间写了一本篆体《毛泽东诗词》，至今保存完好。也有个别同学每天跑到树林里学外语，外语系四年级有一个姓龙的同学创办了一个“世界工农革命大学”，找了一批被批斗的教授和赋闲的老师，免费教英语、日语、俄语、德语、法语。我去听过两次日语课，没有坚持下去。我见过那位“龙校长”，是位有个性的人，每天清晨跑到毛主席塑像前读外语，别人不敢接触那些被打成“牛鬼蛇神”的教授，他偏不怕，让他们出来上课。他说，他们每个月拿了国家的钱，还是要发挥一技之长，这叫做废物利用；他开办“世界工农革命大学”的目的，就是为解放全人类培养外语人才。因为没有学习压力，大多数同学都在混时间，等毕业。有的到珞珈山、磨山去采蘑菇，有的到东湖或其他地方去抓鱼捞虾，回来一起改善生活。在这种气候下，一些同学的地下恋情也浮出水面，我们班当时就有一对男女同学结婚，还有一些同学则是回到老家去结婚了。

1968年秋，“毛泽东思想工人宣传队”进驻武大及其他高校，一盘散沙的局面发生了变化。“工宣队”每天领着大家读“红宝书”，跳“忠字舞”，在毛主席像前“早请示，晚汇报”，斗私批修。一旦有毛主席新的“最高指示”发表，马上组织上街游行，哪怕是深更半夜也要拉出去。这种情况一直延续到年底。十二月份，开始毕业分配。我本来是分配回湖南的，但我当时的想法是“好男儿志在四方”，不要做屋檐下的麻雀；特别是受了艾芜的《南行记》的影响，向往少数民族地区的奇风异俗；加之班上一位玩得好的同学分到了云南，他鼓动我去大西南。在确定分配名额的最后时刻，我跟工宣



队提出，把回湖南的名额让出来，自己去边疆。工宣队负责人说，只剩下一个贵州名额了。我说：行，那就去贵州。从此，人生轨迹发生了很大变化，莫非这一切是宿命？

离开母校将近半个世纪了，当年的同学早已风流云散，往事依稀如梦。可是，不管走到哪里，我心中总有一座山。她是那样美丽、那样亲切，她承载了我的青春、寄托了我的梦想。她，就是我终生眷恋的——珞珈山。借用一位校友的话：“如果青春可以重来，我依然会选择美丽的武大；如果时间还可以倒流，我依然会做那珞珈山上的翩翩少年。”

（作者系中文系 1968 届校友，原名史国富）



回忆关文发先生二三事

孙卫国

2016年2月23日，著名明清史专家关文发先生在广州与世长辞。噩耗传来，不禁悲从心起！如今已过去月余，记忆中与关先生接触的几件事情，却逐渐清晰起来。

1984年9月至1988年7月，我就读于武汉大学历史系中国史专业，关先生当时正是系主任。其时武大校长是刘道玉先生，改革的春风洋溢着整个校园。关先生领导下的历史系也有声有色，在全国举足轻重。在武大四年间，听过关先生几次讲话，他当时因为行政事务繁忙，并未给我们开过课。在大学头两年，几乎很少有机会向关先生请教。他的哲嗣汉华是我同班同学，并没有跟我们一块住宿舍，平时住在家里。我们在同一个小组，过年过节，我们组经常组织活动，慢慢与他熟悉起来。有一年元旦，我们小组办联欢会，大家喝了不少啤酒。汉华很豪爽，连连干杯，却不胜酒力，醉倒了。他说要去卫生间，等了半小时也不见回来，我们去卫生间找，没找到，我有点担心，于是与室友肖圣中就去了汉华家。开门的正是关先生，他面带笑容地跟我们说，汉华回家了，已经睡了，让我们别担心。这是我第一次直接接触关先生，当时的印象是：关先生是位慈祥、谦和的长者，而不是高高在上的领导。因为都对明清史有兴趣，我与汉华成了好朋友。汉华兄不愧出身史学世家，从小受关先生的熏陶，对于国内明清史学界的情况了如指掌。大四决定报考研究生时，最初想报考关先生的，只是当时关先生已经做好了离开武大的准备，不再在武大招生。在汉华兄的推荐下，我报考了南



开大学历史所明史方向的研究生，导师是郑克晟先生，初试成绩合格，于是准备复试。当时我就靠学校每个月发的三十块补助生活，已经不要家里的资助了，但复试从武汉去天津的路费，火车票来回要五十多块，加上住宿、吃饭大概得一百元，一时难以筹措。正想向班主任樊韞珍老师借钱，樊老师却告诉我：“关先生了解了你的情况，决定由系里资助你去天津的来回路费。你先从系里领一百元，回来用火车票和住宿发票冲账。”不知道关先生是怎么知道我的情况的，我就这样去了天津复试，并如愿考上了南开大学历史所的研究生。如果不是樊老师提及，我根本不知道这是关先生直接关心的结果。

1991年6月，研究生毕业后，我留在了南开大学古籍所工作。同年7月，由冯尔康先生主持的南开大学第二届明清史国际学术讨论会在天津召开，这是继1980年由郑天挺先生主持的第一届明清史国际学术讨论会，南开大学召开的又一次国际明清史学术盛会。来自美国、英国、加拿大、日本、韩国、新加坡、澳大利亚、丹麦等国家和我国的百余名学者出席了此次会议。关先生继1980年后，又应邀出席这次学术盛会。当时我刚留校，是会务服务人员。7月10号，在天津火车站接到关先生时，我非常高兴。当时住宿条件还很差，会议代表两人住一间，天津的夏天非常炎热，旅馆没空调，关先生却很乐观，说：“这里比广州要凉快多了！”记得当时关先生提交的论文是讨论明代翰林院制度的；第一届会议上，他的论文是关于明代内阁制度的，都是关于明代非常重要的政治制度史问题，受到与会者的高度评价。会议结束后，我陪关先生去吃久负盛名的狗不理包子，当时狗不理包子只有一家店，在天津市和平区山东路上。我尽管在天津已经三年了，却从未去吃过。大约11点我们就到了，没想到竟然人山人海，门外已经排起了长长的队伍，我们只能排在队尾，耐心地等待着。烈日当空，不一会儿，我们就汗流浹背了，但排着的队伍几乎没动。一个小时过去了，我们才排到门口。没想到店里面人更多，人声鼎沸，空气中弥漫着汗臭味和油烟味，极不舒服。关先生苦笑了一下，说：“包子不吃了吧！”我们



只好挤出人群，在附近一家小店随意吃了点东西。本来想请关先生吃狗不理包子，没想到却是这样的结果，这是唯一一次试图招待关先生，却未成功。以后再也没有这样的机会了，其情其景，似在眼前！

1992年年初，我与汉华兄合作，撰写了一篇明代制度史的论文，题目是《试论明代监察官的考选制度》，该文在详尽收集文献资料的基础上，对明代监察官员的选拔、考察与监督进行了探讨与论证，对制度崩坏及其原因作了较深刻的分析，揭示了其发展规律。文章写好后，呈请关先生审阅，他阅后提出了若干修改意见，并建议补充相关文献资料，使文稿更加完善。论文定稿后，经叶显恩先生推荐，刊发于《中国史研究》1993年第2期，受到学术界的重视，《中国史研究动态》《中国历史学年鉴》《20世纪明史研究综述》等均对论文学术观点作了重点介绍，这对于增强我们的学术自信起到了良好的激励作用。

1988年夏关先生离开武大后，南下回到家乡广州，在华南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担任资深教授，继续从事教学和科研工作，成果不断，著述甚丰。他的学术著作《嘉庆帝传》《明代政治制度研究》等，在明清史学界都有很大影响，也是我案头常备的书籍，我曾撰写《拨开疑雾见本真：关文发教授新著〈嘉庆帝传〉读后》（发表于《江汉论坛》1995年第7期）表达自己的读书心得。

1996年元月15日，我去香港读书时，路过广州，特地去广州石牌华南师大家属区看望关先生。他精神矍铄，书桌前铺着稿子，正在写论文。他笑着跟我说：“香港明清史学界，有两位知名学者，陈学霖先生和赵令扬先生，都很有影响力。你有机会的话，可以去拜访他们，向他们请教。”关先生还鼓励我抓紧时间，好好学习，这些我都铭记在心。后来在香港五年学习期间，我经常向香港中文大学的陈学霖先生请教，他给了我实质性的指导，帮助极大。而香港大学的赵令扬先生最后成为我博士论文的答辩主席。关先生看似不经意的一句话，给我指明了方向。

这些年，我只要路过广州，都会去看望关先生，聆听他的教



海。平时也能从汉华兄的只言片语中，获知关先生的近况，内心一直非常敬佩关先生退而不休、终生坚持学术研究的精神。如今关先生遽归道山，斯人远去，留给我们的是不尽的思念！

（作者系历史学院 1984 级校友）



国立武汉大学初创十年 (1928—1938)素描

涂上飙

1927—1937年，全面抗战爆发以前，是国民政府发展的“黄金”十年。国家的政治、经济、文化、科技、教育等各个方面都得到了大发展。在这一大发展中，国立武汉大学经过调整、整合，逐步发展壮大，成为武汉大学历史上发展最快的时段之一。经过十年的发展，成绩突出，一度与国立中央大学、国立北京大学、国立清华大学、国立浙江大学并誉为“民国五大名校”。

1928年，国立武汉大学建立后，与国立北京大学、国立北洋大学(后因学科调整，更名为国立北洋工学院)、国立山西大学(后取消国立)、国立东南大学(1928年5月更名为国立中央大学)、国立广东大学(1926年更名为国立中山大学)、国立同济大学(1927年8月在上海)、国立暨南大学(1927年9月在上海)、国立第三中山大学(1928年7月改称国立浙江大学)、国立清华大学(1928年在北平)、国立交通大学(1928年)、国立山东大学(1929年)等大学，成为民国第一批国立大学。

国立武汉大学初创的十年，是学校基础建设大发展时期。历经艰辛建立的珞珈山新校区，奠定了武大以后发展的基础。当时确定的3 063.9亩(不包括1936年以后农学院在磨山南面的4 000余亩农林场土地)建校土地，是一种非常有远见的行为。这一土地面积仅次于国立浙江大学的6 533.4亩(含农场土地)、国立山东大学的5 210.6亩、国立北平大学的5 070.3亩、省立广西大学的40 637.0亩(含农场土地)，在当时全国性的41所大学中处于第5位。



国立武汉大学初创的十年，是学校发展规模不断壮大的时期。截至1936年，学校已有文（中国文学系、外国文学系、哲学教育系、史学系）、法（法律学系、政治学系、经济学系）、理（数学系、物理学系、化学系、生物学系）、工（土木工程学系、机械工程学系）、农（农艺系）5个学院14个学系。仅次于国立中央大学（7个学院、29个学系）、国立中山大学（6个学院、22个学系）、国立北平大学（5个学院、18个学系）、国立交通大学（5个学院、16个学系）、国立清华大学（4个学院、16个学系）。

国立武汉大学初创的十年，是学校师资力量大汇聚的时期。十年累计有188名教授在此任教，平均每年有百余名。他们中有后来成为一级教授的李剑农、刘永济、刘赧；有成为“部聘教授”的周鲠生、杨端六、刘秉麟；有成为院士的王世杰、周鲠生、高尚荫、汤佩松。法学院因有王世杰、周鲠生、燕树棠、杨端六、刘秉麟、任凯南、陶因等一批名教授，而被誉为“法学院之王”。与交大的“工学院之王”，北大的“文学院之王”，清华的“理学院之王”，金陵大学的“农学院之王”并称为当时全国著名的几个“学院之王”。

国立武汉大学初创的十年，是学校科研产出丰硕的时期。科研成果的基础性、高端性、国际性都十分突出。中国文学系的谭戒甫出版著作15种，外国文学系的陈尧成出版著作17种，物理系的吴南薰出版著作18种，生物系的张珽出版著作13种。王世杰、钱端升的《比较宪法》，周鲠生的《国际法大纲》，李剑农的《中国经济史稿》，范寿康的《美学概论》，刘赧的《声韵学表解》，谭戒甫的《墨经易解》，刘秉麟的《财政学大纲》，刘迺诚的《比较政治制度》（上、中、下卷），张珽的《植物生态学》，汤璪真的《绝对微积分》（译本）等都是享誉全国的大作。

1936年2月，汤佩松、宋秉南在 *Nature* 上，以 National Wuhan University 为单位，发表论文 *Change in Optical Rotation of Glucose in Dilute Solutions of Boric Acid*；10月，汤佩松、林春猷在 *Science* 上，同样以 National Wuhan University 为单位，发表论文 *Downward Shift of pH Caused by Addition of Glucose to Boric Acid Buffer Solutions*。

国立武汉大学初创的十年，是学校人才培养的凸显时期。学校



早期培养的人才，少则几人，多则几十人。1928年以后，学校平均每年在校的本科生人数达到600人，这一培养规模仅次于国立中山大学、国立北平大学、国立清华大学、国立北京大学、国立中央大学等大学。1935年，学校的法科、工科研究所开始招收研究生。与当时的国立北京大学、国立清华大学、国立中山大学、国立中央大学、国立北洋工学院、私立南开大学、私立燕京大学、私立东吴大学等，成为当时研究生培养的主要单位，是当时高级专门人才培养的重要基地之一。

国立武汉大学初创的十年，是学校大学精神凝炼和革命意志锻造的时期。在刘树杞、王世杰、王星拱校长的带领下，学校逐步形成了“明诚弘毅”的校训。“明诚”两字，出自《礼记·中庸》：“自诚明，谓之性；自明诚，谓之教；诚则明矣，明则诚矣。”“弘毅”两字，出自《论语》：“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远。仁以为己任，不亦重乎？死而后已，不亦远乎？”

国立武汉大学初创的十年，正是国家民族危机日益深重的时期，珞珈山下的教职员工以民族大义为重，通过著书立说、宣传演讲，启迪国人；通过捐钱献物、抵制日货，践行抗日。狮子山上的学生们，当侵略军横行中华大地时，他们以自己的英雄行为谱写了一曲曲抗日救亡的壮歌，游行、罢课、抗议、宣传、革命等，在学校革命斗争史上写下了光辉的一页。

总之，国立武汉大学初创的十年，是蓬勃向上的十年，也是奋发有为的十年，更是日新月异的十年！

注：选自涂上飙编著《国立武汉大学初创十年（1928—1938）》一书，长江出版社2015年出版。

（作者工作单位：武汉大学档案馆）



武大“十区”考

涂上飙

合校以前的武汉大学，为管理的方便教工住宅曾划分为“十区”，现在的人大多不知道十区的概念了。为给后人留下一些线索，特撰此文。

一、学校基本建设概述

1928年7月，国民政府大学院(后来的教育部)决定建立国立武汉大学的时候，李四光作为武汉大学建筑设备委员会的主任，与林学家叶雅各等人一道在珞珈山选择新校址，旧校址在蛇山南面的东厂口。经过国民政府和湖北省政府的同意，最后确定东以东湖滨为界，西以茶叶港为界，北以郭郑湖为界，南自东湖滨至茶叶港桥头，总面积3000余亩(上报到教育部的面积为3063.9亩)的珞珈山新校址。

其实，民国时期武汉大学除了珞珈山新校址外，还有另外两处办学地址。一处是磨山南面4000余亩的农学院的农林场，另一处是旧校址的东厂口，其中的一部分作为医学院的附属医院。这三处加起来有8000亩左右的土地，比现在面积5000余亩的学校要大得多。

珞珈山新校址，包括珞珈山、狮子山(现樱园)、火石山(现行政楼东西两边)、廖家山(现理学院北面)、团山(现理学院东北面)、扁扁山(现湖滨游泳池附近)、侧船山(现经济与管理学院北面)等山。



新校舍设计包括：文、法、理、工、农、医六大学院；大礼堂、图书馆、总办公厅、体育馆、饭厅等大建筑物；男生宿舍六栋，女生宿舍一栋；电气厂、工场各一栋；教职员住宅大小数十栋；其他房屋若干栋，纵横马路数十华里。

1929—1932 年，第一期建设的新校舍——包括狮子山上的理学院、文学院、礼堂、饭厅、学生宿舍和珞珈山南的教工宿舍等建筑完工。1933 年开始第二期建设，1936 年全部竣工。主要建筑有法学院、工学院大楼、理学院附楼和图书馆、体育馆、华中水工试验所、珞珈山教授别墅以及半山庐等。至 1938 年初，除农(部分工程)医两学院、大礼堂、总办公厅等项工程外，大部分工程陆续完成。

二、十区的最初划分

3000 余亩土地，规划为十个区：第一区，位于珞珈山东南边，有坟约 30 处，拟建筑教职工住宅 40 栋；第二区，位于珞珈山北面，侧船山附近，有坟约 70 处，拟建筑体操场、体育馆；第三区，位于珞珈山中西部，有坟约 100 处，拟培植校林及修建教职员工宿舍；第四区，位于珞珈山北边，火石山处，有坟约 60 处，拟建筑理学院、工学院；第五区，位于狮子山的东边，有坟约五六十处，拟建筑大礼堂、办公室、图书馆；第六区，位于狮子山的中西边，有坟约 50 处，拟建筑学生宿舍；第七区，位于狮子山的北边，团山、廖家山处，有坟约 60 处，拟建筑文学院、法学院；第八区，位于廖家山的北边，北临东湖，有坟约 60 处，拟建筑本校动力自来水厂、工厂、煤气厂；第九区，位于廖家山的西边，有坟约 30 处，拟建筑医学院；第十区，位于郭家山南、茶叶港东，有坟约 150 处，拟建筑农学院。

从当时的规划来看，十区是依据地理自然方位，从南到北依次划分。后来是依据建筑物所在地，为管理的方便来划分区域。



三、一区的出现

一区，就是教职员住宅第一区。它在珞珈山的东南头，即我们现在所说的十八栋，基本是独立或连体的别墅形式，主要用来延聘教授。当时学校许多有名的教授及学校领导都在一区住过。

据曾经住在十八栋的查全性(中国科学院院士、武汉大学化学与分子科学学院教授)和皮公亮(长江日报资深记者)介绍，十八栋住过的名人有：

第4栋(双栋)住过范寿康、陶因、刘迺诚、钟心煊等人。范寿康(1896—1983)，著名哲学家。陶因(1894—1952)，著名经济学家。刘迺诚(1901—1976)，著名政治学家。钟心煊(1892—1961)，著名植物学家。第5栋(双栋)住过郭霖和蒋思道。郭霖(1894—1942)，著名机械工程专家。蒋思道，著名法学家。第6栋(双栋)住过缪恩钊、高翰。缪恩钊(1893—1959)，著名土木工程学家。高翰(1902—1996)，著名哲学家。第7栋(双栋)住过陶延桥、李儒勉。陶延桥(1898—1985)，著名化学家。李儒勉(1900—1956)，著名英语语言文学专家、翻译家。

第8栋(单栋)住过王星拱、皮宗石、刘正经。王星拱(1887—1949)，著名教育家、化学家、哲学家，国立武汉大学校长。皮宗石(1887—1967)，著名教育家，国立武汉大学法学院院长、教务长、图书馆馆长。刘正经(1900—1958)，数学家。第9栋(双栋)住过查谦、余炽昌、吴维清和席鲁思。查谦(1896—1975)，物理学家、教育家。余炽昌(1899—1977)，著名的桥梁专家。吴维清，著名数学家。席鲁思(1896—1966)，著名古典文学研究专家，中文系“五老”(声望很高的五位老教授)之一。第10栋(双栋)先后住过汤佩松、方重、陈鼎铭、吴于廑、刘秉麟和查谦。汤佩松(1903—2001)，著名植物生理学家，中央研究院院士。方重(1902—1992)，著名英语语言文学专家、翻译家。陈鼎铭，化学家。吴于廑(1913—1993)，著名历史学家，武汉大学副校长。刘秉麟(1891—1956)，经济学家，教育部部聘教授。第11栋(单栋)



住过周鲠生、刘秉麟。周鲠生(1889—1971)，著名法学家、教育家，中央研究院院士，国立武汉大学校长。第12栋(双栋)住过徐天闵、张有桐、方壮猷。徐天闵(1888—1957)著名古典文学研究专家、诗人，中文系“五老”之一。张有桐，政治学系教授。方壮猷(1902—1970)，著名历史学家。第13栋(单栋)住过叶雅各。叶雅各(1894—1967)，林学家，农学院院长。第14栋(单栋)住过邵逸周。邵逸周(1891—1976)，著名矿冶学家，工学院院长。

14栋后来改为学校招待所。

第16栋(单栋)住过皮宗石、葛扬焕。葛扬焕(1899—1972)，著名法学家。第17栋(单栋)住过杨端六、袁昌英夫妇，外籍老师及陈华癸、周如松夫妇。杨端六(1885—1966)，著名经济学家，法学院院长、教务长。袁昌英(1894—1973)，中国早期女作家、翻译家，“珞珈三女杰”之一。陈华癸(1914—2002)，著名微生物学家、教育家、中国科学院院士。周如松(1912—2005)，周鲠生之女，著名金属物理学家。第18栋(单栋)分别住过三任校长王世杰、王星拱和周鲠生。王世杰(1891—1981)，著名法学家，中央研究院院士，国立武汉大学校长。第19栋(双栋)和第20栋(双栋)先后住过汤璟真、黄叔寅、刘永济等人。汤璟真(1898—1951)，数学家，毛泽东东山高等小学堂时的同学。黄叔寅(1902—1961)，化学家。刘永济(1887—1966)，著名古典文学专家，国家一级教授，中文系“五老”之一，文学学院院长。第20栋和第21栋之间，原有一栋，在抗战中被毁。第21栋住过许宗岳。许宗岳(1911—1974)，物理学家。

以上是老十八栋。学校后来又修建了四栋，即第4栋西边的三栋(第1~3栋)和第16栋西边的一栋(第15栋)，但这里仍统称为十八栋。

第1栋(单栋)住过杨端六、袁昌英夫妇，第2栋(双栋)住过朱祖晦、刘迺诚、刘永济和陈源、凌叔华夫妇，第3栋(单栋)住过查谦和桂质廷，第15栋(单栋)住过高尚荫。朱祖晦(生卒年不详)，经济学家。陈源(1896—1970)，著名文学评论家、翻译家，文学学院院长。凌叔华(1900—1990)，著名作家、画家，“珞珈三女



杰”之一。桂质廷(1895—1961)，物理学家、教育家，我国电离层物理学的奠基人之一，理学院院长。高尚荫(1909—1989)，著名病毒学家、中国科学院院士，武汉大学副校长。

十八栋的房子是假四层楼，一楼是厨房和佣人室，二楼是饭厅、客厅和书房，三楼是卧室、洗手间(配有抽水马桶)，四楼是储藏室。

十八栋在山上的分布排列成三排。从下往上看，第1~7栋为第一排，第8~14栋为第二排，第15~21栋为第三排。

1938年4月，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政治部第三厅厅长郭沫若和夫人于立群从汉口搬到武汉大学，住进一区20号(即第12栋二单元)，后称“郭沫若故居”。5月，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政治部副部长周恩来和夫人邓颖超也从汉口搬到武汉大学，住进一区27号(即第19栋一单元)，后称“周恩来故居”。2001年6月，十八栋的周恩来故居、郭沫若故居被国务院列为第五批国家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四、二区的出现

二区，就是教职员住宅第二区。在校医院西边下坡一带，即梅园食堂下边向西南一直到现在的附小处，多为一、二层的房子。可惜的是新图书馆扩建时，把梅园食堂与图书馆之间的二区房子全部拆光了，以后的人就再也没有二区的印象了。王煜雯在日志中写道：“我知道武大特二区的时候，它已经只是一个地名了，里面残存着一栋孤零零的房子。可是，曾经它不是这样的。”二区24号的后代以《缅怀老房子》为题，在博客中写道：“二区的房子正在被拆掉，它一点一点地凋零，终于要消失了。疼痛在身体里慢慢扩散，漾到我的心中和眼中。那是我长大的地方，我们三代人在这个小区里度过了无数岁月。虽然我早已离开了它，但它的存在却是一个真实的慰藉。走到天涯海角都记挂着它，骗自己：你随时都能回去，那些人和事一如往昔……”

“24号里载着我的春夏秋冬。春天阴雨绵绵，厨房和天井的地面上永远湿湿的一片，衣服永远也晒不干；夏天烈日炎炎，躺在黑



暗的走廊里睡觉，在天井里吃饭，空气里是知了有节奏的喧嚣和西瓜清凉的香气；秋天天气晴好，坐在屋后的葡萄树边晒太阳，边搜寻着草丛中的蚱蜢；冬天阴冷刺骨，挤在小房里吃羊油麻辣火锅，辣得满头大汗手脚却还是冰凉……”

从学校往里走，接近二区的时候，马路的两边有不少便民生活供应点，如理发店、冰棒房、澡堂、银行、邮局、食堂、副食店、新华书店、汽车队、菜场、杂货店和小餐馆等。经过二区要上一个坡，不到 50 米就到卫生科了。经过卫生科，二区就走完了。前面有一个煤店及百货商店。百货商店的后面是东中区，隔着一条马路是三区，粮店和幼儿园在三区。过了幼儿园就是东三区，往东大约一里路几乎没有人住，直到九区。

二区分为老二区、新二区和特二区。老二区最初建设的两排房子是一楼一底，中间有亭子间，是上海弄堂式的楼房。两头的房子共住四家，一个门进去住两家，楼上楼下是不同的住户。两排房子的中间有人工的石山、种植的树草，当时还有铁栅栏，1958 年大炼钢铁时，栅栏被拆除炼钢了。只有住户自己开前门才可进入此大院落。当时这里住的是职员、讲师，苏雪林来武大前，在安徽大学已是副教授，对来武大后只能当讲师一直耿耿于怀，但对分到一套二区的住宅却非常高兴。

在学校的第二期建设中，新二区也修建起来，总共四栋，可以住 16 户，四间大房、四间小房。与老二区不同的是，新二区住的是教授。1946 年，吴宓先生来武大外语系任系主任时，就住在这里，不过，他也因未能分到著名的十八栋的房子而感到遗憾。新中国建立初期，学校的一些负责人如徐懋庸、邬保良、何定杰、周新民等都曾在此地住过。

特二区是学校从乐山迁回珞珈山后修建的，也是教授住宅。两排白墙红瓦的二层房子，主房有四间，两间大约 19 平方米、两间大约 11 平方米，还有保姆间、厨房。房中有天井，把主房与保姆间、厨房隔开，外表看去和老二区差别不大，但里面的格局迥异。新中国成立后，何定杰、李崇淮、李格非、程千帆、杨端六、刘永济、席鲁思等部门负责人和教授都住过此地。



当时老二区和新二区的分界线在图书馆和梅园食堂的交叉路口处，路的西南部分为老二区，路的东北部分为新二区，新二区的北面为特二区。

二区除了住过上面所说的人外，还住过其他老师，不乏有名之人。如外文系陈登恪、方重、胡光延、石民，哲教系程乃颐、胡稼胎、王凤岗，化学系葛毓桂、魏文悌、邬保良、尹致中，物理系葛正权、张其浚，机械系郭仰汀、罗树生、孙云霄，农学院郎星照、张传琮，中文系刘异，法律系潘源来、吴歧、吴学义，历史系韦润珊、吴其昌，电机系文斗、赵师梅、谭声乙，事务部熊国藻、余骏、张泽清、皮守仁，体育部袁浚，校长室丁曰华，图书馆黄孝楨、皮高品，注册部江孝楨、金长椿、金绍先，附小梁荣誉等。

后来住在此处的还有张廷昌、熊全淹、周如松、曹胜涛、钟兴厚、李培森、方麟侣、牟瑞雯、熊全沫、胡国瑞、姚薇元、张云鹤、陈尧成、袁锦翔、杨鸿年等。

五、三区的出现

三区，即教职员住宅第三区。三区在民国时期也有老三区、新三区和特三区的说法。老三区是20世纪30年代为从事学校管理的职员建造的住房。它在现在的校医院东面，位于新工会一带，是两家联体青砖的小屋，就像现在的联体别墅。共有四排大约十栋，房子的间距很宽，家家都有独立小院，住房面积大约50~60平方米。据说肖杰老师的院落收拾得最得体。新三区是20世纪30年代后期西迁乐山前，学校在进行第二期校园建设时，为教授们修建的住宅。它和新二区的建设模式一样，总共三栋12家，房前栽有梅花、石榴和松柏。特三区是学校从乐山迁回后，为教授们建造的住宅。因是战争时期，修建的是平房，也有院落，大约100多平方米。

新中国建立后，随着学校人员的增加，相继修建了东三区、北三区、南三区和西三区。东三区是学校管理职员的居所。房子有两种户型，一种是单门独户，一种是两家共用一厕所。北三区是珞珈山坡下三栋青砖的教授小楼，在现在新工会的东边。住房面积虽然



不大，但环境优雅，樟树、栎树密集，小楼掩映在密林之中，各家培育的栀子花、茉莉、月季、枇杷、冬青等花香四溢。后来三区又盖了36家、18家，都是三层楼房。三区粮店旁边曾经有两排木板平房，十多户人家共用两头的厕所。在这里住着的多是职员、工人，苏联人(安娜的父母)和被划为右派的章蕴胎教授也在此住过。

1958年前后，在新三区(北三区)马路对面(大约现在的幼儿园处)，修了两排学校校长的住所：一排可以住四家，一排可以住六家。每户两层半，楼下两大间，楼上两大间。一楼后面是厨房，二层是厕所，厕所上面还有一间小房。这十家住户从西往东依次是：1号门，曾昭安、曾宪昌父子教授；2号门，先是书记刘仰侨，后是何定华副校长；3号门，先是张勃川校长，后是刘宿贤副校长，最后是教务长张旭；4号门，高尚荫副校长；5号门，王治梁系主任；6号门，吴熙载系主任；7号门，楼下是党办开会的地点，牛太臣、郑杰、侯廉实、杨军等主任在此住过；8号门，简增贵、付开廉两位老师合住；9号门，查全性、魏克全两位老师合住；10号门，吴于廑系主任。后来的书记庄果、纪辉、王泽江等都在此住过。

南三区是东三区和北三区之间的一块地方，西三区是36家、18家与东中区之间的一块地方。

经考证，当时住在北三区的人特别多，主要有：庄果、刘道玉、蒋浦、崔建瑞、童懋林、张焕潮、李国平、高尚荫、吴于廑、王泽江、戴礼彬、张远达、齐民友、吴厚心、张尧庭、邹新提、周焕文、雷晋干、曾尧昌、陈莘萌、王光樑、李鼎初、熊吟涛、田德成、石展之、王子孝、李琪、梁明理、梁家宝、焦庚辛、林颐庚、董庆华、卓仁禧、徐羽悟、曾云鹗、屈松生、程介克、曹栽福、李声香奇、王宗礼、吴成泰、董世华、余先觉、公立华、吴熙载、何海平、周凌云、徐万瑜、周嫦、刘年翠、周大璞、刘禹昌、詹伯慧、曹绍濂、彭雨新、曹泉、陶德麟、康明邦、吴纪先、刘涤源、李崇淮、朱景尧、王治柱、孔繁滋、汤再新、陈守成、聂文杞、韩德培、姚梅镇、马克昌、张泉林、陈德芝、付开廉、陈光祚、谢灼华、王德华等。

住在南三区的有：蹇隶文、舒声、张俊生、魏克全、杨麒、陈



远萌、曹照庚、肖羽华、周敦、郑正炯、熊平英、王鄂生、高镒光、唐瑞昌、方世国、吴林伯、张仲安、董云扬、陈国灿、方西生、杨湘海、李德永、谭臻、尹景瑚、肖骥、李守庸、许海兰、马卫之、华从乙、朴富宁、韩华樑、赵德泉、杨敏才、胡心如、简增贵、彭斐章、张瑛玉等。住在东三区的有：方衡、陈衡生、郭朝胜、杨弘远、陈漱湔等。住在西三区的有：余家荣、查全性、张晓惠、孙祥钟等。

三区是所有区域中最大的一个居住群落，人员也很复杂，官员、教授、职员、工人等都有。

六、四区的演变

一、二、三区出现以后，随着学校建设规模的扩大，又出现了四区、五区的地域概念。

四区位于狮子山西边与茶港之间，即现在的桂园学生宿舍及其以北一带。这里是学校从乐山迁回以后，为新建农学院而修建的住宅，形式和东三区类似。20世纪50年代院系调整，武汉大学水利学院被调整出去，成为独立的武汉水利学院。水利学院的南界限就在四区。四区被分成两块，一块属于水利学院，一块属于武大的四区。应该说，院系调整后的四区就是现在叫做桂园的那一片。

七、五区的演变

五区就在四区的北偏西那一片，即狮子山西北面的郭家山。此处规划建设农学院，包括一栋主楼和侧楼。据陈一周（陈华癸院士、周如松教授之子）教授介绍，此处属于五区，主楼在1937年只建了一半，西迁回来后才完工。主楼的东边有一栋连体的平房，20世纪40年代住着柯象寅、章文才、陈华癸等4位教授。院系调整后，水利学院就将此房拆了。主楼的西北边，即现在中国科学院武汉水生所所在地，是农学院的果林地。农学院的所在地在20世纪50年代院系调整的过程中，划归武汉水利学院（后改名武汉水利电



力大学)。主楼成为武汉水利学院的行政办公楼。2000 年学校合并，武汉水利电力大学回归武大，其主楼成为学校学工部、团委、教育科学院、报社的办公地。

八、六区的演变

有人说六区在狮子山的东北面，位于团山及东南边那一片地方。团山在民国时期修建有女生宿舍，当时设计了一栋，可居住 80 人。实际上女生只有 60 余人，没有住满。现在这一块是湖滨教工宿舍。团山的南面是笔架山，东南是乌鱼岭。这一带有化工厂、机械厂的平房，现在这里是湖滨学生宿舍。

应该说六区在这里是有可能的。五区在郭家山，它的东边是廖家山，当时规划建设医学院。截至 1937 年，医学院还没来得及建设，学校就西迁了。1946 年学校从乐山迁回珞珈山，周鲠生校长一边恢复农学院(西迁后农学院划归中央大学)，一边建立医学院。因为当时国共关系紧张，时局变化快，医学院在原规划之地没有开展建设，没有大楼。当时，农学院大楼刚刚竣工，医学院的实验室在农学院借了一块地方工作。实习医院在原校的东厂口，学校从东厂口迁往珞珈山后，原校失修，抗战期间为日本人所占。学校迁回珞珈山后，实习医院翻修一新，变成医学院附属医院。其实，医学院的主体几乎全部在附属医院。院系调整时期，原计划修建医学院的地方划归武汉水利学院作为学生的宿舍，现在是工学部的学生宿舍。

当时区域的划分是以是否有建筑为基础的。廖家山没有建筑，不可能划分区域，而它的东边是有建筑的，那就是团山周边地区。因此，六区在此是有一定道理的。

九、七区的出现

七区位于行政大楼(民国时期的工学院)旁边，原是两排铁皮顶的木板平房，灰浆地。1957 年后，韩德培先生受到冲击，就在此处居住。他开始住下面一排，由于房子在大树下阴暗潮湿，有时



还漏雨，后来就搬到了上面一排。行政大楼下面还有一栋小平房，住了唐木匠等两家人，也属于七区。

十、八区的出现

八区有两种说法，一说是现在自来水厂对面的平房，一说是化工厂的那排房子。应该说这两处都是八区，因为它们与六区、七区相临，并在六区、七区以外。紧随六区、七区的就应该是八区了。

十一、九区的出现

九区是指东山头印刷厂（老附小）对面的一排平房，里面的住户多是印刷厂的职工。虽然大家共用厨房、厕所，但相处非常融洽。现在的九区范围扩大了，印刷厂的北边、东南边都变成九区了。以前在九区住过并有一定影响的老师有：胡迪鹤、汪向明、卢文筠、肖箴父、彭尘舜、周新民、许倭千、曹永轼、李汉波、盛丽生、严怡民等。

十二、十区的出现

学校的一位老先生在《国共易帜前后武大的家属住宅区》一文中认为，十区是湖边铁路疗养院旁边的那一排破平房（许多人说这里是九区），也是章蕴胎教授和程千帆教授被赶到“嫩烟分染鹅儿柳”的地方。文革后期，因与周边居民发生土地争端，学校在现在大门右侧、杨家湾旁边修了两栋五层住宅，也被命名为十区，就在原来出版大楼的前面，靠近马路边上。前几年，因八一路修建下穿通道，两排两室一厅的房子就被拆除了。

十三、东中区的来历

东中区：除了 1~10 区以外，武大解放前还有个东中区。据



《国共易帜前后武大的家属住宅区》一文，东中区原本是东湖中学的三栋两层楼房，后来一栋归了武大附小，两栋隔成了职工住宅。以现在的附小为基点，向东、东北和正北三个方向有三栋两层白楼，即东中区三栋、一栋和二栋。这三栋房子格局相同，门朝南开，中间有个天井，人从四个角上楼，住几十户人。东中区因在东湖中学和二区中间，故得名。东湖中学创建于1934年，由武汉大学教职员及武汉各界名流发起创办。因地属于东湖，故称为东湖中学，1958年短暂称为“共青团中学”。后搬到东湖边上侧船山附近，东湖中学的原址成为现今的附属小学。

当时吴宓教授就在此区住过，院系调整后调往华中工学院的周克定、汤子章教授也在此住过，据说当时金克木教授住在东中区的二栋二楼。后来他写过一篇《珞珈山下四人行》，谈到他本人和历史系的唐长孺教授、外语系的周煦良教授、中文系的程千帆教授，4个35岁上下的人一起谈天说地的情景。当时东中区二栋的“数十户”人家中午或晚上，家家户户都把小桌子抬到走廊上吃饭，实际上就是听他高谈阔论。

（作者工作单位：武汉大学档案馆）



不思量 自难忘

——忆千帆老师的几件事

吴志达

1956年，在“向科学进军”的氛围中，我和北师大的同窗郝延霖君，同时考取了武汉大学古代文学专业研究生（当时学习苏联称副博士研究生），导师就是我们仰慕的程千帆教授。我们的研究方向是宋元明清文学史，还有两位“老武大”吴代芳、苏德云君，也是程门弟子，其研究方向则是魏晋南北朝隋唐五代文学史。在我们报到后的第二天晚上，由代芳陪同我和延霖，登程门拜见导师。

一、热情爽朗，博学卓识

程先生当时才四十出头，容光焕发，风度潇洒，热情爽朗，和蔼可亲。而对我们学业上的要求，又是极其严格的。在他听了我们简要的情况介绍后，明确地指出：第一，在对本研究方向学术领域有较全面了解的基础上，结合国家所赋予的使命——在高校独立任课或科研机构承担科研任务，拟订研究计划，交一份给他，然后约定时间专谈研究计划的问题。第二，学术研究，当然要出成果，但是切不可急功近利，把基础打得宽厚一些，要像金字塔那样，绝不能像根电线杆。你们是经高教部统一命题考试录取、经我考察同意才进来的，无论你们在读本科时期的成绩如何，研究生是一个新的起点，要有新的奋斗目标。你们的研究方向是宋元明清文学，但也要熟悉先秦两汉的主要典籍，不然，以后就会吃亏。汉魏六朝小说、唐人传奇，对后来的戏曲、小说影响深远，不溯源难以穷流，



广博才能专精。第三，视野要宽阔，从事古代文学研究，要懂古代文学理论批评，外国的文艺理论也要学，但是不能生搬硬套，中国有自己的理论批评特色，系里特请刘弘老（永济先生）为青年教师和研究生讲授《文心雕龙》，认真学，必有收获。理论批评要与文献考据相结合，既不能作空疏之论，也要避免烦琐的史料堆砌。他强调要注意文学与历史、哲学的关系，把文学放到一个特定的文化背景中来研究。听师一席话，颇有茅塞顿开之感。

我们每周听他讲三次宋元文学史课，隔一周汇报一次学习情况，谈学习心得和有关问题。从他的讲话和布置的工作中，我们感受到程先生既重视培养研究生独立思考和研究问题的能力，又重视基本功的严格训练。先从分析某篇有一定难度的具体作品做起，然后写读一个作家集的札记，对他的《宋代文学史》写出最简练的《四库全书提要》式的评述，能提出自己不同的意见，进而选择一个作家或某个有争论的学术问题写论文。尽管他的工作很繁重，但凡是我们要交的各类性质的文稿，他都仔细批阅。我的课程论文选题是《王安石诗初探》，郝延霖的选题是《论苏轼诗》，他赞同我们的选题，随即从他的藏书抽出李壁《王荆文公诗集笺注》和蔡上翔《王荆公年谱考略》借给我；将王文诰《苏文忠公诗编注集成》和《苏诗总案》借给郝延霖，这些都是线装善本书。他还用大牛皮纸资料袋装了一大袋芝麻花生糖给我们，临别时饶有风趣地说：“各有所携，满载而归。”爽朗的笑声，仿佛犹在耳际。

我的处女作《王安石诗初探》，他批阅后亲自送到我们的宿舍来。在他的鼓励下，我将文稿寄到《文史哲》编辑部，当年（1957）12月号就发表了，而程先生却因误入“阳谋”的罗网已被贬至系资料室工作。据在场的人说：“当时程先生看到你在《文史哲》上发表的文章，真是喜形于色，好像比他自己发表文章更高兴。”这就是一个教师的心情。

程先生很注意学术动态，为了准确掌握学术发展历程，培养了我们写卡片的习惯。他设计了卡片样式，印发给我们研究生和几位助教，在他指导下，对中国古代文学史从辛亥革命以来的研究资料做了普查，分工协作，做出系统的、较为完整的资料索引卡，经复



制，我们每人都有一套。我参加工作后，住在湖边三舍。在“文革”中，教师被集中到学生宿舍，让学生监管教师，而“宣传队”占住湖边教师宿舍，把我积累十年满抽屉的卡片，当做生炉子的佳品烧光了。

二、谆谆善诱，才华横溢

听程先生讲课，真是高层次的艺术享受。他学识渊博，才华横溢，语言雄辩，使听众深为感佩。他总是在讲课前，把讲义铅印发给学生，这对来说，无疑是方便多了。但对教师来说，把自己的“秘密武器”事前交给学生，却是一种高度自信的表现。在当时（1956—1957）我们所见到的文学史著作中，还没有如此详备丰赡的同类著作。由于众所周知原因，这部到1988年10月才定稿的《两宋文学史》和2013年才出版的《元代文学史》，虽然前者经吴新雷教授、后者经我协助修订，对某些章节“做了填平补缺的工作”，宋元文学史总字数近八十万，但相比其初稿即当年所印发给学生的讲义，规模已颇为宏大，涉及此前同类著作中许多不曾或甚少论述的领域。尽管论点、史料、考据、鉴析诸方面，在讲义上都已备载，千帆老师的讲课却仍然具有很强的魅力，总觉得听他讲课有新的收获，讲义之外还大有学问。他的课堂语言，流畅精警而游刃有余，抑扬顿挫，触处生春；譬喻形象生动，而又具有雄辩的逻辑力量；批判反面人物或丑恶现象语言犀利而又富幽默感。神态严肃而又自然，内容比讲义上所写的更深化、更丰富了。“老武大”的友人说：“程先生上课，三分钟就可以把学生带进艺术的境界。”此言不虚也。

千帆先生才思之敏捷、记忆力之强，也是令人佩服的。如果说在课堂上很少看讲稿，能把讲义的内容既熟练又生动、引人入胜、条理清晰、有如行云流水般地表述出来，可以理解为备课充分；那么在课外，例如我们和他谈研究计划、论文纲要，或是谈某个学术问题，每当涉及某个作家的作品或相关史料，他随口就能指出见于某书第几卷，甚至把原文背了出来，对版本的优劣，也很熟悉。这



固然与他早年在堂伯父君硕先生办的“有恒斋”私塾学习我国古代主要经典著作有关，即所谓“童子功”很扎实，也与天赋的聪明才智分不开。我们今天没有重走读私塾的可能与必要，但凡有志于研究我国传统文化之士，在上中学、乃至大学时期，在我国古代主要典籍方面多下点功夫，也是能见成效的。这里需要特别指出的是：程先生之所以能成为当代大师级的学者，成为具有广阔视野和高度开放的现代意识的学界领军人物，与他从初中三年级开始到大学毕业，去南京接受现代教育密切相关。当时的金陵大学（包括附中）和中央大学可谓大师云集，教师可以在两校兼课，学生可以在两校听课，像黄季刚、胡小石、刘衡如、胡翔冬、吴梅、汪辟疆、林公铎、汪东、王晓湘等名师的课，他都认真地听了，转益多师，融会贯通，与时俱进，终成大家。他的专业是古代文学，但对中外文艺理论和现当代文学创作都很关注。因此，在他当系主任期间（1947—1952），凡是无人肯教的课，他都自己来承担。例如应历史系系主任吴于廑之邀，讲一年制每周三节课《中国文学通史》，没有人愿意接受这种制作“压缩饼干”似的任务，吴于廑先生是他的好友，盛情难却，他就自己去讲这门课，因他取舍得当，突出重点，讲授生动，效果很好。收在他的全集第十二卷的《程氏汉语中国文学通史》，就是在当年讲义基础上修订的，具有鲜明的特色。例如明代兴起的八股文，以往的文学史著作大多视八股文为反面教材，花极少篇幅，点到为止。而早在20世纪80年代后期，我接受教育部授予编写《明清文学史·明代卷》的任务，千帆老师就曾嘱咐我“应将八股文列专章”，我从明代文学的全局考虑，原则上接受老师的意见，八股文的篇幅、内容相当于一章，但在编目上却列为节。程氏著文学史则把八股文列为专章，叙论允当，在众多文学史著作中可谓首创。再如原由丽尼（郭安仁）教文艺学，被调北京后，这门课没人承担，程先生就自己来教。还有当时四年级的写作课，教写总结、写报告之类，也没人愿意干，他也自己去教，效果都很好。这都与他丰富的知识结构、广阔的视野、接受新事物新知识的能力密切相关。



三、学术帅才，善于创新

在20世纪那场“扩大化”运动之前，武大中文系教师阵容之强盛，在全国都是颇有名望的。老先生有以刘永济、刘博平、徐天闵、黄焯、席鲁思为代表的“五老”，中年教师有以程千帆、刘绶松、袁昌英、沈祖棻、李健章、周大璞、胡国瑞、李格非为代表的“八中”。1956年《文学研究》（后来改名为《文学评论》）初创，特聘刘永济、程千帆两先生为编委，由此可见一斑。“反右”之后的所谓“五老”“八中”，恕我直言，已有降格凑数之嫌，有的“老”或“中”，实在不敢恭维。从发展的角度看，现在文学院的教师队伍颇为可观，不乏名师、大家，稍感不足的就是尚缺大师级的领军人物。其实现在的物质条件比以往任何时候都好，为什么从全国高校或社科系统来看，似罕见公认的正活跃于文坛的大师呢（但愿这纯属我的孤陋寡闻）？也许与受一些不必要的干扰、流于形式的繁文缛节有关。

程先生既是学识广博的通才，又是由博返约、学有专精的专家，毕生著作等身。他作为教师，与科学院的学者在科研项目方面有明显的区别。教师所面临的任務，首先是教学，科研方向与教学活动密切相关。宋代思想家、文学家朱熹《观书有感》诗云：“问渠那得清如许，为有源头活水来。”教学活动过程，正是教师从事学术研究的“源头活水”，程老师的绝大多数学术著作是在授课的讲义基础上，不断修订、充实、提高而成为佳作的。每部著作都有其鲜明的特色，具有学术个性。特别是像文学史这类著作，无论是通史还是断代史，在有几家著作问世的情况下，难免会有所雷同，而他却能在略有所同的情况下突出其所异。这在前面提及的《程氏汉语文学通史》《两宋文学史》《元代文学史》等著作中，就足以见出其学术共性与个性。武大在四川乐山时期，他为教学而写的《文论十笺》《史通笺记》《校讎广义》等专著，别人似无同类著作，其学术个性似更突出。1957年他因参与“鸣放”而获罪，冠以“右派元帅”称号，先后下放八里湖、沙洋农场劳动。其间有一段时间，正是



1961年大饥荒之时，政策放宽，让“右派”回校做教辅工作，程先生回到中文系资料室，他不仅把资料工作做得非常出色，各个学术专题剪报、资料卡片齐全，还利用掌握学术信息的有利条件，在业余时间做学术研究。收在先生《全集》第八卷的《唐代进士行卷与文学》和《古诗考索》中的若干具有代表性的考据文章，就是在这期间写的（每篇末尾，标明写作年月）。他是那种得一支点就能创造奇迹的人。“史无前例的浩劫”，他当然在劫难逃，丰富的藏书被抄散，《金瓶梅》《西厢记》之类小说、戏曲通俗读物，被造反者抢劫，著作手稿当作罪证没收。大约1973年前后，原中文系所在地“工农楼”一间堆放杂物的房子，发现一口铁锅中堆满写有程先生姓名的手稿，沈先生得知，如获失而复得的至宝，抱回家去，其中就包括上述书稿，《校雠广义》稿已霉烂不堪，劫后幸存，亦是奇迹。

他文史哲兼修，学贯古今中外，在文献学、古代文学、古代文论三大专业领域，都取得被学术界公认的建树。在古代文学方面，贯通文学史，尤精于诗，特别是唐宋诗，这是有丰厚家学渊源的，他的叔伯祖父、父亲，都是著名的诗人。他不愿意搞选本，只因为教学工作需要，才与先师母沈祖棻合作搞了从汉魏六朝以迄唐宋的《古诗今选》，具有鲜明的特色，选篇精当，一些艺术性可谓上乘而一般人认为思想性不强的，他们选了，例如张若虚的《春江花月夜》。程先生曾多次讲授《杜甫研究》，也出版过《宋诗选》，但最后作为专项科研成果收入《程千帆全集》的是《杜诗镜铨批钞》《读宋诗随笔》。还值得一提的是《被开拓的诗世界》一书，是他与莫砺锋、张宏生合作的，但最具创意的一篇——《一个醒的和八个醉的——读杜甫〈饮中八仙歌〉》，为程先生所独撰。据我所知，还有一些论文，例如研究辛弃疾、元好问的论文，均未收入《全集》，我体会其用意是：去除一般，独存精髓，不追求字数之多，而重视质量之高，保留真正独创性的成果。前《文学遗产》主编徐公持曾说：“当代学者，研究中国文学取得最高成就的是南方案千帆，北方钱钟书。”这是很公允的评价。

无论在武大，还是晚年到南大，凡是经他传授的入门弟子，在教学与科研事业上都有所成。我国的第一个文学博士莫砺锋，就是



他培养的。他的人格魅力，具有极强的凝聚力。诚如王瑶先生所称赞：“程千帆很善于带学生。”在他指导下学习和工作，有如沐春风之感。每当我在治学上遇到困难或有所犹豫时，他便用巧妙的方法开导我。例如我感到撰著《中国文言小说史》战线太长时，他就引用荀卿名言写了条幅“锲而不舍，金石可镂”，托张三夕师弟带给我，并题写我的书斋名为“穿石居”，每当抬头见此教诲，懈怠顿消。此书完稿后，他审阅了书稿，并撰序一篇，以示鼓励；同时交给我一副重担：任《中华大典·文学典·明清文学分典》主编，1200万字，由我推荐副主编和选聘编纂人员，经费包干，并嘱我去南京参加相关学术会议。其间我向他提及一些棘手的问题，临别时他将宋人方子通的一首七绝，写成条幅赠给我：“溪流乱石碍通津，一一操舟若有神。自是世间无妙手，古来何事不由人。”我当然心领神会，要有善于处理复杂困难问题的方法和毅力。在一定的时间内，要完成巨大的文化工程，必须掌握一个方向性的基本原则，以确保《大典》的质量。他在来信中明确地提出衡量与把握质量的标准是：不误、不漏，这个顺序不能颠倒，力求不出错误是第一位的，因受字数限制，绝对不漏实际上是不可能的，但不该漏的尽可能不漏。我算是比较勤奋的，但也不免有偷闲懒散之时，为免误《大典》重任，在给先生的信中，我请他写一副鞭策性的对联，他认为我有这种精神很合他的心意，很快就将对联寄来了：“恪勤在朝夕；俯仰愧古今。”程先生组织、协调、领导学术群体的才能，确实不同凡响，具有大师超凡的气度，是学术上真正的帅才。可告慰老师的是：付出我们四代人辛劳的文化工程——整个《文学典》的六个分典，均已如期出版。

四、执著忠诚，穷而弥坚

千帆老师的心，是灼热赤诚的，像炉火似的热，又像秋水似的清。他的心总是那样坦荡透明，年逾不惑而心无城府。对家人温馨忠诚，对学生友人重信谊、笃真情，对事业执著追求，对国家和人民，具有高度的责任感和使命感。



从1952年秋到1956年9月，沈祖棻先生应邀先后在苏州江苏师范学院和南京师大任教。沈先生的健康状况不太好，所以总是程先生去苏州或南京相聚。当时一般只能坐船，需要两天一夜34小时。但他工作很忙，有一次为了能按约定的日期赶到南京，他就急忙乘飞机如期赴约，那年代乘飞机可不像现在这样容易。

1956年10月，沈先生调回武汉大学中文系任教，为祝贺他们全家团聚，全系教师和研究生在行政大楼第一会议室举行联欢会。系领导和老师们作了热情洋溢的讲话，在一片掌声中，程先生神采飞扬、满腔激情地吟唱了沈先生作的一首词《浪淘沙》四首中的第一首，以表达沈先生抗战时期的忧国之情，而与眼前的幸福欢快作对照。这也是当代文坛佳话。在家庭生活中，正是这种高雅温馨之爱的力量和传统文化的精神支撑，使程先生在遭遇“扩大化”运动的沉重打击，以及“史无前例”的浩劫中，能够坚强地度越困厄不堪之境。千帆师被贬谪到农场从事惩罚性的劳动，在他们来往的书信或所作的诗歌中，抑或偶获恩准得以回到学校最荒僻的穷巷陋室少聚，都洋溢着人间苦涩而又深挚的至情。他们既是患难夫妻，又是文章知己。先生秉性旷达爽朗，对于“以非罪获严谴，厕身刍牧者垂二十年”的不公正待遇，并不十分介意。唯沈先生的不幸车祸惨死，使他心灵受到重创，既悲且愤。那是在1977年6月间，我闻此噩耗，顾不得会不会挨批判，前往他家吊唁。先生的爱女丽则在门外洗衣服，双眼红肿，哽咽着说：“爸爸在屋里。”我走进房门，只见千帆师孤零凄凉地坐在书桌旁，左手缠着绷带悬挂在脖子上。目视此情此景，黯然神伤。我们紧握着手，好一阵子说不出话来，唯泪眼相对，心灵共鸣，同命相怜。我们师生两代人的命运何其相似，苍天为什么这样冷酷！

我国自古以来正直的知识分子，有关心国事民瘼、直言敢谏的传统，而这种净谏精神，又往往与对“圣君英主”的理想和希望联系起来。有一次，我和延霖去程先生家，与他谈学术问题，谈及宋明理学与士大夫的精神面貌，他对明代嘉靖年间一批正派士大夫为国家民生大计“苟利社稷，死生以之”的品格，深为赞赏。我们有一个共同的认识，就是每个时代、每个阶级，都有自己的忠臣。所



谓忠臣，就是意识到社会的忧患，具有责任心和使命感，为了国家和人民的利益，置个人荣辱得失于度外。正是基于这种思想认识，当1957年春邀请知名人士出席整风座谈会的时候，很多人都和程先生一样，本着“知无不言，言无不尽”的精神，坦诚地直抒己见，谁也没有料想到，会上发的谰言，竟成了入另册的罪状。

直到1975年，终于盼到了“乌头白，马生角”，程先生戴了十八年之久的右派大帽终于摘掉了，又立即奉命“自愿退休”。说起摘帽，不能不令人对这位年逾花甲的老人产生由衷的敬意。那是在沙洋农场，程先生驾着牛车顺着下坡路疾奔，前面却来了一群放学归家的小学生，眼看就将出现牛车撞倒一群小学生的惨剧，在这千钧一发之际，先生毅然跳下牛车，牵着牛鼻子拐个弯，小学生免遭横祸，而程先生自己却折断了腿骨，受重伤卧床几近一年。正是这种舍己救人的壮烈行动，感动了“上帝”，在他所属那个班组群众的强烈呼吁下，才摘掉那个帽子。

一个长于治学、才华出众的学者，正当年富力强之时，被迫“放下了笔杆子，拿起了放牛鞭和粪耙子”，确实是非常令人惋惜的。令我感到钦佩的是，在如此艰难的环境中，只要有可能，他就悄悄地拿起书本或挥动笔杆。在十八年间，大约将近一半时间是在校内农场或中文系资料室工作，白天放牧或到资料室坐班，晚间回家，与沈先生论诗谈文，读书写作，照旧不误。在沙洋农场劳动时，还利用晚上开放图书馆之机，认真地读了汉隋八代史。特别是在奉命退休，成为街道居民后，更加专心致志地从事学术耕耘。1978年春，我去看望他时，看见在他书桌右侧墙壁上，贴着一张毛笔写的纸条，上书“一寸光阴一寸金，寸金难买寸光阴”。他对我说：“这看似老生常谈，我就是要以惜分阴的精神，把失去的时光夺回来。”这不是空话，我每次去看他，他都在伏案写作，以每天写三千字左右的速度，整理沈先生遗留的论著和诗词创作稿。左丘明、屈原、司马迁等古人发愤著书，大概就是这种精神。明乎此，就不难理解，从1979年至1999年20年间，程先生的学术成果，真可谓著作等身。由河北教育出版社出版的十五卷本《程千帆全集》是他生前定稿的，为纪念他百岁诞辰，又由武汉大学出版社



出版经修订的《元代文学史》，还有由师母陶芸编的《闲堂书简》，从中可见对友人和学生的真挚情谊以及治学之道。他曾经用形象化的语言对我说：“一棵扎根深土的树，即使把它的枝干砍光了，也会萌发出新芽的。”实践证明，这也是真理。

在1957年之前，沈先生就曾与程先生相约：“要在喝采声中退场。”于是程先生于1990年在一级教授的岗位上，声望最为隆高之际，主动上书引退；而对培养青年学者和著书立说工作，仍然孜孜不倦。他是在2000年5月中旬主持通过《中华大典·文学典》最后两个分典《魏晋南北朝文学》和《文学理论》的样稿论证会后，于6月3日溘然长逝的。他对学生的遗嘱是：“在我身后仍能恪守敬业、乐群、勤奋、谦虚之教，不坠宗风。”弟子们都铭记于心。

（作者系中文系1958届研究生校友，原载《长江学术》2016年第1期）



最美大学的最美回忆

王 军

洋溢着理想主义精神的 20 世纪 80 年代是出诗人的年代。在全国高校，几乎每个中文系的学生都算半个诗人。我也未能例外。当时我因中学时写诗小有名气而被保送进武汉大学，觉得一下子由混沌的尘世进入了诗人的乐园。

1985 年，我面临高中毕业。由于偏执于文学，数理化成绩一塌糊涂，连高考预考都未通过，我只好准备做个“待业青年”了，但自己仍想像高尔基那样到社会（“我的大学”）上继续实现文学之梦。有个中学同学的哥哥是开照相馆的，我甚至准备毕业后去那儿当临时工……幸好南京梅园中学觉得我给母校争得了些荣誉，想出了一招：把我发表的作品及获奖证书复印许多份（感谢那个时代发明了复印机！）向全国二十多所大学寄发了推荐函。很快，武汉大学特意派来一位负责招生的老师，领我去武汉面试。华东师范大学也约我去上海面试（他们还答应给我的中学另外五个入学名额）。最终，我选择了武汉大学，作为免试保送生，没参加高考就跨进了大学门槛。哦，对于我而言，缪斯不仅是诗神，更是我的命运女神，她带给我好运气！

新生入校，照例由辅导员带领去瞻仰位于樱园老校舍区的闻一多铜像，因为他曾任武汉大学文学院院长，我们不再叫他老诗人，而改口叫他老院长。整个大学时代，老院长都叼着那支著名的烟斗，坐在山坡上看我们班后生写诗。这也是一种文学传统吧，武大是一所为诗人树有塑像的学校。偌大的武汉，也只有两位诗人以塑像的形式站立着，另一位是东湖公园里的屈原塑像。我“野心勃



勃”地想：第三尊塑像会留给谁呢？我可要加把劲啊。有如此想法的也许不只我一人，那个时代的诗人都有类似的雄心壮志，我周围的同学，有不少都是在闻一多铜像前宣誓成为诗人的，譬如陈勇、李少君，譬如低年级的邱华栋，我们都是浪淘石文学社的。类似的社团，仅武大就有十来个，各自招兵买马，举办朗诵会，油印诗刊，忙得不亦乐乎。我们常去的桂园咖啡馆里，有已毕业的校友王家新的诗集出售，其时王家新在《诗刊》工作，我们便觉得北京的《诗刊》跟武大有缘，谈论王家新像谈论一个发达了的亲戚。这种亲近感是可以理解的，没准，现在武大的新诗人也带着同样的神情谈论我呢。

每年春天，樱园的樱花便开了，武汉三镇的市民，成群结队地到武大校园内赏花，有一条路也以樱花大道命名。浪淘石文学社，也该举办邀集湖北各高校诗人参加的樱花诗会了。20世纪80年代的朗诵会，可比90年代的要阔气得多，一声号令，千人云集，有兵团作战的气势。我参与主持的几届，由学校派车接来碧野、徐迟、曾卓等老作家担任评委，评出的好诗都有奖品，且在校报、校刊上发表。朗诵者大多是各校的名花，莺歌燕舞，陪伴着各自的诗人逶迤而来，真是才子佳人大聚会，诗会隆重得像选美。难怪那时候诗人多呢，读者中美女也多，女大学生们以认识诗人为荣。顺便提一句：曾在樱花诗会朗诵拙作并获奖的华中师范大学“战地夜莺”（校广播员）孙汀娟小姐，毕业后成为湖北电视台著名主持人。十年一别，偶尔调频道重睹她的芳颜，我自作多情地猜测：美人是否还记得我的诗呢？

武大当时在全国领先招作家班，有廖亦武等诗人。廖胡子以酒和诗团结了一批社会上的兄弟。诗坛正闹“第三代诗歌运动”，按道理最热闹的地方应该在四川，可四川的诗人极喜爱来武汉串门。成都的尚仲敏编印《大学生诗报》，每期都及时地在武大教学楼前张贴出来，惹得众人像看大字报一样争相围观。莽汉李亚伟、杨黎从重庆乘船随流而下来武大找人，敲错了宿舍门，结果认识了正捧本《星星》在读的我，畅谈一番，还送我一套他们的诗歌资料《非非主义》。那时候只要知道对方写诗，就跟在敌后碰上同志似



的，对一下接头暗号顿时就变成生死之交了。多年之后，我跟李亚伟又戏剧性地在北京重逢了，他摇身一变，已腰缠万贯，手持大哥大敲我的门，拉我去楼下喝酒。问他还写诗吗，他说：诗不写了，酒还照样喝。想当年，李亚伟的一首《中文系》曾使全国各高校的诗人臣服。

武大快成了四川诗人的别墅，廖亦武的宿舍就是一大据点。李亚伟、杨黎、马松等“游侠”经常不请自来，反客为主地邀我们这些本科生诗人喝白酒，从他们身上，我学到了不少江湖知识。廖胡子捧着个大茶缸慢条斯理地招呼大家，与旧时代川江上的舵爷神似。他还邀约亚伟、开愚等人在武大搞过一次第三代诗歌讲座，谈吐幽默、粗野，像练武场上的枪棒教头，与平常助教、副教授们温文尔雅的讲学风格迥异，吓退了不少阶梯教室里的女学生。他们把绿林好汉的诗风带进了武大的校园。应该承认，他们使诗歌不仅仅停留在写作的阶段，而且接近于行为艺术。他们以流浪汉的形象，对校园诗歌进行了一场哗变、一次革命。武大很巧合地成为第三代诗歌运动的一座桥头堡。

廖亦武、李亚伟他们常去法律系的女生宿舍，那里有他们一个漂亮的女老乡。而且跟这个女老乡同寝室的，还有好几个漂亮的女同学。据说有一次他们泡得太久了，某女生不耐烦了：“我们明天就要交论文了。”在座的开愚说：“我可以替你写呀。”女生不信：“你写得了吗？这可是国际法专业的。”开愚讨来题目与稿纸，一挥而就，完成了一篇谈国际法的论文，女生们传阅，居然没看出什么破绽，第二天就如此交差了。由此可见开愚的博学。这是武大校园里流传的一段关于诗人的佳话。第三代诗人，大多是大学生出身，而且天性聪慧，能把死书读活了。现在看来，一座大学，多出几位诗人，还是比多出几个书呆子要强。

1989年7月（20世纪80年代末尾），我离开了武大，来到了北京，在中国文联出版社做编辑。不知是因为城市的更改还是因为年代的更替，我周围的诗人越来越少了，甚至我自己，诗也写得越来越少了，基本上改写散文了。是否可以这么认为：不管作为我个人，还是对于中国的诗人群体，都由诗化的岁月进入了散文化的岁



月？诗人们的黄金时代结束了。本文是一个武大毕业生、一个退役诗人的回忆录。但时代是否也会如此这番地回忆我们呢？它是记住了，还是遗忘了？

（作者系中文系 1985 级校友）



大清炮队

——忆我们曾经的校园乐队

吴伟文

在武大求学的那段日子是我最快乐的时光，不是因为美丽的校园和悠久的学校历史，也不是因为留恋来自异国他乡的樱花，而是因为那些令我眼花缭乱的女生，还有我们终身难忘的乐队——大清炮队。

我的大学生涯没有埋头在图书馆，而是沉浸在音乐和吉他声里懵懂毕业的。程琳、侯德建、邓丽君、费翔、罗大佑、童安格、张蔷、韩宝仪、齐秦……打动着一个个清纯年少的心。

当李敬阳吱吱嘎嘎拉着不成调的提琴练习曲，翟健烦躁地说，把曲子弹得流畅些（模仿《末代皇帝》中溥仪如厕时对钢琴师的旨意）的时候；当生物系罗文新清晨吹着凄厉的小号扰人清梦的时候；当深夜熄灯后我坐在计科系曲宁宿舍窗台上弹着吉他深情高歌《九个太阳》，唱罢得到喝彩却被楼下一个没情调的女生推开窗户呵斥“不是每个人都需要太阳的”的时候……都不会尴尬，只有开怀大笑和留到今天的唯美回忆。

由中文系 1982 级刘一民和杨树两位学长以及新疆班的部分学长创立的乐队，是武大通俗和流行音乐的渲染地，我们戏称为“大清炮队”。以《请把这张唱片留给我》为代表的原创歌曲的创作源源不断，经张震、刘晓霞、蔡青、我和邓峻等校园歌手和乐队的推广，在武汉大学、武汉测绘学院、华中理工学院、华中师范学院甚至江汉大学等校园里广为流传。当然，离不开刘伟等推手通过不亚于现在的微博、微信“群发”的女生曲谱手抄本的特色媒体传播（至



今我还琢磨不透这种媒体的精髓)。

学长们毕业后，由 1984 级的樊林、涂强，1985 级的我，还有 1986 级的罗文新等开始承继这支乐队，留校的刘一民学长时常指导并亲自参与。同时得到当时的校学生会主席历史系 1985 级的郭永航、副主席中文系 1985 级的卢雍政和新闻系 1985 级的窦文涛的鼎力支持。易中天老师双手插在牛仔裤兜里也时常光顾。

文化需求离不开经济基础，学校没有经费让我们瞎捣鼓这些。为了添置架子鼓和电吉他等乐器，需要“蓝精灵”和“绿蛤蟆”(当年武汉方言对蓝版百元钞和绿版五十元钞的俗称)。乐队只有办舞会来盈利增加收入，满足“艺人们”的烟酒消费。舞会上橘子粉糖精水(卫生程度优于现在任何一种饮料)成为掏空恋爱男生可怜腰包的工具。难怪我们的系书记记着嗓音说：“我们这个中文系，啊，平时是搞舞会，考试是搞舞弊(汉腔是押韵的)”。我罗列了一下当年的一些曲目：

1. 伦巴：《万水千山总是情》《阿美阿美》《常青树》
2. 慢四布鲁斯：《在水一方》《让我再看你一眼》《一帘幽梦》《望春风》
3. 慢三华尔兹：《月朦胧鸟朦胧》《垄上行》《大海啊故乡》
4. 快四：《粉红色的回忆》《莆田进行曲》
5. 快三：《波兰圆舞曲》《风流寡妇圆舞曲》

亲爱的女生们，想想哪支曲子响起时，你被男生邀请滑入刚刚清扫完五花肉的食堂舞池？

在分手的那一瞬间，让我轻轻说声再见，心中虽有万语千言，也不能表达我的情感。

在这短短的一瞬间，让我再看你一眼，不知何时才能相见，不知何时回到你身边。让我再看你一眼，看你那流满泪水的脸；

让我再看你一眼，我要把你留在心间……

(作者系中文系 1985 级校友)



歌声里，有一整个诚恳的时代……

王晓莉

伟文同学从微信发来几首当年的校园歌曲 MP3，并附言说：“关于我们的中文系，关于那时的校园歌曲，写点文字吧。”

于是，在四月初的这个下午，我试着开始听这些歌名即已透露其抒情气质的校园歌：《未来曾显得遥远》《你向我走来》《请将这张唱片留给我》……那感觉是奇妙的。它们是一些老歌吗？的确，关于它们，30 年前武大学子已耳熟能详，在樱园、桂园宿舍的每扇窗下，在校礼堂的舞台，哪儿没有响起过这些年轻的、不染尘埃的歌声呢？哪儿没有同学时时议论着、羡慕着演唱这些歌曲的人呢？

可是，30 年后，在我因听过人间无数种声音而变得有些挑剔的耳朵里，它们依然如此新鲜、耐听。就像玫瑰，每次开放都是新生。那歌中的迷茫，我依然理解；那歌中的深情，并未过时；那歌的旋律，有如海水，带来岁月的潮音。

我略带惊讶地听着，一遍又一遍。我感到 20 岁时候的血，又涌了起来。20 岁时候中文系的往事，又开始返回心中。

春阳微醺如酒，正适合陷入一段青春的回忆。这些歌曲，以及当年演唱它们的人，成为一条我回到 1985 级中文系、回到青春、回到 1980 年代的路径。

诗人多，个性美女多，还有，歌唱家多，是为武大中文系 1985 级的“三多”。歌唱家也有三大：吴伟文、刘晓霞、蔡青。在一首诗歌可以虏获女孩芳心，一把吉他、一副好嗓子可以征服整个桂园的年代，也就是说，在那个沉溺于美的年代，此三人是我们中文系 1985 级的骄傲。



该怎么描述他们的存在呢？这么说吧，他们的气质与性情，与中国戏曲的角色行当“生旦净末丑”有着惊人的对等关系。即使时光已过去多年，我仍然这样认为。

伟文是行当中的“小生”。他是安徽歙县人。白脸，清瘦，言谈举止皆若有情，徽州文化灵逸的一面在他身上得到很好的体现。他是当年武汉大学校园歌曲的主力唱将，他唱歌，嗓音天生带着深情，亦听得到黄山松风的高亢与低吟。我想起在中文系的晚会上，当他低头，拨起吉他，他与他的乐器融为一体。数年后，我又听到伟文唱辛晓琪的《味道》。我听得出他的嗓音已添加了一定量的酒、生活路途的奔波、熬夜后的些许疲劳，以及这一切的混合。然而，即使在这些沧桑之音的遮盖下，我仍是听出了当年的味道：那演唱时投入的深情，那对音乐无改的痴迷。

晓霞无疑是“花旦”。贵州遵义的妹子，形体娇小，活泼俏媚，带了贵州辣酱的鲜香与泼辣有劲。我读《射雕英雄传》，总觉得晓霞就是黄蓉那样的女子。然而当她开口演唱，台下寂静无声。我尚记得，当她与伟文对唱《你向我走来》，台上宛如一对金童玉女。而她唱邓丽君，几可乱真。外系也总有同学来打听，贵系的“小邓丽君”呢，我们则骄傲作答：住我对门呢。

而蔡青，则是端庄秀丽的“青衣”。我那时看她说话或是听她唱歌，总感觉她带了水意，逶迤而来，又漫漫而去，又神秘又清丽。也似是比同龄的我们要成熟一二分。当她开口唱《红楼梦》，“一个是阆苑仙葩，一个是美玉无瑕……”她的嗓音与歌词本身一样叫我惊艳，难以忘怀！附带一句，我记得蔡青是湖南人。中文系1985级的湖南妹子，王萍、范智红、蔡青，想起来个个都是要叫人翘大拇指。

孔子闻《韶》，“三月不知肉味”。伟文、晓霞、蔡青们演唱并不断在校园被莘莘学子们传唱的那些歌，是我们那时的韶乐。很多个夜晚，我们将我们的心，安放在诗歌里，以及，安放在这些歌曲里。我们在那些音乐里低徊不已，拿他们的歌做“酒曲”酿自己内心的一杯酒，抒自己青春的一份情。那歌声里固然也有青春特有的迷茫，却奋力向上着，渴望着有一个好生活；固然也遮不住青春的



华彩，底子却是朴素天成，无丝毫伪饰。

动听的歌好写，诚恳的歌却难出，因为要捧出一颗心。校园歌曲之所以动人，正在于每首都像捧出一颗心那般诚恳。

很多年后，我才明白过来，诚恳，那是整个 1980 年代武大学生的气质，也是整个 1980 年代的气质。在那个年代，青年去结诗社，非为获取某种资本或资历，只为“热爱”；青年去歌唱，非为商业，也只为“热爱”。青年心中什么都有：才华、诗情、爱，以及美，以及理想……只有一样是没有的，而那样东西却在后来的年代开始泛滥成灾，日益腐蚀人的灵魂。那样东西，叫做“世故”。

我非音乐界人士，然而仍可说，那时的武大校园歌曲已达到一个相当的高度。而中文系 1985 级的伟文、晓霞、蔡青们，当时如果为唱片公司所包装，他们或已成为知名歌手。他们毕业后若走上的是——一条音乐道路，也许现下正坐在某电视台选秀节目的导师位置上。他们的歌声绝不逊色于同时代的那些其他校园歌手们。

在他们的歌声里，有武大，有中文系，有我们的青春，有一整个诚恳的、高蹈向上的、理想主义的 1980 年代。

“我的青春！我不会回头呼唤……”俄罗斯大诗人茨维塔耶娃在她的《青春》一诗中这样写道。我也不会回首呼唤青春。然而，我渴望着，盘腿坐于珞珈山的绿草坪上，或是，在桂园某个朴素的夜，在学生宿舍的露台上，能再一听这些同学的歌声！

（作者系中文系 1985 级校友）



珞珈的流光

叶 慧

昨天去参加了武大校友聚会活动。我去得比较早，看到了冬日南宁的日落江景。

冬日的邕江十分宁静，波浪温柔，悄悄地浮着一艘渔船。落日的余晖淡淡地抹在蜿蜒的山顶上，橘粉、淡黄、葱绿、天青色依次变幻。

今年南宁的冬天分外寒冷，我戴了手套、绒帽仍得跺脚取暖。但是，看到眼前这一湾绵延的江水，不由得还是拿出了手机拍照留念，或许那一刻的宁静温柔清寂寒冷让人想留下来。

邕江和长江不一样。在我关于长江的记忆中，长江是和那些奔涌而来的浊黄的浪涛、码头边江水上长鸣的轮渡以及冬日江水退去之后的开裂地块联系在一起的，与邕江冬日这丰沛的江水江边盎然的绿意很是不同。

这两条江和两座城市——南宁、武汉联系在一起。两条江也像两座城市性格。

我在武汉度过了七年时光，一年多前因种种机缘离开了武汉南下，武汉的模样还是在心里。武汉热络、喧嚣，冰火两重天；武汉有容乃大，都市风景与老旧的街巷并存；武汉是一个永远不宁静的城市，始终像个大工地；武汉亦有那一份清新文艺气息，珞珈山粉白的樱花，疏懒的松叶，水果湖安静的街道，是我最喜欢散步的地方……

校友们聚在一起畅谈过往，互致新年祝福。年长一些的校友谈起在武汉的时光，都很激动，一幕一幕记得清清楚楚。我不由得有



些唏嘘，在武汉的日子，或许是我们最美好的时光，而当时的我们又是惘然无知的。因为我们也有学业的压力，也有就业、未来这些宏大而又摸不着的东西给我们带来的迷惘。我们会沉下心思，漫步至腊梅淡黄色的小花瓣旁，感受那一缕若有若无的暗香吗？我们会在早晨少人的时分，与那一树一树的樱花喁喁交谈吗？我们会在夕阳西下的时刻，登上樱顶，在斜阳中与青绿飞檐融为一体吗？

天地玄黄，宇宙洪荒；日月盈昃，辰宿列张。我也是在将要离开武汉的时刻，牢牢地记住了老斋舍的这些名字。一个年近天命的师兄还记得自己住在天字斋。我不由得轻轻在心里默念起了这些出自《千字文》的老斋舍的名字，这些现在仍存于我记忆中的名字。

追忆似水年华，小玛德莱娜点心支撑起普鲁斯特的回忆大厦。也许有时是需要一些生活的片段，比方说今天温柔静谧的邕江，这样的景致让你停下来，静下来，回忆过去的一些东西。而回忆的过程则像是一张网，滤去那些伤怀的、难过的，留下喜悦的、感动的。记得那年中秋和娜娜、老谢、韬哥一起在东湖边看月亮，我们有那么多有趣的事情分享，抚掌大笑，碰杯不断；还记得站着听八十开外的马克昌先生演讲，老先生风趣幽默地聊着被反右、文革耽误的三十年时光；还记得那时通过了司法考试，大家一起去华中师范大学吃小火锅，牛肉的、排骨的、羊肉的，我们要了所有的种类；还记得那时结伴去凤凰旅行，我们一起搭黑车，在怀化蜿蜒的公路上放声歌唱《最珍贵的角落》，一起泛舟沱江，笑容伴着清亮湍急的江水荡漾……

其实离开也没多久，却好像在回忆很久之前的事情了。或许时光是最好的雕塑家，雕塑了我们的容颜，也成就了我们的现在与未来。朋友们联系不多，但也一直在分享着他们的生活。一起看月亮的他们，去了离我好远的北方了，订婚了，买房了，找到心仪的另一半了；一起吃火锅的他们，去深圳了，去北京了，去重庆了，回河南了；一起去凤凰的他们，有的在为尚未面世的宝宝深情写诗，有的在家乡享受和家人团聚的欣喜，有的仍保持哲思、佳作不断，有的已隐隐有民权大律师之象。他们生活的艰难与美好，有时也给我一些启示和鼓励。有时看到、听到一些不平的遭遇，一些难言的



苦衷，一些爱侣变怨偶的故事时，我也不免怅惘。我的朋友们，新近的照片上的你们还是这么年轻，还是这么意气风发，笑容还是这么爽朗，还是这么努力、这么认真，让我相信，生活不在别处，幸福就在我们身边。

校友聚会之后，我走在青秀山边的路上，车子一辆辆从身边经过，我贪婪地呼吸着空气中树叶的清香。空中挂着大大的月亮，一会躲进云朵里微笑，一会俏皮地露出圆润的脸。已经有多久没有看过夜空了，又有多久没有什么都不想只是散散步了？

伏尔泰说，所谓的命运，就是考验、惩罚和奖励。我想，在珞珈山的时光，是命运给我的奖励，也是我自己给自己的奖励。

珞珈的流光，当时只道是寻常。

（作者系法学院 2011 届研究生校友）

校友文苑





回 珈

陈 勇

一座山的高度，不在乎目测
在于你眼中，它撑起怎样一个世界
那些曾经爱慕过的美丽和繁花
在桂香、樱白、梅笑与枫红编织的幕布上
情愿把所有青春都托付，一代一代
把一座山堆垒得无比巍峨、醒目
每个人都可以遥看，从更加年轻的背影中
认领那些一夜走失的光阴
而每次回来，记忆的行李叮当作响
往事又像新上的咖啡一样烫口
珞珈山似乎还在不停地长高
不断赶来增援的美感，让镜子惭愧不已
回珈，在微微鞠躬的尘土里
这样的归途舒卷的不只是风和彩虹
我仅仅借出了一小片肺腑
呼吸收纳的，竟是这世间最美的星空

（作者系中文系 1985 级校友）



当珞珈把一世的浪漫交付你我

陈 勇

当珞珈把一世的浪漫交付你我
巨大的幸福，在山顶云集
又化作一场花雨，洋洋洒洒
瞬间弥漫了每一片有缘的心空

伫立金秋，我深嗅的第一缕桂香
贴着微凉的夜，收复了一段初梦
这难以抵拒的香袭，经过了你
也就俘获了我，比任何爱都更坚执

樱桂同发啊，你的春与我的秋，奇迹般叠合
这意外的种子，穿越一个多世纪的动脉
在樱花大道，驰骋游子们记忆的神经
在梅园操场，总有一部电影撮合各种美好

最好的见证就在这里
无论是一块石头恋上了一朵花
还是柔情的湖水托付了一座山
都显影于我们深情对视的眼波里

我们被这一山一水、一草一木的灵犀所滋养
情愿把一生的欢喜，都锁入这紧握的双手



一起去触摸不被时光腐蚀的青春
一起来膜拜护佑我们的灵魂

此刻，我脆弱的小心脏，比沸水还激动
一座无比巍峨的山，可以精炼成钻戒
戴在最值得铭记的故事的柔指上
把两颗心打一个结，系在风的领口

这无与伦比的醉美时刻
日月相依，山水相连，十指相扣
浪漫永续珞珈，你我相许珞珈
一切爱都将在此悄悄汇聚，落地为家

（作者系中文系 1985 级校友）



满江红·井冈山行

邓少君

井冈山麓，翠叠嶂，同窗欢跃。
忆珞珈，四载寒暑，情谊可列。
俊郎美娃恰芳华，学海遨游不停歇。
喜今朝，寰玉宇琼洲，皆仁杰。

登赤峰，承先烈，洗铅华，拓新业。
知天命，绝伦征程刚越。
梅桂霜雪蕴鸿猷，执手相看真如铁。
待秋枫，夕阳更逍遥，彪史册。

（作者系图书情报科学系 1984 级校友）



同窗聚会

冯从善

萍水相逢喜有缘，如歌岁月忆当年。
人生起步同规划，学海求知共讨研。
朝夕不离磨铁砚，风华正茂说明天。
名山名水钟灵处，永结金兰友谊传。

珞珈一别久西东，虎跃龙腾各展雄。
搏雨搏风留灿烂，为家为国建勋功。
几回梦里期重聚，此日席前庆再逢。
美酒同斟杯一盏，明朝赶路好乘风。

（作者系历史系 1965 级校友）



七律·七十述怀

胡德坤

七十人生弹指间，珍分惜秒未曾闲。
心仪珞岭嘉华去，情系珈山白发添。
二战风云寻正史，海疆曲直觅真源。
夕阳尚有余晖在，装点晴空霞满天。

（作者系历史系 1964 级校友）



告别武大

河南校友会 2010 届社会学专业本科毕业生集体创作

第一章 我的大学

你的美，是一种看尽繁华的沉静
老斋舍高耸的塔楼上，飞鸟默默地彷徨
鉴湖畔，春风吹皱午后炫目的阳光
细柳轻垂，写下难解的文章
梧桐叶落，湮没了行人的足迹
静无人处，寂寥小花散发淡默芬芳

你的美，是只有走近，才能读懂的诗行
是飞鸟接群，织成珞珈秋色的层层彩帐
是蝴蝶翩跹，落在野花盛开的亭亭回廊
是独自一人，走在晚樱盛开的情人坡上

你的美，不会在游人如织的绚烂樱花下绽放
只会在一切都被微风醺醉的时候
悄悄地进驻我们身旁
仲春樱园内，有梅影摇曳，花浮暗香

你的美，隆冬凌波外，有飞鸟绝迹，雪锁湖塘
是清晨倚门远眺的，孤鹭伴日飞向磨山



是傍晚奥场长待的，牛郎织女隔河相望

武大啊，我的大学

你最美的时刻

是银杏满地，梧桐被秋风渲染得金黄

是大雪笼罩，老图被银白映衬得端庄

是清晨，阳光下樱花飞舞的哀婉惆怅

是午后，邂逅满坡鸢尾的独自彷徨

是深夜，雨水敲击石面弹奏出的优雅乐章

武大啊，我的大学

你的美，弥漫在整个珞珈山上

东湖烂漫，闪烁着柔情的波光

弘毅自强，撑起不屈的脊梁

想要与你倾诉啊，我却要回归故乡

你的美，带着无法言说的感伤

第二章 与你告别

六月的光阴，毕业的礼服

近处笑影留痕，绚烂明媚远方

夏至未至，等不及秋风染红惆怅

心之所至，已嗅到未来翩跹的芬芳

青春不散场，唯有我们用心追寻的梦想

青春的相册里，你我笑靥如花

笑容藏心，让时间驻足彷徨

托版装裱，将回忆镶嵌入行

下一个春秋，利用闲散时光

一笔一画书写出属于你的精美诗行



等待来年花开，花开人笑，
等待幸福的味道盈漫远方
经历一路风霜，也能沐浴一身暖阳

蜕变，成蝶
振翅，飞翔

走向明天又怎能把昨日遗忘
相遇、相识、相知，瑰丽的宝藏
细数过往历历光影，馥郁恒香
请勿淡了牵挂，浅了念想
放我在无边的心上
留给彼此美丽一场

往前走，那里有快乐相伴左右
幸福像痛楚一样明显
往前走，那里有光影笼罩云层
明亮与黑暗一道同行

一眶泪水，话别凝成水晶
不挽留，不哀伤
温暖手心，放在你我肩膀
不遗失，心珍藏



一剪梅·鲲鹏广场

怀 俊

冥北鲲鹏落此间，沉静千年，直到当前。
轻舒金翅九霄旋，击浪滔天，鸣振人寰。
鸟瞰珞珈苍翠园，典海籍山，师圣学贤。
精培俊彦五十千，立地擎天，梁栋扛肩。

(作者系数学系 1952 级校友)



2016 年“校友年度捐赠”附诗二首

孔令仁

一别母校数十年，半辈奔波能动艰。
黽勉尽职无悔恨，薄材绵力自羞惭。
余生还恋东湖水，剩梦企翘珞珈山。
为心共襄强校志，微囊添瓦肝胆宽。

一钱半力劲薄微，尽心持意自矜菲。
平生不忘恩师教，饮水思源甘忤羸。
六载身心金百炼，半世风雨碧四维。
南望珞珈新美景，众拱樱顶硕黄辉。

（作者系原水利电力学院电力系 1962 级校友）



三月的樱花

李福信

春风吹过来了
心忽地蹿上了云天
那个如云雀般的女孩
还在快乐地歌唱吗

三月的樱花开了
美丽的彩裙飘过了窗外
那牵动我眼眸的青春背影
会是那个同桌的小芳吗

珞珈山上
千秋塔旁
江山如画瞰湖光
校园里
那个一起看露天电影的女孩
还芬芳在樱花漫天的大道上吗

老斋舍内
碧海青天
少年趣事话流年
窗台前
那捧卷展读的清丽身影



是那个留着长辫
骄傲答问的女孩吗

三月的樱花
你快些开
快些开
让我们青春相拥
翩翩起舞于茵草地
跌落笑声在花丛间

三月的樱花啊
你慢些开
慢些开
我怕
这姹紫嫣红的花期
转眼飘零在天边
我怕 我怕
那个如花的女孩
一转身
就消失在茫茫的花海中

(作者系经济管理学院 1985 级校友)



长在春天的珞珈山上

李立屏

山上的树
过着和我不一样的生活
它们结出的种子
是我的水果
它们呼出的气息
是我赖以生存的根本
它们朝饮晨露，昼食太阳
它们凝重缄默，夜沐月光
鸟是自由的爱人
歌才欢快嘹亮
藤是懂事的孩子
天天相伴
日日承欢
我不想再去繁华
就长在春天的珞珈山上

（作者系日语系 1983 级校友）



七律·珞珈山

刘鲁颂

浩如烟海览东湖，
学子离乡此境殊。
慷慨讲坛风撼树，
琢磨经史贝生珠。
才情高蹈桂华自，
气质清奇梅萼出。
多少凭栏明月夜，
珞珈南望照归途。

（作者系中文系 1985 级校友）



告老还乡有感

刘 征

风雨兼程十五秋，
耕耘不息孺子牛。
峥嵘岁月堪回首，
苦乐酸甜不言愁。
幸有挚友诚相助，
柳暗花明登坦途。
古稀之年还故里，
颐养天年水长流。

（作者系物理系 1963 级校友）



九十抒怀

闵朝斌

相知相随复相助，经年濡沫乐悠悠。
往事烟云忆无益，昂首健步向前走。向前走。

(作者系工学院土木系 1953 届校友)



贺闵朝斌学长九十大寿

罗肇森

人生七十古来稀，吾君九十仍高志；
三年磨砺成硕果，百木丛中见灵芝。
宁弟遥祝矍铄寿，更望南山超期颐！

（作者系工学院水利系 1953 届校友）



东湖赋

陶佳珞

悠悠古城，巍巍武昌。天赐明珠，辉耀东方。烟波浩渺兮蕴人间风雨，湖岸逶迤兮演岁月沧桑。

君不见，楚庄督阵鼓声响，请和桥下敌将亡；屈子忧国仰天啸，泽畔行吟泪沾裳；刘皇叔祭天祈福报，李谪仙放鹰怜雏伤。楚地雄风今尚在，长天楼上看沧浪。

君不见，张香帅筑金青双堤遂江湖两分，周苍柏建海光农圃而名重一方。中兴之臣建宏业，东湖之父载史章。

君不见，皇皇黉宫拔地起，百年学府弘毅自强；巍巍博馆立湖畔，千秋瑰宝惊艳绝响。人文荟萃，群贤雅集，湖山增秀，桃李芬芳。

君不见，梅园明月映伟人身影，谈笑间运筹帷幄；湖心小亭留旧主遗迹，仓皇时画壁难张。

嗟夫！枕流听涛看云舒云卷，淘石吹笛观世衰世昌。一代风流俱往矣，如椽新笔重绘山色湖光。

美哉！春樱含羞，夏荷滴翠，秋菊染金，冬梅傲霜。绿道蜿蜒，千年之作，渔舟轻泛，八面茶香。百岛如星六峰连，四季美景一湖藏。野趣人文兼楚韵，不逊西子浓淡妆。

幸哉！生于斯长于斯，倚珞珈秀峰，观柔水汤汤；祈湖天永清，百鸟竞翔，荆楚儿女，再谱华章！

（作者系中文系 1984 级研究生校友）



珞樱赋

陶佳珞

江城仲春，莺飞草长，东湖粼粼，珞珈苍苍。梅香已随寒风逝，桃蕊正迎丽日放。奇哉！樱似一夜雪浪涌，银花漫天，独领春光。素练凌空，惊嫦娥之幽梦；绣袂弄云，赛瑶姬之霓裳。虽逊梅之风骨，犹有玉树之逸韵；不竞桃之秾艳，却溢琼花之清芳。银龙舞翠峦，巍峨添灵动之气；玉带映黄舍，恢宏增秀华之光。莘莘学子，年年花下赛诗会；熙熙游人，岁岁云海乐徜徉。美哉！不信人间美如斯，只疑仙境从天降！然佳期苦短，胜景不常，风扫云散，红雨茫茫。明媚鲜艳曾几日，一朝飘落太匆忙。清泪漱漱，忍辞嘉木；玉蝶纷纷，欲往何乡？实堪伤，幸留君影慰思量！君莫叹，虽输苦雨三两日，已赢颂诗万千行。明春傲然归故里，又令桃杏空惆怅！

（作者系中文系 1984 级研究生校友）



春 分

夏 斐

我坐在这里想你
风从云中钻进来
阳光跳过树梢
渗透脸皮
我闭上眼睛
呼吸着春的声音
花儿都红了
张开衣裙
或者毛孔
大河奔流血脉贲张
你，正走过田埂

（作者系中文系 1984 级校友）



珞珈缘

于 刚

时光荏苒，仿佛昨天。
母校常萦绕在梦里，星星点点。

是迎着晨曦在樱花道上早读，
还是伴着夜幕从图书馆晚归；

是在足球场挥洒汗水，
还是去东湖戏水荡船；

是搬着小凳去操场欣赏电影，
还是寻找那音乐声处舞姿翩翩；

是在实验室测试刚装好的电路板，
还是去教学楼自习孜孜不倦；

是在歌咏会上一展歌喉，
还是在运动会上短跑跨栏；

是在考场上冥思苦想，
还是完成作业后的舒心开颜；

是结队骑车去磨山春游，



还是邀友去享受豆皮热干面；

是放暑假前的切切等待，
还是开学前的殷殷期盼；

是登黄鹤楼遥看长江天际流，
还是访归元寺观千姿百态的罗汉；

是去聆听大师谈古说今，
还是牵手在林荫道上初恋；

是那郁郁的桂花飘香，
还是姣姣的梅花争艳；

是刚入校时的忐忑，
还是拿到毕业证书时的自豪感；

是初识学友时的青涩，
还是离别时难舍难分以酒代言。

母校让我们化蛹为蝶，
是我们人生远航的起点。

母校给我们最大的馈赠，
是胸怀，智慧，坚韧，信念。

胸怀让我们成熟、涵融、大度，
智慧给我们知识、视野、远见。

智博慧渊难求尽，生命绽放数十年；
海阔无涯天为际，山高绝顶宇为巅。



坚韧使我们开创事业时
经得起折磨，
耐得住寂寞，
忍得住诱惑；

信念使我们追求梦想时
迎难而上，
遇险而化之，
视苦为等闲。

永远传承吧
那母校的精神；
永远光大吧
那母校的馈赠。
永远珍惜吧
那同学的情谊。
永远封存吧
那曾经的青春。

(作者系空间物理系 1977 级校友)



八十抒怀

叶国源

人生转瞬耄耋年，
酸甜苦辣三万天。
淡泊名利执教鞭，
物质功过放一边。
均衡饮食除陋习，
平和心态体常健。
甘为人梯如红烛，
夕阳美景谱新篇。

（作者系中文系 1957 级校友）



珞珈红

杨光芷

珞珈吹雾净，
旭日出湖东。
山径万般绿，
树丛一点红。
从容她笑问，
羞怯余无声。
母校太多事，
至今牵我魂。

（作者系中文系 1955 级校友）



武大的树

喻 杉

离开珞珈山已经 20 多年了，武大的树，却仿佛一直长在我的脑海里，根，愈扎愈深，叶，愈长愈茂。

珞珈山的名字，由闻一多先生而来。珞，是坚硬的石头，珈，是女子的饰物，一刚一柔。而长在珞珈山上的树木，树干坚硬挺拔，枝叶摇曳婆娑，也是一刚一柔。刚柔相济，这也是武大人的性格。

当年，我们走进美丽的武大校园，树，就和我们朝夕相伴。

那些新栽下的树，纤弱，稚嫩，但是生机勃勃，就像刚刚走入校门的新生；那些正值壮年的树，郁郁葱葱，正在撑起一片蓝天，就像那些在讲台上讲课，在实验室里研究的先生；而那些饱经沧桑的老树，树干布满了皱纹，每一条皱纹里，都蕴含着武大的历史，多像武大的老教授和老校长们。

树，就是武大，就是武大的先生和学生们。

早春，我们看到樱花盛开，艳丽的色彩一扫冬日的阴霾。

盛夏，我们感受梧桐带来的阴凉，知了的歌唱带来夏的热烈。

金秋，我们恣意畅享桂园里扑鼻的香气，金黄的落叶在脚下铺平了道路。

严冬，我们伫立在松树之旁，领略梅花的不畏严寒，品味凛冽风中的暗香。武大的树，一年一年轮，一季一景色。像这些武大之树一样，武大学子在珞珈山上也为自己刻上年轮，同时，也在自己的心头涂上浓浓的绿色。

这是希望之色。



武大的树是有魂的。

其实，刚柔相济就是武大树魂，说刚，他不畏强权，不畏艰险，勇于向上，勇于登攀；说柔，他善于同其他树木相依相存，善于从各个角落汲取养分，善于生存在任何地方。

武大的学子也是树，是带着武大之树的魂魄走向四面八方的。武大学子的根不管植于何处，总会有一支伸向珞珈山。因为，武大的养分，还在源源不断。

感谢你，武大的树。

（作者系中文系 1980 级校友）



水调歌头·中秋忆珞珈

杨宜城

秋月最明亮，珞珈如明珠；
长空流风白云，最忆青春殊。
东湖击水飞溅，黄门攀尖登顶，乘势向寰宇。
颂我武大郎，立国学汉武。
天地长，人世短，有几许？
少青中老，历经艰险如过隙。
耄耋之年将至，怀旧迎新双愉，千里婵娟途。
颂我珞珈人，以一生相许。

（作者系物理系 1960 级校友）



赞 美

阎 志

我要把春天的第一首诗
送给你
把怀念、生长、赞美写成一首诗
送给你
阳光正好
虽然时间从没有为什么
停留过
但是我还是要
最早的春日
把第一首诗送给你
虽然我可能不会
再写第二首
关于春天的诗

(作者系经济与管理学院 EMBA2006 级校友)



红叶之歌

——45年重聚首

邹昌仁

九月秋残秋无穷^①，珞珈山上秋叶红。
谁把秋林付丹青，一卷斑斓秋韵浓。
山前国立大校门，满头飞霜三十人。
四十五年重聚首，执手相看问姓名。
当年满怀报国梦，攀登誓欲作梁栋。
粤语吴音聚此间，弦歌笑语朝夕共。
图书馆里数学楼，活页讲义大部头。
夜深灯下相砥砺，辨疑穷理总不休。
宏图壮丽催人奋，热血如沸浑身劲。
忽然乌云蔽红日，校园停课闹革命。
满腔怒火讨黑帮，烧书焚砚肆疯狂。
龙争虎斗无宁日，举头四顾何茫茫。
一朝分别路漫漫，山高水阔情难断。
世路风尘音信稀，花朝月夕同思念。
秋去春来岁月添，拖家带口到中年。
报国不甘空有梦，五更早起夜迟眠。
夏日骄阳冬日雪，三尺讲台度岁月^②。
磨穿子石绝韦编，转眼花甲头已白。
东湖携手总难忘，年到古稀情更长。
盼望重聚珞珈山，推心置腹品茶香。
班长精心作筹运，众人协力齐推进。



旧照一张识容颜，三十九人全名姓。
匆匆一别信渺茫，悠悠岁月去何忙。
笑貌音容犹昨日，而今踪迹在何方？
回到母校查档案，再向各方发函电。
海底有针终可捞，不信故人不得见。
七月炎炎汗如蒸，星空遥望寄情深。
精诚所至金石开，粤南桂北报佳音。
金恒小弟传捷报，俘获大郭殷二道^③。
治国不便作远行，一声问候先送到。
友情接力相传递，辗转寻到熊锡义。
感动同窗一片诚，紧挽爱妻来相聚。
亲兄弟，好同窗，珞珈山上聚一堂。
见面几多心里话，细语轻柔问健康。
一睹校训情难控，燃起当年报国梦。
登高一望眼界开，满山红叶齐飞动。
红叶灿烂胜朝霞，古稀正是好年华。
激情犹是东湖水，澎湃扬波溅浪花。
湖光潋滟映山色，湖光山色得宜彰。
楼台隐隐山光里，满园花香伴书香。
相携流连樱花道，图书馆前争留照。
当年学子又重来，似投母亲暖怀抱。
旧舍唤名洪子斋，门前踯望意徘徊。
人云住此多洪福，今生难忘百八阶。
图书馆东文学院，重来还如初相见。
对面凝神久伫立，耳听慈母在呼唤。
林间朗朗吟诵声，翩翩学子正年轻。
使我青春能从头，还来武大做学生。
谈心漫步江滩游，乘兴更上黄鹤楼。
友情绵绵说不尽，长江滚滚向东流。
多情堪赞程相甫，一声招来小公主。
举止落落仪态方，众人观女如见母^④。



推杯换盏鑫华楼，举箸击盘作歌讴。
人生能得几回聚，同窗须得几世修。
岁月难驻容颜好，但祝此情长不老。
相期二零二零年，三十一人都不少。
分别日长聚短暂，永存心中是思念。
回眸凝望珞珈山，满山红叶正娇艳。

注：①聚会时间是2015年11月7、8日，夏历九月二十六、七日，节令正值秋末临近立冬，而大地还一派明丽的秋色，故有此语。②班上绝大部分同学都在大、中学校从事教育工作，故有此语。③金恒、大郭、殷二道及下文中的治国、熊锡义都是本班同学。④程相甫及其妻都是本班同学。

（作者系数学系1970级校友）



蝶恋花·忆念

钟道才

远别珞珈忆当前，樱花园内，莘莘学子勤钻研。烈炎之下测地貌，夜观星斗定北巅。

图书馆外舞蹁跹，体育馆上，团日生活各掏心(窝)。斋舍高歌东湖荡，离后情牵若干年！

(作者系土木工程系 1953 届校友)



珞珈赋

张恩东

龙兴东土，脉起中州；地衔荆楚，气冲牛斗。统三山而治五岳，汇百川而通四海。神仙洞府，菩萨过而落袈；皇天后土，帝子巡而揖首。飞檐走壁，驾祥云以凌霄汉；雕梁画栋，携彩霞以呈锦绣。神农天降，大禹君临；龟蛇相嬉，江汉汇流。

上巴陵，下吴越，跨梅岭，过京都。分合有数，择晴川以成高阁；尊卑有序，舞黄鹤以筑重楼。洪山宝刹，镇十方世界；云梦古泽，吞六国春秋。

凤鸾昭仪，春和景丽。燕戏鱼水，风摆杨柳。琼浆玉液，醉群峰于粉黛；金钗罗裙，拢轻烟于香袖。暖云移时，雨花飘絮；青丝垂爱，蛾眉含羞。樱杏妖娆，藏百花之柔情；桃李娇秀，透千卉之清幽。梨树海棠，蔷薇牡丹；紫荆玉兰，迎春石竹。花各有主，不压无名之枝；情皆有姻，不牵无缘之手。

赤帝盛德，泽润夏口。百花献瑞，千湖卷轴。巍巍华冠，盖宇宙之神器；炎炎金轮，御天地之绸缪。归元立庙，长春布道；赤壁遣怀，琴台谐奏。青山未改，主日月之丹心；长河涇流，续洪荒之源头。奔雷来袭，暴风骤起；疾电破空，狂雨低吼。万千气象，皆随君子之一念；无限江山，不离圣王之左右。

紫微下凡，适逢秋候。枇杷黄熟，石榴红透。嫦娥奔月，迎圣驾于九天；玉女投梭，传帝恩于八周。金风送爽，丹桂飘香；仙荷摇艳，芙蓉吐幽。仰观无极，启太上之枢纽；俯察经纬，体苍生之所求。三才齐显，五蕴俱化；六合同顺，七道皆守。彩虹开霁，映碧空于澄心；宝象中天，转乾坤于未有。



香妃神韵，傲立冬雪；冰肌晶莹，冷月明眸。婷婷袅袅，凌绝世之风华；行行款款，携异域之豆蔻。雪莲俏丽，沁人心脾；梅兰绰约，端谨嘉柔。疆无内外，遇仁者成一体；人无远近，逢知己则相投。清清爽朗，善驻四方；白白皑皑，芳留永久。宛若处子，佩完璧以示节操；贞如烈女，取大义而忘身后。

一山一石，各抱奇志；一草一木，自韵风流。或隐或显，皆从天机；或济或收，俱有定数。

（作者系英文系 1984 级校友）



七律 · 酬答原《湖北日报》文艺副刊主编张宿宗惠赠书法大作

曾世竹

书圣兰亭万代传，
惊龙矫舞入云天。
自来仰止唯先圣，
岂料敬钦有后贤。
潇洒俊逸绝世俗，
动心骇目见深渊。
誉驰洙泗一俊杰，
饱蘸春光挥大椽。

（作者系中文系 1958 级校友）



东湖赋

邹惟山

东方之景，在于一湖；天下之观，在于一山。武昌小城，以长蛇为中；汉口大池，以大别为案。近之沙湖，任桐沉醉之岸也；远之琴台，子牙记忆之风也。滔滔长江之水，日夜奔流，而东往也；沉沉京广一线，隐约奔腾，而南去也。长江之左，有衣裙蓝色飘飘，乃东湖之水；京广之右，是茶烟绿色袅袅，为九峰之林。东湖者，汉口隔江而望，武昌伸手可触也。珞珈者，江夏穿水而至，青山转身而抱也。东湖者，东方之大湖，天下之巨盆也。珞珈者，楚人之胸怀，荆襄之文眼也。

亚洲城中湖之最大者，天下内陆湖之至美也。大湖之东者，为青山之烟，远而观之，现代产业之气象也；大湖之西者，乃珞珈之云，近而观之，世界最美之校园也。大湖之北者，政府要地所在也，远而观之，荆楚之中枢也。大湖之南者，楚天之高台，近而观之，国之森林之根也。东方山水，西湖多矣，而东湖一也；世界江河，南湖多矣，而北湖一也。西湖名气之大，在于人文之深厚，大如东方之海也；东湖心胸之阔，在于珞珈之绵延，高似西方之山也。西湖、北湖、南海者，以东湖为首也；南山、北山、西山者，以东山为高也。

东湖之巨者，磨山与珞珈之间，百里波涛，亿年青峰也；东湖之大者，江夏与鄂州之际，百里桃花，万载波光也。东湖之低者，在于冬季，冰霜之冷，倒吸凉气也；东湖之高者，在于秋天，楚天之空，放飞神志也。东湖之大，乃西湖十倍之所形也；东湖之清，为长江汉水之所济也。东湖之恒者，在于一湖之碧也；东湖之变



者，在于九峰之色也。山水相竞，乃有天下之美景；江湖相济，乃有壮观之山河。

湖之美者，如春之婀娜而舞；湖之丽者，似秋之缤纷而唱。湖之醇者，冬之梅花似雪也；湖之厚者，夏之桃李缤纷也。沙湖之静者，不如东湖之宁也；南湖之秀者，不如东湖之浪也。梁子之阔者，不如东湖之广；汤逊之奇者，不如双湖之桥。春如美女，夏如美男也；秋似唐宋，冬如秦汉也！

东湖，山水之秀者，东方之最也。西湖之水浅如也，东湖之水深如也。西湖之山高耸也，东湖之山浑圆也。西湖有西泠，东湖有东林也；西湖有刘岛，东湖有梅岭也。荷花之阔大，东湖为胜；草鱼之肥美，西湖不如。西湖有苏堤，东湖有九龙之虹；西湖有断桥，东湖有放鹰之台。西湖有平湖秋月，东湖有百里长道也。

百里长道，让山水相接，四方相通也；绿道步行，助人在山水，天地相融也。东湖之水岸，半日方可回；东湖之绿道，三日才会去。居于桂子而望珞珈，与东湖有间也；行于东湖而望日月，和天地一体也。屈原行吟，而存大阁，元帅挥笔，而形巨碑。祝融观天，而见星宇；毛氏提手，而有《离骚》。彩笔挥洒，而有长卷；诗人听涛，而有丽辞；学子行走，而有美文。居正临湖，而翔九凤；之洞观雪，而有汉阳；贝娜戏水，而有凌空；徐帆凌波，而有唐山；一多望海，而有九歌也。楚天之台，登之而观三楚也；珞珈之山，居之而视九天也。

东湖之大者，在于文脉之深，古有屈子，今有东山也。东湖之巨者，在于教育之功，近有两湖，今有八校也。东湖之波，犹如诗人之风也；东湖之光，恰似学者之思也。珞珈之林，犹如文学之臂也；珞珈之石，恰似哲学之基也。吾辈向往，似珞珈之人也；时下风尚，如东湖之性也。

和平时代，再修长道，观东湖之水可行也；战争岁月，不筑小路，听九峰之风不便也。绿道建成，当为君子之行也；东湖永恒，从无小人之风也。闻此而喜，亦为之忧也。青山不可挖，绿水不可填也。千湖之省，何故减半？百湖之市，何故年小？南湖之水，让千户痛心；梁子之水，使万户难行。心胸狭小者，不可居东湖之



畔；惹是生非者，不要走东湖之道。阴阴阳阳者，不要观东湖之波也；背后算计者，不可吸东湖之风也。

江城之大，不如东湖之阔；大别之高，不似珞珈之神。如无东湖，珞珈无空灵之气乎？如无珞珈，东湖无哲学之骨乎？自然乃天地所造，永恒如斯也；人文为高士所凝，灿若星光也。民族之精英，在于创造之士；国家之栋梁，在于博学之才。东湖之岸有珞珈，上天之所赐也；珞珈之旁有东湖，上帝之所形也！

珞珈之黎明，千山竞秀也；东湖之黄昏，万水流芳也！

（作者系中文系 1993 届研究生校友）



武大同窗久别重逢

张文元

(一)

一别半百各东西，今喜重逢忆往时。
意气风发齐比翼，求学追梦秀雄姿。

(二)

珞珈学子报国执，海角天涯奉献时。
今老心红当互勉，再为圆梦写新诗。

(作者系经济系 1960 级校友)



《武大校友通讯》捐订名录 (2016 年1月1日—2016 年12月31日)

张孝烈	100	刘求长	200
唐秉仁	210	冯经益	100
吕金南	150	邓志贵	100
罗成明	120	王龙飞	300
唐寿同	2000	文治平	400
罗振之	1500	李道庸	200
李 钊	100	干相福	200
李金庆	400	蔡建章	150
汪广生	100	李承尧	200
宫荆江	100		



征订征稿启事

《武大校友通讯》由武汉大学校友总会编辑，武汉大学出版社出版。它是校友之间、校友与母校之间沟通信息、联络感情的纽带和桥梁，是广大校友共同的精神家园。刊物宗旨：传播母校信息，展示校友风采，联络校友感情，弘扬珞珈精神。

《武大校友通讯》每年出版一辑，栏目分为：卷首语、特别报道、珞珈人物、珞珈记忆、校友文苑。每年会根据实际情况增设“专刊”等内容，如今年就增设了“1986级校友专刊”。《武大校友通讯》以回忆文章和校史资料为主，偏重于校友对学校生活、昔日老师和同学的回忆，对学校历史事件及人物的回忆，使之成为史料价值高、值得收藏的校友读物。

《武大校友通讯》是校友自己的出版物，办好它需要充足的经费。我们借鉴兄弟院校的经验，采取校友捐资订阅的办法。《武大校友通讯》每辑工本费人民币48元。为使手续简便，希望您最好一次订阅两年，捐赠金额不限。捐订者可直接向校友总会办公室订阅，《武大校友通讯》将刊登订阅和捐赠校友的名字。捐款请汇寄至武汉大学校友总会办公室（邮政编码：430072）。

为了办好《武大校友通讯》，欢迎海内外校友踊跃投稿。来稿形式不拘，以真实、原创、传播正能量为原则，内容要与母校、校友活动、校友生活相联系，由于篇幅所限，来稿一般不超过5000字；各地报纸、杂志上发表的有关校友事迹的文章，也恳请大家积极推荐。

稿件请寄武汉大学校友总会《武大校友通讯》编辑部收。投稿电子邮箱：aoff@whu.edu.cn。

《武大校友通讯》编辑部

2016年12月



关于进行校友信息登记的通知

校友信息数据库是校友工作的基础，每一位校友的信息对我们做好校友工作都是十分重要和宝贵的。为进一步加强母校与校友、校友与校友之间的联系和沟通，恳请尚未到武汉大学校友总会登记个人信息的校友尽快登记。

请将个人信息通过电子邮件发送至 whdxxyzh@whu.edu.cn，个人信息含姓名、出生年月、入学时间、毕业时间、所在学院、所学专业、电话、手机、电子邮箱、工作单位、通信地址、邮政编码等。

校友变更已登记的个人信息也可发送电子邮件至 whdxxyzh@whu.edu.cn。

联系人：武汉大学校友总会办公室 曾荣 电话：027-68756019

武汉大学校友总会办公室

2016年12月